

庄景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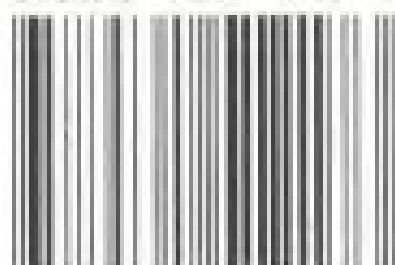
海外交通史之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福郎  
封面设计：蒋东明  
封面题签：吴孙权

ISBN 7-5615-1217-1



9 787561 512173 >

庄景辉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海外交通史迹研究



**庄景辉** 福建惠安人，1952年6月出生。197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海交史研究会理事，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泉州》(合著)、《陈墩丁氏回族宗谱》(编校)、《宋代商业史研究》(日译)、《郑和》(日译)等书，发表《明末清初福建的海商与陶瓷贸易》、《陈墩丁氏回族汉化的研究》等论文40余篇。

Adh/10



# 目 录

泉州子城址考·····	(1)
泉州罗城址考·····	(19)
泉州宋代祈风石刻考释·····	(37)
宋代泉州的石桥建筑与海外交通·····	(52)
泉州出土海船结构的历史分析·····	(68)
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	(79)
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	(99)
圣墩顺济祖庙考·····	(111)
《天妃灵应之记》碑考·····	(137)
郑和行香碑考·····	(158)
郑和舟师驻泊福建的航次与时间·····	(174)
随郑和下西洋的福建人·····	(187)
郑和宝船尺度的探索·····	(201)
明初三十六姓迁居琉球中的蔡襄后裔·····	(227)
泉州在明琉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	(252)
明初福建的海防建设及其遗迹·····	(265)
明清时期泉州青花瓷的生产与外销·····	(307)
明末清初的福建海商与陶瓷贸易·····	(313)
后记·····	(329)

# 泉州子城址考

往读地方志乘,见载泉州古城址者,皆语焉含混且互相矛盾,对其创建人、时间,以及垣壕基址,未获其详。同时,随着历史的变迁,城垣或坠废、或毁拆,已经荡然无存;城壕或湮淤填塞、或房舍掩压,所见遗迹无几,难得考古实物之资料。可见,泉州古代城址的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1980年,陈允敦、庄为玑两先生在《泉州文史》第二、三期合刊上,分别发表了《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sup>①</sup>二文,首先对泉州子城和罗城遗址作了考察和论证。然而,他们所得的结论却是不同的,分歧的焦点在于子、罗城的创建年代。前者认为“罗先子后”,后者指出“子先罗后”,各执己见,莫衷一是。1985年以来,双方又撰文就所持之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辩<sup>②</sup>,把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这样一来,对泉州古代城址的探讨,便愈显必要了。

从笔者所涉猎的有关资料来看,泉州古城址的问题,并不象有

---

① 《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又载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② 参见庄为玑《泉州古城址的再探索》(《晋江地区社联通讯》1985年第4期);陈允敦《期望庄为玑教授对泉州古城的三探索》(《泉州学刊》1986年第2期);庄为玑《三探泉州古城址》(《泉州学刊》1986年第5期);陈允敦《泉州子城和罗城的创建孰先孰后》(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印,1987年)。

的人所说的那样,真相已经大白,问题已经解决。笔者认为,目前的讨论乃至争辩,仅仅是泉州古城址研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因此,笔者试图在这方面作些探索,抛砖以引玉,来推动泉州古城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本文,先就泉州子城的形制、创建人及其年代、存在的时间略作考证和辨析。

—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载子城之形制云:

子城在罗城内,……周三里百六十步,为门四:东曰行春、西曰肃清、南曰崇阳、北曰泉山。……子城外壕,环绕子城,广深丈余,壕皆有桥。

府志对于子城规制的这一记载是极其简略的。如今城垣已不复存在,四城门楼中的北门楼“早废”,东西南三座,经历代重修保留至抗战期间也被拆去了<sup>①</sup>。不过,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福建泉州工务局测量队制、泉州南街同文斋印的《泉州市图》上,则标有东西南三城门楼的位置,那座早废的北门楼,据说原址上仍筑有称为“泉山宫”的小神龛。由此倒可见着子城四门楼的确切位置,即东之行春门位于今门楼巷口东街上;西之肃清门位于今井亭巷口西街上;南之崇阳门位于今承天巷口中山路上;北之泉山门位于今孝悌巷口中山北路头。这就为我们揭示了子城的座落方位及其大致范围。但是,要了解它的具体形制,在城垣已无迹可考的情况下,只有抓住“子城外壕,环绕子城”这一特点,借助子城壕的有关记载及其遗迹去追寻。

方志中对于子城壕的记述,万历府志过于简略,乾隆府、县志

<sup>①</sup> 王连茂:《泉州拆城辟路与市政概况》,《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记之有误,唯道光九年(1829年)修纂的《晋江县志》,不仅所载较详,而且对前志的错漏之处作了“改订”。下面,根据县志所载,以子城北门外位于泉山铺示现庵前的泉山桥为基点分述之。

自北向东而南的城壕,由示现庵内后壁穿出,经白狗庙后,出弥勒宫左,再伏其势由府城隍照墙外接梅花桥。梅花桥在广平仓口,壕由此南折,从小涵透至霞田池下河,延与行春门外的迎春桥相接。迎春桥原位于近美里巷口,桥壕俱不存,桥之向北水关在相公巷中营守备署门路内,向南水关在鸚鵡山窟,嘉庆九年(1804年)浚沟向北水关尚存。迤而东南至登瀛桥,桥在桂檀巷尾伯府埕头佛祖宫前,宫直跨壕上,水从鸚鵡山窟穿承天菜园乃至北桥,下用横板上用小板直铺,以不悟行者,宫后壕甚显明。

自北向西而南的城壕,由泉山桥至裴巷东新街西清军驿前的坂仓桥,桥存壕塞,沟路已失,水势从花山涂窟面来,下接肃清门外井亭巷口的肃清桥。此桥壕俱存,但为民居压塞。迤而西南至放生桥,桥在梦果巷(即花巷)尾真济宫前,宫直跨壕上。

南壕出梦果巷口,下入小泉涧巷,过直跨壕上的登贤桥宫后,由傅池亭出清源书院口,下一桥入书院池透至登瀛桥,而后由登仙桥(即离井桥)出通淮门<sup>①</sup>。

以上是《晋江县志》记载的距今一个半多世纪时的子城壕状况。可以从中看到,早在170多年以前,子城壕便难窥其全貌了。但是,尽管有的“桥存壕塞”或“桥壕俱不存”,有的“宫直跨壕上”或“民居压塞”,已经“缺环不周”,可它的来龙去脉却是清楚的。由壕环城面推之,子城垣大体上由东西南北四城门作横向趋直线而筑,相交处折角成周,整座城之平面,基本上呈东西稍窄南北略宽的长方形。城址就座落在以今钟楼偏东为中心的地方。城之垣高基广

<sup>①</sup> 请参照清胡之祝、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志》卷9《城池志·叙池》。

无从稽考,从近代以来陆续出土的刻有“子城”字样的残砖看,仅知道它曾是用砖砌筑起来的。

## 二

子城的创建时间及其创建人,志书记载不一。所见有这么三种说法:其一,万历《泉州府志》记时不记人,云“唐天祐二年筑”<sup>①</sup>;其二,乾隆《泉州府志》等记时又记人,云“相传唐天祐三年节度使王审知筑”<sup>②</sup>;其三,乾隆《晋江县志》既不记时且不记人,云“子城筑于唐贞元以前,年月莫考”<sup>③</sup>;要明辨其是非,还得回到志书中去找答案。

万历府志卷十《官守志》载唐刺史苏妙传云:

苏妙,字观妙,南海人。大历中刺泉,有惠政,有鹤来巢行春门楼,妙出鹤每集车盖,州民颂歌之。

此云白鹤所巢之“行春门楼”,当指子城东门楼无疑。查乾隆府志卷二十六《职官》,苏妙于大历四年(769年)任泉州刺史,说明至迟在公元769年之前,这座周三里余的州城即后来所称之“子城”便已经出现了。

可列举的诸如此类的例证很多,但最有力的当推有关“北楼”之记载。乾隆县志卷十五《杂志·古迹》云:

北楼,在子城泉山门上,唐贞元九年,守席相重建,欧阳詹有记。

① 万历《泉州府志》卷4《规制志上·城池》,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重刊本。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11《城池》,又见《重纂福建通志》卷17《城池志》,《读史方舆纪要》卷99《福建五》。

③ 请参照清胡之悛、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志》卷9《城池志·叙池》。

这是说明子城非建于唐天祐年间的最好证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唐贞元九年(793年)席相重建,欧阳詹为之作记的“北楼”,是否为子城泉山门上之北楼?有的人便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是在罗城的朝天门<sup>①</sup>。对此,只要参阅乾隆府志的如下记载,其错误就昭然若揭了。卷十二《公署》云:

州治在双门正北,明为泉州卫,今为提督署。……治后有北楼,即欧阳詹所记者,王十朋重修。

文下接载《十朋自为记》云:

……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数日,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将压邪,众木以支之,询之乃北楼也。惕焉,不敢睨矧敢登?有碑,尘如积,漫不可读,乃四门所作之记。叹息久之。……明年春二月,建贡院,秋八月落成,得余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月丁卯,董役者以论工告,与同僚三四辈登而四顾,山川城郭之富,尽在目中,亦一州之壮观也。

无须再作更多的解释,以上的记述足以表明,唐贞元九年席相重建、欧阳詹作记的北楼在子城泉山门上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乾隆县志早就对某些志书的错误记述作过考订,批评“隆庆志谓即罗城之朝天门、《闽书》谓在衙城<sup>②</sup>之上”的诸失实之说,写下了“北楼即泉山门之楼无疑”的结论<sup>③</sup>。

万历、乾隆两府志有关子城创建时间的记载显然有误,而乾隆县志所云“子城建于唐贞元以前,年月莫考”是言之有据的。子城建于唐天祐三年(或二年)一旦被否定,节度使王审知筑子城之说自

①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② 乾隆《晋江县志》卷2《规制志·城池》载:“衙城即州治,垣墙留从效筑,为开府建牙之地。宋淳祐中,旧址尚存,至洪武元年,始废为卫。”

③ 《十国春秋》卷90《闽一·太祖世家》

然也就难于成立了。实际上,在此十几年之前,王审知与泉州便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景福二年(893年)王潮攻取福州,王审知随之入城。他被命为福建观察副使,后潮病由其权知军府事,及乾宁四年(897年)十二月潮歿,审知继位,即开始了他对福建的统治<sup>①</sup>。作为一位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他所精心图治的当然是整个福建,致力经营的是福州(如开甘棠港于黄岐、筑罗城于福州等)而不是泉州。当时,泉州虽是一个重镇,但统治着这里的是王审邽。至天祐二年(905年),审知“墨敕”王延彬权知泉州军州事。在这位被誉为“招宝侍郎”的年轻刺史先后26年的治理下,泉州曾出现了“岁屡丰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局面。因此,即使在唐天祐三年真有建造三里州城之举,恐怕决不会也没有必要由福建观察使亲自来主持一个州一级城垣的建设。况且把握着这里权力的是他“墨敕”的颇有才干的侄儿王延彬。真不知道创建泉州子城的功绩是如何把它记在王审知之名下的。别说了城的创建时间不在唐天祐间,就创建人为王审知而论,也是全然不可能的事。

然而,陈允敦先生却抱定“府志所云‘子城相传为王审知建也’之说,较可接受”<sup>②</sup>,并于实地踏勘找到了不少依据来加以论证,从而确立“罗先子后”的观点。我们不妨列举其主要论据剖析如下。

其一,他说子城是从密集的民房中强行拆出一条隙地供挖壕与建垣的,因此不得不迁就民房和回避权贵第宅而造成曲折<sup>③</sup>。姑且不论凭着历经变化而留下来的城壕遗迹竟能看出城垣的“小曲折”不知带有多少的可靠性;姑且不论从来就未曾听说过历史上的建城造郭竟不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制约而是由于迁就民居和回避官宅而舍直就曲,就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也是绝不可能的。按志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王延彬》。

② ③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载子城壕深广丈余,垣高虽不见载,但以一般作估墙基应在2丈左右,加之必需留足可供挖壕扬土、筑垣搭架和堆放沙土(或砖石)等工程建设的空地,所动用的土地,何止是“一条隙地”,其宽度至少也得在5、6丈以上。要在民居中拆出如此之宽而又周3里余的这么一大片面积,特别是象他所说筑城时“市内已相当繁荣,民居拥挤”的状况下,可以想象,势必引起居民的怨声载道,而这种劳民伤财的加深与民众矛盾的作法,是和王氏政权“保境息民”的政策相形见绌的。好了,就算是能予强行拆出的话,又何需迁就某些民宅呢?至于权贵府第,既然是王氏统治的天下,建筑以自卫,还能有谁称得上“权贵”让城垣避开府第以致“破坏其方整性”?又说是对立派所居,那就更是当拆勿论,不可容忍它的存在了。

他“还可以从现存古街道在子城内及古子城外遥遥相对,取得实证”,说明是拆建子城后,原有街道被截断的痕迹,而且子城毁后至今已有千年有奇了,古路尚无法复原<sup>①</sup>。他列举了东、西、南墙被截断的例子。但据笔者看来,这只不过是论者对着《泉州市城区图》而作的“纸上谈兵”,假如他去实地踏勘,或许便可发现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如他说东垣被截断者有:1 卫校北墙对中营下巷;2 彩笔巷遥对庄厝巷;3 新府口巷遥对何衙埕;4 敷仁巷遥对何衙埕<sup>②</sup>。此四者不稍说1无巷可对,就是后三者,2间隔的是府后山,3间隔的是鸚鵡山,4间隔的是承天寺,可以说彼此并不相干,只不过是“遥遥相对”罢了,怎么能说是因于城垣壕而造成的?由此可见他所举例子系牵强附会之一斑。

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还说这些迹象是在子城废后1000余年仍然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的。据论者所云,子城仅存在了72年,是

① ② 陈允敦:《泉州子城和罗城的创建孰先孰后》,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印,1987年。

个短命之城<sup>①</sup>。这 72 年给这个城市的布局所造成的影响,竟然比在其废去之后的 1000 多年的城市发展变迁还要大,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时代海外贸易兴盛,港市建设繁荣,泉州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面貌的这样重要的发展时期,如今的市区街巷坊里之称,基本上还是宋代(确切地说是南宋)及其以后才出现和逐步形成的,难道论者所说的状况是可能的?

其二,他说城建布局,要求对称,子城东墙原应建于南俊巷,但实际没能这样做,说明有所勉强<sup>②</sup>,是城址不能自由选择的结果<sup>③</sup>。这一点,恰恰说明子城不是从民居中拆建的,正是因地制宜建造起来的反映。有必要在这里提醒一下论者的是,当他在强调子城布局必须对称时,自己在《泉州古城址平面图》<sup>④</sup>上绘出来的、被考定是建于唐开元天宝间的罗城有对称吗?罗城布局的不对称,大概不致于也是迁就回避民居官宅之故吧。他认为造成子城布局不相称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将鸚鵡山的王审知花园包入城内,并视之为王审知筑子城的重要依据<sup>⑤</sup>。把东垣建于门楼巷包鸚鵡山,显然是筑城者出于便利防御的军事目的之考虑。该山是周围地方的高埠之一,总不会把东垣筑于南俊巷,而将鸚鵡山撇在垣外边上,给敌人留下攻城之便。说鸚鵡山是王审知的花园,不知出何据典,大概是论者求依据心切,把这里原是“留从效之蓝园”<sup>⑥</sup>当作王审知花园而混淆起来了。就算是的话,正如前面已经论及,至天祐三年,它与王审知也早就没什么关系了。

其三,他说出土的子城砖非修城砖。砖铭有“使”字是上级派专“使”来主持鼎建<sup>⑦</sup>。1936 年在原子城遗址出土上部残缺印有“〔缺〕

①⑦ 陈允敦:《泉州子城和罗城的创建孰先孰后》,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印,1987 年。

②③④⑤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 2、3 期合刊,1980 年。

⑥ 《闽书》卷 7《方域》。

子城砖使立”的城砖一方<sup>①</sup>。陈允敦先生把它视为是王审知建子城的一个重要依据。“使”字被理解为上级派来主持鼎建子城的专使。笔者对此不敢拘同，“使立”当作“置用”之意解似较合适，不知陈允敦先生以为如何？他进而推之是五代鼎建用的砖。不知道陈允敦先生是从砖的质地、规格（大小尺寸），还是从砖铭的字体、句型，或是其他哪些特征来判断的。连见都没有见过这方城砖，只凭自己的既有观点来妄加推论，而这种推论，无论是砖的年代，还是砖的性质，都是不足为据的。后来，他好不容易地查到《闽中金石录》的有关记载，便迫不急待地于另一篇文章<sup>②</sup>中据此而把“使立”修正为“使内”，可惜的是陈允敦先生却没能对“使内”作出应有的解释。1981年夏，泉州体育场室内球馆地下工地（原子城址）又掘获上印有“〔缺〕衙子城砖使立”残城砖一方<sup>③</sup>。事实证明，陈允敦先生的“修正”适得其反，而这种舍弃出土实物偏信文献资料的作法是历史研究之一大讳也。

顺便于此一并论及，有人对近年出土的这方残城砖作了考证，得出了“新发现的‘衙子城砖使立’的古城砖，应为唐天祐二年所制作，由此，则知泉州先有外城，后衙、子城同时创建，外城遂称罗城”的结论<sup>④</sup>。实际上，这一结论只不过重蹈复辙于陈允敦先生“罗先子后”的观点，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把志书中所出现的唐太和以前有关“城”的记载，不加任何分析，一概视之指的是罗城，而毫无根据地把出土的古城残砖断定为唐天祐二年所制作，即承认了王审知建子城之说，其谬误所在，可见于笔者以上之论证，此不赘述。至于衙城的创建时间，倒无须多作“考证”，万历府志所载欠详，乾

① 《晋江文献丛刊》第1辑（1946年）。

② 陈允敦：《期望庄为玳教授对泉州古城的三探索》，《泉州学刊》1986年第2期。

③ ④ 吴幼雄：《泉州最古城砖的考证》，《泉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隆府志等载之则甚明确，系“留从效筑为开府建牙之地”。怎么能在一方残砖上见记“衙”与“子”并提，就可推断衙城与子城“同时创建”呢？砖铭所云尚待诠释，但据此论证两者是同时创建，恐大欠妥。总之，论者的见解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其四，他说王审知所筑的子城之“泉山墙”（北垣）是利用唐州城（罗城）之北垣之中段，二城共一“北楼”。这是陈允敦先生在最近撰写的《泉州子城和罗城的创建孰先孰后》一文中抛出的新看法。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是付出代价的，对自己颇费苦心进行踏勘而于《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中作过论证和于《泉州古城址平面图》上描绘出来的沿革城图，在很大程度上作了自我否定。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这一看法，是陈允敦先生在发现自己所确认的唐贞元九年席相重建、欧阳詹为记的北楼在朝天门上这个论证“罗先子后”的重要依据被证明是错误的时，为了固执自己“罗先子后”的观点而不得不进行的修正。虽然他为自己经过修正而推出的论点颇为得意，也找到了许多“确凿的证据”力图令人信服，但正如一位颇有造诣的学者曾经说过，“一旦你为自己确立了错误的论点，那么，你所为之而找到的论据越多，你的论点偏离史实就越远”，我觉得陈允敦先生便是如此。

首先，子罗城共一北墙，从建城的目的和作用来说，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大家知道，筑城是为了防御，特别是内城外郭的建筑，虽说前者是“为君”，后者是“守民”，但实质上是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防御敌人的攻侵，做到重重防卫而兴修的，起着外郭一旦被攻陷，内城尚可抵挡以求援兵的作用。无论是“子先罗后”，抑或“罗先子后”，内外二城必然都是分离的。这是一般的常识，是建城所普遍遵循的通例。然而，若是子罗共一北墙，如何能起到重重防卫、层层御敌之作用？假设敌至，只要选择北垣攻入，不就可直捣“老巢”了。象这样的子城之建设是没有多少军事意义的。王审知



也好,其他筑城者也好,应该不至于那么愚蠢。陈允敦先生要是懂得这个道理,大概就不致于有这一强加于古人的见解了。

其次,就他再次踏勘为子、罗城共一北墙所找到的依据而言,完全是为满足这一经修正的错误观点之需要而臆造出来的。他划出一道“东起于中营下巷横过相公巷,斜经马鞍山东北坡,沿米仓巷北转西折过释仔桥,转南、折西、过进贤至烟丝厂西”的七转八折的“唐州城北墙”,并在其新编绘的《泉州城建置沿革图》上令人眼花缭乱地标示出与此相应的一系列变化<sup>①</sup>。这不仅全盘否定了自己在《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中划定的原罗城之北垣,而且改变了王延彬拓城西地、陈洪进拓城东北隅的范围,增加了留从效拓筑于城泉山门至罗城朝天门的一大片地方。陈允敦先生对上述原罗城北垣和王、陈二氏拓城范围的重新划分,以及还无中生有地划出留从效扩东北地建朝天门,亦如他在前篇文章中论证它们一样,又可罗列出实地踏勘的一大堆依据,讲得头头是道,行文口气是那么的自信和无可辩驳。然而,当我们认真地阅读他的前后3篇文章和2幅地图,并作一番细心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其本文之上下,前后文、图之间,以及论据与观点之间,充满了矛盾和错误。为什么在他的笔下,泉州子、罗城垣位置的确定和移易,犹如儿童拼盘上的积木,可以随心所欲地拆、筑,同时还一样能从实地踏勘中找到“有力依据”?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混乱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原因,就是论者不科学的实地踏勘为自己提供了不科学的论证依据。

陈允敦先生在“从文字记载既已难得”的情况下,想“学司马迁那样,走向实地寻找遗址作为依据”<sup>②</sup>,这本来是个研究问题的很好途径。但是,当他在进行实地踏勘时,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子城除有“以限戎马”的城壕环绕,其内、外(即罗

<sup>①</sup> <sup>②</sup> 陈允敦:《泉州子城和罗城的创建孰先孰后》,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印,1987年。

城内)还有“以利转运”和“以通渲泄”的支沟。内支沟如“八卦”,外支沟“凡十六条,至各街巷多有沟须随其近处大沟归注,不可殚述”<sup>①</sup>。这些纵横交错的沟壕,历经数百年乃至千余年的变化,有淤浅或填塞而成坑坑洼洼者,有改道或被掩压而成阴沟暗渠者,还有屡湮屡浚仍在发挥其作用者。凭着这些支沟、城壕遗迹,把它们混为一谈,连成一线,指沟为壕,继而推之是“城垣相伴”,当然可以为你任意想象出来而划分的城垣随时随地提供“壕”的依据。陈允敦先生在实地踏勘获取资料中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此。他只注意现有地面的遗迹,忽视了其历史变迁和发展的过程,缺乏应有的时空概念;他只知片面地抓住某些现象,不懂得作全面的比较分析,没能把它与历史背景和条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象他这样的实地踏勘,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仅未能为他探讨问题提供可靠的资料,反面成为导致错误推论的根源。因此,其结论往往是一种主观的臆断,所提出来的观点,往往是一种脱离史实的偏见。只要我们对陈允敦先生在研究城址中的失误所在能有所认识,我想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占用更多的篇幅来对“子、罗城共一北墙”的那些论据逐一进行批驳了。

通过对以上论者提出的几点依据的剖析,无疑从反而给了子城为王审知所筑之说一个更加有力的否定。

### 三

事实足以说明,子城不是唐天祐时王审知所建造的,而早在唐贞元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它的具体创建时间“年月莫考”,不过,我们可以从一则最早提到泉州“城”的资料来推断它的最低下限。乾

① 道光《晋江县志》卷9《城池志》。

隆县志卷六《官守志》赵颐正传云：

赵颐正，乾元元年为晋江令，开晋江凿沟引水通舟楫城下，民甚德之。<sup>①</sup>

这则资料，把泉州城的出现往上推到了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以前。必须于此加以诠释的是，这里所说的“城”，是子城还是罗城？根据凿沟引晋江水至城下可以肯定，城不是在江边，而是与江具有一定距离的。从子城和罗城的地理位置结合晋江的地理变迁考察，这个“城”指的当然是子城而非罗城。因为子城座落的地位略高，距江也稍远。假如象有的人所说是指罗城<sup>②</sup>，那么，赵颐正所完成的这项工程是没有意义也不值得特别记载的。在宋元拓城之前，原罗城之南壕在横贯临漳门至通淮门一线，即今俗称“壕沟”是也。南壕以南的濒江一带，是随着晋江的淤浅而不断向江边扩展的。在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游九功筑翼城时，乃“沿江为蔽”。尤其是临漳门外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还发生“水啮城下路将及城”的事。直到近代，由于河道变迁而逐渐形成的晋江支流“破腹沟”仍绕于临漳门外，晋江之水还可抵原罗城壕。难道在1000多年前，需要凿沟引晋江水至罗城下吗？赵颐正所开凿的是由晋江至于城的沟渠，由于便利了舟楫的交通往来，为百姓们做了一件大家所希望的但又不易办到的事，所以才会“民甚德之”。对于这则难得的资料，笔者就是这样理解的。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把它视为子城创建时间的下限。其最高上限，不稍说应在州治由丰州迁至今泉州的唐久视元年（700年）<sup>③</sup>。这就是说，子城当建于唐久视元年至乾元元年

① 这一记载除府、县志外，还见于《唐书》卷41《地理志》、《舆地纪胜校勘记》卷30《福建路》等。只是后者记时间为“开元二十九年”，官职为“别驾”。这里姑从前说。

②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③ 此据《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载：“（唐）久视元年，县人孙师业诉称赴州遥远，遂于南安县东北界置武荣州，景云二年改为泉州，即今理是也。”

之间的某个时候。其具体年月,目前看来是谁也讲不清楚的,只有留待新史料的发现再下结论了。

尽管如此,子城的创建比罗城要早,却是很明确的。志书中诸如乾隆县志卷十四《词翰》载何乔远《浚东湖记》中之所云,正是说明两者早晚关系的最好材料:

泉东湖在古最钜,……湖之延袤,北距北山,南距海,东距山,西距郡城之行春门。其后城郭之,庐舍之,田畴之,坟墓之,历岁悬长,今之东湖坳堂杯水而已。

早期的东湖之西可抵子城东门,后来,包括建筑罗城在内的侵占淤填,遂使东湖渐渐变小了,文中所说子城先于罗城是再明白不过的。象这样没有直接记述,但能为我们揭示“子先罗后”的材料并非止于一二。不过,有的人认为“无母那来得子”<sup>①</sup>,竟如此机械地去理解城的发展,此乃笑话矣。以“子”“母”之称假于城郭,主要并不在于说明它的先后,而是用来表示其大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城市的发生和发展也不例外。每一座城市,无论是政治都市,还是商业城市,只要有子、罗城并存,基本上都是“子先罗后”发展的。当然也有异例,但《读史方輿纪要》所载的“罗先子后”者能有多少?这种特殊现象必竟是少数。倘若要对泉州城的发展作一比较,我想无须舍近求远,就借鉴福建几个府城来说吧。

福州城,“唐中和间(881—885年),观察使郑鉴修拓郡城东南隅,……是曰子城。天复元年(901年),节度使王审知,……又于子城外环筑罗城”。

建安城,“建中初(780—783年),刺史陆长源改筑县城为州治,周九里有奇。……伪闽王延政增筑郡城,周二十里”。

<sup>①</sup>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兴化城，“宋徙军治此，因筑子城，周仅二里有奇。……明洪武元年（1368年），复修葺，十二年，指挥程升请辟城东北隅，……与旧城合，延袤十一里有奇”。

漳州城，“宋筑土为子城，周四里。……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其外城仅树木栅，周五里”。<sup>①</sup>

上列福建8府中之4府城，均与泉州城一样，是先子城后罗城而建造起来的，另延平、汀州、邵武3府虽仅1城，也可见其从小到大的发展趋势。客观事实总会令人折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泉之郡治，相传未有罗城七门，先有子城四门”<sup>②</sup>的这一记载呢？

#### 四

大约在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建造起来的3里余州城，当包罗它的外郭即“罗城”出现之后，它被称为“子城”而又与之共存了多长时间？经过了多少次修葺？是到了什么时候才秃废或被拆除的？不见志书有这方面的明确记载。也许是由于罗城的出现，使子城失去了昔日“唯我独当”的重要地位，人们亦把注意力转到了起着主要防御作用的罗城上来，因此，直接记述子城的资料也就越发少见了。然而，只要它没有消亡，就必然会反映出它的存在。事实正是如此，有不少迹象表明，子城经五代历宋元而保留了下来，直到明代中期还依然存在。

在五代，据《闽书》卷四十一《君长志》留从效转载：

朱文进既杀延曦，署黄绍颜为泉州刺史，从效时为泉州散指挥使，与其党王忠顺、董思安等，图议复王氏子孙。忠顺、思

① 以上均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95、96、97、99。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11《城池·高霁记略》。

安置酒从效家，募外士得陈洪进等五十二人，持白挺夜入城，劫库兵，擒绍颇斩之。

库兵和刺史当然住在衙署内，此时尚无“衙城”，所谓“入城”，指进入子城显矣。

在宋代，据乾隆府志卷十二《公署》载，乾道五年（1169年）冬十二月，王十朋重修北楼讫工，与同僚登而回顾，看到的是“山川城郭之富尽在目中”，赞叹“亦一州之壮观也”。后来，又登楼赋诗一首，有句云“山川城郭壮哉郡”，可见当时不仅子城（城）、罗城（郭）并存，而且一样“壮观”。成书于十三世纪上半叶的祝穆撰《方輿胜览》卷十二亦有“承天寺在子城东南”之记载，如果子城已经无存，就不会以其为方位来记述承天寺的位置了。

在元代，乾隆府志卷十二《公署》载：

元左副新刷土军万户府在府北泉山门外，至元间以殿前司左翼军隶于府，复刷土军以益之，乃立营建署于州之后，万户赤干迁建今所。

史称泉山门与子城共存亡。万户府由州治后门迁建于泉山门外<sup>①</sup>，说明泉山门在子城犹存无疑。假如子城已废，就无所谓有州之后门与泉山门外之别了。《清源金氏族谱·丽史》中有关元末“亦思巴溪”之乱的一段记载，更明确地揭示了子城的存在。其云：西域那唵呐据城作乱，至正甲午（1354年），福州行中书省奏檄浔尾场司丞陈骇、浞洲场司丞龚名安合兵讨之。城中千户金吉夜开城西门密纳陈骇兵入，“那唵呐仓卒突骑出子城拒战”，后被擒送京师。

下面的一则明代资料，为子城至少留存至明代中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明正德五年（1510年），知府向一阳因灾而重建行春门楼，林俊为之作记，其中写道：

<sup>①</sup> 参见乾隆《泉州府志》卷24《军制》。

泉负冈带海,城郭辅郡为固,其内子城。子城四门,其东曰行春,正德庚午,守者弗戒门毁。夫门阙楼堞,岂必专为敌设哉?所以谨表中之防,锢风气,杜奸萌,以兴相安于无事。万一敌至,而外城弗守,子城亦足效隘险于一支,以俟夫援兵者之集,斯则权驰举之大都也。甲戌郡守李侯锐力主废举,……楼观壮雄,扁檐坚整,绝前之胜以益固。

就记中所云“城郭辅郡为固,其内子城”,及强调外城一旦失守,子城亦可防御以观,显然这时的子城之城垣和门楼是完整的。它依然与罗城一起发挥着“辅郡为固”的作用。

到了此后 100 年的万历年间,见载“后泉山门废,徙谯楼于卫南”<sup>①</sup>;又 150 年后见载“后衙城,子城俱废”,“城久废,泉山门亦无存”<sup>②</sup>;再能看到的是明末清初先后 8 次的“重建”或“重修”东西南三城门楼之记载:

时 间	修 葺 者	工 程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守蔡善继、同知舒有翼	重修行春门楼
天启六年(1622)	约正郭鼎、金男,进士 必昌,举人必春暨户部主事郭梦詹	重修行春门楼
清康熙二十年(1681)	提督杨捷	重建崇阳门楼,改门曰丽正、楼曰禄蒸
乾隆十四年(1749)	知县黄昌遇	葺行春门

① 万历《泉州府志》卷 4《规制志上·城池》,泉州市志编纂委员办公室,1984 年重刊本。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 11《城池》。

乾隆十六年 (1751)	知府高霁、知县黄昌遇	重建兩正门改樓曰喜雨
乾隆十七年 (1752)	知府高霁、知县黄昌遇	重建肅清门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守王纆、令方鼎	重建行春门樓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令王雱	重修行春门樓

虽然我们还未能找到直接的材料来说明子城秃废的时间,但从以上记载大致可以推出,那应是在明代后期的事,只有除泉山门外的东西南三城门的“古楼”,则保留到了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史实证明,子城自建至废,历尽了约 800 年的沧桑而完成了它的使命。然而,有的人却认为,“从唐天祐三年修,至宋太平兴国三年毁,可知子城之存在,只有 72 年,实是个短命之城”<sup>①</sup>。显而易见,论者所云只不过是凭着自己仅能看到的乾隆《泉州府志》和《读史方輿纪要》中的二条资料而作的主观臆测。这种止知其一未及其余的妄加论断,其谬误程度就无须笔者在这里多费笔墨来再作评判了。

<sup>①</sup>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 2、3 期合刊,1980 年。



## 泉州罗城址考

泉州古代城址，是泉州历史上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但由于文献记载之有限，考古资料之缺乏，确实给问题的探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求取史实在于不断地探索，而问题的正确结论往往存在于争鸣之中。因此，笔者曾不避粗浅，在《泉州子城址考》一文中，对泉州子城的创建时间及其形制作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里，拟就泉州罗城的形制及其创建时间亦作一番论证，旨在前后二文“相得益彰”，使我们对泉州古代城址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也希望通过这些探讨，能有助于大家展开对泉州子城和罗城及其孰先孰后等城址问题的讨论，以求得一个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

道光《晋江县志》卷九《城池志》载，泉州罗城，广 37306 尺，为门 7，东曰仁风，西曰义成，南曰德济，北曰朝天，东南曰通淮（涂门），西南曰临漳（新门）、通津（水门），门皆有楼，除通漳门外，各门还筑有瓮城。城垣石砌，高 3 丈 2 尺，墙上垒堞，并建有窝铺、敌楼和炮台。城外壕沟环绕，广 6 丈，深 2 丈余，三面通流，滢洄如带，独东北一隅有盘石 10 余丈，地势较高，潮不能通<sup>①</sup>。对于罗城的规制，不仅志书记载较详，而且可在 1922 年的《泉州市图》<sup>②</sup> 上窥其

① 清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志》，晋江县图书馆藏手抄本。

② 福建泉州工务局测量队制、泉州南街同文斋印：《泉州市图》，民国十一年（1922 年）。

全貌。罗城是在1923年才开始陆续遭破坏的,15年后,整座城垣连同门楼则被拆光毁尽了<sup>①</sup>。

保存至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罗城,是始建之后经“历代以来屡广而大,屡增而高,屡培而厚,屡易而坚”形成的。根据《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等志书之记载而编制的下表,为我们展示了它重修、扩筑的变迁和发展过程。

时 间	修 筑 者	工 程
唐天祐间 (904--907)	知州王延彬	拓城西地包西禅寺
南唐保大中 (943--957)	节度使留从效	重加版筑,周20里, 环植刺桐
宋乾德初 (963--968)	节度使陈洪进	拓城东北地(松湾)包 崇福寺
宣和二年 (1120)	郡守陆藻	增筑外砖内石,基横 二丈高过之
绍兴二年 (1132)	守连南夫	重葺
绍兴十八年 (1148)	守叶廷珪	陶土为砖,取砾为灰, 以巩城基。辟通淮水 门,引巽水入城内壕
绍兴三十年 (1160)	守邓祚 <sup>②</sup>	继葺

① 王连茂:《泉州拆城辟路与市政概况》,《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11《城池》载:“淳熙、绍熙间守邓祚、张坚、颜思鲁继葺。……绍兴三年守游九功砌瓮门,复即南罗城外筑翼城。”查同书卷26《职官》云:邓祚绍兴三十年任;张坚淳熙元年任,颜思鲁十六年任;游九功宝庆元年在任,表据此改。

淳熙间 (1174—1189)	守张坚、颜思鲁 <sup>①</sup>	继葺
嘉泰元年 (1201)	知州倪思	修城郭
嘉定四年 (1211)	守邹应龙	以贾人薄录之费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
宝庆元年 (1225)	守游九功 <sup>②</sup>	砌瓮门,复即南罗城外筑翼城,东自浯浦西抵甘棠桥,沿江为蔽,以石成之,四百三十八丈,高盈丈,基阔八尺。
绍定间 (1228—1233)	刘叔、智白	建翼城(不知何处)
元至正十二年 (1352)	监郡僕玉立	拓南罗城地合翼城为一周三十里,高二丈一尺,东西北基广二丈四尺,外甃以石,南基广二丈,内外皆石。改镇南门曰德济,废通津门,复于临漳、德济间建门曰南薰。原镇南桥壕遂为城内壕,东西相抵者悉砌以石。自通淮门南绕德济门过南薰门之半浚新壕
明洪武初 (1368—1398)	卫指挥同知李山	增高五尺,基广俱二丈四尺,内外皆甃以石,建月城六(南薰门

①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11《城池》载：“淳熙、绍熙间守邓祚、张坚、颜思鲁继葺。……绍兴三年守游九功砌瓮门,复即南罗城外筑翼城。”查同书卷26《职官》云:邓祚绍兴三十年任;张坚淳熙元年任,颜思鲁十六年任;游九功宝庆元年在任,表据此改。

		无月城)、窝铺百四十,门各有楼。又于仁风、通淮之间辟小东门
天顺、成化间 (1457—1487)	都指挥武成,知府张岳、徐源,指挥王炫、王振、王潜、王焜李珏等	相继葺
嘉靖三年 (1524)	知府高越、同知李缙	重修门楼、窝铺
嘉靖三十八年 (1559)	知府熊汝达	重建德济门。改通淮曰迎春、南薰曰通津,并修各月城。重浚外壕
嘉靖四十年 (1561)	兵备万民英	城北外壕盘石不能通水,乃建小城楼,临壕围以木栅,筑羊马墙以备倭,后以压断龙脉拆去。浚外壕深阔可通舟楫
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副使姚尚德、知府姜志礼	地震楼铺雉堞多圯,复继治之。城旧有用砖处,尽易以石。
清顺治十五年 (1658)	提督马德功、兴泉道叶灼棠、知府陈秉直等	依关东式改造,拆补城垣三百八十九丈,周城筑石台、垒垛靖二千三百八十六堵,盖空心炮楼六,角葺城楼六座,炮门炮台一百七十五,开朝天门月城加六尺,因羊马墙故址拓翼城四处建窝铺九十四、敌楼六、炮台十二
康熙四年 (1665)		
康熙十七年 (1678)	知府张仲举、知县沈朝聘	海寇围城,德济门一带颇多坍塌,重修之

雍正九年 (1731)		修葺
乾隆十六、十七年 (1751、1752)		重修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邑令张炳	重修
道光十年 (1830)	署府宪袁	请修
道光十五年 (1835)	提督马济胜、兴泉永道周凯、知府崇福、署府陈凤翰	率绅士等捐修

纵览上表,不仅对罗城的变迁和发展有了了解,而且使我们注意到一些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万历(1612年)《泉州府志》卷十一《规制志上·城池》载,罗城“南唐保大中留鄂公从效所筑”<sup>①</sup>,以后纂修的乾隆(1763年)《泉州府志》、乾隆(1765年)《晋江县志》、道光(1829年)《晋江县志》道光(1835年)《福建通志》,均延此说,《读史方輿纪要》(1692年前)亦作同样记述。这与诸同志中又载“先是王延彬于唐天祐间权知军州事,其妹为西禅寺尼,拓城西地以包寺”,显然是个很大的矛盾。城都尚未创建,谈何可供拓筑?王延彬拓城包寺既是事实,那罗城就不可能为留从效所筑了。对此,《方輿胜览》则有不同的记载,其卷十二记泉州中云:

桐城,留从效重加版筑,傍植刺桐环绕。

<sup>①</sup> 万历《泉州府志》,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重刊本。

《方輿胜览》成书于 1225 年至 1264 年间,虽去南唐保大中 300 余年,但它可谓最先记及了留从效修城事,比万历府志早了 400 来年。1489 年前黄仲昭等修纂的《八闽通志》<sup>①</sup>亦作如此记述,可见“重加版筑”的说法是可信的。看来是万历府志一书之误,而诸书沿误了。

值得注意的是,留从效的此次修筑罗城,工程是比较大的。他不仅重新版筑了城垣,环植刺桐,而且还扩展了街道,尤为重视联系港城和便利商旅的工程建设。《清源留氏族谱》卷三《留国公传》云:

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

在拓宽仁风街时,他把唐初安葬的位于行春门外的蔡尊师墓“徙之松湾”<sup>②</sup>,并在仁风门外建造了仁风桥<sup>③</sup>。

说罗城为留从效所筑,这显然是不对的。也许是留氏重加版筑,使罗城旧貌换新颜,环植刺桐,使“刺桐城”之称遂而远播海内外,加之此前有关罗城方面较少见载,因此,后人便把罗城的创建与这位对修筑罗城作过突出贡献的留鄂公联系起来。

第二,《读史方輿记要》卷九十九《福建五》记泉州“刺桐城”云:“宋太平兴国二年<sup>④</sup>,陈洪进挈地归朝,诏三城皆隳坏。”“三城”即指“内为衙城,外为子城,又外为罗城”的三城。衙城为“州治之垣墉”,此不足论,子城已在《泉州子城址考》一文中作了若干考证,这

① 《八闽通志》卷 80《古迹》,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② 万历《泉州府志》卷 20《杂志》。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 10《桥渡》。

④ 据《续资治通鉴》卷 9《宋纪九》载,陈洪进纳土归宋在太平兴国三年,《读史方輿记要》所云恐误。

里亦不再论及,让我们来看一看罗城的情况。

前面说过,南唐保大中即公元943年至957年间,留从效重新版筑了罗城。而在此之后20年便“隳坏”,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象有的人所认为的“城废”到“城垣规模无可稽考”,甚至在宣和时(1119—1125年)必须“寻址复筑”的程度<sup>①</sup>。那么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之前10余年的宋乾德初(963—968年),城垣必然已经“土崩瓦解”。这样一来,陈洪进拓城东北地包崇福寺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原罗城垣还在,新拓的城垣才能与之连接成周,起到包罗寺的作用。

对此,还可引证一则更有说服力的记载,《八闽通志》卷二十九《名宦》乔维岳传云:

太平兴国初,陈洪进纳土,以其子文显为泉州留后,而以维岳为通判。会“盗”起仙游,众十余万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势甚危急,监军何承矩、王文金欲尽屠其民,燔府库而遁。维岳挺然抗议坚守,既而转运使杨克让率兵破贼,围遂解。

“盗起仙游”即指仙游县百丈镇农民林居裔起义。当林居裔率众攻打泉州城时,乔维岳以城中兵3000坚守,抵御10余万的农民军于城外,待援军解围,要不是有坚固完整的罗城可供防守,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一年,正是陈洪进归附宋王朝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而《读史方舆纪要》却记当时罗城亦已隳坏,岂不谬哉!有的人竟然轻率地引之为据并大加发微,那更是错上加错了。

第三,据表统计,自唐天祐至清道光900多年间,罗城先后不同程度地修筑和扩建了27次。其中比较大规模的拓筑有4次。分别是唐天祐中王延彬拓城西地包西禅寺,宋乾德初陈洪进拓城东北地包崇福寺,南宋末游九功拓南罗城外筑翼城,元末偃玉立拓

<sup>①</sup>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南罗城地合翼城为一周。这四次拓城的范围,有的比较明确,有的虽不甚了解它的具体起止地点,但也可推知其大致规模。此外,象清叶灼棠“因羊马墙故址拓翼城四处”,还有诸如“真西山守时,刘叔、智白建翼城不知何处”<sup>①</sup>这样的记载,后者无从稽考,大概是与前者一样,它们都是所拓规模不大的工程,不象上述四次扩建,成了新罗城形制的重要构成部分。

王延彬拓城西的范围,大体上是将原西城门(在今奉圣巷口迤西)向西北推至新义成门处,街道随之延伸,城垣外展呈梯形。由《泉州市图》上可以看到,位于这片外拓罗城范围内的九史巷尾,有面积颇大的“西姑池”。据庄为玘先生的调查,今池已被附近工厂填平,但原池边尚存一尼姑庵,据庵内尼姑说,该庵是西禅址遗址<sup>②</sup>。从其地理位置考察,这与王氏拓城西地包寺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陈洪进拓城东北地的范围,陈允敦先生在他编绘的《泉州古城址平面图》<sup>③</sup>上划了个扭曲的小长圈,把崇福寺箍了进来,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史实的。由于时代的久远,陈洪进所拓之城没有留下什么可资考证的遗迹,唯有根据崇福寺的地理位置来加以推论。然而,城垣的砌筑,不在万不得已的地理条件限制下,一般都是避曲趋直的。道理很简单,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因为城垣的弯弯曲曲面拉长防御战线,以便在最大的范围内,达到最有效的防御目的。根据崇福寺的地理位置,陈洪进拓城的范围,应自仁风门北上尔后西折,与大约位于本官街附近的原罗城垣相接。只有这样,才能既起到包罗寺的作用,又可保证罗城的规整性。因此,陈氏拓城的范围,

① 道光《晋江县志》卷9《城池志》。

② 庄为玘,《泉州古城址的再探索》,《晋江地区社联通讯》1985年第4期。

③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决不象有的人所说“这次扩建城垣的工程,远小于王扩”<sup>①</sup>,而是前者不亚于后者也。

最近,有位先生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对今崇福寺是否为当年陈洪进拓城包之的崇福寺(即千佛庵)提出了怀疑。他在查阅文献中发现,泉州曾有两座崇福寺,一是大家所熟知的陈洪进为其女出家为尼而建造的“千佛庵”(宋元祐六年改今名)<sup>②</sup>;另一是鲜为人知的王审知为五代“释衲”黄文矩而创建者<sup>③</sup>。据府、县志及《八闽通志》、《闽书》等记载之陈洪进所建寺的地位,似乎与今崇福寺不一,所云崇福寺建在城东北之虎头山。虎头山为郡城之内山,由清源脱入城之东北隅,又名松湾,旧有晋时松四株因名<sup>④</sup>。按乾隆府志卷首城图所示,其位置当在今一中地方,这与陈允敦先生在《泉州古城址平面图》上所标示的方位是基本一致的。由此推之,崇福寺应在一中一带才是,怎么会是今址呢?查寺之沿革,崇福寺在明天顺后废,现在的崇福寺是时隔200来年后的清顺治年间重建的。假如虎头山的座落可以确定为上述之位置,那么,重建的崇福寺就有可能不是在原旧址而是迁现址修筑起来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今崇福寺或与王审知建者有关?总之,这位先生认为,陈洪进建造的崇福寺应在一中一带的虎头山地方而不是在今址。若这一看法得予肯定,推之开来,陈洪进拓城包寺的范围,就不是以上所推论的了。它应包罗自仁风门北上至“屁股石”折向绕顶埔与朝天门相接的这么一片“城东北隅”。虽然新罗城的这一地段城垣在清初曾经叶灼棠作过若干小规模拓筑,但其基本规制应是奠基于

①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65《方外》。

④ 乾隆《晋江县志》卷1《輿地志·山川》。

陈洪进之手。

游九功在南罗城外增筑翼城的范围,志书载之颇详。其东起浯浦,西抵甘棠桥,以石砌筑。估计在当时今一、二、三、四、五保及南门外的一些地方尚未完全成陆,是沿着原晋江北岸蜿蜒而建的。翼城的起止地点甚为明确,但有的人却将其任意延伸为“过浯浦桥,转北沿东鲁巷接于原通淮门”<sup>①</sup>,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若以西边的“临漳门外第一桥”甘棠桥为起点,那么翼城的终点就在东边的浯浦。浯浦,据《重纂福建通志》卷六《河渠书》云:“浯江,《闽书》云在笋江下流,道光志云岸有浯浦”,即在今南门地方,以“浯浦”命名的“浯浦桥”和“浯浦东桥”均位于德济门外<sup>②</sup>。翼城墙自西而东砌筑,就止于此,所谓过浯浦桥接于通淮门,纯属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游九功所拓之翼城,只不过是一道高盈丈基阔8尺的“以蔽沿江”<sup>③</sup>的防汛墙堤,并没有真正起到可以御敌的“城”的作用。

僖玉立拓南罗城以就翼城的范围,正是砌筑了由通淮门南下与位于浯浦的翼城东端(即后来的德济门)相连接的这段城垣。假设说这一地段的城垣象有的人所云是游九功筑翼城的一部分,与原罗城之通淮门已连接成周,那僖玉立就没有什么可拓之地,也就无所谓“始拓”罗城“以就”翼城“而成一周”可言了。从“拓筑”范围来说,僖玉立完成的只是上述工程而已,但他所做的城建工作却是大量的,把翼城加高与城垣一样为2丈1尺,基加宽为广2丈,内外砌石,在合翼城处建南门改名德济(福建省地名委员会、泉州市地名委员会合编,1983年印制的《泉州市城区图》附《泉州古城变迁图》标其名为“镇南门”误矣,原罗城南门在南街尾金鱼巷口曰

①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

③ 乾隆《晋江县志》卷6《官守志·僖立玉传》。

“镇南”),封闭通津门而于临漳、德济门间辟南薰门(明嘉靖间复改曰“通津”),加宽原罗城东西北垣基为2丈4尺,外砌以石。与此同时,自通淮门南绕德济门至南薰门一线随拓罗城而开挖了城壕,之所以进一步延浚到南薰门,大概是由于翼城外的德济门至南薰门一段,经过130来年的淤积已相继成陆不再“沿江”之故。而南薰门至临津门一段依然濒江仍以江代壕。万历府志在述及僊玉立拓城后的罗城外壕时作了明确的记载,其云:

今自临漳门外绕西而北而东而南抵通淮门,皆旧外壕,其自通淮门南绕德济门过南薰门之半,乃拓罗城而浚之壕,又自南薰门之半西距临漳门,则濒江无壕也。<sup>①</sup>

志书有关罗城外壕的这些记载,对通淮门至德济门城垣为僊玉立所拓,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关于僊玉立拓之罗城,有的人还提出了这样的不同见解。认为“顶埔即一中及师专高地一大片乃僊玉立所拓的,具有僊拓特征”<sup>②</sup>。我们不妨把僊玉立的拓城与他的目的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作一考察,或许会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元至正中僊玉立监泉州时,那是一个“正值诸路兵乱”的年代:“十年同安贼掠海滨,监郡僊玉立俘其魁”;“十一年冬山贼攻安溪县治,监郡僊玉立捕获平之”;“十二年夏仙游流贼剽掠泉州,有司御之遁去”<sup>③</sup>。“盗贼四起”连年不断,给泉州城的存亡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僊玉立一方而率兵诛讨,一方而则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着手进行加强郡城的安全建设。在这动乱不安的时期,修建城垣,目的在于防御,首先必须考虑到的应是城垣的加固而不是拓

① 万历《泉州府志》卷4《规制志上·城池》。

② 陈允敦:《泉州古代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附兵纪》。

筑,尤其是那种较大规模的扩建,更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僊玉立修、拓罗城,正如其传中所云,一切“以捍御计”<sup>①</sup>。他拓南罗城,利用原翼城合而为一周,是为了使城南这片繁华的地方得到保护。他加厚整座城垣并外甃以石,是为了使郡城更加坚固;他浚深城壕,是为了更好地防御敌人的进攻。即使当时城东北隅的一中及师专那片地方还没有城垣包罗,而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去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拓筑,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说这片地方与城南比起来,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军事作用,也还不具有非拓不可的必要。总之,就文献记载来说,我们找不到有僊玉立拓城东北隅的记录,而所谓“具有僊拓特征”,不知道论者能拿出什么依据来?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的迹象可以说明这一点。论及于此,则给了笔者一点启示,前而提到陈洪进拓城东北隅的推断,倒不一定要以崇福寺地址的变迁为依据,因为在僊玉立拓南罗城之前,城东北隅已不再是城外之地,由此而往上追溯,在陈洪进拓城包寺之后的近400年中,并不见有其他较大规模的拓城之举。所以,要说包罗这片地方的城垣是奠基于陈洪进之手,就是不存在寺址变迁的问题,这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第四,一旦明确了构成新罗城的四次城垣拓筑的范围,那么,原罗城的规模也就一目了然了。其南、东、北、西城垣是:

南垣,以涂门稍北向东(津头埔方向)外延2、3百米的折北角为起点,以新门北面向西外延约200米的折北角为终点,其间以横贯后城、金鱼巷、上崎头、新门后街以南一线为垣基。近年出版的《泉州市城区图》附《泉州古城变迁图》,以涂山街、新门街为原罗城之南垣,将原城外南壕(即今八卦沟)围入城内是完全错误的。原南城垣上原辟有4门,自东向西为通淮、镇南、通津、临漳,通淮、临漳

<sup>①</sup> 乾隆《晋江县志》卷6《官守志·僊玉立传》。

二门,经游九功拓翼城和僣玉立拓南罗城合翼城为一周后,分别易位由原南向改通淮朝东、临漳朝西,并把包罗进来的这一段原罗城之外壕“悉砌以石”而成为城内壕。有的人把“现存从通淮门至临漳门的壕沟”,看作是“原罗城的南壕全段”,并以东通淮西临漳为东西垣的起点<sup>①</sup>,这是不全而的,应该包括由通淮、临漳分别向外延伸的部分,才算得上是完整的南垣和南壕全段。

东垣,以上述南垣东端的折北角为起点,临东湖北偏东而上,拐向忠义巷东至仁风门,由此向北偏西过五足亭直接本官厅街。阅《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并观《泉州古城址平面图》,论者从兵马司桥东转北接橡胶厂划出一道城垣来,还找到了“砌石壕岸一段”,“淤水沟一段”,以及追忆了60年前释仔山的“一堵残垣”为证据。实际上,城之南壕在涂门内的兵马司桥处虽有转弯,但它与汇郡东南部诸水而来的“城内支沟”合流,趋东向注于新罗城外壕,没有以120度大转弯向北偏东而上形成东壕南端的迹象,而且也不存在有一条北来的壕沟在转弯处与这个“南壕”交接可构成东壕的痕迹,不知道所找到的那三处遗迹具有哪些可以说明它是原罗城垣壕的特征?而又具有哪些共同的时代特征可以把它们作为罗城垣壕而将其连系起来?

即便退一步来说,假如承认南起兵马司桥北止忠义巷南的这段城垣的话,那么同一起止点向东扩展的城垣也就是明初卫指挥同知李山曾辟小东门其间的这段城垣又是何人何时拓筑的呢?有人把它也记在僣玉立名下,这由前而的分析已经证明,那是不可能有的事。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僣玉立是不会扩城来包罗这块地方而拉长防御战线的。这道原罗城东垣之南段,基址没有多少变化,即成为后来新罗城之垣也。

<sup>①</sup>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北垣,大致东起本厅街尾,西抵北门。城垣基址在沿本厅街过新坊下连营房街一线以北。北垣较短,基本上与南垣同向平行砌筑。

西垣,自北门沿环城马路,在新华路口转向南偏西而下,与位于奉圣巷西西街上的原义成门连接,复向西南至环城马路,继续延伸接于临漳门外西北的南垣之西端。然而,对于原罗城西垣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泉州古城址平面图》所标示的原义成门“位于甘棠巷口偏东的西门街上”,西垣则“从腐植酸厂南下,沿半月池(已填)、师姑池(已填)及山仔池等池东南岸,经西门街复顺甘棠路东沿南下,抵马路头,与原临漳门接于水关桥东北”<sup>①</sup>。这道西垣是陈允敦先生以“根据群众告知古西禅寺即今址而推断的”为依据来划分的。其意图很明白,就是在王延彬拓城西地包寺之前,西禅寺必在原罗城西垣之外,因此,便把义成门的位置确定在西禅寺东面的西门街上,并由此向左右延伸划出了这么一道城垣,同时又划出了一道王延彬拓之包寺的城垣来。当然,与前面述及的陈洪进之拓城一样,王延彬扩建城西地包西禅寺的范围,甚至原罗城西垣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王延彬妹出家为尼的西禅寺之位置来推断的。然而,这不仅首先要搞清楚寺址,而且还不能不注意拓城范围的规整性和所能起到的保护寺的作用。于是,笔者对《泉州古城址平面图》所划出的王延彬拓城之范围和原罗城之西垣的位置是颇持疑义的。关于王延彬的拓城范围已见上述,此不重复,不过,由于王氏拓城与西城垣位置的确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关键所在则系于古西禅寺址。因此,这里姑且承认论者的所谓古西禅寺址在“位于甘棠巷口偏东西门街上的原义成门外偏北”之说来稍加分析。王延彬拓城包寺是为了使这座寺庙得以保护,其目的是很明确

①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的。但从图上划出的范围,则有相悖之处。它从马路头向西北绕今西门,在新华路拐角向东北,与位在腐植酸厂的原罗城相接。据图上标示的西禅寺位置近在新华路口,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向寺的西南方面扩建了可以说与寺无关的那么一大片地方,而当垣墙绕过西门后,却反内拐紧迫寺址。在这里形成一个内折角再接于原罗城垣?按理说,既然包罗了西南地方而扩至西门,即应直趋位于腐植酸厂的原罗城垣连接,这样才能让寺的前后左右都留下相应的空间,不致使西禅寺挨贴着城垣而不利于保护。否则的话,如果不需要包罗寺之西北这块地方,那也就同样没有必要去把寺西南的那么一大片地方圈进来了。只须象陈允敦先生划陈洪进拓包崇福寺的范围一样,从他认定的甘棠巷口偏东的西门向西北方向扩去达到能把西禅寺箍进来不就行了吗?可见他所划定的王延彬拓城包寺范围,既不规整,又不能真正起到保护寺的作用,是很难予以解释的。笔者认为,据群众所反映的“西禅寺即今址”是不可靠的。至于那道西城垣的位置,正如陈允敦先生自己在踏勘中看到的“西壕遗迹很不明显”,“原义成门皆无踪迹”,只不过是自圆其说而毫无根据地把那些已填未填的大池小池当作是“城壕被淤积退化而成的”遗迹而划出来的罢了。陈允敦先生有关西城垣的推断,犹如建筑在沙漠上的高楼,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其结论,也就不能成立了。

见如上述,原罗城的东西南北垣基址是比较清楚的,它基本上呈直线砌筑,与城壕互为表里。从其形制来看,大体上构成了较为规整的梯形。

第五,罗城存在于唐天祐间王延彬拓筑之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始筑于什么时候?志书不仅缺载,而且还很难从中找到较能说明问题的有关记录。这里不妨根据几条资料所提供的线索,来探讨一下罗城创筑的大致时间。

万历府志卷十《官守志》赵桀传云：

赵桀，泰和中刺史。郡中有通淮桥，其东南曰通淮门。桀于郡郭之东南隅渚泄江水，以肥沃南洋之田，民便之，因其氏曰天水淮。

对于这则史料，有人把它理解为在赵桀凿淮之前已有了郡郭（即罗城），显然是错的。这是明人记唐事，为了便于说明淮的地理位置，而指出了它在当时（即明代）的“郡郭之东南隅”。例如明人记宋事一样，万历府志云游九功筑翼城“东起浯浦西抵甘棠桥”，但甘棠桥则为“明宣德间里人张实修”<sup>①</sup>，你总不能说甘棠桥在宋代就已经有了。以上引文中明确讲到了城内的通淮桥和城之通淮门，与赵桀开凿的“淮”的关系及其名称之所由。由此可见，有了天水淮，才可能有罗城七门之一号称“通淮”。这就是说，罗城的创建时间必然在天水淮开凿之后，即其上限不早于唐太和中（829—835年）。后来，笔者又在乾隆府志卷六《方外》查到了一则这样的记载：

文称，仙游人。初时仙游为州属邑，州刺史闻称有道，延致之，至，则于州之四门募施者，造浮图于开元寺东。

这里所说的“州之四门”，指的是州城的四门，而辟有四门的城，显然是“周三里，为门四”的子城无疑。文称造东塔的时间，见于同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开元寺》云：“寺有东西二塔，东塔号镇国，唐咸通六年僧文称以木为之，高九成。”僧文称在子城四门向过往行旅募捐，于咸通六年即公元865年建造了开元寺之东塔。子城既作为州城而存在，正说明罗城尚未出现。这样一来，则把罗城创建时间的上限往下推移了约30年。

有关罗城的最早记载，大概以见于唐乾宁四年（897年）黄滔《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暨云东瞰全城（即子城），西吞半郭（即罗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



城)”句为首先,但罗城的出现,似乎可以往上追溯。发生于唐末的重大历史事件王潮入泉,则反映了这一事实。《闽书》卷四十一《君长志》王潮传云:

悉师将行,会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州人闻潮治军有法,皆奉牛酒迎潮。潮围城,岁余克之,杀彦若,有其地。

据《十国春秋》卷九十《闽一·世家》载,王潮引兵围泉州,时在光启元年八月,翌年八月拔之,廖彦若顽抗了1年多才被王潮攻下城来,靠的仅仅是3里子城的防守?这是很难想象的。一定是凭借近20里罗城的坚守,才有可能维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把罗城创建的年代上溯至光启元年即公元885年以前,这便是最好的依据。

罗城创建时间的上下限,基本上可以确定在唐咸通六年至光启元年,换言之,罗城应是于公元865年至885年之间建造的。这20年,是兵慌马乱之年,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开始爆发而席卷全国的。中原的农民大起义对江南必然带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城到船添外国人”(唐会昌薛能诗)的对外贸易港市泉州,其统治者将更具岌岌可危之感。在只有小城3里而无大城广罗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通过卫民以达到保护自己利益而兴修罗城加以防御,是完全有可能的,乾隆府志记述了这么一件事:

女仙万氏,居东湖之浒,生能疗病,死能为国捍患。乾符六年,黄巢作乱寇闽,至惠安,郡城戒严,神往御之曰:未说泉州境,且说东湖一万家。巢从骇遁,民得免肝脑涂地。

云女仙万氏一语以御“敌”乃至其“骇遁”,这恐怕是一种夸大其词的传说。乾符六年即公元879年黄巢起义军至泉而未入,虽然带有“假道于闽以攻粤”的战略目的,但其攻陷福州继而南下,大概不会不问津泉州。之所以遁而不入,也许是因为泉州罗城已经出现而“郡城戒严”,难于一时攻取之缘故。要说罗城创建的具体时间,我

们还可以据此而从其上下限中作进一步的推定,即应是在唐咸通末乾符初建造起来的。

以上的结论表明,罗城的创建时间比子城创建于唐久视元年(700年)至乾元元年(758年)之间<sup>①</sup>迟了100多年,两者上下相去约1个半世纪,“子先罗后”是无可争辩的。

---

① 请参见拙文:《泉州子城址考》。

# 泉州宋代祈风石刻考释

## 一

祈风石刻，凿镌于泉州市西郊九日山之摩崖，是国内仅存的记述有关宋代泉州守土之臣“祈风”情况的珍贵实物资料。1961年列为福建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末以来，多有学者对石刻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不少舛讹。如吴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记其数目有“11段”<sup>①</sup>，后《泉州九日山宋摩崖石刻》一书中统计为“13段”<sup>②</sup>；黄柏龄《九日山》亦云“13段”<sup>③</sup>。他们不仅把冠以“提举市舶”的官员游览此山之石刻误列为祈风石刻而使段数出现差错，并且抄录内容及其点校也有谬误。在展开探讨和研究方面，亦多有错误之认识，如台湾学者方豪、宋晞，也许是未能亲临九日山踏勘之缘故，所征引为资料者与实物记载出入甚多，在研讨中也就因此而得出了一些不正确的结论<sup>④</sup>。

1980年12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对九日山石刻重新作了考察勘校，发现祈风石刻实存“10段”，同时对吴文良在

① 吴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1962年第11期。

② 吴文良：《泉州九日山宋摩崖石刻》，泉州市文管会、泉州海交馆印，1964年。

③ 黄柏龄：《九日山》，泉州海交馆印，1979年。

④ 宋晞：《宋泉州南安九日山石刻之研究》，《学术季刊》1955年第3卷第4期。方豪：《宋泉州等地之祈风》，《宋史研究集刊》（一），1958年，台北。

《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一文中记录的石刻文字错漏处作了详细的勘误<sup>①</sup>。为了给学术界提供研究泉州宋代祈风石刻的第一手资料，兹参照泉州海交馆编印的《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油印本）之所载，将 10 段祈风石刻的准确内容加标点录之于此，以飨读者。

淳熙元年，岁在甲午季冬朔，吴人虞仲房帅幕属洪子用、朱彦欽、赵德季、赵骏孚，祈风于延福寺通远祠下，修岁祀也。与者许称叔、吴景温、闻人应之、赵子张。

淳熙十年，岁在昭阳单子闰月廿有四日，郡守司马偁同典宗赵子涛、提舶林劭、统军韩俊，以遣舶祈风于延福寺通远善利广福王祠下，修故事也。遍览胜概，少憩于怀古堂，待潮泛舟而下。

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祀事既毕，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款。淳熙戊申夏四月，会者六人：林枏、赵公迥、胡长卿、折知刚、赵善采。冬十月，会者五人：赵不逊、胡长卿、韩俊、赵善采、郑颐孙。

嘉泰辛酉十有一月庚申，郡守倪思正甫、提舶余茂实腾甫，遵令典祈风于昭惠庙。既事，登九日山，憩怀古堂，回谒唐相姜公墓，至莲华岩而归。统军韩俊用章，同寮朱曾景参、戴溪肖望、钱箬仲渊、曾应定之、陈士龙云卿与焉。

嘉定癸未孟夏二十六日戊戌，东阳章株敬则、寿阳魏□叔子、山西杨世勤元功、三山林力行勉之、郡人留元圭待申、括苍何□德常之、合□陈亿曼卿、莆阳王彦广居之、清漳郑名卿坤辅、句水戚达先兼叔、嘉禾陆相同甫，莆阳黄荃德言、即墨于达卿兼仲、天台应基子履、开封赵汝茂千里、三山赵与官清叟、三山南澄士登，以祈风于昭惠祠下，因会于延福，登山瞻石佛，访

① 李玉昆：《南安九日山摩崖石刻勘校记》，《泉州文史》第 8 期，1983 年。

隐君亭，少憩怀古而归。期而不至浚仪赵善耕戴卿、莆阳刘焯叔元览。

太守戴卿颜颐仲，禱回舶南风，遵彝典也。提舶寺丞刘克逊俱禱焉，重司存也。礼成饮福，尚羊岩壑，真胜践也。别驾卢同父、左翼权军陈世才、舶幙赵崇血、邑令尹薛季良，从与祠事也。宗正徽猷赵师恕适拜开国命，弗果至也。时淳祐癸卯孟夏乙丑也。书者同父也。

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遂游。

宝祐丁巳仲冬下泝，郡守天台谢稟元道因祈风昭惠庙，邀宗正天水赵师济东之及总管寿阳纪智和子常、别驾姑苏赵梦龙驥父、莆阳方澄孙蒙仲、晋江宰三山彭樵道夫、南安宰三山王广翁居安、权舶子三山卢文郁从周、监舶豫章李宏模希膺，陟西峰，探石穴，寻佛岩之遗迹，访君谟之旧游，觴泳于梅竹泉石间，竟日而归。

宝祐戊午四月辛卯，莆田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越十有八日戊申，祈风延福。寿阳纪智和，开封赵梦龙，三山彭樵、王广翁、赵时僖，豫章李宏模，同会遵故事也。时农望方切，并以雨禱，瓣芻纒兴，霖霖随至，乃书于石以纪之云。

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禱风此山。知宗兼郡事古汴赵希侂安宅、提举縑事眉山王楠茂悦，领郡侂三嵎虞会和叔、三山郑君为瑞国，察属番禺史霆声宏甫，天台卢应佰和，东嘉赵崇东阳卿，三山林起东景仁、黄以谦谦之、潘昌廷孔时，邑令三山陈梦发以道、陈山公仰卿，是日也，霜日熙明，溪山献状，登怀古、景先哲，宛然有得，彝典云乎哉！

## 二

这 10 段石刻,记录了南宋时期泉州举行祈风的时间、地点和参加的官员,以及祀典的状况等。结合有关文献,对此略作如下考证。

## 1. 祈风时间

“祈风”起于何时,尚不见有明确记载。但祈风,无疑是伴随着风帆的产生而出现的。人们首先发明风帆,才进一步认识了信风的规律,并利用这一规律为船舶航海服务。然而,人们对信风规律虽有所认识,可并不能完全掌握天气的变化,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神灵,认为“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者,神也”<sup>①</sup>,因此也就出现了祈神以求船舶航行顺风之举。可以说帆的出现是形成祈风活动的触媒,而祈风活动被升格为一种祀典,则是随着海上通商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现存于泉州九日山的 10 段祈风石刻中年代最早的是南宋淳熙元年(1174)的虞仲房石刻,但这并不意味着祈风是这时候才出现的。《闽书》卷八《方域志》载:

……曰肉身王,姓陈名益。熙宁间,西夏有警,诏求勇敢士,郡守辟益为巡辖官,元丰间,从守祈风,目睹庙之灵,誓舍身为佐,遂值仗立化。僧泥益驱,别祠奉焉。

北宋元丰间(1078-1085年)陈益随郡守祈风,这或许是目前所见明确记述官方祈风的最早记录。又《惠安县志》卷十一《坛庙寺观》记位于“添奇铺海滨”的大蚶庙云:“昔海涛汹涌,有物轮囷高大,乘潮而至,乡人异之,为立庙。海商祈风亦能分帆南北,五代南

① 真德秀:《祈风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 50。

唐封光济王。”据此看来，民间祈风则在唐末五代以前。倘若从我国航海史的发展加以考察，祈风的产生显然比这还要早得多，正如宋人所云“遵令典”，“自古然”<sup>①</sup>也。

祈风活动产生很早，而举行祈风活动的时节却是一定的。它根据船舶按信风规律的航海时间来确定。我国东南沿海驶向南海各地的船舶，一般是“北风航海南风回”<sup>②</sup>，广州“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sup>③</sup>。泉州地方船舶的航海往返时间，基本上与广州差不多。见于10段石刻的祈风时间是：

章棣祈风于“孟夏二十六日戊戌”即4月2日；

颜颐仲祈风于“孟夏乙丑”即4月19日；

方澄孙祈风于“四月辛卯…越十有八日戊申”即4月29日；

林枏祈风于“夏四月”、“冬十月”；

虞仲房祈风于“季冬朔”即12月初一日；

司马伋祈风于“闰月廿有四日”即11月24日；

倪思祈风于“十有一月庚申”即11月13日；

赵师耕祈风于“仲冬二十有一日”即11月21日；

谢稹祈风于“仲冬下澣”即11月21日；

赵希侂祈风于“南至后十日”即12月初四日<sup>④</sup>；

由此可见泉州的“岁两祈风”，通常一为“禱回舶南风”于夏4月；一为“遣舶祈风”于冬11月前后。故“祭有祈焉，有报焉。祈也者，所以先而致其禱；报也者，所以后神而答其赐。祈不可以为报，而报不可以为祈，自古然也。而舶事之岁举，事祀典于神则异乎？是

① 林之奇：《祈风舶司祭文》，《拙斋文集》卷19。

② 王十朋：《提舶生日》，《梅溪后集》卷20。

③ 朱或：《萍洲可谈》卷2。

④ 有抄录作“南至俊十日”者“俊”乃“後”之误也。“南至后十日”应是冬至后十日，此即咸淳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于夏之祈，有冬之报；于冬之祈，有夏之报”<sup>①</sup>。至于祈风的具体时日，并不规定在某一日。石刻记回舶祈风在4月，或19日、或26日、或29日；遣舶祈风在11月，或13日、或21日、或24日，在12月，或初一日、或初四日。其应是视具体情况择日进行的。

## 2. 祈风地点

祈风的地点，莆田有“商人远行，莫不来祷”的祥应庙<sup>②</sup>；惠安有“海商祈风亦能分帆南北”的大蚶庙<sup>③</sup>等。九日山的通远王神祠，则是泉州地方的祈风地点之一。宋李邴《水陆堂记》载：“泉之南安有精舍曰延福，其刹之胜，为闽第一。院有神祠曰通远王，其灵之著，为泉第一。每岁之春冬，商贾于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谢于此。农之水旱，人之疾病亦然”<sup>④</sup>。这里所奉之“通远王”，《闽书抄·方外志》记云：

神，永春乐山隐士也。……唐咸通中，山僧欲建寺，求材乐山，遇一翁白须指其处，得杞、楠，梦许护送。一夕材乘涨下，众神之，作灵岳祠，名殿神运。宋封神通远王，赐额昭惠。嘉祐中泉大旱，守蔡忠惠祷雨辄应，奏加封善利王，寻加号广福、显济。

因此，石刻中记祈风地点在“昭惠庙”、“昭惠祠”、“延福寺通远祠”、“延福寺通远善利广福祠”等，所云名称虽不一，但指的地点是一样的。祈风祀典是在九日山延福寺的通远王神祠进行的。

通远王神祠是宋代官府的主要定点祈祭处。嘉祐中(1056—1063年)蔡襄于此祷雨，元丰间郡守在这里祈风。人们对其的尊崇

① 林之奇，《祈风舶司祭文》，《拙斋文集》卷19。

② 莆田《祥应庙碑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③ 《惠安县志》卷11《坛庙寺观》。

④ 《泉州府志》卷7《山川》。



和信仰,远在后来被奉为“天妃”的海神妈祖之上。尽管庆元(1195—1200年)间泉州城南已有供奉妈祖的顺济宫之建置<sup>①</sup>,但直至南宋末“守土之臣”的祈风祀典仍是在通远王祠进行的。

### 3. 祈风官员

10段石刻记录的11次祈风中,参加者有郡守(太守)、宗正(典宗)、提舶(提舶缙事、提舶寺丞)、统军、总管、别驾、左翼权军、舶幙、权舶干、监舶、邑令尹(邑令、县宰)等当地的军政要员76人(因故未至者3人),85人次。这批官员,其中见载于方志和有事迹可考者35人,依次列之于表:

姓名	官 职	任 期	出 典
虞仲房	提举市舶司	淳熙元年	福建通志·职官志卷4
司马俊	知州事	淳熙九年	泉州府志卷26、29
赵子涛	知宗正司事	淳熙间	府志卷26
林 劬	提举市舶司	淳熙间	府志卷26
韩 俊	殿前司左翼军统制	淳熙间	府志卷28、29
林 枏	知州事	淳熙十二年	府志卷26、29
赵公迥	知宗正司事	淳熙间	府志卷26、46
胡长卿	提举市舶司	淳熙间	府志卷26
折知刚	通判军州事	淳熙间	府志卷26
倪 思	知州事	嘉泰元年	府志卷26、29
余茂实	提举市舶司	嘉泰间	府志卷26
朱 曾	通判军州事	庆元间	府志卷26
戴 溪	添差通判军州事	庆元间	府志卷26
章 棣	知州事	嘉定十五年	府志卷26
魏 峴	提举市舶司	嘉定间	府志卷26
林力行	通判军州事	嘉定间	府志卷26
留元圭	主管南外睦宗院官	?	府志卷26、46
陈曼卿	进士	隆兴元年	府志卷33
赵与官	惠安知县	淳祐四年	府志卷27
赵善耕	知宗正司事	宝庆间	府志卷26

① 《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刘辉叔	安溪县丞	嘉定间	府志卷 27
颜颀仲	知州事	淳祐二年	府志卷 26、29
刘克逊	提举市舶司	淳祐间	府志卷 26
	知州事	淳祐五年	
卢同父	添差通判军州事	嘉熙间	府志卷 26
薛季良	南安知县	嘉熙间	府志卷 27
赵师恕	知宗正司事	?	府志卷 26
赵师耕	知州事	淳祐七年	府志卷 26
	知州事兼提举市舶司	淳祐间	府志卷 26
谢 阜	知州事	宝祐四年	府志卷 26
方澄孙	通判军州事	淳祐间	府志卷 26、29
	知州事兼提举市舶司	淳祐间	
赵希侂	知宗正司事兼知州事	咸淳间	府志卷 13
王 楮	提举市舶司	咸淳间	癸辛杂识·别集
虞 会	别驾	咸淳间	府志卷 13
史霆声	? (元幕)	咸淳间	府志卷 13
林起东	校官	咸淳间	府志卷 13
黄以谦	校官	咸淳间	府志卷 13

此外,石刻中标明官职,而志书缺载的有“左翼权军”陈世才、“舶幟”赵崇孟、“宗正”赵师清、“总管”纪智和、“别驾”赵梦龙、“晋江宰”彭樵、“南安宰”王广翁、“权舶干”卢文郁、“监舶”李宏模、“邑令”陈梦发和陈山公等,足见志书记载多有疏漏。

这些主持或参加祈风祀典的郡守、提舶等官员,都是一些为政清廉,在政绩方面多有建树,深受百姓拥戴的官吏。象“引身闽山接商舶,贾胡钦仰清节高”的虞仲房<sup>①</sup>;“以清德律贪,除诸邑无名科敛,讼牒盈庭,剖决不滞,豪强敛迹”的林枏<sup>②</sup>;“泉守多矣,不求祠而民祠之有三人”之一的倪思<sup>③</sup>;“州多货舶,株与郡守真德秀毫发

① 楼钥:《攻媿集》卷 1《送虞仲房赴漳州漕》。

②③ 《泉州府志》卷 29《名宦》。

不染，二人去州之日，番商拥道攀送”的章棣<sup>①</sup>；“除商税，…民甚德之”的颜颐仲<sup>②</sup>；“禁官吏强买，…番商闻风并集，舶计骤增”的刘克逊<sup>③</sup>；“剔除囊弊，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的方澄孙<sup>④</sup>等等。他们“遵令典”、“帅幕属”至九日山祈风，也是其对发展海外贸易的关心和重视的反映。

#### 4. 祈风祀典

举行祈风祀典的情景，不见有专门记录。但从石刻所记述的内容，以及其他文献中的若干记载中，似可窥其大概。

作为神事活动，执事者于神座前宣读“祝文”，是最为重要的议程。其祝文有如嘉定、宝庆间（1208—1227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所作之《祈风文》云：

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呜呼！郡计之殫，至此极矣。……引领南望，日需其至，以宽倒悬之急者，惟此而矣。神其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飘，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谨顿首以请<sup>⑤</sup>。

晚年寓居泉州的李邴在《水陆堂记》中记述了九日山举行祈风祀典的盛况：“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谢于此。……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成物命不知其几百数焉。已而散胙饮福，觞豆杂进，喧呼狼籍。”<sup>⑥</sup> 文中描述的这番盛况，不惟官方之祈风，也是民间商贾的祈谢场景。当然，官方择定的祈风

① 《福建通志·名宦传》卷7《宋》。

②④ 《泉州府志》卷29《名宦》。

③ 《福建通志·列传》卷14《宋11》。

⑤ 真德秀：《祈风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50。

⑥ 《泉州府志》卷7《山川》。

日子,势必形成这种活动的高潮。绍兴间(1131—1162年),有禅师慧邃,以佛教“杀生为大戒”,建议“易杀为仁”、“却茹荤为蔬食”,遂易之为“水陆会”。但那种祈拜之后的吃喝之习并没有因此而废止,淳祐三年(1243年)颜颐仲祈风石刻就有“礼成饮福”的记载。

从石刻记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官方的祈风祀典,在一定程度上说已成了守土之臣藉以览胜觞咏的聚会。他们“祀事既毕”,或“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款”;或“陟西峰,探石穴,寻佛岩之遗迹,访君谟之旧游,觞咏于梅竹泉石之间,竟日而归”。

### 三

祈风是宋代泉州守土之臣每年必须举行的“祀典”,也是市舶司的职责之一。九日山之石刻,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但其所记述的乃是那数以百计的宋代祈风祀典中的一小部分。明显可见的如绍兴间提举市舶司的林之奇作有《祈风文》、《祈风舶司祭文》;乾道间任知州的王十朋曾作《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嘉定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亦作有《祈风文》等等,说明他们都主持或参加过祈风,可是均没有留下题刻。如果说泉州祈风石刻是海外贸易兴盛时期的产物,那么绍兴间是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年代,却不见有题刻;如果说它是在海外贸易萧条时期,以祈风来特别鼓励海外通商,那么也没有留下象开禧(1205—1207年)之后至嘉定(1208—1224年)之初海外贸易曾出现一度衰落时的题刻。因此,这10段石刻只是每年举行祈风中的一般性活动,之所以会留下题刻,正如九日山上其它纪游石刻那样,不过是某些参加祈风者“书于石以纪之”的一种“雅兴”罢了。

然而,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祈风祀典与“犒设蕃商”的关系。论者往往认为“市舶官员和守臣冬初举行祈风仪式同宴设各国

蕃商可能是同一天进行,在祈风仪式完毕后犒宴蕃商”<sup>①</sup>;有人亦提出“既然祈风是为他们祈求顺风而举行的典礼,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当然要参加这一典礼,但是现存九日山祈风石刻中不见有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名字,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轻商思想有关”<sup>②</sup>。这些认识与解释,一时成了学术界在研究九日山祈风石刻的讨论热点。祈风祀典与犒设蕃商是不是同时进行?中外商人有没有参加祈风祀典?石刻中不见他们的名字是否与轻商思想有关?只要我们对祈风和犒设之活动略加考察,就不难看到问题的正确一面。

祈风祀典,是一项由郡守主持的旨在祈求船舶顺风的“州祀”。宋代之海外通商,在泉州地方财政和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船舶航海顺风“毕至而无梗”,乃“吏与民之大愿”。官方把它当作“是以国有典祀”一样,列之为守土之臣遵行不悖的“令典”。这种祈风祀典,在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设置之前,由郡守主持进行<sup>③</sup>。设置市舶司之后,因祈风与市舶司直接有关,亦成为其职责之一。但它仍然是由郡守而非由市舶司提举主持进行的。九日山10段石刻所记11次祈风,由知州主持者10次(其中知州兼舶主持者2次),仅一次是由市舶司提举主持的。淳熙元年(1174年)提举虞仲房主持的这一次祈风,不能不说是一次例外。若据府志所载“知州事萧国良,淳熙元年任,二年除知建宁府,张坚二年任”<sup>④</sup>推之,似乎是此次祈风在12月举行,当时正处人事更动之际,郡守未能前往,才由市舶司提举出而执事的。再就颜颐仲祈风

① 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李玉昆:《试论宋元时期的祈风与祭海》,《海交史研究》总第5期,1983年。

③ 《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④ 《泉州府志》卷26《文职官上》。

石刻云“太守贰卿颜颐仲祷回舶南风，遵彝典也。提舶寺丞刘克逊俱祷焉，重司存也”，以及谢稟祈风石刻云“郡守天台谢稟元道因祈风昭惠庙，邀宗正”等官员参加的文句表述形式来推敲，也能进一步说明祈风是由郡守主持、市舶司提举和有关军政要员参加而进行的一种“州祀”活动。

犒设蕃商，是一项由市舶司提举主持的旨在“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的礼仪。在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之前，泉州市舶司犒设蕃商的规格、经费均远不及广州。《宋会要辑稿》载：

绍兴十四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琇言：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番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番舶之际，宴设诸国番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从之。<sup>①</sup>

曾任广州市舶司提举的楼琇调任泉州市舶司后，改革了过去只用少量资金让市舶监官备办宴设的做法，按广州体例增加经费并由市舶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各国商人。可见绍兴十四年以前，犒设蕃商只由市舶监官出面备办，提举官及守臣是不参加这一活动的。这就显示了祈风与犒设在规格上的差别。自绍兴十四年起，开始改由市舶司提举主持、守臣一起参加进行犒设，以招徕诸国蕃商。

祈风与犒设，尽管目的都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但前者是祀典，后者是礼仪，无论从其形式乃至性质都不同，两者是不可能安排在一起进行的。事实正是如此。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广州的情形云：“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

风。……广帅以五月祈风于丰隆神”，又云“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人集府中”。这一记载清楚地说明广州祈风于五月在丰隆神庙，犒设于十月在州府之中。从九日山祈风石刻之记述至少也明白，泉州市舶司的犒设不是与祈风同时进行的。泉州有如广州在五月祈回舶南风，也在十月后祈遣舶北风。每当守土之臣祈风于九日山通远王神祠时，往往是“礼成饮福”，游山玩水，“竟日而归”；要不就是“祀事既毕”，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款”。这一天的活动时间中并没有迹象反映出包括了“祈风仪式完毕后犒宴蕃商”的内容。泉州市舶司犒设诸国蕃商不在九日山与祈风祀典一起进行，而应与广州一样在州府中排办，这是无可疑义的。

假若我们从宗教信仰方面加以剖析，将为此提供更为有力的依据。宋代，尤其是南宋，泉州是“郡为番商之会”<sup>①</sup>的繁华港埠，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带着不同宗教信仰和习俗的商人云集其间，形成了“华夷杂处”、多教并存、竞相发展的局面。蕃商中为数最多的是穆斯林，他们崇奉真主穆罕默德，认为“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万能的，是至上的”<sup>②</sup>。因此，穆斯林航海者祈求顺风亦表现为向真主的祷告。这种宗教行为，既使到了尊奉湄洲妈祖为海上保护神的明代，侨居中国的穆斯林，一旦海上遇险，仍保持自己的信仰，“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sup>③</sup>。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支配下，决定着皈依者不可逾越的行为规范。反映在航海祈风方面，宋代的穆斯林商人有自己的祈风地点与仪式。岳柯《桯史》和方信孺《南方百咏》等对宋代广州穆斯林的祈风有比较详细的记

① 《泉州府志》卷 29《名宦·胡大正传》。

② 《古兰经》第 3 章第 29 节。

③ 刘序：《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 年。

述。穆斯林们不参与当地官方的“祈风于丰隆神”，而是每年五月前后，“率以五鼓”登怀圣寺番塔之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在伊斯兰教寺的番塔单独进行的<sup>①</sup>。泉州的穆斯林亦有自己的祈风场所。创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泉州通淮街的清真寺，在其大殿壁龛里雕刻有“船舶在海中带着真主的恩惠而航行”等与航海有关的《古兰经》文句<sup>②</sup>。这显然是与寺内所举行的宗教仪式密切相关的祷词，说明祈求真主保护航海顺利是这座清真寺举行宗教仪式的一项重要内容。位于市东郊灵山的伊斯兰教圣墓，自唐以来便是穆斯林瞻礼膜拜祈求平安的地方，更吸引着航海者前来祈祷。至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著名回族航海家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时，还慕名特来行香，“望灵圣庇祐”<sup>③</sup>。圣墓和清真寺，无疑是宋代泉州穆斯林航海祈风的地点<sup>④</sup>。这一事实，进一步排除了穆斯林商人前往参加九日山祈风祀典的可能性。无论是穆斯林商人，或其他各国的商人，他们尽可以主动地应邀参加市舶司犒设蕃商的筵宴，但都决不会背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改变固有的民族习俗，而去九日山向通远王神祈祷，并在祀典之后“散胙饮福”。从宗教信仰方面所作的如上分析，使我们有理由完全相信这一点。

对于中国商人来说，要论证他们有没有参加祈风祀典，比起外国商人要困难得多。因为问题的是与否，没有任何实证资料。所云中国商人参加祈风祀典，仅是根据两者的祈风活动有着共同之处面作的推测。但必须看到，即使他们参加了官方的祈风，也未必在石刻上出现名字。前面说过，被列为“州祀”的祈风，是守土之臣率

① 参见《程史》卷11；《南海百咏》卷1。

②③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④ 参见陈达生：《宋元时期泉州穆斯林祈风与祭海之踪迹》，《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幕僚进行的,其规模似乎并不很大,如林枹祈风石刻明确记录的2次参加祈风的人数,是“夏四月会者六人”、“冬十月会者五人”。当然,实际参加的人数应该不止于石刻记述的那么几位,还有部份低级官员和随从人员等。不过能登上题刻者只是“从与祠事”的少数军政要员而已。其他人员或出于官阶级别的原因,或由于刻石条件等的限制,而就难得“榜上有名”了。假如我们不全然否认中国商人应邀参加祀典的话,他们显然也将类似其他随行人员一样,是不可能一一登名于石刻的。

然而,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尽管祈风是为商船航海顺风,但当它升格为官方的祀典时,就不是具体的只代表了商人的某些利益,而是宏观的象征着“吏与民之大愿”。既然是具有这么一种意义的一项官方活动,民间商人便不一定会被官府邀请来参加了。笔者认为,之所以在石刻上没出现中国商人的名字,而且在文献上也未见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这本身就是中国商人没有参加官方祈风祀典的一个很好证明,而我们为什么要凭推测去牵强附会呢?

总之,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都没有参加官方在九日山举行的祈风祀典,这是可以肯定的。既如是,也就谈不上把祈风石刻中不见中外商人的名字视为是与中国传统的轻商思想有关的事了。

# 宋代泉州的石桥建筑与海外交通

在福建泉州众多的文物古迹中,最值得称誉的一类名胜是宋代的石桥建筑。这些桥梁凌空越阻,如彩练飞舞,飘落于大江巨河之上,若蛟龙卧波,横贯在港湾岛屿之间。它们以花岗石为建筑材料,坚固耐久,虽屡经沧桑,而当年之规模犹在,至今仍在为广大百姓提供交通往来之便。这里,笔者拟对宋代泉州石桥建筑的概况、科技成就、在海外交通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略加考察与探讨。

## 一

泉州的古代桥梁,分布于境内的每一个角落。据地方志书记载,泉州本府及所辖5县,有各时代的石桥计478座,如表一所列<sup>①</sup>。

由表中可以看出,除无年代可考者外,以宋代建造的石桥为数最多。宋以前,泉州只有少数跨度不大的“架木为梁”的桥或3、4座小型石桥。入宋以来,石桥建筑飞跃发展,不仅建造了数以百计的石桥,而且所有大型石桥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特别是在南宋,

---

<sup>①</sup> 据《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永春县志》卷5《水利志》、《德化县志》卷4《山川桥渡》所作的统计。

继北宋洛阳桥(万安桥)等石桥的修建以后,掀起了一个造桥热潮。

表一 唐以来泉州石桥统计表

县 份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年代失记	总数
晋 江 (含府城)	1	2	52	4	1	3	43	106
南 安			24	3	3	1	31	62
惠 安			17	3	7	4	12	43
安 溪			8		3	3	26	40
永 春			33	15	16	24	52	140
德 化		1	5	2	11	23	45	87
合 计	1	3	139	27	41	58	209	478

从江河溪流之上到海湾岛屿与陆地之间,从东南海滨到内陆山区,都先后架起了许多石桥梁。在泉州 139 座有名称、地址和事迹可考的宋代大中型石桥中,有 113 座修造于南宋。最引人注目的是绍兴年间(1131—1162 年),时间不长而造桥最多。以晋江县为例,宋代兴修石桥 53 座,造于南宋的是 36 座,而绍兴年间所建达 13 座。它们是古陵桥、安平桥、普利大通桥、建隆桥、梅溪桥、石笋桥、苏埭桥、瓷市桥、东洋桥、玉澜桥、适南桥、龙津桥和长溪桥。在短短的 30 来年间,造桥总长度在 5052 丈以上(有 3 座长度不明未计在内),即 30 余里,平均每年造桥总长 1 里多。海滨一带如此,在内陆地区也一样。譬如永春县 33 座宋桥,32 座是南宋兴修的,而其中有 22 座建于绍兴年间。绍兴时期可谓是南宋造桥热潮中的高峰。

南宋泉州石桥以其数目之大突出于历史,更以石桥之长和长桥之多为世人所称道。这是造桥热潮的一大特点。北宋皇嘉年间建成的长 360 丈的洛阳桥,是我国桥梁史上第一座永久性多孔式跨水长桥,不仅开创了在江水入海口上造桥的先例,而且其长度达

到了一个空前的新纪录。然而,在南宋建造的桥梁中,有不少可与洛阳桥一争高低。其中长度超过5里的有5座,而80丈以上的就更多了,仅晋江一县就有石笋桥、悲济桥、顺济桥、陈坑桥、凤屿盘光桥、普利大通桥、东洋桥、洛阳桥、玉澜桥、苏埭桥、海岸长桥等11座。象泉州这样多造桥、快造桥、造大桥、造长桥的盛况,可以说在我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都是罕见的,因此古人曾有“闽中桥梁甲天下”之誉<sup>①</sup>。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僧人造桥。据统计,宋代泉州有31名僧人参与了石桥的建造工程,由他们“领其工”、“董其事”建造的石桥达43座。晋江县僧人造桥尤为突出,在52座宋建石桥中,有23座是僧人修建的。许多大型石桥与和尚的名字相联系,如造洛阳桥的义波、造安平桥的祖派、造石笋桥的文会、造悲济桥的法超、造玉澜桥的仁惠、造普利大通桥的智资、造凤屿盘光桥的道询、造苏埭桥的守徽、造海岸长桥的智镜、造金鸡桥的守静、造上陂桥的行传等等。其中道询和尚一个人就主持造成了登瀛桥、清风桥、青龙桥、獭窟屿桥、弥寿桥和凤屿盘光桥等6座石桥。和尚为宋代泉州的石桥建筑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泉州宋代石桥的概况,参见表二。

## 二

宋代泉州石桥建筑方面的许多科学技术成就,在我国桥梁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筏形基础”的发明。桥墩水下基础工程的处理,向来是完成桥梁建造的关键环节。洛阳桥址位于江海交汇的喇叭口端,江

<sup>①</sup> 王世懋:《闽部疏》。

表二 宋代泉州石桥一览表

县 份	桥 名	时 间	修 建 者	长 度
晋江	陈翁桥	建隆间	邑人王养、僧行珍 守蔡襄、僧义波等 僧法超 侍禁傅璘	15 丈
	小桥	太平兴国间		
	大桥	太平兴国间		
	林田桥	端拱二年		
	青濠桥	淳化间		
	吟啸桥	咸平间		
	万安桥(洛阳桥)	皇祐五年	僧怀应 僧怀应 僧怀应 僧宗爽 僧宗爽 僧祖派 给事中江常、僧智资	360 丈
	悲济桥	皇祐间		80 丈
	通济桥	元祐间		
	湖柄南桥	元符间		
	湖柄北桥	元符间		
	前埭桥	元符间		
	林湾桥	元符间		
	高港桥	元符间		
	濠市桥	大观间		
	濠溪桥	大观间		
	古陵桥	绍兴三年		17 丈
	安平桥	绍兴八年		811 丈
	普利大通桥	绍兴十二年		200 丈
	建隆桥	绍兴十六年		
	梅溪桥		里人苏晟	50 余丈
	瓷市桥		里人苏晟	
	石笋桥	绍兴二十年	僧文会	80 余丈
	苏埭桥	绍兴二十四年	僧守徽	2400 余丈
	东洋桥	绍兴间		432 丈
	玉澜桥	绍兴间	僧仁惠	1000 余丈
	适南桥	绍兴间	司户王元	
龙津桥	绍兴间		36 丈	
长溪桥	绍兴间		26 丈	
安济桥	乾道八年	僧了性		
金谷桥	乾道八年	僧继辨		
海岸长桥	乾道间	僧智镜	770 余间	



	观光桥 弥寿桥 长坝桥 大盈桥 板桥 梯云桥 观国桥 珠渊桥	宝庆元年 端平间 嘉熙间 嘉熙间 淳祐三年 淳祐间 淳祐间 淳祐间 宋	里人黄以宁 僧道询 里人张真 里人王弁 里人王克谐 僧明愍	60 余丈
惠安	龙江桥 菱溪桥 张店桥 跃津桥 仁寿桥 陈公桥 谷口桥 娘子桥 獭窟屿桥 通济桥 青龙桥 龙津桥 巨济桥 大德桥 惠宁桥 琼田延寿桥 得仙桥	端拱间 治平二年 治平二年 崇宁间 靖康间 绍兴八年 绍兴间 绍熙间 开禧间 淳祐间 宝祐间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令张介  里人谢文龙 里人连大德 令彭元达  僧道询 令赵时铎 僧道询  里人黄姓	二里许
安溪	双济桥 谷口桥 两港桥 西洋桥 龙津桥 凤池桥 永安桥 黄塘桥	北宋 北宋 淳熙九年 淳熙间 庆元五年 嘉定间 南宋 南宋	僧普足 僧普足 僧全一 僧惠明 令赵师馘 令陈密 僧惠清	32 间 68 丈
永春	永镇桥 隆兴桥 石井桥	建隆间 绍兴元年 绍兴二年	僧普足 范天成 里人陈有仁	





水湍急，海潮汹涌，砌筑坚实的墩台基础显得更加重要。近千年前的建桥工匠们，在“深不可址”的江海交汇之处“垒石于渊”，即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满抛大石块，形成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从而架起了跨越“水阔五里”的大型桥梁。这种“筏形基础”是我国建桥工程中的一大发明，也是世界桥梁技术中的首创。

第二，“睡木沉基”的创造。在洛阳桥落成之后 80 余年建造起来的安平桥，其基础采用的是另一种筑法。用几层纵横交错编成的木筏固定在筑墩处的水面，在木筏上垒筑墩石。随着墩石逐层加高，木筏渐渐下沉到江底，最后奠定桥墩基础。这种方法既简便又省工省料。位于九日山下跨越晋江之上的金鸡桥也采用了同样的筑基方法。1958 年，在桥址修筑水闸，掘开原桥墩时发现了实物。“睡木沉基”方法，是泉州宋代桥基工程中又一次可贵的创造。

第三，浮运架桥法的最早应用。泉州的宋代桥梁，都是用石料在波涛险恶的江上海口建成的。以安平桥为例，整座桥面用 2000 多条石板铺接而成，有的石板长达 11 米，宽、厚各近 1 米，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当时，要把如此巨大的石梁架设在高耸的桥墩上，是极为困难的。明人谈到洛阳桥的建造情形时有“凿石伐木，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纤”的描述<sup>①</sup>。又有道询和尚“率其徒操舟运石”建造獭窟桥的记载<sup>②</sup>。这一鳞片爪的史料，反映了当时利用海潮高涨，用船运载石料，凭借简单的吊装设备，把巨大的石料牵引就位，筑成桥墩或起架为梁。这种浮运架桥法，是现代桥梁工程中广泛应用的施工方法，事实证明在北宋洛阳桥建筑时就已经采用。

第四，多种桥墩的设计。泉州的所有宋代石桥，都采用“简支式”的梁桥结构，然而在桥墩方面却有许多创例。如洛阳桥就与一

① 《泉州府志》卷 10《桥渡·万安桥》。

② 《泉州府志》卷 10《桥渡·獭窟屿桥》。

般河流上的桥梁不一样,桥墩的前后两端砌成三角形分水尖。这是适应江水受到海潮涨落的影响形成两个流向而设计的。安平桥横跨五里海湾,更加科学地根据海滩港道的地质特点和水流缓急的不同来设计桥墩的形状。这座桥有桥墩 360 余座,采用了 3 种形式,在海滩和港道的不同水流区域,分别构筑了长方形、船形和半船形墩,以分水势。还应述及的是,洛阳桥和石笋桥在桥墩顶部逐次挑出 3 至 4 层条石,以承托石梁,既增加了桥墩的跨径,又缩短了石梁的长度。这种悬臂式墩,对后来桥梁结构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泉州桥梁石墩的砌筑方法,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全部采用大条石逐层纵横交替垒置而成,整体性好,承重大,经得起水流冲刷和浪潮冲击,而又结构简单,砌筑速度快,是后世常常袭用的施工方法。

第五,花岗岩的利用。正如当地许多其他古代建筑一样,取材于花岗岩是宋代泉州桥梁的一大特色。一座座桥梁,从桥基、桥墩到梁面和扶栏,从艺术装饰到附属文物,无不以当地盛产的花岗岩为建筑材料。花岗岩的结构紧密,质地坚实,而且纹理光泽美观,用于造桥牢固耐久,作为桥面扶栏和各种雕刻装饰,更给桥梁艺术增添了风采。

泉州宋代石桥建筑是古代人民伟大创造力的结晶。无数名不垂青史、功不铭碑记的能工巧匠,在桥梁科学技术上的卓越成就,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

### 三

纵观宋代泉州石桥的布局,可以看到与海外交通的紧密关系。许多大型石桥,有的建筑在陆路交通的干线或江河的渡口处;有的近海、靠海,甚至伸向海湾,或与隔海市集相通,或与海中岛屿连

接,或直接建在海船停靠的码头附近,密切了港区、码头与泉州市区的联系,对完善泉州港的海陆联运,加强与内地的联系,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横跨于洛阳江上,“当惠安属邑,与莆阳(今莆田)、三山(今福州)、京国(今开封)孔道”<sup>①</sup>,现在仍是厦门、泉州与福州间运输大动脉的必经之地。在未成桥之前,这里原是“水阔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的“万安渡”<sup>②</sup>。因阻于洛阳江面宽阔,水深流急,自泉州北上福州,不得不由城北出朝天门,从马垵格入河市,翻越朋山、白虹山,攀登高山峻岭,盘旋羊肠小道,经仙游然后抵达<sup>③</sup>,严重地影响了泉州与内地的联系和经济交流。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万安桥的建成,“以三千六百尺之石斗空而行,为千百年履海之康庄”<sup>④</sup>,“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sup>⑤</sup>,“往来于其上者肩毂相踵”<sup>⑥</sup>。彩灯戏传统剧目《洛阳桥》所描述的大桥落成之日“三百六十行过桥”的百姓欢庆场面,正是对这座桥梁在通商旅、畅货运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的赞颂。

顺济桥和石笋桥的建造与洛阳桥一样重要。泉州城南晋江环绕,阻隔了市区与“南乡海滨”及漳、潮的交往。尽管早在唐代,从晋南的安海、东石港通往州城的陆路交通已相当频繁,沿途置店列肆,并“设驿馆招待往来旅客”<sup>⑦</sup>,但晋江上只有舟渡。先后于绍兴三十年(1160年)和嘉定四年(1211年)建造起来的石笋桥和顺济桥,改善了陆路干线的交通条件,使“往来如织”的商旅“肩摩踵接

① ② ④ ⑤ ⑥ 《泉州府志》卷10《桥渡·万安桥》。

③ 《晋江县志》卷2《规制志·三驿铺》。

⑦ 佚名《西山杂志》,清嘉庆十三年蔡永兼抄本,晋江县图书馆藏。

直摄风涛于足下”，而“永免病涉”<sup>①</sup>。双桥跨江，使泉州与安海的陆路交通顺畅无阻，也加强了与南安、同安、漳州和南粤等地的联系。“泉州桥梁，……其跨江而当孔道者，东有万安，南有顺济”<sup>②</sup>，两桥贯穿一线，使泉州城“南接漳广，北通江浙”，方便得多了。

后渚是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为了加速进出口货物的流转，宋代又开辟了近在咫尺的乌屿岛为新的船舶寄泊地。乌屿岛位于洛阳桥东不足5里的江心，由于地处泉州湾内区，适于避风；岛的东缘港道深邃，可以通行和停泊巨型海舶。南宋间相继架起了盘光桥和无尾桥两座400余丈的跨海长石梁，与陆上交通相连接，使乌屿岛成为后渚港的辅助口岸，通海联陆的枢纽。中外商船“岁泊于此”，岛上“商贾络绎”<sup>③</sup>，因而有“金乌屿、银后渚”之誉。

安平桥的兴建，也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安海是泉州宋代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之一，是“南北往来市舶之区，泉之一大都会”<sup>④</sup>。绍兴间，修筑了闻名于世的“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使“相望六七里，初往来以舟渡”而“大为民患”的辽阔海湾，一跃而成为“马舆安行商旅通”的坦途<sup>⑤</sup>。“西桥当南、同、漳、广之冲”<sup>⑥</sup>，它的修建使安海与水头联成一体，沟通了与南安、同安、漳州乃至广州等地的联运。安海成了“通天下商船，贾胡与民互市”<sup>⑦</sup>的重要港口。全盛时，“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利者所必趋，随处成交”<sup>⑧</sup>。

此外，象泉州城东南的普利大通桥、玉澜桥、苏埭桥等靠海长桥，都直接建于海舶停靠码头附近，为运卸货物提供了方便。在内

①② 《泉州府志》卷10《桥渡·顺济桥》。

③ 《重修乌屿桥碑记》。

④⑤⑥ 《安海志》卷14《桥渡·安平桥》。

⑦ 《安海志》卷4《城池》。

⑧ 《安海志》卷3《封域》。

陆地区,许多石桥也是为了加强经济腹地与沿海港口的往来而兴修的。如建于绍兴年间位于永春城水门外的知政桥(即云龙桥),“桥之道东抵莆福,西通都城,实往来之要冲”<sup>①</sup>,为便捷交通创造了条件。

这些为了加速进出口货物的运转、便于商旅往来而建造的桥梁,是泉州港水陆交通网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宋代大批石桥的建筑及其在海外交通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南宋乾道间(1165—1173年)知泉州的王十朋有诗赞曰:“论功不减商舟楫,遗利宜书汉平准。”<sup>②</sup> 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 四

桥梁建筑,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宋代泉州大批石桥的出现,正是海外贸易发展、兴盛的表征。

入宋以来,泉州的海外贸易日益发展。太平兴国初,宋廷在一则诏令中说:“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sup>③</sup> 泉州虽未置市舶司,而与广州、两浙相提并论,说明泉州与海外通商已相当活跃。如当时仍统治着泉州的陈洪进,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一年间连续向宋廷进贡五次,献上乳香等16万4千余斤,及白龙脑、通牯犀、真珠、胡椒、玳瑁等一大批珍贵舶来品<sup>④</sup>,便是这一事实的具体反映。海外商人纷纷通过海道前来泉州贸易。雍熙年间(984—987年),天竺僧罗护那航海

① 《永春县志》卷5《水利志·云龙桥》。

② 《泉州府志》卷10《桥渡·石笋桥》。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

④ 《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7、8、9。

到泉州，“番商以其胡僧，竞持金缯珍宝以施，僧……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sup>①</sup>。可见外商不仅来泉州做生意，而且有不少侨居于此致富的。泉州人出海经商的也络绎不绝，“每岁造舟通异域”<sup>②</sup>。其中，“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sup>③</sup>。据《高丽史》载，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至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泉州商人到高丽贸易的有18起近500人<sup>④</sup>。往来东南亚的更多，泉州海商郡保“尝至占城国”<sup>⑤</sup>是其一例。北宋中期，泉州已经发展成为“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sup>⑥</sup>的繁华港口。以洛阳桥为主的晋江的悲济桥、通济桥，惠安的菱溪桥、张店桥，南安的对龙桥等一批石桥，就是在这—时期建造起来的。

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市舶司，确立了泉州作为对外贸易港的重要地位。此后无论泉州人经商海外，或是蕃舶至泉州，再也不必象过去那样到广州办理手续，而可直接通航了。鉴于蕃舶辐辏，宋朝政府还于政和五年（1115年）在泉州置“来远驿”，把泉州作为接待海外使节的重要口岸。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廷南迁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泉州的海外贸易更进入了繁荣时期，迎来了绍兴的最盛年代<sup>⑦</sup>。“舶交岛夷，而财赋本裕”<sup>⑧</sup>，市舶司利税充盈，商人财富日增。从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的7、8年间，泉州蕃舶

① 《诸蕃志》卷上《天竺国》。

② 《方輿胜览》卷20 谢履《泉南歌》。

③ 《东坡奏议》卷6《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④ 《高丽史》卷4—8。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⑥ 《宋史》卷350《杜纯传》。

⑦ 参见拙文：《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

⑧ 《輿地纪胜》卷134《福建路·泉州》。

纲首蔡景芳一个人所招徕贩进的物货,就使市舶司“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sup>①</sup>。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蒲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市舶,“抽解价钱三十万贯”<sup>②</sup>。举此2例,可见一斑。至绍兴末,市舶司每年可得息钱近百万缗<sup>③</sup>。民间经商极盛,“朝为原宪暮陶朱”<sup>④</sup>、“海贾归来富不贫”<sup>⑤</sup>。如“尝与乡人数人相结为贾,……往来米海中数十年,费用甚饶”的晋江人林昭庆<sup>⑥</sup>;“主舶船贸易,……获息数十倍,……价直数十万”的泉州人王元懋<sup>⑦</sup>;“为海贾十余年,致资二万万”的泉州杨客<sup>⑧</sup>等等,涌现了一批豪商巨贾。泉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羨”,被誉为“富州”<sup>⑨</sup>和“乐郊”<sup>⑩</sup>。海外贸易的繁荣,无疑为大批石桥的建造提供了经济基础,掀起了南宋时代的造桥热潮。绍兴间是泉州市舶税收人最多的年代,而这时正是造桥的高峰时期,多半的大型石桥建造于这一时期。此后,随着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在乾道、淳熙、庆元、嘉定、淳祐等年间,仍先后建起了不少石桥,足见石桥的建筑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我们不妨对建桥经费的来源作进一步的考察。泉州在宋代建造的所有石桥,虽然有少数由地方长官捐资倡修,但绝大多数是商民募捐兴建的。洛阳桥“靡金钱一千四百万,求诸施者”<sup>⑪</sup>。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则神话:当年观音前来襄助募捐,她化为一位美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

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4。

③ 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记载及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的有关推论。

④ ⑤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12。

⑥ 秦观:《淮海集》卷33《庆禅师塔铭》。

⑦ 洪迈:《夷坚三志》己卷第6《王元懋巨恶》。

⑧ 《夷坚丁志》卷第6《泉州杨客》。

⑨ ⑩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15、17。

⑪ 《泉州府志》卷10《桥渡·万安桥》。

女，端坐江中船上，声称若以金钱掷中者妻之，于是天天满载而归，为建桥募得不少金钱<sup>①</sup>。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但也是建桥费用来源于商民的反映。安平桥是由乐善好施的安海商人黄护于绍兴八年“舍钱万缗倡造”的<sup>②</sup>。积极参加捐输的还有往来于安海经商的外地商人。在近年修复安平桥时出土的石护栏上，发现有阴刻“浯洲屿（今金门）颜达为考妣施此一间”和“崇放里□头保□十六娘□□共施造一间”等字样。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知泉州曾为建桥作过贡献的赵令衿在《石井镇安平桥记》中说：“经始之日，人咸劝趋，即石于山，依材于麓，费缗钱二万有奇”，是“因众志之和，资乐输之费，一举工集”<sup>③</sup>。凤屿盘光桥的建造，更蒙上一层神奇的色彩。《闽小记》记载：“泉州有娘子桥（即盘光桥），视洛阳虽低而长过之。相传泉人人番舶坏，得巨岛，见人蟒夜出有光如昼，乃插刀穴口，蟒出为刀伤，性急直奔，胸破肚裂，遗下明月珠累累。其人归，遂得巨富。尝谋聘富家女为妇，富家翁怪其妄诞，给之曰：‘余女畏渡海风波，能作桥又布金于桥满，当遗女。’其人即作桥布金，俗呼为娘子桥。”<sup>④</sup> 这则传说的情节固不必当真，但反映盘光桥由泉州的“人番”舶商出资兴建应是可信的。

这些石桥的日后修葺，也同样或“募众修”，或由某富商捐资进行。据《万川陈氏家谱》记载，陈庆甫为巨富，在衢州府内商店货栈连城，是一位到泉州做海外生意的商人。他于元代初年捐银5万余修建衢州城垣，自谓这是其前助修泉州洛阳桥的余资<sup>⑤</sup>，可见他捐

① 《惠安风土志》，惠安县文化馆油印本。

② 《安海志》卷29《乐善》。

③ 《安海志》卷14《桥渡·安平桥》。

④ 《泉州府志》卷75《拾遗上》。

⑤ 引自冯玉辉《瓷器的外销与衡阳陶瓷业的繁荣》，《1987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修洛阳桥的金额是相当大的。值得一提的是,侨居泉州的蕃商也象热心于襄助其他公益事业一样参加石桥的修建。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曾于淳祐三年和六年(1243、1246年)出资重修了位于晋江县四十一都的龙津桥<sup>①</sup>和长溪桥<sup>②</sup>。他就是侨居泉州曾以贩运蕃货和招徕蕃商作出贡献而被宋廷赐以“承节郎”的富商<sup>③</sup>。

在宋代之泉州,人们能如此乐于为建桥、修桥捐资鸠工,是以充裕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而海外贸易的牟利,是使“商民随力输助”的主要来源,正如南宋二知泉州的真德秀所说:“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sup>④</sup>

① 《福建通志·津梁志》卷3。

② 《泉州府志》卷10《桥渡·长溪桥》。

③ 《真文忠公文集》卷25《重建太守倪公祠记》。

④ 《真文忠公文集》卷50《折风文》。

# 泉州出土海船结构的历史分析

我国古代的造船业和航海术,与我国其他杰出的科学成就一样,充分反映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远在3、4千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懂得“剡木为舟,剡木为楫”,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步掌握了造船和航海技术,开辟了海上交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交换的扩大,促进了造船工业的日益发展,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劳动人民对中国以至世界造船、航海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泉州港是我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的著名港口,也是我国古代南方重要的造船基地。早在先秦时期,这里是古越族居住的地方,越族是擅长造船航海的民族,公元前五世纪便以“以舟为车,以楫为马”见称。他们创造了首尾尖高的独木舟,是适应东南沿海自然条件航行、具有民族特色的船型,越话叫“须虑长”,汉语译为“了鸟船”(舡舡船)<sup>①</sup>。这是泉州造船的最早起源。

秦汉之际,我国沿海南北航线已经沟通。公元112年,汉以楼船征伐南越<sup>②</sup>。当时的楼船是高大壮观、防御设施很强的多层战船,这种楼船先进的建造技术,给南方的造船技术以很大的影响,推动了南方造船业的发展。公元六世纪的南朝,文献上就有了泉州

---

① 《越绝书》及《正字通》云:“须虑长(越船名),即舡舡也。”

② 《汉书·武帝纪》。

与海外交通的记载,那时泉州的大舶已可通达南洋的棱加修国(即今马来半岛)<sup>①</sup>。

唐代,开创了我国再统一的新局面,泉州开始建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泉州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之一(即交、广、泉、扬)。泉州造船业也在中外交通需要的促进下发达起来。五代时(907—960年),泉州以“刺桐港”闻名于世,远洋帆船可以运陶瓷、铜铁“泛于蕃国”<sup>②</sup>。

宋元两代,我国造船航海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巨型海舶的出现,特别是指南针的应用,更加扩大了海上交通的范围。泉州港成了我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主要港口,各国的海商、船舶云集于此,空前繁盛,有“世界最大港”之称。泉州造船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每岁造舟通异域”<sup>③</sup>。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泉州土产中就有“海舶”一项,《诸蕃志》中称之为“泉舶”。当时所建造的海船,无论在形制和船体的规模上都已经相当先进,为中外商客所乐用。

泉州宋代海船的发现和出土,对于研究我国造船史和海外交通史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特别是为宋代泉州木造帆船结构的探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试从历史学的角度,根据泉州宋船结构的特点,结合文献记载和地方调查进行分析,提出几点看法,以供参考。

① 《续高僧传》。

② 《留氏族谱》。

③ 《舆地纪胜》。

## 一、泉州古船结构的历史调查

为了了解泉州古代海船的情况,我们曾于1958年至1977年间到泉州沿海一带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造船史迹和泉州海船资料。兹将有关海船结构的部分调查材料记录于下,作为研究泉州古船结构时参考。

**船头** 泉州海船的船头是小方形的。船头上方下狭,艏柱与主龙骨榫联,两边各有一根出角,舷侧板分别钉在出角上,前面再封钉上1层木板,构成方形船头。

船头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叫“碇前”,是抛放船碇的地方。碇前安装1根横木叫“头筋”,用坚硬质料的木头做成,较为耐用。横木上竖有4根小木柱叫“角木”(即绞关木),用以分隔碇绳。船头下段叫“头兽面”,封板上绘有兽面图案。上面画了1个圆月形,如龙鼻子,下面画白色和黑色的纹饰,叫“山字头”,好象龙的唇齿。船头两边还装两个船眼,叫“龙目”。龙目之下画有水波纹,船航行时犹如龙头在水面跃动,非常生动。

**船尾** 泉州海船的船尾上部宽阔,下渐收敛为狭,彩绘得很漂亮。上部有1条横木叫“鹰板”,船尾两翼叫“尾花”,上面画有月形等图案。中间是尾座(即舵孔),两旁是“尾库板”,开有橹孔。

船舵是掌握前进的“方向盘”,有“利文舵”,“剃头刀舵”等类型。南方海深,舵形狭长,可以升降,不象北方浅海船舵扁宽。

**船身** 船身舷侧板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叫“波浪板”,波浪板有3条,称为大波、红波和水仔波。甲板以上部分舷侧板叫“牛栏”,中间开了1个闸门,叫“水仙门”,以便于装卸货物之用,航行时关闭。尾部波浪板上画有“海鳅”图案。下段3至5条舷侧板叫“枕条”,漆黑色和绿色的2条叫做“黑枕”,漆黑色和红色的3条叫“大

枕”。在波浪板和枕条之间有 1 条特别突出的叫“东脚枕”，是以半圆木做成的，以防船身接触撞碰之用。

船身甲板之下用木板分隔成前、中、后 3 大舱，每舱又根据船的用途不同和需要分隔为若干舱不定。底舱主要用于装货物。甲板之上有舱房，为船员和旅客生活工作的地方。在尾舱的后甲板上设有房子 2 间，叫“日月房”，是老舵了望、掌舵、作缭（控制帆）的地方。

**船桅** 泉州海船一般以 3 桅为多。在船头前舱的头甲板上安装有“头桅”，下有桅座。船中舱的主甲板上安装有“主桅”，下设有桅座，叫做“含檀”，桅边有绞车，用以升降帆。船尾舱甲板上安装有“尾桅”，又名“尾送”。

**船底** 泉州海船的船底是尖形而不是平底的。底部装置有“龙骨”，龙骨是船体结构的中坚骨干，一般由 2 至 3 段巨木组成，分为前龙骨（即艏柱）、主龙骨、后龙骨。泉州一带建造海船在榫接龙骨时要举行隆重的“奠基礼”以祭海神。在龙骨结合处的横剖面下凿有“保寿孔”，洞内放银元、五谷种和记录船舶建造黄道吉日的红布，然后在龙骨榫接处各用 6 根大铁钉钉合。这 12 根铁钉被称为“圣钉”，代表 12 生畜，据造船老师傅说，这是一种祈求海神庇祐航海安全的迷信行为，直到解放初期还存在，是泉州一带建造船只的古老传统作法。

船底内装置有倒人字形肋骨（俗称抱弓），每 50 厘米 1 根，肋骨是船体的横结构，肋骨多以增加船体的强度。在船翻身角（吃水线）以下的水底板（即船底板）外表涂有 1 层石灰水，以保护船底板，防止腐蚀，是一种既经济又简单的防朽办法。造船老师傅说，这种作法古代就有了。由于船的底部都涂以白灰，当地人们称之为“白底船”。

此外，我们还对造船使用的材料，如木材、铁钉、桐油灰、工具

以及制造方法都作了调查。虽然所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考察出土海船的直接证据,但对于认识泉州古代船舶无疑是很有帮助的。泉州海船具有很大的地方特点,与出土海船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二、泉州古船结构特点的分析

泉州古船出土时,“船体上部(即甲板以上)的结构已损坏无存,基本上只残留一个船底部,船首保存有艏柱(即前挑筋)和一部分残底板”。“船身中部底板、舷侧板和水密舱壁保存较完好。舱底座和船底板也较好地保存下来”<sup>①</sup>。泉州古船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但是从残存的水线以下部分的现状,可以看出其结构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第一、泉州古船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底部结构呈尖形,正如《高丽图经》所称“上半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我国海域辽阔,自然条件不同,在海船的结构中,形成了在北方海区以平底为主的主要船舶类型;在南方海区以尖底为主的主要船舶类型。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廿八年,如福建广南海道深阔……造尖底海船六只,每而阔三丈,底阔三尺,约载三千料”。东南沿海海岸曲折,海道深阔,风力强,潮流急。这种海船面宽,船底尖,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航行,吃水深有较大的稳性,受到横向风吹袭时,横向移动较小,便于破浪前进而不影响航速。这种尖底船是我国东南海域木造帆船的主要特点。

古船底部龙骨由2段松木接合而成,全长17.65米。龙骨两端接合处均挖有“保寿孔”,横剖面各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挖有7个小孔和1个大孔,形若“七星伴月”,孔内放置有铁钱、铜钱、铜镜等

①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10期。

物。虽然泉州一带近代造船的龙骨中，“保寿孔”的形式和放置的实物不尽相同，但可见是一种古代造船的传统做法，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第二、泉州古船小方头阔尾，这是受到北方船型方头方艏的特点影响而形成的。出土时还保存有艏柱和两根出角，前面的兽面板损坏严重。但从破损的痕迹仍可看出小方头形状，这与没有出角两边舷侧板直接钉合在艏柱上构成尖形船头是截然不同的。船尾也只部分残存，很宽阔，尾营斜度较大。舵底座保存尚好，用若干块大樟木叠合而成，出土时还留3块，舵已不见，但从舵底座的孔径可见舵杆是很粗大的。

第三、宋代的船舶一般是肥短或方型的。泉州古船就有这个时代特征，其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船身扁宽，平面似椭圆形，长宽比例为2.6:1。这种肥短船型的例证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很多：

《资治通鉴》称：“(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

《萍州可谈》称：“船方如一木斛，非风不能动。”

《宋会要辑稿》船部称：“一千料船长七八丈，宽二丈五尺。”其比例为2.8:1，与泉州古船更相近似。

这种短肥的结构航行时速度虽受到影响，但便于抵抗风浪的冲击，而增加稳定性。船身宽阔体积大，容载量多。在宋代，进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一些如丝绸、香料等物品，这种船型“头尾高，当中平阔，冲波逐浪，却无畏惧”<sup>①</sup>，是很善于装载，适于远洋运输的。

第四、泉州古船底部为2重木板，舷侧板为3重木板构成，3重总厚度达18厘米。其结构形式自龙骨至舷侧板用14行船板依次叠合形成4个阶梯状，船板采用搭接式和平接式两种连接方法。多重外壳板的采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总

① 《太平寰宇记》“福建路泉州”条。

结,具有很大的时代先进性,这与当时繁盛的海外通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多重木板制造的船舷,经得起疾风巨浪的冲击,坚固难破,可以做长时间、长距离的航行。船板叠成4层阶梯状,使船在风浪中颠簸减少左右摇摆,获得较大的稳定性。尖底船型,船身外壳弯曲多,弧度大,采用多重板造巨舶容易施工,用平接和搭接的方法交插排列,木板又不易断裂。同时,多层外壳板既经久耐用,又便于维护修理。这种“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sup>①</sup>的结构是宋代远洋海船的特点之一。

第五、据文献记载,宋代的造船,已经把船舱划分为数区,在结构上,采用了水密隔舱的建置。泉州古船用12道隔板分隔成13舱,各舱长度不等,第8舱最宽为9.15米,第1舱最狭为4米。《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记载中国海船时称,船身里面有13个舱房。据我们调查,13舱的结构,近代泉州沿海一带的货船还有沿用,并且都有专门名称和不同的用途,列表如下:

舱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舱名	内镜	头仿	二仿	东脚垛	小官厅	亚班边	中垛	大垛	五垛	四垛	官厅	灶垛	尾垛
用途	头桅	装工具	装柴米	装货	住人	主桅	装水	装货	装货	装货	船长宿舍	厨房	尾桅

水密舱的创制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造船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成就。唐宋以来,我国木造海船已经应用,比其它国家开始采用早了几百年。泉州古船舱隔板保存较好,隔板厚达10至20厘米,每道

①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隔板用若干块木板榫接而成,并在隔板与船底板衔接处,使用铁钩钉勾连在一起。唯在每道隔舱板最底部留有1个12×12厘米的小孔,为平时洗刷船舱沟通污水至中垛,以便排出船外之用。水密舱的作用,在《马可波罗行纪》与《蒲寿庚考》二书中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述。马可波罗说:其船之最大者,更有水密隔舱13舱,都用坚固的木板构成,船舶触礁或鲸击致有裂痕处,在水流入裂处,水手乃就受损之处,把货移入邻舱,因夹板甚密,水不能由一舱流入他舱。

在舱隔板和船底板的交接处还装置有肋骨。古船平面宽阔,横向受力较大,装置肋骨,增加船体的强度。

第六、泉州古船的第1舱和第6舱还分别保存有头桅座和中桅座,桅杆已不存在。海船的航行主要靠帆力起推进作用,从古船的长度和规模结合调查资料推断,在船尾还缺有1根桅杆,肯定是一艘3桅以上的海船,这与宋代海船的结构是相符合的。

### 三、泉州古船结构的几点看法

泉州古船结构尖底造型、方头方艏、船体短肥、三重木板、多水密舱、多根桅杆的特点,是宋代造船技术发展 to 一定高度的体现,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宋船形制相吻合,证明了它是一艘宋船。在年代的推断上,船中出土的大量遗物如香料、陶瓷器、铜铁等都可以为进一步说明是宋代海船提供很好的依据。

泉州古船结构的先进性,与宋代泉州对外贸易的繁盛是息息相关的。海外交通的需要促进了造船技术的革新和改进,而只有造船工业的发达才使海外交通的广泛成为可能。泉州古船的结构特征所反映的体积大结构坚固、容量多善于装载、稳性好抗风力强的优点,证明了它是一艘适于远洋航行的帆船。

泉州古船具有东南海区宋代海船的一般特点,但是,它有浓厚

的地方特色,可以与同处一海域的浙江海船、广东海船区别开来,充分证明是宋代泉州建造的。龙骨中“保寿孔”的装置,是泉州造船最独特的传统作法,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这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依据。

泉州古船使用铁钉和桐油灰,就与广东造船不一样。据宋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记载:“深广沿海州军难得铁钉桐油,造舟皆其穿藤约束而成,于藤缝中以海上所生之茜草干而塞之,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矣。”广东造船没用铁钉,泉州古船除用榫合连接木板外,还用铁钉加固,船上残存的铁钉、钩钉、宽钉、稟钉、锁钉等六种,由于用处不同而分为三角形、棱形、圆形及带钉帽的各种形状,与现在泉州造船所用的铁钉基本一致。

广东造船不用桐油灰,泉州古船船板接合时留下的缝隙,则以油灰填塞之,以防漏水。在古船中发现一把灰刮板,是用于维修填补桐油灰的工具,出土时上面还残留有油灰的痕迹。《真西山文集》中就有宋代泉州造船使用桐油灰记载:“晋江县为造军用船敷买人户桐油,赤藤等物。”马可波罗也说:“先用石灰及碎麻,用某种木油(即桐油)搓为一起,三者混合,则成为胶,用以涂船,颇为得用。”这种桐油灰与现代泉州造船的用料是一样的。

泉州古船与浙江船不同,浙船比较狭长,船长与宽的比例较大。《宋会要辑稿》称“绍兴三十一年,福建浙江安抚司,打制海船,缘两路船样不同”。这条史料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宋代泉州船与浙江船的不同之处,但所指船样不同,就是造型结构有区别。

宋代的海船,已经有大中小分类,这种分类的标准,历史文献记载不一,如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用长度分为30丈、10丈、10丈以下;吴自牧的《梦粱录》用载重量分为5千料、1至2千料和1千料;朱彧《萍洲可谈》说海船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此外,还有用舱桅、造价、用铁钉量等来分类的。根据文献记载,把宋船大小

等级列表如下：

	长 度	载重量	载人数量	载货量
大 船	30 丈(约 100 米)	5000 料	500 -600 人	600 吨(?)
中 船	10 丈(约 30 米)	1000 - 2000 料	200—300 人	200 吨左右
小 船	10 丈以下	1000 料以下	100 人以下	200 吨以下
文 献	《高丽图经》	《梦粱录》	《梦粱录》	《发掘简报》

根据初步复原意见,泉州古船全长可达 30 米左右,即 10 市丈,这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指“中船长十余丈”的长度是相一致的。又据古船的船长、船宽和船深的推测,它的载重量在 200 吨左右,与表中记载宋船的等级比较,泉州古船则系宋代中等远洋帆船。

宋代的船舶,不仅有等级分类,同时也有了船的专门名称。《宋会要辑稿》说淳熙十三年(1186 年)“福建路起发到海船,大南船廿二只……差轻捷槽船四只……”。这里所谓福建路发起海船,实系泉州发起海船,泉州市舶司常称为“福建路市舶提举司”。这里称泉州大船为“大南船”,中船被称为“槽船”。元代伊本巴都他记述:“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镇克(Junk),中者曰曹(Zao),第三等者喀克姆(Kekam),此类船皆造于刺桐(即今泉州)及兴克兰(即今广州)。”<sup>①</sup> 可见泉州造船不仅有大中小三等,而且有名称,中等船叫“槽船”。伊氏所记元代船舶名称,元去宋未远,当也指《宋会要辑稿》中的“槽船”,也就是中等远洋帆船。据我们调查,泉州一带沿海现代建造的海船乃袭用古代专称。即大船叫“艚”,中等船叫“艧”,小船叫“舫”。现将宋以后泉州港建造海船的类型与名称列表于下:

<sup>①</sup> 张星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摩洛哥大游历家伊本巴都他》。张星煌先生将这三等船名意译为船、舫、货船,是因不明泉州方言所误,实为艚、艧、舫。

	宋		元	明	清	近代
	客 船	货 船				
大 船	神 舟	大南船	艚 船 Junk	大洋船	横洋船	青头艚
中 船	客 舟	槽 船	槽 船 Zao	乌艚船	贩槽船	乌艚船
小 船	钻 风	海 船	舩 船 Kekam	小洋船	双桅船	大 船
文 献	《高丽图经》	《宋会要》	《伊本巴都 他游记》	《东西洋考》 《洗海近事》	《厦门志》	《调查记录》

综合以上对泉州古船结构特点,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地方调查材料所进行的分析,我们认为泉州古船是一艘宋代泉州建造的中等远洋槽船。

# 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

有宋一代,尤其是到了南宋,是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时期。探讨这一时期泉州与海外进行贸易的经营形式、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及其兴盛的原因,对于了解历史抑或借鉴于今,无疑都是很有必要且非常有意义的。

## 一

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经营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封建政府因“所得动以百万计”而极为重视通商海外,而且,垂涎于奇珍异宝的达官贵人和图牟暴利的豪家巨族,以及谋求生计的民间百姓,都从事海外活动。

接待海外“朝贡”使者,受理外国“进奉”货物,是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经营形式之一。海外诸国遣使者来宋“贡方物”,朝廷给予免征税收的优惠,并“回赐”礼品。这样的“朝贡”,实际上是一种“不过利于互市赐予”的政府间贸易<sup>①</sup>。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确立了作为对外贸易港的重要地位。此后,无论是泉人贾海外,还是蕃舶至泉州,再也不必寄港广州,而可以直接通航了。为了扩大海外贸易,朝廷曾专门下令,让泉州市舶司以政府的名义

---

<sup>①</sup>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1《四裔八》。

同海外国家联系,招诱南海诸国人贡。《宋会要辑稿·职官》载:

据本寺(鸿胪寺)状称,契勘福建路市舶司依崇宁二年二月六日朝旨,招纳到占城、罗斛二国前来进奉。

这种招诱活动,卓有成效,连罗斛(今泰国南部)这样“自来不曾入贡”<sup>①</sup>的国家也来朝进奉。继市舶司设立之后,宋朝政府又于政和五年(1115年)在泉州置“来远驿”<sup>②</sup>,把泉州作为接待海外“朝贡”使者的一个重要口岸。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国向宋“进奉”,朝廷便下诏让使臣免赴京城,令泉州官员代表政府给予热情款待<sup>③</sup>。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前来“贡方物”,宋廷同样委泉州负责受理<sup>④</sup>。许多贡使运载大量的物货在泉州登岸,并由这里起发京师。来南宋“进奉”的占城使者,一次运到泉州的货物,就有乳香10万余斤,其他香料数千斤,还有象牙7千多个<sup>⑤</sup>。通过这种由封建政府经营的以“朝贡”形式出现的贸易,输入泉州的各种海外物货,其数额是很惊人的。

权贵官僚私牟海外贸易之利,是经营形式之二。权贵和官僚经营海外贸易为宋朝政府所严加禁止。然而,尽管宋廷一再申令“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严禁他们从事海外贸易活动<sup>⑥</sup>,但这种现象却不能杜绝。特别是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南外宗正司从镇江移置泉州<sup>⑦</sup>之后,这种经营形式显得更为突出了。为了满足奢侈生活而追求珠宝香药,为了挥霍蠹耗而转买海外物品以牟取暴利,这些皇族宗室仰仗政治上的权势,不仅对“以命易货于鲸漫万里之

①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0。

③ 《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50。

④ 《宋史》卷489《外国传·三佛齐》。

⑤ 《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51。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

⑦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

外,幸登于岸”的商人“重征”、“强买”或“陷之罪而干没”<sup>①</sup>,甚至“夺贾胡浮海巨舶”<sup>②</sup>;而且,或“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sup>③</sup>,或“遣亲信于化外贩鬻”<sup>④</sup>,更是趋之若鹜。正如南宋两度出知泉州的真德秀所说,宗子“抵法冒禁,色色有之”<sup>⑤</sup>。政府的禁令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权豪官家私营海外贸易者更不乏其人,此从朝廷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便可窥见一斑。

民间商人兴贩牟利于海外,系经营形式之三。这种私商经营海外贸易的形式在宋代是相当普遍的<sup>⑥</sup>。政府极力鼓励这种商贸活动,但它又是在市舶司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其经营形式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独资”,即采用自己的资本,打造船只,购置货物,招聘船员乃至纲首(即船长)从事海外贸易,如王元懋便是独资经营的典型例子。《夷坚志》载:

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祇役僧寺,其师教以南番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淳熙五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困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以十五年七月还,次惠州罗浮山南,获息数十倍。<sup>⑦</sup>

又如崇宁四年(1105年),泉州商客李充,“将自己的船壹只,请集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9。

②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9。

③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

⑤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15。

⑥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37。

⑦ 洪迈:《夷坚三志》己卷第6《王元懋巨恶》。

水手，欲往日本国，转买回货”<sup>①</sup>。这种独资经营者，可以说都是地方上的富豪之家。二是“合本”，乃共同出资，合股经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据《淮海集》载：

林昭庆，泉州晋江人也。少趺驰，以气自任，尝与乡里数人相结为贾，自闽粤航海道，直抵山东，往来海中数十年，费用甚饶。<sup>②</sup>

又据《夷坚志》载：“泉州商客七人：曰陈、曰刘、曰吴、曰张、曰李、曰余、曰蔡，绍熙元年（1190年）六月，同乘一舟浮海”<sup>③</sup>，等等。这些人有不少是想通过海外贸易发财致富的中、小商人，还有一些是谋求生计的无地或少地之民。无论是“独资”，或是“合本”，民间私商经营的海外贸易，在泉州市舶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王元懋一次贩到的沉香、真珠、脑麝等货物，就“价值数十万”<sup>④</sup>。

泉州人们从商致富的情形，犹如刘克庄作《泉州南廓二首》所吟：“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惟有桐城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sup>⑤</sup>他们当中的确出现了许多象“致费二万万”的泉州杨客<sup>⑥</sup>，“获利百倍”的泉州纲首朱纺<sup>⑦</sup>，“费用甚饶”的晋江人林昭庆<sup>⑧</sup>，“其富不费”的泉州人王元懋<sup>⑨</sup>等这样的暴发户。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宋代泉州民间私商经营海外贸易之盛况。

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就是以这样的几种不同身份者的不同

① [日]《朝野群载》卷20《大宰府附异国大宋商客事》，转引自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

② 秦观：《淮海集》卷33《庆禅师塔铭》。

③ 《夷坚三志》己卷第2《余观音》。

④⑨ 洪迈：《夷坚三志》己卷第6《王元懋巨恶》。

⑤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

⑥ 《夷坚丁志》卷第6《泉州杨客》。

⑦ 莆田《祥应庙碑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⑧ 《淮海集》卷33《庆禅师塔铭》。



经营形式与海外各国通商往来的。

## 二

宋代通过海路与泉州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是相当广泛的。成书于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云麓漫钞》，记述了南宋中期常到泉州贸易的海外国家有31个，即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秔、三佛齐、真腊(真里富)、三泊、缘洋、登流眉、西棚、罗斛、蒲甘、渤泥、阁婆、占城、目丽、木力干、宾达浓、胡麻巴洞、新洲、佛罗安、朋丰、达罗啼、达磨、波斯兰、麻逸、三屿、蒲哩唤、白蒲迳、高丽<sup>①</sup>。曾于嘉定至宝庆间(1208—1227年)任泉州市舶提举的赵汝适，在他编的《诸蕃志》一书中，记录了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情况。这部“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里之联属，山泽之蕃产，译华方，删其秽渫，存其事实”<sup>②</sup>而写成的重要著作，所列举的国家就更多了。这一时期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不下60处。以今人的地理概念来说，其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非洲的广大地区。《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书记述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具体事例，考古发掘出土的大批实物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

东亚：泉州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往来是十分频繁的。从泉州去高丽，船舶乘夏季之后的南风北上，“必先至四明(即宁波)而后再发”，一般“五、七乃至二十日”便可到达<sup>③</sup>。泉州多有海船人高丽往

① 赵云卫：《云麓漫钞》卷5《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舶》。

② 赵汝适：《诸蕃志·自序》。

③ 《历代名臣奏议》卷318。

来买卖<sup>①</sup>，即使在宋辽对峙曾一度禁止商贩往来的时期，泉州商人私自到高丽贸易从不间断。宋时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sup>②</sup>，而其中以泉州商人为数最多。仅据《高丽史》所载，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至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泉州商人到高丽国贸易的有18起，近500来人<sup>③</sup>。举其姓名和有事迹可考者有欧阳征、林仁福、陈文轨、怀贲、陈亿、李颢、卢遵、林藹、林禧、王易从、黄文景、肃宗明、徐戩、徐成<sup>④</sup>以及柳悦、黄师舜<sup>⑤</sup>和黄慎<sup>⑥</sup>等。这些泉州商人不仅带去了大量的“土物”、“珍宝”和“新注华严经经板”等，还为密切两国间的关系做出了贡献。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国“始复遣使修贡”，就是“因泉州黄慎者为向导”，才使中断了数十年的两国关系重新恢复起来的<sup>⑦</sup>。

宋朝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虽然是明州，但泉州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前面提及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是专门从事对日贸易的商客。他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1105年）曾先后2次泛海到日本“转买回货”。日本商人则常搬运杉木板和罗木板至泉州贸易<sup>⑧</sup>。

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就与泉州开始通商往来了。在宋代，主要是三佛齐（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加里曼丹岛）、阁婆（爪哇岛中部北岸）、蓝无理（苏门答腊岛西北亚齐）、凌牙斯加（泰国北大年）、佛罗安（马来半岛西部）、新拖（爪哇岛西部）、蓝篔（苏门答腊岛东岸）、苏吉丹（爪哇岛中

① 《东坡奏议》卷6《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② 《宋史》卷487《高丽传》。

③④ 《高丽史》卷418。

⑤ 《历代名臣奏议》卷346。

⑥⑦ 《四明志》卷6《市舶》。

⑧ 《诸蕃志》卷上《倭国》。

部)、单马令(马来西亚境内)、登流眉(马来半岛中部)、麻逸(菲律宾民都洛岛)、三屿(菲律宾三岛)、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和罗斛等。三佛齐是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它不仅是“诸蕃水道之要冲”,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东来的印度和阿拉伯诸国船舶,“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sup>①</sup>。从这里“舟行顺风月余亦可到”泉州<sup>②</sup>。占城是泉州与南海诸国交往的必经之地,是“海外诸蕃国”的“都会”之一。其距泉州较近,“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便可到达。象这样以泉州为基点记述与东南亚诸国的航程,在史书中是很常见的:阇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真腊国,“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sup>③</sup>,说明当时泉州与东南亚这些国家之间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航线。东南亚向来是泉州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泉州商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最为活跃,不仅常到这里做买卖<sup>④</sup>,而且,有的成了东南亚诸国对宋“朝贡”的媒介<sup>⑤</sup>。有的兼通番汉书,备受当地政府的重用<sup>⑥</sup>;有的甚至长期居留并“娶妻养子”<sup>⑦</sup>。这一特殊现象的出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亚:宋代称印度次大陆地区为“西天诸国”。通过海道与泉州往来的国家有南毗(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故临(印度西南

① 《岭外代答》卷2《三佛齐》。

② 《文献通考》卷332《三佛齐》。

③ 以上参见《诸蕃志》各国传。

④ 例见《夷坚甲志》卷第7《岛上妇人》:“泉州僧本称说,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莆田《祥应庙碑记》:“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等。

⑤ 《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9。

⑥ 《夷坚三志》己卷第6《王元懋巨恶》。

⑦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禁约》。

岸全隆)、胡茶辣(印度西北古吉拉特一带)、注犍(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鹏茄罗(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细兰(斯里兰卡)等。故临是泉州与阿拉伯等西方国家往来的中断站。自泉州至故临,一般于11、12月乘北风从泉州扬帆,出岱屿门,舟行40天到蓝无里过冬,第2年又启航,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顺风月余抵达故临<sup>①</sup>。有不少“西天诸国”的商人直接到泉州从事贸易,其“富者钜累货万,列居即城南”,南毗人罗巴智力干父子便是来泉经商并在这里定居者之一。同时僧侣也相继来泉州活动。

东南亚:宋代把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诸国称为“大食”。比较著名的国家有麻嘉(沙特阿拉伯麦加)、瓮蛮(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阿曼)、记施(波斯海基什岛)、白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弼斯罗(波斯湾北岸巴士拉)、吉慈尼(阿富汗加兹尼)、勿斯离(伊拉克北境摩苏尔)等。从泉州到大食,沿南下航线先抵故临,在这里换乘小船继续航行,花1个月越过阿拉伯海,便到达波斯湾沿岸之“大食诸国”。自泉州至大食,1次大概需要2年时间。而由大食东来,乘信风航行1月到故临,改大舶续航,过马六甲海峡北上,自甲子门入泉州。虽然“大食在泉州之西北,去泉州最远”<sup>②</sup>,但是大食诸国的穆斯林商人沿着海路前来泉州的很多,而且输入物货的数量也很大。如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蒲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抽解“直三十万缗”<sup>③</sup>。同时伊斯兰教传教士也纷至沓来。这些商人和传教士在泉州进行商业和宗教活动,并大批定居下来,聚居于城南。大食商人施那韩便是他们当中较为著名的一位<sup>④</sup>。

非洲:位于北非的易斯里(埃及开罗)、遏根陀(埃及亚力山大

① 《诸蕃志》卷上《故临国》。

②④ 《诸蕃志》卷上《大食国》。

③ 《宋史》卷186《食货志》。

港)、默伽猎(摩洛哥)和东非海岸的层拔(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琶罗(索马里柏培拉)、中理(索马里沿岸)、昆仑层期(马达伽斯伽岛),甚至远在西欧的斯加里野(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国家和地区,也通过海道与泉州发生贸易关系。

### 三

海外贸易,是一种通过海运流通商品的经济活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满载着物货的“泉舶”,由泉州港扬帆,经越南东海岸,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复穿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或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非洲东岸。而阿拉伯、波斯以及印度、东南亚诸国的使节、商人、僧侣、传教士等搭乘船舶,纷纷东来,蕃货远物在泉州源源登岸。宋代经由泉州输出的商品,既有当地的,也有如建州腊茶、龙泉青瓷器等国内不少州郡的土产;而输入的商品,则是来自海外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和阿拉伯地方的特产。进出口“舶货”,不仅数量浩瀚,而且种类繁多。

宋代泉州向海外诸国输出的货物,大致上可分为这么几类:

陶瓷器。中国以盛产瓷器而著称于世。泉州的制瓷业在宋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大批窑口的兴建,产品数量的激增,还是烧制工艺所达到的水平,都是以往朝代所不能比拟的。据近年来考古调查,泉州府各县已发现的宋代窑址达100多处,其数量为历代窑址之冠。主要窑口有德化盖德窑、泉州东门窑、晋江磁灶窑、同安汀溪窑和安溪桂瑶窑等。从采集和发掘的标本看,有碗、瓶、盒、壶、杯、洗、盂、军持以及各种雕塑品。不惟种类繁多,造型优美,且釉彩丰富,光泽莹润,有青、影青、白、黑、绿、黄色等。瓷器装饰有卷草、莲瓣、折枝花、云龙、飞凤和几何图案,均美观雅致。由于

泉州瓷器“甚饶足，并过洋”，大批出口，行销广泛，遂成为深受各国人民欢迎的主要对外贸易品。简直可以说，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几乎到处都能够寻见当年留下来的泉州瓷器的遗迹。在日本，同安汀溪窑的青釉划花篦纹碗被称为“珠光青瓷”<sup>①</sup>，福岗、松川等地出土的“黄釉铁绘花纹盘”和“白瓷盒子”，则分别是晋江磁灶窑与德化窑的产品<sup>②</sup>；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的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当地出土的泉州宋窑的军持、瓶、盘、盒等<sup>③</sup>；在斯里兰卡曾发现德化窑的“莲花瓣”<sup>④</sup>；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 1 万多件中国瓷器中，也有泉州的宋代青瓷器<sup>⑤</sup>；在肯尼亚，发现有安溪窑的宋代瓷瓶<sup>⑥</sup>；在埃及，早于十一、二世纪的法贴梅时代就输入漂亮的德化瓷器了<sup>⑦</sup>。

纺织品。海外诸国向来喜爱中国的纺织品。纺织业的发展，在泉州亦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代居子显著的地位。“女工织纴，冬锦夏葛”，成了泉州城乡一种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宋代泉州又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之一，曾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纺织品种类齐全，花纹美观，色彩绚丽，质地轻柔，织工精巧，北宋时已有“绮罗不减蜀吴春”<sup>⑧</sup>的美誉。其棉麻丝绸产品产量之多和质量之美，不仅被列为贡品<sup>⑨</sup>，而且大批投入市易，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宋代从泉州运销海外的主要货品有绢、生绢、白绢、缟绢、五色绢、五色纴绢、假锦、建阳锦、缎锦、锦绫、白绫、皂绫、丝帛、象眼（一种纺织品），还

① [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

②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③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④⑤⑥ 许清泉：《宋元泉州陶瓷生产与外销》，《古陶瓷研究》第 1 辑。

⑦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

⑧ 苏頌：《苏魏公集》卷 7《黄从政宰晋江》。

⑨ 《泉州府志》卷 21《田赋》载：绍兴中规定上纳朝廷的贡品，仅棉布一项即达 5 千匹。

有白布、红吉贝、五色茸等。

金属及其制品。泉州的矿冶业以铁矿的开采和冶炼最称发达。宋时各县俱产铁砂，置冶煮炼，其中以安溪青阳冶铁场最为重要。据《宋史》记载，庆历五年（1045年），该处“铁冶大发”，迄今留下来的遗址范围很大，铁渣堆积层达数公尺。冶银主要集中在安溪的龙崇银场。熙宁间（1068—1077年）开始采炼，其规模也相当可观。治平中（1064—1067年）在泉州还设有“铜冶”<sup>①</sup>。与矿冶业有关的各种金属铸造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产品大量供给国内市场和远销海外，是泉州的重要利源之一。据《泉州府志》记载，宋时泉州“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sup>②</sup>，可见坑冶铸造之盛和外销数量之巨。出口的主要金属与各种金属制品是铜鼎、铜锅、铁鼎、铁锅、铁针、铅网坠和金银器皿、锡器，以及铁、铜、乌铅、白锡、赤铜、金、银等。

农副产品。糖、酒、盐、茶等在出口商品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货物主要畅销东南亚一带。十、十一世纪，泉州成为全国甘蔗的生产中心之一，制糖业大兴，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宋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就特别指出泉州是砂糖的产地。《惠安县志》说，“宋时王孙走马埭及斗门诸村，皆种甘蔗煮糖，商贩辐辏”。制成的白砂糖、糖霜，大量“泛海售商”，官府还在这里“置监收其税”<sup>③</sup>。据《诸蕃志》记载，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等国都从泉州进口糖和酒。泉州制盐自宋以来即多于他郡，堪称发达。沿海一带，“民多业盐，以盐为籍”<sup>④</sup>。盐亭分布甚广，晋江县有161个，惠安县129个，南安、同安也有不少。当时泉州酿酒业

① 《宋史》卷186《食货志》。

② 《泉州府志》卷21《田赋》。

③④ 《惠安县志》卷5《物产》。

与制盐业之兴盛,有“千家沽酒万户盐,酿溪煮海恩无极”<sup>①</sup>之称。产盐除供本地食用外,还运销内地,并输往单马令等东南亚一带。茶树的种植于北宋已普及泉州各县,从沿海丘陵到内陆山地,都有不少茶园,所产茶叶既多且佳。泉州清源洞和南安一片瓦的茶叶被推为上品。安溪是主要的产茶区,从宋初黄夷简的《山居诗》“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句子中可窥其盛貌。出于清水岩者,其味尤香,深受时人赞赏。最迟在北宋,泉州茶叶便已开始外销,如皇祐时(1049—1054年)晋江县南部的大宅诸村广植茶圃,产品曾运销两粤及交趾<sup>②</sup>。至南宋,泉州茶叶则与瓷器、酒等同为海外各国“皆所愿得”的重要出口商品<sup>③</sup>。

此外,漆櫨、漆碗、雨伞、凉伞、绢伞、草席、梳子等日常生活用品,大黄、黄连、川芎、白芷、樟脑、乾良姜、硼砂、砒霜等药材,纸、笔、建本文字(建州的书籍)、牙臂环、五色珠子、皮鼓等文化艺术品,胭脂、珠砂等化装品和桐油等也运销海外诸国。各种物货大量出口,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进口商品——宋代从海外各国输入的货物达400百种以上,下面是常见于记载的品类。

宝货:象牙、犀角、真珠、珊瑚树、翠毛、龟筒、玳瑁、人参、麝香、龙涎、猫儿睛、砗磲、碾花琉璃等;

香料:乳香、金颜香、笃耨香、安息香、蔷薇水、沉香、笈香、速暂香、黄熟香、生香、檀香、降真香、麝香木等;

药物:龙脑、没药、血竭、苏合香油、梔子花、肉豆蔻、没石子、苏

① 《方輿胜览》卷12。

② 《西山杂志·大宅》。

③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41。



木、木香、白豆蔻、胡椒、萆澄茄、阿魏、芦荟、肭肭脐、茯苓、白附子、石决明等；

布帛：蕃布、吉贝布、丝布、色丝布、驼毛布、织金软锦、兜罗锦、大小布等；

杂货：槟榔、槟榔酒椰子、椰子酒、波罗蜜、松板、罗板、杉板、乌横木、镔铁、水晶、硫黄、黄脂、水银、鸚鵡、椰心簞、螺头等。

在这些进口货物中，为数最多的是香料和药物。市舶司也最重视这类商品的进口。1974年于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便是载着香药从东南亚回航而沉没的。出土的遗物以香料与药物最为大宗，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胡椒和龙涎香等达4700余斤。<sup>①</sup>香药的输入，虽然被统治者大量地作为奢侈品，也助长了社会上宗教迷信活动。但是，香药在医药卫生和饮食方面的应用，给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增添了许多新的品种，并丰富了食品的内容，这对于人民的社会生活无疑是有好处的。

#### 四

史实向人们展示了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局面，那么，促使这一时期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呢？当然不可忽视诸如农业、手工业之进步这样的经济条件，但在一定程度上说，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应该是最重要的。

第一，宋廷南迁的影响。泉州在发展道路上的大踏步前进，是从南宋时代开始的。这一时期海外贸易大幅度上升，甚至赶上广州，成了我国对外通商的主要口岸。它的崛起，与宋廷南迁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sup>①</sup>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1125年,女真人发动了对北宋的掠夺战争,战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而泉州却处于偏安一隅的和平环境里。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南外宗正司移置泉州,大批皇亲贵族定居了下来。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宋高宗即“命六官自温州泛海往泉州”<sup>①</sup>,许多士大夫也纷纷逃到这里。远离兵火的相对安定局面,使泉州成了宋朝统治者的避乱之所,而更为重要的是让“有船人户”“不失本业”,<sup>②</sup>中外商人可以从事正常的海上贸易往来。建炎四年(1130年),正当江浙诸港横遭战火破坏之时,泉州市舶司依然“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sup>③</sup>。在宋金战争中,泉州港不但没有受到战火的威胁,海外贸易反而持续发展。

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偏安江南,临安(杭州)成了南宋的都城。因此,这里不仅是封建官僚集团统治人民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是统治阶级大肆挥霍的所在地。宋代从国外舶来的贵重物货和奢侈品,主要是供宫廷和统治者的上层人物享用的。杭州,这南宋王公贵族、百官富豪聚集的地方,便是一个最大的消费场所。宋廷南迁后的这一变化,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由于宋金对峙,两浙路各港口的海外贸易遭到严重的影响。从明州诸港进口那些专供上层统治者享用的舶来品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广州虽然在宋金战争中免遭兵燹,南宋时仍然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但是,在舶货“起发行在”方面则大大地不如泉州了。朝廷对纲运曾作过这样的规定:

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言,市舶司管押纲运官推赏,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之十三。

③ 《宋史》卷186《食货志·香》。

今措置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物货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无欠损与比做押钱帛指挥推赏，如不及全纲以五斤为则作十分组计，亦依押钱帛纲地置格法等第推赏。从之。<sup>①</sup>

从广州到杭州纲运“六月程”比泉州“三月程”要困难的多，加之长途输送既有不少“欠损”，又往往是“枉费脚乘”、“亏损官钱”<sup>②</sup>，于是，泉州所处地理位置之优越，比广州更胜一畴。宋廷的南迁，泉州不象明州港那样遭受战乱的波及，海外贸易可以充分发展；又比广州靠近都城，物货搬运入京比较顺利。这样一来，它作为杭州从海外输入香药宝货的最近便的口岸，受到了南宋统治者的倍加关注。

南宋时的杭州，亦是奇珍异宝“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的商业中心，是国外进口商品“从便货买”的最大销售市场。而这些舶来品主要是由泉州输入的。杭州商贾辐辏，“视京师（指汴梁）其过十倍”。闽商搬运大量海外物货至杭州交易，江浙商人从泉州转买胡椒、降真香、豆蔻等到这里贩卖的更多<sup>③</sup>。为了供给市场的需要，满足官舍富室豪华奢侈的消费，泉州不仅成了江浙海商转贩舶货的场所，而且是“泛往国外”出洋兴贩的主要港口<sup>④</sup>，泉州海外贸易因此而更加繁盛了。在宋廷南迁的影响下，泉州步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

第二，政府对外政策的作用。宋代的海外贸易，是在封建政府严格控制下进行的。统治者的态度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与海外贸易的盛衰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鼓励海外贸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0。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21。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4。

④ 吴自牧：《梦粱录》卷12。

易,实行对外开放,是宋朝政府的一贯方针。南宋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统治者更加积极提倡了。

宋廷南迁,丧失了半壁江山,局踣于江南一隅。面临着军需民用“经费缺乏”的状况,宋高宗充分认识到展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曾谕及臣僚云: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sup>①</sup>

他还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sup>②</sup>,显示出对海外贸易的格外重视。当时的泉州既近临安,又不受兵火之扰,这对于把市舶之利作为重要财政来源之一的南宋统治者来说,其地位更显重要,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各方面扶持泉州市舶司,藉此进一步来发展海外贸易。

其一、加强市舶司职权。绍兴十二年(1142年),南宋政府罢止绍兴二年以来福建提举茶事司兼领提举市舶,而“令见任官专一提举”泉州市舶<sup>③</sup>,以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紧接着,朝廷又应市舶提举楼琫之请,增拨官钱犒设蕃商。《宋会要辑稿》载:

绍兴十四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琫言,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船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从之<sup>④</sup>。

南宋朝廷还多次拨款,增加市舶“本钱”。建炎二年(1128年)六月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

②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1。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3。

十日“诏度牒师号一十万贯付福建”“专充市舶本钱”<sup>①</sup>，乾道三年（1167年）又特地“诏令福建市舶司，于泉、漳、福州、兴化军应合起赴左藏西库上供银内，不以是何窠名，截拨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sup>②</sup>。南宋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泉州招徕海外商客，扩大贸易数额，广泛开展贸易活动，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其二、弛禁舶货交易。对于进口货物的贩买，南宋政府也逐步放宽了运销范围的限制。按原来的规定，“蕃商止许于市舶置司所贸易，不得出境”。这样一来，造成进口商品不能正常运转行销，使海外商人“有失所之忧”<sup>③</sup>。为了让泉州的海外贸易不受影响，宋廷很快便于淳熙二年（1175年）取消了这道禁令，允许前来泉州的蕃船，其物货只要经过市舶司征榷之后，“疏其名件，给据付之”，便可以往“福建路州军兴贩”<sup>④</sup>。于是，开阔了输入货物的销售市场。为了适应这方面的需要，南宋政府于开禧三年（1207年）又一次放宽了政策，批准海外商船，除依市舶条法“抽解和买人官”外，其余物品可以“从便货买”<sup>⑤</sup>。这一规定的实施，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的流通速度，扩大了运销范围，极大地便利了商人的买卖，进一步密切了泉州与国内诸市场的联系，从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商船前来泉州贸易。

其三、申饬市舶治理。为了保证海外贸易的广泛展开，进一步增加市舶收入，南宋政府规定了一系列加强市舶管理的办法和奖惩条例。对“招诱舶舟，抽解物货”作出贡献的蕃舶纲首和市舶务监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2。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9。

③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0、31。

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3、34。

官,分别以“补官有差”和“转一官”的奖赏<sup>①</sup>。如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故“特与补承信郎”<sup>②</sup>。而对“亏损番商物价”等影响海外贸易的官员给予降低官职的处分<sup>③</sup>。并且,如果发现官司“巧作名色,违法抑买”的现象,“许蕃商越诉,犯者计赃坐罪”<sup>④</sup>。

同时,还注意到市舶提举的委任是否得当与海商即离、贸易消长的关系。宋高宗认为:

提举市舶官委寄(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即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sup>⑤</sup>

现实就是如此,经常出现那种“提举官往往非其人,致蕃商稀少”的状况<sup>⑥</sup>。因此,朝廷尽量起用执行和实施政策得力的官吏,以杜绝侵盗之弊和招徕外国商舶。在泉州,不乏有为政清廉,多有建树,深受蕃商和百姓拥戴的好市舶官。例如绍兴间(1131—1162年)“监泉市舶务,宿弊十去八九”的傅自修<sup>⑦</sup>;淳熙元年(1174年)任提舶“贾胡钦仰清节高”的虞仲房<sup>⑧</sup>;淳熙五年任提舶“严禁官吏向蕃商强买”,“蕃商闻风并集,舶计骤增”的刘克逊<sup>⑨</sup>;嘉定间(1208—1224年)任知州兼提舶和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的赵崇度<sup>⑩</sup>;淳祐间(1241—1252年)任知

① 《宋史》卷185《食货志》,《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5。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25。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4。

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6。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7。

⑦ 《晋江县志》卷11《人物志》。

⑧ 楼钥:《玫瑰集》卷1《送虞仲房赴潼川漕》。

⑨ 《福建通志》卷14《列传》。

⑩ 《福建通志》卷125《宋宦绩》。

州兼提舶“剔除蠹弊，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的方澄孙<sup>①</sup>，等等，他们都为发展海外贸易做出了贡献。

第三，造船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兴盛是与造船业的发达分不开的。宋代，我国的主要造船基地，多集中在沿海的交通要冲明州、泉州、广州之大海港。然而，泉州造船技术之进步，则居于首屈一指的领先地位，曾得到“海舟以福建为上，广、西船次之，温、明又次之”<sup>②</sup>的高度评价。《太平寰宇记》还特别引人注目地把“海舶”一项，列为泉州土产之一<sup>③</sup>。正因为泉州建造的航海大舶，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中外商客所乐用，故每因朝廷遣使，均先期来泉州雇募客舟<sup>④</sup>，并屡屡被宋朝政府诏令大批建造<sup>⑤</sup>。当时官营造船场并不兴隆，而民间造船业却兴旺发达起来。凡滨海之民，皆自备财力，建造舟船，兴贩牟利于海外<sup>⑥</sup>。可以认为当时在晋江边上的泉州以及惠安、南安、晋江沿海一带的许多地方，曾出现过一个个繁忙喧腾的造船工场。据考古调查，泉州城南门外辛公亭附近的厂铺，市东南郊的乌墨山澳和鸡母澳等地方，都发现有造船的遗迹<sup>⑦</sup>。

如此堪称发达的泉州造船业，不仅在史籍中留下了许多记载，更难能可贵的是，1974年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现为此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实物证据<sup>⑧</sup>。这艘被研究认为是宋末时代的海船，其出土时，虽然保存下来的只是一个残体，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尖底造

① 《泉州府志》卷29《名宦》。

② 吕颐浩：《忠穆集》2卷《论舟楫之利》。

③ 《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道·泉州》。

④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1《客舟》。

⑤ 参见《泉州府志》卷29《名宦》之黄彦辉、林湜等各传之有关记载。

⑥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37。

⑦ 泉州海交馆调查组：《泉州涂门外法石沿海有关中外交通史迹的调查》，《考古》1959年第11期。

⑧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型、三重壳板、多根桅杆、隔舱数多并采用水密舱制等特点,反映了其规模大结构坚固,容量多善于装载,稳性好抗风力强,吃水深适于远洋航行等技术成就,是宋代泉州造船业发达的重要物证。早在700百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对造船的许多科学原理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和比较成熟的掌握成度,这些长期生产实践的总结,智慧的结晶,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乃至今天仍然有其深刻的影响<sup>①</sup>。考察陈列在泉州海交馆内的出土古船,低吟着宋人谢履“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sup>②</sup>的诗句,不难令人想像到宋代泉州造船业和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的情景,也不能不由此而认为这是当时海外贸易赖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 对古船的研究和探讨,请参照1987年海洋出版社出版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所载各论文。

② 《舆地纪胜》卷134《福建路·泉州》。



# 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

在元代，泉州曾以“东方第一大港”而著称于世。那么，元时泉州的繁盛状况究竟怎样？产生这种繁盛局面的原因是什么？这里，笔者拟通过对当时海外贸易的兴盛、港市的繁荣，以及泉州在元初的特殊地位等方面的考察与分析，来揭示和认识泉州发展史上这一黄金时期的真实面貌。

## 一

元大德六年(1302年)泉州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一文中记云：“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sup>①</sup>。这种梯航万国的空前发达的海上交通，在当时的官方文献和私家著作中也有不少记载。《通制条格》云，由泉州出发去做买卖的商船，远至“回回田地里”（阿拉伯世界）和“忻都田地里”（印度）<sup>②</sup>。有的亦记述说，泉州舶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与夫东南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sup>③</sup>。泉州还成了计算我国与东西洋诸国航程的起点站。如《元史·马儿八国传》云：“自泉至马儿八约十万里”；《异域

① 《泉州府志》卷11《城池》。

② 《通制条格》卷7《杂令》。

③ 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转引自高启《青邱诗集》卷10。

志》云：爪哇国“自泉州发船一月可到”等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与泉州发生海上贸易关系的有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和非洲东北部，以及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对此更作了详细的记载。

据《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与泉州通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除澎湖外，达 98 个，比宋代《诸番志》的记载，增加了三、四十个之多<sup>①</sup>。这些通商口岸，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及印度、马来群岛，这说明元时泉州与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与伊斯兰国家和东非乃至欧洲之通商，更多的还是以中介贸易的形式出现的。据记载，“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泉州），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转贩蛮子境内”<sup>②</sup>。在东南亚诸国中，吕宋群岛的三岛，“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sup>③</sup>；“元惠宗至正初，爪哇国王爱时念黑耳，还曾派出他的商船来泉州贸易，然后转赴印度，而泉州商人一般从这里输入大量黄金，并获得最大量的香料，远销到世界各地”<sup>④</sup>；小巽他群岛东部的古里地闷，有泉州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sup>⑤</sup>。可见，泉州商人常至东南亚一带进行贸易活动而大获其利。

元代泉州港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必然促使这个“梯航万国”的都会亦成了元帝国最大的商品集散港口。

《岛夷志略》不仅记载了元代泉州与海外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还对当时的贸易方式进出口商品的种类等也作了详细的记录。

① 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国名，请参见苏继庠校释的《岛夷志略校释》一书之记载。

② 张星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册第 609 页。

③⑤ 《岛夷志略校释》之《三岛》、《古里地闷》、《前言》。

④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 3 卷第 6 章《爪哇岛》、第 2 卷第 82 章《泉州港及德化市》。

其记元代泉州的外销商品有 90 多种,比宋代增加了不少。总的来看,输出品系以衣料为最多,日用品和食品等次之。衣料有锦、缎、绢、丝等帛类和棉、苧、葛、麻等布类,日用品有盘、瓷瓶、瓷壶瓶、各色烧珠、瓦翁、大小水罐等各种陶瓷器和金、银、铅、锡、铜、铁等各类金属器;以及盐、酒等食品与漆器、篦梳、黄油伞等杂货。这些外销商品,虽以福建各州县之地产为大宗,但来自江南甚至西南各省的产品中,也不乏有名牌货。如海南岛的海南布,苏杭二州的苏杭色缎,浙江处州(龙泉)的处州瓷,江西浮梁(景德镇)的瓷壶瓶及瓷壶,广东、云南的牙梳等等。

应该说,元代泉州发达的制造业为港口外销提供的各类商品,数量最多,品种也最为丰富。如纺织品,仅《岛夷志略》所载,就有 20 余种产自泉州。其中“刺桐缎”(又称泉缎)更是驰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又如瓷器,德化瓷器当时已列为上供贡品,颇负盛名。马可波罗来泉州时,对它赞不绝口。晋江磁灶所生产的军持、瓶、执壶、罐、碟等外销产品,在釉色及装饰手法方面,除具有我国的传统格调外,还部分带有异国风味。这说明当时生产工艺技巧有了新的提高。

进口商品中香药类数量最巨,其次是衣料类、宝货类、食品类及各种杂货。特别是衣料的输入,较前代为多,除宋代进口的品类外,还有八丹布、巫峇布、柔布、苾布、闍婆布、八都刺布、八节那间布、西洋布、麻逸布、占城布、甘理布等。香药、宝货品类之多,也跟宋代一样,其他如波罗蜜、万年枣等食品以及出自通商各国之土产,货色繁多,难以枚举。

元代泉州海外贸易之兴盛。正如元时著名文人吴澄所称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

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sup>①</sup>。因此可以认为，元代泉州实际上已支配了元帝国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成了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大港。

## 二

元世祖至元末年以后，泉州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她以空前繁荣的都市风貌为世人所注目。中世纪最著名的游历家、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首先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历史情景。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末，在元廷服务了17年的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护送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为王后，途经泉州城。他在《游记》中记述了所目睹的事实：“……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远到蛮子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自己投资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巨额的收入。”他还谈到了这里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sup>②</sup>。

继马可波罗之后的又一位著名游历家、摩洛哥丹吉尔港人依宾·拔都他于1347年(元至正七年)来华，从泉州登岸。他对元代后期泉州的盛况作了明确的记述：“渡大洋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城极扼要，生产绸缎，较汉沙(杭州)及汗八里(大都)

① 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

②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3卷第6章《爪哇岛》、第2卷第82章《泉州港及德化市》。

二城所产者为优。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为大海伸入陆地，港头与大川相接。城内每户必有花园及空地，居屋即其中央，正犹吾国的赛格尔美撒城内情形”。在他的笔下，刺桐城又是各种制造业都很发达的工业城市。驰名海外的刺桐缎，被元朝皇帝作为馈赠印度摩哈美德国王的高级礼品；许多技术先进、设备齐全的中国商船，大者有3至12帆，1艘可载千人，而这些商船都是泉州和广州二埠制造的；从刺桐港出口的包括这里烧制的瓷器，运往印度诸国，甚至远达拔都他的故乡摩洛哥等等<sup>①</sup>。

此外，意大利僧人马黎诺里，于1342年（元至正二年）受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之遣，出使元廷，回国时由泉州放洋。他的游记也有这样的记载：“又有刺桐城为大商港，亦面积广大，人口众庶。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栈房一所，以储存商人来往货物”<sup>②</sup>。

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商埠之一，这时“刺桐港”的名字已蜚声海外，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游记、史著或书札中。1298年（元成宗大德二年）任波斯首相的拉施特，虽未曾来华，但所著《史记·契丹国传》也述及刺桐港的重要地位：“中国之工程师及科学家，皆报告由契丹各省、马秦（中国南方）都城兴绥（杭州）、刺桐诸城来之船舶，……兴绥、刺桐乃滨海大埠。由印度及马秦都城航来的船舰，皆至此停泊”，“刺桐为商港，海舶辏集”<sup>③</sup>。

可以相信，在十三、四世纪，刺桐港的名字为世人所熟知，就象今天人们熟知纽约、东京一样。甚至到了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当著

①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拔都他游历中国记》。

②③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54、239、337页。

名的航海家哥伦布着手进行东航时,也知道在中国有一个举世无匹的巨港。当时,意大利学者保罗托斯加内里为他介绍东方情形的信中就说到了元代刺桐港之盛况<sup>①</sup>。

正象西方人笔下所记述的那样,泉州不仅是昌盛的通商巨埠,而且也是一座繁华的国际都市。

至元十二年(1352年),郡守偃玉立对罗城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修筑和扩建。这次工程把位于今涂山街一带的原罗城之南垣向南拓展,直至濒临晋江北岸,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郡守游九功筑的翼城连接起来,并加高砌石,从而使城周达到30里<sup>②</sup>。这个历史上的最大范围,把最热闹的城南商业区的大部分包罗了进来。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居民,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外,来自阿拉伯、波斯、叙利亚、也门、亚美尼亚、印度、占城、爪哇、吕宋群岛,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也纷至沓来侨居在这里。这些外国人,无论人数、国籍或身份,都比宋时复杂得多。他们当中有商人、传教士、教徒、游历家、水手、骑士、妇女和儿童,也有王子、贵族和使节。在这些肤色不同、服饰各异的人们中,又以头裹白巾、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各地的穆斯林居多,故有“裹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sup>③</sup>之称。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中外商客云集,商业异常繁荣。“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sup>④</sup>。商品交易活动,集中于城南进行。这里既有集市贸易,还开设着稠密的店肆。店内外商品丰富多采。“市有生蛮卖象牙”是摆摊兜售的外国商贩;“户外声声卖紫檀”,是穿街走巷挑担叫卖的香料贩子。由于便捷的海陆交通,泉州同国内其他市场

①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54、239、337页。

②④ 《泉州府志》卷11《城池》。

③ 宗渤:《清源洞图一·为洁上人作》,《全室外集》卷4。

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各地商人纷纷涌入泉州,他们“往往机巧趋利”,或把各种番货运物贩抵杭州和大都,或活跃于东南亚等海外各国之间,兼营转销彼此所缺商货的国际贸易。如杭州商人张存,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流寓泉州,前后6、7年,即以贩舶起家,他本人还到过“蕃中”<sup>①</sup>;泉州陈江丁氏开基祖丁节斋,也是于元初“自苏(州)货贾于闽泉”,最后“卜居泉城”的<sup>②</sup>;又如江西商人汪大渊,长期住泉经商,与泉州结下了不解之缘<sup>③</sup>。有赖于此类商人的转运活动,不少远地货物源源聚集于泉州港,运销海外,而数量浩瀚的舶来商品,也被不断地转贩于国内其他市场。此时,宋代的李充、朱纺、蔡景芳等那样“其富不赀”的本地大商<sup>④</sup>,已甚少见。代替他们的,则是在元统治者实行种族歧视制度下,政治、经济地位都要优越得多的回回巨贾。如蒲寿庚、佛莲、赛洛夫爱丁、合只铁即刺、马合马丹等。他们或则官居显贵,府第栉比;或则财富惊人,“挥金不啻于泥沙”;或则敢于纠集武力,夺取市舶大权,发动叛乱等等,均反映了其政治、经济实力之雄厚。其他色目人亦从事商业活动,连基督教堂的教士也建有以储存商人来往货物的栈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当地的香料与丝绸交易,乃至整个经济命脉。这构成了不同于宋代的元代泉州城市商业的重要特色。

在这座城市里,有着不同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各个民族。他们混处一隅,虽然存在着相互间的排挤和斗争,然而更为重要的民族的相互影响与融合。许多人与当地妇女、男子通婚,从此定居下来,并死葬泉州。近代以来曾发现有阿拉伯文刻墓碑数百万。他们所生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23《圣铁》。

② 《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丁氏谱牒》。

③ 《岛夷志略校释》之《三岛》、《古里地冈》、《前言》。

④ 参见拙文:《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

的孩子被称为“半南蕃”。在一方中、阿文合璧的墓碑上镌记的“泣血谨志”者吴应斗，便是一个这样的半南蕃<sup>①</sup>。许多阿拉伯人的后裔，如潘、丁、郭、金、夏、葛、马等姓，有的已成为泉州人丁兴旺的家族。毫无疑问，在这种融合中，泉州的风俗、文化、艺术等等，也必然要受到深刻的影响。

论及元代泉州的繁荣，特别值得述及的是各种宗教在这座城市的传播和发展。由于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均采取宽容的政策，因此随着各色人等的侨居泉州，这里也成为世界多种宗教在东方的重要据点，形成了一种多教并存、教寺林立、竞相发展的驳杂局面。留存至今的那些蕴含着中古文化气息的宗教建筑及其遗迹遗物，为我们追溯当年的情景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各种外来宗教中，伊斯兰教的势力最大，其影响于泉州者亦最深。那时居于泉州的伊斯兰教徒数以万计，他们有自己的伊斯兰公会组织，并有礼拜寺六、七座。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通淮街之“清真寺”，则是元至大三至四年（回历710年，1310—1311年），一位来自波斯设拉子城著名的鲁克伯哈只重新翻修的<sup>②</sup>。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座典型的阿拉伯传统形式的寺院，几乎全是元代修建后的遗物。

基督教在元中叶以后已盛行于泉州，受教皇尼古拉斯四世派遣于皇庆二年（1313年）来华的意籍圣方各济各会教士安德鲁、哲拉德、裴莱格林3人，都曾相继任过泉州主教，而且均死葬泉州。城里建有“雄壮华丽，为一方冠”的教堂3所<sup>③</sup>。

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7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

②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1部分《伊斯兰教建筑石刻》，宁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5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与其他外来宗教一样,印度教之传播,也以元代最为盛。据考古发现,当时泉州至少有印度教寺两座。寺院规模宏大,其所遗青石建筑构件及石像雕刻等有 200 余方。这些石刻既多且美,具有典型的印度教风格,显然是经印度教徒授意或提供画本,而出自雕技高超的本地石匠之手的,堪称元代中印民间艺术交流的结晶。

此外,如佛教,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经朝廷批准,合 120 所支院为一寺,并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此为开元寺自唐创以来的最盛之时,寺僧“食常万指”<sup>①</sup>。又如摩尼教,元代也曾兴盛一时。元政府在这里设有管领江南诸路明教、景教等的教务大总管,可见泉州已成江南摩尼教最重要的教区。

元代各种外来宗教在泉州的传播,众多阿拉伯式、波斯式、印度式、意大利式和中国式的教堂的兴修,曾把这个“东方第一大港”点缀得光怪陆离,更洋溢着浓厚的“国际”气氛。

### 三

元代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和港市的繁荣,是与元初泉州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统治者的积极经营息息相关的。

1276 年 2 月,元军挥师南下攻取临安。撤至福建的宋端宗赵昰及张世杰等宋臣,对泉州庞大的南外宗正司以及拥有海上实力的蒲寿庚寄予兴复宋室的极大希望。但元统治者对泉州港和蒲氏的作用也知道的很清楚。于是,独揽泉州港军、政、市舶大权的蒲寿庚,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宋元双方围绕着他的向背而展开了对泉州港的争夺。然而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审势趋利,于景炎元年(1276 年)十二月初八日顿然弃宋降元,泉州城便牢牢地为元朝所

<sup>①</sup> 释元贵:《温陵开元寺志·建置》。

控制了。

由于蒲寿庚的弃宋降元，泉州港因此而没有沦为宋元双方的主要战场，避免遭受战争的巨大创伤甚至毁灭。在改朝换代、兵火相续的动荡年代里，泉州港口贸易未曾中断。泉州港之所以在元初会跃居为国内最大港的位置，这是重要的客观条件之一。

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提倡的态度，泉州归元后，即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特别重视和大力扶持。泉州由此而迅速地兴盛起来，并走向她的黄金时代。

至元十四年(1277年)，正当东南一带还是战火弥漫的时候，元世祖便下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并派蒙古人银青光禄大夫忙古斛主持，采取“每岁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然后听其货卖”<sup>①</sup>等一系列措施，鼓励人们通贸海外。泉州不仅首先设司，而且是招徕外商、组织海外贸易的中心。为了同南海诸国建立贸易关系，元世祖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特诏令唆都、蒲寿庚向“蕃舶诸人”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sup>②</sup>。很显然，正因为泉州港同南海的交通没有中断，而蒲寿庚“素主市舶”可“诱诸蛮臣服”，所以，元世祖才把注意力集中在这里。随后，元政府几次通使往南海诸国进行“招谕”活动，也多倚重泉州港的人物。如至元十六、十七、十八年(1279—1281年)曾相继派孙胜夫、万永贤、蒲师文等“通道外国，抚宣诸夷”。元政府频频派遣以泉州人为主体的使团招谕海外，说明泉州港在对南海通贸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中外使节的往来，则多是由泉州登岸或附舶的。

元初频繁的招谕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海外诸国纷纷遣使前来朝贡，元帝国同南海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

① 《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② 《元史》卷10《世祖纪七》。

这必然首先给处于特殊地位的泉州带来了繁荣是毫无疑问的。

元朝政府在立国之初,便以泉州港为中心积极展开招谕诸蕃的活动,通贸海外;与此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以恢复和发展泉州的社会经济,进一步促进港口贸易的兴盛。

政治方面,泉州行省的建立最为重要。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越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设泉州路总管府。后行省虽屡有迁移,但大德元年(1297年)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时,又徙治泉州。作为行省政治中心,这在泉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政区级别的提高,乃意味着港口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经济方面,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赋之半”;至元十八年(1281年),诏止泉州所承担建造的征日海船150艘<sup>①</sup>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特别是元政府在这里禁铜钱,行钞法,禁私盐,增税课,立僧司、宣政衙门,立站户、通政衙门,立宣慰司等,随着这些措施的实行,泉州的社会经济便很快地得到了复苏和发展。

市舶制度方面,元代基本上沿袭宋制。但也有不同的做法。如在禁榷、博买,增加舶税;实行“官本船”的办法,以加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垄断等等。唯须提及的是,元政府为了确保泉州港的贸易利益,曾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特地作出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sup>②</sup>。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政府颁行的《市舶则法二十二条》中,又明文规定各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取税。可见元初泉州港在国内诸港中已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① 《续资治通鉴》“至元十六年二月”、“至元十八年二月”条。

② 《元史》卷11《世祖纪八》。

海陆交通设施方面,元统治者为了沟通辽阔的疆域,实行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不仅使驿路遍布于中国境内,而且贯穿欧亚大陆。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递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泉州是元大都与东南地区陆上交通干线的终点,驿路之设更受重视,这使她跟外界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元政府又在泉州至杭州的海道上,建立了15个海站,每站置船5艘,水军200,“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sup>①</sup>。从而保证了舶货和外国来使能够及时“自泉州发舶,上下递接”,经杭州直抵大都<sup>②</sup>。正因为有如此可靠、便捷的海陆交通网,元代泉州港才成为国内最大的集散市场。

军事方面,泉州港在元初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她不仅是蒙古政府建造战船的主要基地,也是主要的海军基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史弼等统率元兵2万、舟千艘远征爪哇,便是从泉州港启航的<sup>③</sup>。这也不能不促使元廷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强泉州港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总之,由于元初泉州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元统治者的积极经营,泉州从一开始便成了大元帝国的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重要港口。到了至元末年,她更以海外贸易的空前兴盛,港市风貌的高度繁荣,而被誉为东方的第一大港。

① 《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

② 《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8、19419。

③ 《元史》卷210《爪哇传》。

# 圣墩顺济祖庙考

在妈祖研究方面,圣墩顺济祖庙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然而,由于文献记载凤毛麟角、庙宇建筑荡然无存,给研究者的探讨带来不少的困难,至今还难以明了其真实的历史面貌。那么历史上的圣墩顺济祖庙究竟怎样?带着这一问题,笔者查阅了不少志乘谱牒资料,并于1989年12月间前往原宁海镇白塘周边的梧郊、洋尾、上俞、镇前和南埕、三江口一带进行调查。1990年2月中旬,在获得一定线索的基础上,又一次来到实地进一步做细致的踏勘和访问,取得了重要的收获。遂使我们对圣墩顺济祖庙的历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拟就圣墩顺济祖庙的缘起、规制和沿革、庙宇座落的具体地点,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等,作一番论证。

## 一

有关圣墩顺济祖庙的历史资料所见实在太少,惟近年发现的《白塘李氏族谱》中收录的“载《天妃灵著录》”<sup>①</sup>之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一文,为我们了解圣墩顺济祖庙早期的若干情况

<sup>①</sup> 《圣妃灵著录》已不经见,据《白塘李氏族谱》载“嗣孙廷梧谨志”《天潢流派图》云:“张翥《灵著录》载制干创祠舍地及保义郎振公奉使高丽事”,可知《圣妃灵著录》系张翥所撰。

提供了依据。这则弥足珍贵的史料,由肖一平先生在《略论妈祖传记的演变》一文<sup>①</sup>先予披露,不过,他所经眼的是近年的油印本《陇西李氏族谱》<sup>②</sup>,故所引多有错漏,兹将我们获见的《白塘李氏族谱》清初抄本中的原文加标点抄录于下:

里有社,通天下祀之,闽人尤崇。恢闳祠宇,严饰貌像,岿然南面,取肖王侯。夫岂过为僭越以示美观?盖神有德于民,有功于国,蒙被爵号,非是无以彰其威灵也。郡城东宁海之傍,山川环秀,为一方胜景,而圣墩祠在焉。墩上之神,有尊而严者曰王,有哲而少者曰郎,不知始自何代,独为女神人壮者尤灵,世传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州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既没,众为立庙于本屿。圣墩去屿几百里,元祐丙寅岁,墩上常有光气夜现,乡人莫知为何祥。有渔者就视,乃枯槎,置其家,翼(翌)日自还故处。当夕编(遍)梦墩傍之民曰:“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实所凭,宜馆我于墩上”。父老异之,因为立庙,号曰“圣墩”。岁水旱则祷之,疠疫崇(崇)降则祷之,海寇盘互(互)则祷之,其应如响。故商船尤藉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宁江人洪伯通,尝泛舟以行,中途遍风,舟几覆没,伯通号呼祝之,言未脱口而风息。既还其家,高大其像,则筑一灵于旧庙西以妥之,宣和壬寅岁也。越明年癸卯,给事中路公允迪使高丽,道东海,值风浪震荡,船舶相衡者八,而覆溺者七,独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橈竿为旋舞状,俄获安济,因诘于众。时同事者保义郎李振,素奉圣墩之神,具道其详。还奏诸朝,诏以“顺济”为庙额。于戏!女郎庙之灵,古虽有之,不过巫山为云,洛浦凌波,曹娥抱尸浮江,帝女啣木填

① 见《妈祖研究论文集》,鹭江出版社,1989年。

② 《陇西李氏族谱》,1980年莆田涵江李步成等重编印。

海,犹立石当时,血食千载,要其德被于民,功及于国,蔑如也。今神居其邦,功德显在人耳目,而祠宫褊迫,画像彤暗,人心安在乎?承信郎李富,居常好善,首建其议,捐钱七万,移前而后,增卑而高,戒功于中秋,逾年月告毕。正殿中峙,修廊翼,严祠有堂,斋庖有庐,磨砻刈削之工,苍黄赭堊之饰,凡斯庙之器用,殆无遗功。李侯以鹏飞久游门下,遂命记之,义不容辞。切(窃)闻射的山有仙人遗箭一只,郑巨君尝采薪得之。少顷,有人就觅,巨君知其神,还之,因请曰:“每患若耶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之。”其人惟化为白鹤飞去,后果如其请,乡民德之,立向(白)鹤庙于射的山南。今宁海常获旦南暮北之使(使),而无还箭之功,故李侯因鼎新轮奂,以答神之麻尔。或曰:“旧尊圣墩者居中,背而少者居左,神女则西偏也。新庙或(成),迁于正殿中,右者左之,左者右之,牲醴乞灵于祠下者,宁不少疑?”鹏飞曰:“神女生于湄洲,至显灵迹,实自此墩始,其后赐额,载诸祀典,亦自此墩始,安于正殿宜矣。昔泰伯庙在苏台西,延陵季子像设东面,识者以为乖典礼,遂命改之。鹏飞谓李侯之作是庙,不惟答神麻,亦以正序位云。”于是乐书其事,继以《迎》、《送》二章,使乡人歌而祀之。……宋绍兴二十年庚午正月十一日,特奏名进士廖鹏飞谨记。

廖鹏飞的记述,首先为我们揭示了圣墩顺济祖庙建置的缘起,而《白塘李氏族谱》中的《枯槎显圣记》则更加详细地说明了庙的建置与李氏家族的密切关系。其记云:湄洲神女凭枯槎显灵光于宁海墩,并托梦乡人“宜馆我于墩上”,“父老异之,告于制干李公,公曰:此神所栖也。吾闻湄有神姑显迹久,今灵光发现昭格,必为吾乡一方福,叨神之庇,其在斯乎,遂募众营基建庙,塑像崇祀,号曰圣墩,祷应如响。李公乃舍鱼桁 24 门于庙前供香灯,又辟田地 200 亩于本屿供祭祀,以答神麻”。“枯槎显圣”虽为神话,然记述圣墩庙系宋

元祐元年(1086年)制干李公创建则是很明确的。“制干李公”何人?据《白塘李氏族谱》载,在宋代被“徵辟敕授”为“承信郎殿前统制司制干”者是李富,其传云“富,字子诚,号济轩,行二十七,早丧父,事母孝。宋建炎初,黏罕犯顺,率义旅隶韩蕲王世忠麾下,立功,敕承信郎殿前统制司干办兼管畿军机。……生于宋神宗元丰八年乙丑,卒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辛巳二月十二日,寿七十八。”从时间上看,李富出生于元丰八年(1085年),当元祐元年即公元1086年建庙时,还不满2岁,由他主持建庙是不可能的。蒋维敏先生在《一篇最早的妈祖文献资料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中,由此而认为“故《天妃显圣录》、《天后志》所记皆有误”<sup>①</sup>。其实不然,论者忽略了李氏家族中的另一位被“封赠”为“制干”的人物,那就是李富的父亲李泮,其传云:“泮,字思泮,行二十五,以子富赠承信郎殿前制干,寿六十五。”显然,圣墩祖庙是由李泮创建的,同时,他还舍鱼桁和田地充作庙产。

圣墩祖庙从元祐初肇建之后,曾在宣和四年(1122年),有宁江人洪伯通因泛舟海上得神女庇祐而“高大其像,则筑一灵于旧庙西以妥之”。自此以降,历宋至元又经过两次扩建与增筑。一是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重建顺济庙,前引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载,由于“祠宫褊迫,画像彤暗”,承信郎李富首建其议,捐钱7万,重建顺济庙。黄公度《题顺济庙》诗中的“枯木肇灵沧海东,参差宫殿崑崙空”句,正是对李富重建后的圣墩祖庙恢宏建筑

<sup>①</sup> 见《妈祖研究论文集》,鹭江出版社,1989年。



的真实写照<sup>①</sup>。这次重建,不仅庙宇“鼎新轮奂”,而且迁神于正殿,将“旧尊圣墩者居中,哲而少者居左,神女则西偏”改“右者左之,左者右之”,以正序位。

另一次是元大德间(1297—1307年)李清淑的新建蕃螯殿,黄四如撰《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螯殿记》<sup>②</sup>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述:“圣墩庙几三百祀,岁月老,正殿陋。李君清淑承先志,敬神揄龟筮,卿士庶民协从,由寝及殿,易而新之,鳩工于大德己亥,祭落于癸卯腊月,五六年间始克就,难矣哉!……庙前曰殿甲,以后曰寝乙,殿居甲乙间,建于何年?自制干公李富奉妃像正位序始。殿曷名蕃螯?地祇称媪,螯者福也,百顺故蕃。笔则法从陈公说,立则李令尹茹,存旧也。殿之木焉须?妃阴鹭民之精爽不貳者,曰山之西有木钜甚,工师求之,果如神言,尽售其材以归。殿之费焉出?四方之善信乐施也。殿之役谁助?教役属功,则乡之寓士耆宿,奔走疏附,则里之千夫、百夫长也。”倡建者李清淑,系李泮派下第七世(肇莆第十三世)孙,谱载:“清淑,一名师古,字彦奇,行百七,号蔬圃。好贤乐善,执礼施仁,先正四如黄渊公纪其行,尝兴建圣墩顺济祖庙蕃螯殿,记亦黄公所撰也。生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卒元仁宗皇庆元年壬子。”李清淑主持的这次兴修工程,前后历时6年才告竣,他对旧而陋的正殿和寝殿“易而新之”,并在两殿之间新建了一座蕃螯殿。至此,圣墩顺济祖庙的建筑达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规模。而在元代中叶

① 黄公度,宋绍兴年间“正奏及第史部考功员外郎”,系李富同时人,据宋龚茂良《宋左朝散郎尚书考功员外郎黄公行状》云“公讳公度,字师宪。……至绍兴八年,公遂以文章魁天下。……二十五年冬被召赴阙。明年正月入对便殿。……其年六月,公得疾,八月二十四日卒于位,年止四十八”(《宋状元知稼黄公集》卷下)可知,黄公度卒于绍兴二十六年。而白湖庙始建于绍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落成,则黄公度诗乃为圣墩庙题写明矣。

② 《白塘李氏族谱》,又《黄四如文藁》卷1。

以后,这样一座规模宏大,颇具影响的庙宇似乎已销声匿迹,别说庙宇建筑没有保存下来,就是在文献上也不见有关记载。其状况再也难得其详了,惟难能可贵的是,“圣墩”作为地名而见之于方志中。

圣墩顺济祖庙究竟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废圮的?现有史料不见记载,这的确是个难解的迷。假如说它非毁于天灾,而是遭破坏于人祸的话,那么,我们抑或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是因兵燹而毁灭的。纵观莆田地方史,元代以来这里曾惨遭2次较大的劫难,那就是元末的亦思法抗之乱<sup>①</sup>和明末的倭寇骚扰<sup>②</sup>。由历史资料而作的比较分析推之,圣墩祖庙毁于亦思法抗兵乱的可能性更大。这场肇始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息止于二十六年(1366年)由色目人势力恶性膨胀拥兵叛乱和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省宪构兵”而混杂在一起的战乱,战火弥漫福、兴、泉,祸及城乡,生灵涂炭,成为敌对势力双方必争之地的兴化路,备受蹂躏。“灾区并不限于一隅,而是全莆糜烂”<sup>③</sup>。许多方志谱牒记述了这一事实,祠宇、寺观被焚<sup>④</sup>,宗祠、祖墓被毁<sup>⑤</sup>,谱牒无存、辰忌失记<sup>⑥</sup>,子姓迁散,遂墟其地<sup>⑦</sup>。在北洋、涵江、江口一带,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一月的纵兵大掠,为祸尤为惨烈。过去那种“笙歌摇曳树底闻,甲弟巍峨空中起”的盛况,由于元末的10年寇乱,出现了“人事变更非昔时,荒烟落日青

① 干:《元末莆田的亦思法抗兵乱》,《台湾兴安会馆落成纪念专辑》。

② 张寄民:《兴化倭祸记》,《台湾兴安会馆落成纪念专辑》。

③ 朱维干:《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抗兵乱》,《泉州文史》第1期。

④ 方尚祖:《南山荐福祠碑记》,宏治《兴化府志》。

⑤ 澄清《俞氏族谱》,《林氏族谱》。

⑥ 莆城书仓房《郑氏族谱》,《李氏族谱》。

⑦ 登溪《黄氏族谱》,黄仲昭:《未轩集》。

猿悲”<sup>①</sup>的凄凉景象。居于白塘的李氏家族一样未能幸免,为了“保境安民”,李文材(肇莆第二十五世)“当元季乱”,“仗义设防剿捕”<sup>②</sup>,但无济于事,族人仍纷纷提携窜避,如李德老(肇莆第二十四世)“避元乱卜居福清隆仁里”<sup>③</sup>。历时十年的兵灾,使莆田“无数人民成为虫沙,无数村落化为灰烬”<sup>④</sup>。圣墩顺济祖庙极有可能是在夷兵攻掠的战火中被焚毁的。当然,明代末年的倭寇给莆田地方造成的祸害尤甚于元末兵乱,例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初十日倭寇涵江地方,聚党千余,入三江,住新桥头,而涵江、镇前、洋尾诸大村,焚掠一空<sup>⑤</sup>。明末的倭寇对白塘一带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据《余氏族谱》载:“倭陷莆城,谱牒火燹”。《白塘李氏族谱》载:“前谱载公葬塘东,因变乱失祭,后子孙不知塘东是何处地方”,又载:居宝(肇莆第三十一世)“配黄氏,倭变扶姑涉水溺死”。此外,我们在该谱中亦见生长于明末者不配而止和有配无嗣而止的为数甚多,恐系死于倭乱。因此,我们也不排除圣墩祖庙毁于明末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对其废圯的年代作推测时,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它是保留到明末才毁于倭寇的话,那么从元末至明末的近2个半世纪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关于圣墩祖庙的文献记载,而且我们纵览文献资料发现,把圣墩与湄洲混为一谈始于明末,而以何乔远《闽书》的记载最显谬误。《闽书》卷二十四《方域志》云:“湄洲屿,一名絳江,在大海中,与琉球相望,顺济天妃庙在焉。妃林姓,……时时凭样浮槎,朱衣现光,遍梦湄洲墩父老,父老相率祠之,名墩曰圣墩。……宋宣和间,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舟危,神登

① 郑岳:《莆阳文献》卷3。

②③ 《白塘李氏族谱》。

④ 朱继干:《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抗兵乱》,《泉州文史》第1期。

⑤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31《祥异》。

舟护之。归闻于朝，请祀焉，赐名‘顺济’。”《闽书》著作于万历四十年至四十八年（1612—1620年），去倭祸最为惨烈的嘉靖（1522—1566年）末年，最多不过半个多世纪，恐怕不致于让何乔远对这去之并不甚远的历史事实作如此错误的记述。然而何氏竟把圣墩顺济祖庙的事迹与湄洲揉合记入《闽书》，这恰好说明圣墩祖庙废圯的年代较早，遂已被人们所淡忘了。

对于圣墩顺济祖庙废圯的时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史料可资佐证，但根据以上的分析推断，其毁于元末的亦思法抗兵乱，这不会是不可能的。

## 二

方志谱牒的记载揭示了圣墩顺济祖庙的缘起和发展的过程，使我们不难想象这座称盛一时的庙宇建筑的宏大规制，也引起了我们对探索其确切坐落地点的极大兴趣。

一个地名的得称，往往源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事物。“圣墩”便是如此，它由立庙崇祀湄洲神女而得称，后来庙宇废圯了，圣墩却作为地名留传了下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被历史淘汰，并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只仅仅保存在地方志书中罢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舆地·水利》载：“北洋引延寿陂水为大沟三，小沟五十九，分为三派：自黄臂桥西至琵琶槽远及章鱼头为大沟一，通小沟二十有二；自沙塘透邇圣墩下宁海镇为大沟一，通小沟二十有六；自玃塘出吴刀汇于魏塘直接大保庄而下为大沟一，通

小沟一十有二。”<sup>①</sup> 这条“自沙塘逶迤圣墩下宁海镇”的中大沟，当地乡人称之为“陈桥沟”。其自西北延寿陂（沙塘）蜿蜒流经县城、黄墩、郊下、西漳、陈桥至梧郊，归白塘而通镇前（宁海镇）。从县志记述的中大沟水势结合流经地点推察，圣墩位于镇前村北而沟渠流入白塘处的梧郊一带是肯定不会错的。于是，我们便以梧郊地方为重点展开了调查。

梧郊村东南而临白塘，在与之近在咫尺的水面上有 1 座面积很小的岛屿叫浮屿，屿上有 1 座坐东朝西规模不大的妈祖庙，称为“浮屿天后宫”。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梧郊里人敬撰”的《重兴浮屿天后宫序》云：

浮屿之宫，何自助乎？粤自有宋制于李公破金教主，渡海遭风，叨扶持于一苇，转危为安，怀德惠于寸衷，有感必报，爰建坛于浮屿，永荐藻于白塘，于兹历数百余年矣。何意浇风求梦，污秽雕栏，致从前累成之功德，坏之荧星于一夕。然行宫毁，胜迹存，圣母其有意乎？八月十二日夜示灾，十三日清晨，即驾一朵祥云，现金身于白水之上，仪仗曳日，鼓吹喧天，未几而湄洲。可塘人氏奉圣母蹇舆奔屿，宣扬圣梦，允庇重兴，真奇迹也！但工程浩大，独力难支，敢募四方诸善信，发心助建……<sup>②</sup>

屿上还有 1 座造于宋景定四年（1263 年）的石桥与陆地相通，桥而镌有“宁海镇奉祠郭天应敬舍浮财确造此桥，一完了毕，求荐先府君汾阳王七知县资严冥福。景定癸亥清明日告成”44 字。据此

① 宏治《兴化府志》、《八闽通志》亦有同样记载。陈池养《莆田水利志》卷 3《陂塘》将北洋的这三大沟渠称为“南大沟”、“中大沟”和“北大沟”，当地乡人分别称为“天九湾沟”、“陈桥沟”和“新港沟”。

② 《白塘李氏族谱》。

而使我们相信早在宋代, 屿上已建有奉祀妈祖的建筑, 但这与“枯槎显圣”而建造起来的圣墩顺济祖庙不是一回事。

除了浮屿天后宫外, 梧郊附近没有别的妈祖庙。不过, 当我们在这一带做调查时,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村子南边的 1 座古桥梁和桥头的两方碑刻。一方系乾隆四十八年(1781 年)立石, 保存完好, 高 2.4、宽 0.82 米, 嵌于村保健站墙上。碑中央镌刻大字楷书“宋殿前制干李公宫后放生池桥”, 并记载“裔孙”光文等 13 人捐资重修的情况。另一方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汉灞崩, 堤不筑, 塘变为海, 致桥又圯”, “制干李公裔孙州司马光文重造”碑记<sup>①</sup>。此即县志所载李富建的“宫后桥”是也, 今俗称“墓兜桥”。这座桥梁横跨于上述北洋中大沟通白塘处的水面上。与其东面 50 米处的涵黄公路桥并行南北向。桥面和护栏均为水泥制成。据当地村民讲, 涵黄公路未筑之前, 这里原系涵江通黄石之孔道, 是 1982 年重修的。桥头仍保存有 1 对白花岗岩护栏, 高 1.52 米, 柱头雕饰蹲狮, 俨然宋代作风。在考察中, 乡人李捷绶先生(60 岁)指着桥北地方告诉我们: 听古人讲, 放生池桥北曾有 1 座大的妈祖宫。根据他提供的这条线索, 我们走访了村里的李元勋(77 岁)等父老。得到的是同样的说法。桥北地方早已盖满了民居, 我们便在此周围进行了踏勘, 果然发现了一些宋元时代的庙宇建筑构件。遗物之 1 宋连础瓜棱柱残段, 白花岗石琢成, 八棱, 础径 51、柱径 43 厘米。无论其雕琢形式和直径尺寸, 还是石料色泽, 都与李泮舍地创建、李富重修之梅峰寺<sup>②</sup>之大雄宝殿、钟鼓楼现存宋代连础瓜棱柱如出

① 此碑断为二段, 下半段嵌于民居墙上, 上半段今仍用作民居杂物间的铺地石, 调查时发现, 经洗刷后得以拼抄碑记全文。

② 参见黄公度《宋殿前制干澹轩李先生梅峰书院碑》, 徐师仁《梅子岗卧云轩记》, 干大川《梅峰复祀祠记》, 载《白塘李氏族谱》。

一辙。遗物之二元代柱础，辉绿岩琢成圆形，通高 18 厘米，素雕，上部反弧外展，折腹而下部内收，上径 44、底径 35.5 厘米。遗物之三代殿前须弥座构件，长 106、宽 26、厚 11.5 厘米，辉绿岩琢成，刻莲花瓣图案。

访问和踏勘的收获，为我们推测圣墩顺济祖庙的具体坐落地点——梧郊村宫后放生池桥北提供了依据。

第一，顺济祖庙遗址在宫后放生池桥之北，其所处的地点梧郊，与县志记述的“圣墩”地理位置正相吻合。这里的地理变迁与庙宇的发展也是相一致的。白塘“原是海荡，后海堤继作，遂以成塘”<sup>①</sup>，北宋时，梧郊仍是临海突出的一片较高的地方（堆、墩），李泮营基建庙于墩上。后筑海堤而成白塘。李富又对庙宇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他不仅增筑殿堂，还将庙前原其父舍供香灯的鱼桁辟为放生池，并造桥其上。当时放生池之水域比现在要宽阔得多，至今我们还可看到桥南淤填成田，桥北临水扩筑，使多孔石桥缩短跨度，水面变得越来越窄的变化痕迹。“圣墩”即指今梧郊地方是也。

第二，“宋殿前制干李公宫后放生池桥”为李富所建是毋庸置疑的。宫后是地名，系原孝义里 19 村之一<sup>②</sup>。这个村落也是后来妈祖被封为“妃”，而顺济祖庙与其他妈祖庙一样被晋称为“妃宫”后，有人家迁徙在宫的后面地方居住而形成聚落并得称的。在梧郊邻近地方因之而得称的还有今上俞直街一带的“圣妃埭”<sup>③</sup>，以及“跨墓兜、洋尾、镇前三境”的“宫水塘”即今之白塘。“宫后”这一村名今已消亡，实际上现在的梧郊包括了原位于今村西边的“墓兜”和东边的“宫后”两个比邻的村子。墓兜亦系孝义里 19 村之一<sup>④</sup>，原为

①③④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 2《舆地·水利》。

②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 1《舆地·里图》。

“吴家聚族之地”<sup>①</sup>。历史上与洋尾(李)、镇前(余)<sup>②</sup>三村环白塘相峙,有“三姓为一方巨族”之誉<sup>③</sup>。但据调查,梧郊村今以李姓居多,约占百分之四十,吴和刘、詹、陈诸姓约占百分之六十。李姓是由洋尾迁梧郊的,估计就是后来徙居宫后者,乃李制干之后裔。因此,“裔孙”承先志,修宫后放生池桥,又立石昭示祖先业绩,是顺理成章的事。桥以驾于宫后村的放生池上而得名,桥下放生池显然像一般庙宇的規制一样位于庙前,而文献中记载的顺济祖庙正是坐北朝南的<sup>④</sup>,可见放生池及桥是庙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实物资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桥北地而上发现的庙宇建筑构件,分别具有明显的宋元时代的特征。从这些构件的宽大尺度和精巧的雕琢工艺据以推知的庙宇规模,与文献上有关顺济祖庙殿宇恢宏的记载也是相吻合的,显然是顺济祖庙的遗物。据遗物的保存者说,这些建筑构件都是1982年重修宫后桥时,他们亲手从桥下放生池中捞上来的。又据当地乡人说,修桥时还看到桥下有许多青釉瓷器和陶狮之类的“古物”,因为破损无实用价值而没有打捞上来。据此,假如我们能有机会进行有计划的打捞或发掘,相信会有不少文物出土,而为我们认识顺济祖庙的历史面貌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

第四,《兴化府莆田县志》还保存有一个与圣墩有关的名称“圣墩桥”<sup>⑤</sup>。这本是考证圣墩在什么地方的最好证据,但县志只载桥在孝义里,李富建,没有注明具体地点。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

① 《吴氏族谱·墓兜祖居》,梧郊李捷绶摘抄本。

② 据镇前《余氏族谱》载,余氏于元初由余埔移居宁海镇前。

③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2《舆地·水利》。

④ 据廖鹏飞记述,李富因墩上神女“西偏”(右边)居末位,改为“安于正殿”,使“右者左之,左者右之”以正序位,说明庙宇坐北朝南。

⑤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4《建置志·津梁》。



调查中,遍访老乡都不知晓有这么个名称的桥梁。因此,虽名曰圣墩桥,而要企望由此去追寻圣墩是很难的。然而,当我们在梧郊找到圣墩庙址的线索后,于这一带做进一步的考察时,遂使我们发现了圣墩桥。今梧郊三面环水,在1982年涵黄公路未建之前,有3座桥梁将梧郊分别与南之镇前、北之上俞、东之洋尾相连接。南则上述宫后放生池桥;北则“同治辛未(1871年)造,民国甲寅(1914年)重修”(桥碑,立桥头亭内)<sup>①</sup>的榆溪桥;东则塔桥,查《兴化府莆田县志》,“孝义里桥八”,其中没有1座塔桥<sup>②</sup>,现存塔桥长72、宽3.25米,水泥桥面翼以花岗石护栏,1982年重修。桥头立有白花岗石雕琢的小型佛塔1座(通高1.83米),塔正面佛龕两侧阴刻“孝义里刘闰同室李八娘奉舍”字样,是宋代的遗物,“塔桥”不用说是由桥头佛塔面得称的。即如此,当自古已然,为何县志却不载?可见“塔桥”是后来乡人的俗称。正如人们称宫后放生池桥——宫后桥——墓兜桥一样,它应有一个原来的名字。我们在梧郊、洋尾、上俞调查时,乡人都说塔桥是李富建,在桥重修前,本是1座水漫桥(白塘水常淹没桥面)。俞秉华等几位村民还告诉我们,1982年修桥时,曾在沟底(桥墩下)挖出刻有“李制干”等字样的大石板。看来塔桥为李富所造是不成问题的。那么,这座桥东西走向,架在榆溪汇白塘的水面上,主要的作用只在于沟通洋尾与梧郊的往来,并非交通要道。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起的作用推之,李富建造这座桥梁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使聚居在洋尾的李氏族人前往圣墩之便而架设的。这座由洋尾通往圣墩的桥梁,应该就是“圣墩桥”。若如是,岂不为确认圣墩顺济祖庙址增添了一个很好的证据吗?

考证圣墩顺济祖庙的地址,不能不论及元洪希文的一首题圣

① 据实地考察,这座石桥的年代应比石碑所记要早。

②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4《建置志·津梁》。

墩妃宫的诗作,有人认为“元初黄渊作《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釐殿记》时,其庙尚在宁海,而到洪希文题诗时,庙却在湄洲。黄、洪皆莆田人,前后只隔40年左右,两人记载应该说都是可靠的,但原因何在却弄不清楚”<sup>①</sup>,其实这是一个用不着探讨的问题,只要仔细校阅有关史籍,原因就自然明了了。

最近,我们检得由钱塘符元嘉参订,莆田郑王巨(一字兰陔)辑选、海宁陈显曾校阅的《莆风清籁集》一书,其中收录有“元洪希文一首”,刻本刊此诗题为《题圣墩妃宫》,下夹注小字“即湄洲屿”四字,诗后又加以小字4行:“兰陔诗话:天妃林姓,闽王时统军兵马使愿之女,莆田湄洲屿人,生而灵异,能乘席渡海,人呼曰龙女,名其墩曰圣墩。宋时赐号灵惠夫人,元时加封天妃。汝质此诗,盖作于至元加封时也。”很明显,诗题下和诗后所夹之小字,是兰陔辑选时附加上的。由《莆风清籁集》所见,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洪希文原诗是《题圣墩妃宫》,而非《题圣墩妃宫即湄洲屿》或《题圣墩妃宫湄洲屿》。后人给予《莆风清籁集》以很高的评价,视为“有清一代不多得之书”<sup>②</sup>,尽管辑选者在《兰陔诗话》中将圣墩与湄洲屿混淆而给洪希文《题圣墩妃宫》诗题加上错误的注释,但还是把这首诗的原作保存了下来,将其与《元诗选》互校<sup>③</sup>,发现后者有几处明显的错误,兹录《莆风清籁集》所刊《题圣墩妃宫》诗于后,以正其讹,也希望能有助于对诗意的理解。

### 题圣墩妃宫

我昔纆舟谒江干,曾覩帝子琼华颜。云涛激射雷电沟,殿

① 蒋维猷:《一篇最早的妈祖文献资料的发现及其意义》,《妈祖研究论文集》,鹭江出版社,1989年。

② 《莆风清籁集·补刻跋》。

③ 顾嗣立编:《元诗选》己集《去华山人洪希文六十首》。

阁碑兀鱼龙间。此洲仙岛谁所构，面势轩豁规层澜。壶山峙秀倒影入，乾坤摆脱呈倪端。粉墙丹桂辉掩映，华表耸突过飞峦。湘君小水幻灵骨，虞帝迹远何由攀。银楼玉阁足官府，忠孝许入巫咸班。帝怜遐陬杂鲸鳄，柄受水府司人寰。五云殿邃严侍卫，仙衣法驾朝天关。危樯出火海浪破，神鬼役使忘险艰。灵旗旄望广乐振，长风万里翔虬鸾。平洲远屿天所划，古庙不独夸黄湾。至人何心恋桑梓，如水在地行曲盘。升阶再拜荐脯藻，不以匪薄羞儒酸。日谈诗史得少暇，石桥潜渡凭雕栏。诗成不觉肝胆醒，松桧蓊荟鸣玦环。骑鲸散发出长啸，追逐缥缈乘风还。<sup>①</sup>

诗作者洪希文，字汝质，莆田人，生于前至元十九年，卒于至元二十六年，享年 85 岁（1282—1366 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岩虎，宋贡士，为兴化教谕”，其父卒，“嗣为乡先生，郡之名族争致西席，郡庠聘为训导，大宾延请无虚岁”<sup>②</sup>，是一位很受人敬重的饱学之士，亦曾被李富裔孙李三老（肇莆第二十五世）“礼请”“教子侄”<sup>③</sup>。当李清淑在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釐殿时，洪希文已经 20 多岁，他对此大概不会没有耳闻目睹，而应该对庙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我们从诗句中可以窥知，他是一位虔诚的妈祖信仰者，值得注意的是“日谈诗史得少暇，石桥潜渡凭雕栏”句，记述的正是他在执教于李氏子侄之余，从洋尾渡过圣墩桥（塔桥）前往圣墩（梧郊）拜谒妃宫的情形。这首诗显然写于洪希文应李三老礼请教子侄期间，所题咏的系圣墩妃宫是很明确的。

学术争鸣对于探讨问题是不无裨益的。我们也想在这里与学

① 《莆风清籁集》卷 60。

② 顾嗣立编：《元诗选》己集《去华山人洪希文六十首》。

③ 《白塘李氏族谱》。

术界对圣墩庙址的不同看法展开讨论。蒋维钺先生认为：“圣墩顺济祖庙就是面向三江口的三神宫”<sup>①</sup>，肖一平先生亦曾对此“作出了肯定的结论”<sup>②</sup>。近年出版的《江海女神妈祖》一书，也持同样的说法<sup>③</sup>。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来到南埕一带考察时，看到这座宫庙正门上竟然挂起了“圣墩顺济祖庙”匾额，看来“三神宫”就是“圣墩顺济庙”似乎已成既定的事实。这样一来，尽管我们对圣墩顺济祖庙的坐落地点在今梧郊所作的考证，已足以否定这种看法，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再就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错误观点加以剖析。

首先，庙的名称和所祀之神与圣墩祖庙相违。位于三江口对岸、南埕村以东5、6百米之海堤上的这座庙宇，规模不大，分为前后二殿，后殿曰“东来寺”，前殿曰“潮显宫”，当地乡人称之为“三真宫”。所谓“三神宫”，乃论者附会自喻之称，民间并无这种叫法。东来寺内，中祀释迦牟尼，左右为观音和迦兰，两侧为十八罗汉，前（前殿壁后设龕）为韦陀。潮显宫中祀三殿真君（男性），法主仙妃（女性，即黄岩孙《仙溪志》所载“兴化县有女巫自尤溪来”的“昭惠庙”神）和妈祖。就其所奉祀之神祇面言，后殿自成一体为一般佛教寺院常见诸神；前殿虽有3神，但除妈祖之外，另2神并非如廖鹏飞在《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说的“尊而严者曰王”、“哲而少者曰郎”者。据南埕村曾如镜（73岁），翁荣桂（74岁）等乡人反映，三真宫自古以来并无妈祖神像，仅在帷幔上方悬一妈祖香火袋而已，因主祀“三殿真君”（居左，右边配祀“法主仙妃”），故名“三真宫”。

①② 蒋维钺：《一篇最早的妈祖文献资料的发现及其意义》，《妈祖研究论文集》，鹭江出版社，1989年。

③ 吴金粟：《江海女神妈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他们又说,即使是到1985年三真宫重修后,宫的正龛中仍主祀“三殿真君”,配祀“法主仙妃”2尊各高1米余的泥塑像,而仅于香案上设一小龛内奉高不及半米的妈祖木雕像。直至1987年,该宫董事会经请教肖一平先生,并以蒋维钹先生的《一篇最早的妈祖文献资料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为依据,才于1988年开始在正龛中央崇祀妈祖,在宫门上悬挂“圣墩顺济祖庙”庙额,同时镌刻石碑记载重修“顺济祖庙”经过的<sup>①</sup>。

其次,三真宫不是创建于宋代,而是清康熙年间才建造的。1985年乡人集资重修三真宫,油漆工在刷新脊梁时发现上面有字,后经清理,墨迹虽已模糊,但仍全然可读,梁上写着:“大清康熙四十七年岁次戊子闰五月□□开山住持比丘深然募缘鼎建”29个字,这一题款的意思十分明了,也就是说这座庙宇系由创建该寺庙的第一代住持深然化缘募资“鼎建”的。鼎者方也,正当其时也。鼎建就是始建,大概谁都不会怀疑这2个字在说明这座庙宇建筑年代上的含义。三真宫是在清康熙年间才出现的。

再者,南埕和三江口一带在宋代还未成陆。也许有人会觉得上述二点尚欠足据,那么,历史地理的变迁完全可以证明,三真宫坐落的地点在宋代还不存在营造建筑物的地理条件。据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宋代莆田北洋一带的海岸线是以柳桥、阔口、芦浦、陈坝、三步泄、镇前、西墩、大埕、西湖、新港、港头、涵江、慈寿、金墩、田头、西刘、东蔡、下墩、新墩、江口为陆海分界的<sup>②</sup>。那时涵江西北的新港和港头,曾设过入海斗门,东边的砣头,则是海中的礁岛,直至清代,东南的白埕、新浦、砣头、澳尾仍作为盐场,今洋尾东南

<sup>①</sup> 据南埕村三真宫董事胡金章先生1990年2月11日的介绍。

<sup>②</sup> 林汀水:《从地学观点看莆田平原的围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1期。

和镇前以东的南埕一片埭田,是明代初年围垦起来的<sup>①</sup>,故有“新埭”之称。我们在这里踏勘时,南埕村里见不到任何宋元时代的遗迹遗物,附近也没有“圣墩桥”的传闻,《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舆地·水利》载:“御史朱澜尝与吴守书其略曰:莆中洋田,依山附海,由高趋卑,尽处为沟,沟外为堤。……此堤即今之居民往来内堤是也。海民又于堤外海地开为埭田,渐开渐广。……外复为堤以障海浪。此即前守黄公所修石堤是也”。这里所说的“居民往来内堤”基本上是前述宋代海岸线的堤岸,在镇前至洋尾即为白塘堤。自洋尾以上还可见到以捍海势的原堤岸之痕迹。宁海桥沿线的外堤,是随着入明以后埭田的开垦而围筑的,砌之以石,乃是明末的事。“前守黄公”系嘉靖十三年(1534年)知莆田的黄一道,《兴化府莆田县志》说他“修宁海桥海堤为功最茂”<sup>②</sup>。所修石堤,正是这道“以障海浪”的外堤。三真宫就坐落在明代修筑起来的外堤之上。在宋代,南埕、三江口还是一片大海,堤之不存,庙将焉附?

论及于此,把南埕三真宫说成是圣墩顺济祖庙的错误之所在,自然无须我们举证更多的理由来加以说明。倒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看法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联想,而在三真宫挂额立石昭示,更是违背史实的轻率之举。只有纠正错误,还三真宫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不至于贻误后人,这才是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

### 三

元祐元年圣墩庙的建置和宣和五年的御赐“顺济”庙额,在妈祖信仰的传播和发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廖鹏飞在《圣墩

①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2《舆地·水利》。

②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8《职官志·名宦》。

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所云：“神女生于湄洲，至显灵迹，实自此墩始；其后赐额，载诸祀典，亦自此墩始。”

宋雍熙四年(987年)九月九日，妈祖“湄峰飞升”，里人立祠奉祀。在此后的1个世纪间，其信仰者和影响范围仍是很有限的。“有商三宝者，满载异货，要通外国，舟泊洲前，临发旋，胶弗起，舟人入水，见一怪坐旋不动，急报客，大惊，登岸询洲人：此方何神最灵？或曰：本山灵女极称显应，遂诣祠拜祷”<sup>①</sup>。可见当时湄洲“通贤灵女”还不那么为人们所熟知。然而，自从李洋建庙于宁海镇的圣墩之后，其信仰便由此而开始迅速地传播于外，影响范围也由此而开始不断地扩大。人们不仅“水旱则祷之，疠疫崇降则祷之，海寇盘亘则祷之，其应如响”，而且“商舶尤藉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sup>②</sup>。妈祖已经从一位“能言人休咎”的“里中巫”发展成为“舟航危急，有祷必应”的海上保护神。宋时“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sup>③</sup>。而“莆东南滨海，商舟之所会”<sup>④</sup>。城北白杜村的“大官庙”，大观二年(1108年)赐庙额“祥应”，宣和四年(1122年)封“显惠侯”，也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sup>⑤</sup>的崇祀对象。这座祥应庙虽然比圣墩庙早获朝廷封赐，但圣墩庙却以“商舶尤藉以指南”而与之并驾齐驱，在海商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亚于祥应庙。从湄洲屿到“馆于”圣墩，妈祖已不再仅仅是对生活在“可耕可食”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人们的庇佑，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了海上商人的保护神。这一变化，不能不说是妈祖信仰传播的一个重大飞跃。

宣和五年(1123年)，朝廷赐圣墩庙以“顺济”庙额。这一首次

① 《天妃显圣录·祷神起旋》。

② 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

③ 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东坡奏议》卷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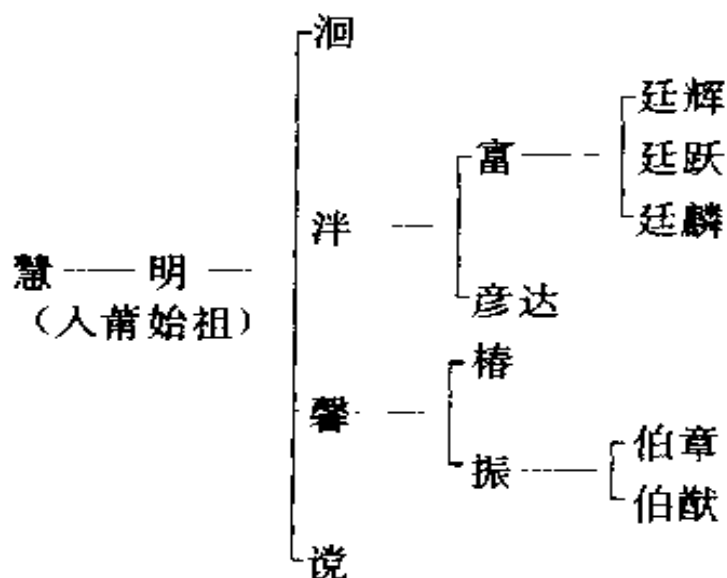
④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1《舆地·附潮汐》。

⑤ 《宋兴化军祥应庙记》。

封赐不仅提高了妈祖和圣墩庙的地位,也把妈祖信仰的发展与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宣和赐额之事,除见载于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外,还见诸宋元明清的有关文献,其中以《天妃·显圣录·朱衣著灵》述其始末最详:

宋徽宗宣和四年壬寅,给事中允迪路公奉命使高丽,道东海,值大风震动,八舟溺七,独公舟危荡未覆,急祝天庇护。见一神女现桅竿,朱衣端坐,公叩头求庇,仓皇间风波骤息,藉以安。及自高丽归,语于众,保义郎李振素及墩人备述神妃显应。路公曰:世间惟生我者恩罔极,我等飘泊大江,身濒于死,虽父母爱育至情,莫或助之,而神姑呼吸可通,则此日实再生之赐也。复命于朝,奏神显应,奉旨赐“顺济”为庙额,蠲祭田税,立庙祀于江口。

文中所述及的李振,《白塘李氏族谱》记有他的生平和事迹:“振,行十八。宋宣和五年偕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海中遇风,八舟溺七,神护公舟保全国信,归授承信郎。寿三十九,配陈氏,合葬东厢乌石山。子二:伯辛、伯猷”。据族谱载其世系如下表:





李振系居李氏肇莆第四世,与李富为堂兄弟,谱中“宋徽辟敕授”项又云:“振,允迪奉使册封高丽,授承信郎”。看来李振不仅随路允迪奉使高丽,而且在往使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北宋时期,福建的海外通商已经相当活跃,穿梭于中国与高丽间的商人尤以闽籍商人为多。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sup>①</sup>。仅据《高丽史》所载,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至元祐六年(1091年)的80来年间,福建商人到高丽贸易的就有18起,计478人<sup>②</sup>,比同时期两浙路等沿海地方对高丽的贸易还来得频繁。由于福建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之先进,于是宋廷遣使高丽,不仅按“旧例”先期到福建“雇募客舟”<sup>③</sup>,而且“挟闽商以往”<sup>④</sup>。李振“素奉圣墩之神”<sup>⑤</sup>,又膺选随路允迪奉使高丽,很可能是一位曾到高丽做过买卖的商人。他在奉使高丽归国后被宋廷授以承信郎(保义郎?),说明他曾为此做出了贡献,可见李振确有其人,他也确实作为“同事者”参加了路允迪奉使高丽之行。路允迪在途中遭风,获一神庇佑,正是由“素奉圣墩之神”的李振向他“备述神妃显应”,而奏请朝廷赐额曰“顺济”的。明人丘浚云:“宋宣和中,朝遣使于句丽,挟闽商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之言,赖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sup>⑥</sup>,所说的正是这件事。宣和赐额圣墩是确有其事的。

然而有人对此表示了怀疑,其提出的最主要理由是,徐兢是当事人之一,为什么在他记使事始末甚详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

① 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东坡奏议》卷6。

② 参见〔日〕斯波义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3年1期。

③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

④⑥ 丘浚:《天妃宫碑》,《丘文庄公集》卷5。

⑤ 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

“却未提及神女护使和徽宗赐额之事”<sup>①</sup>。大家知道,《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系徐兢于宣和中奉使高丽,就其见闻所及编著而成,主要记载高丽的山川、风俗、典章、制度、接待使者的仪式、海上往来的道路,全书40卷,海道占6卷,所载尤为详尽。在记述自明州出发至高丽沿途所到之处的时间和航行路线的同时,也对途经祭祀的神灵作了笔录。主要有招宝山的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东海龙君)、沈家门的祠沙(岳渎主治之神)、梅岑的宝陀院(灵感观音)、海驴焦的神霄玉清九阳总真符策等十三符、黄水洋的祀沙(溺死之魂)和蛤窟的龙祠<sup>②</sup>。以上诸神是中国与高丽航线上“华人往还必祀之”,<sup>③</sup>或“海舶往来,必诣祈福,无不感应。……旧制,使者于此请祷”<sup>④</sup>之神灵。书中唯一述及在海中遭难而蒙神灵保佑的,是徐兢所乘之舟在黄水洋舵折得到福州演屿神的庇护。其记云:“第二舟至黄水洋中,三舵并折,而臣适在其中,与同舟之人断发哀退,祥光示观,然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舵,既易,复倾摇如故。”徐兢乘坐的船,当舵折之际,有“祥光示现”而易危为安。由于徐是福州人,他当然不会认为祥光护舟的是莆田之神女,而是“前期显异”的福州之演屿神。这正象李振素奉圣墩之神一样,是徐兢素奉演屿神的反映,而路允迪在途中遇风,得一神女庇护,是“及高丽还,语于众”,才由李振向其推崇为圣墩女神显应的。因此,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没有提及神女护使事是很自然的。

路允迪奉使高丽因得神灵庇佑,归国后奏请朝廷赐额、加封的

① 蒋维锁:《一篇最早的妈祖文献资料的发现及其意义》,《妈祖研究论文集》,鹭江出版社,1989年。

② 以上分别参见《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和卷39各条。

③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9《海道六·蛤窟》。

④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梅岑》。

寺庙和神灵不止一、二,但这在徐兢的《图经》中均不见载。例如位于定海县东北五里,“宋宣和五年侍郎路允迪、给事中傅墨卿出使高丽,涉海有祷,因而建庙”的昭利庙<sup>①</sup>,以及“宋元丰元年安涛、陆睦奉使高丽还,上言请建东海神于明州定海县。诏封渊圣广德王,崇宁赐额崇圣宫。大观加封助顺,宣和加封显灵”的东海助顺孚圣广德威济王庙<sup>②</sup>,甚至连徐兢自己临危蒙庇的演屿神的加封和赐额,也没有被载入其著作中。我们只能从后来的其他志乘中见到有关的记载。《福州府志》卷十四《坛庙》云:“昭利庙,在越王山麓,神为观察使陈严长子延晦。乾符中,黄巢寇闽,神慨然谓人曰:吾生不鼎食以济朝廷,死当为神以慰入望。既没,祀于连江演屿,宋宣和二年建庙今所。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使三韩,涉海遇风涛,赖神以济。事闻,封协灵惠显侯,诏赐庙额昭利。”亦如上面列举的例子那样,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载宣和赐额圣墩庙,而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不记此事,是并不奇怪的。况且,宋代“敕撰”的《宋会要辑稿》明确地记载“徽宗宣和五年八月赐额顺济”<sup>③</sup>,称妈祖为“宁海镇顺济神女”<sup>④</sup>,这绝不可能是杜撰。还有,人们把圣墩与湄洲并称为“祖庙”,不消说这是由于朝廷对妈祖的首次褒封系赐额“顺济”于圣墩的缘故。普天下自宣和赐额之后,号曰顺济的妈祖庙不少,但唯圣墩才称“顺济祖庙”,这本身就是圣墩顺济庙额赐的一个很好说明。前面提及的与圣墩庙址近在咫尺的浮屿天后宫,今其所印之镇宅符亦冠以“浮屿祖庙”的称号。据梧郊村的乡人告诉我们,听古人说浮屿宫是因放生池桥北

① 《宁波府志》卷11《坛庙》。

② 《延祐四明志》卷15《祠祀考》。

③ 《宋会要辑稿·礼》20之61《神女祠》。

④ 《宋会要辑稿·礼》20之51《张天师祠》。

的妈祖宫毁后迁到浮屿重建而跟着称“祖庙”的<sup>①</sup>。原来浮屿天后宫与圣墩顺济祖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之所以称为“祖庙”。是因袭了圣墩顺济祖庙的旧称。综上所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以《图经》“未提及神女护使和徽宗赐额之事”,而轻易怀疑廖鹏飞所记不是事实?应该说宣和赐额圣墩庙是可以肯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圣墩顺济祖庙也从兴盛走向衰微。这一转折的关键,则是由于白湖庙的崛起。

白湖庙是以胜于圣墩祖庙的优越条件而建立起来的,《天妃显圣录·托梦建庙》云:

(绍兴)二十七年,莆城东五里许有水市,诸舶所集,曰“白湖”。岁之秋,神来相宅于兹。章氏、邵氏二族人共梦神指立庙之地,丞相俊卿陈公闻之,验其地果吉,因以奉神。

立庙之地白湖(即今阔口地方),在城东五里,“海自上黄竿入三江口历宁海至此”<sup>②</sup>,距政治中心郡城不远。这里又为诸舶所集之水市,是“介延寿、木兰二水间,南北商舟会焉”<sup>③</sup>的商港。当年白湖建庙所制造议论的依据是“神来相宅于兹”,表明这是神灵本身从“宜馆我”于圣墩到“宅于白湖”的又一次有选择的迁移。这种选择,显然是基于白湖既近郡城且为通商口岸而发端的;而神灵的迁移,正意味着白湖庙作为崇奉者膜拜中心地位的确立。

白湖庙从一开始就以神的显著灵迹感召广大善信。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白湖庙告竣,时瘟疫流行,神指示甘泉,饮者立痊,

① 此据调查时的老乡之说,这与前引《重兴浮屿天后宫序》记载浮屿天后宫是由可塘(即今梧郊)人于乾隆年间重建的可相印证。我们曾到浮屿天后宫作了考察。宫中仍奉祀三神,除妈祖外,还有老者与少者神像,与廖记“王”和“郎”类似,足见浮屿天后宫与圣墩顺济祖庙的因袭关系。

② ③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1《舆地·山川》。

于是“请者络绎”<sup>①</sup>；又庙成之第三年，“流寇刘巨兴等啸聚，直抵江口，居民虔祷于庙，……神灵现出空中，贼惧而退。既而复犯海口，神又示灵威，贼遂为官军所获”<sup>②</sup>。疾病的威胁和“寇贼”的祸害，危及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由于神灵的庇佑得以平安无事，这在当时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无疑促使广大的善信祈愿者趋向白湖庙。

白湖庙亦成为官方祈祷的场所和朝廷褒封的对象。白湖建庙以后，官方的许多重要祈祷活动多是在这里进行的。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民菑，葛侯鄂祷之”；淳熙十四年（1187年）“旱，朱侯端学祷之”；绍熙元年（1190年）“旱，赵侯彦励祷之”；开禧二年（1206年）“金寇淮甸，郡遣戍兵，载神香火以行”<sup>③</sup>，因此，立庙以来，以“圣泉救疫”而诏封“崇福夫人”，以捕获“流寇”而加封“灵惠、昭应”<sup>④</sup>，又以“郡国部使者，陆续奏闻”，朝廷亦相继封赐有嘉。直至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官府为行香之便，才迁白湖庙妈祖神像入郡城文峰宫奉祀<sup>⑤</sup>。

白湖庙具备的优越条件，是圣墩庙所不可比拟的，其一经创建，便一跃而走向兴盛，“灵惠妃宅于白湖，福此闽粤，雨暘稍愆，靡所不应”<sup>⑥</sup>，“舳舻万里来往，有祷必应”<sup>⑦</sup>，“舟车所至，香火日严”<sup>⑧</sup>，信仰圈以此为中心而扩展开来。50年后，“今仰白湖香火，几半天

①③ 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引。

②④ 《天妃显圣录·托梦建庙》。

⑤ 杨滩：《涓洲屿志略》卷1《宫庙》。

⑥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部行祠·顺济圣妃庙》引《庆元四年加助顺诏》。

⑦ 赵师侠：《莆中献白湖灵惠妃三首》，《坦庵词》。

⑧ 楼钥：《攻媿集》卷34。

下”<sup>①</sup>，甚至连“宁海神女”之称呼也遂以“白湖妃”所取代了<sup>②</sup>，在与之相去不过 10 余里的圣墩祖庙渐渐地趋于衰微，其称盛一时的地位为白湖庙所更替。以至于元天历二年（1329 年）朝廷遣官致祭天下 15 座天妃庙，其中没有圣墩而列白湖<sup>③</sup>，这是理所当然的。说到底，妈祖信仰的消长，宫庙地位的兴替，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圣墩顺济祖庙在历史上经历了 2 个多世纪的沧桑而废圯了，甚至连名称也为人们所遗忘，然而，它在妈祖信仰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

① 陈必：《龙图陈公文集》卷 7《白湖顺济庙重建寝殿》。此文的著作年代，李献璋先生认为记于绍兴十四年至三十年间（《妈祖信仰的研究》附录《妈祖文献资料》），是完全错误的。白湖庙创建于绍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告成，不存在“重建寝殿”之事。再说陈必系陈俊卿之子，生于乾道七年（1171 年），卒于绍定三年（1230 年），绍兴三十年前尚未出生，不可能有此作。据文中称妈祖为“妃”和“祠宇殆周于甲子，规摹增焕于此时”句推之，此文应作于嘉泰四年（1204 年）前后。

② 刘克庄《协应夫人庙记》有“前祀夫人，白湖妃。于殿后列三土者于堂”句。

③ 林清标：《敕封天后志》卷七。

# 《天妃灵应之记》碑考

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以下简称《天妃碑》),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最珍贵的实物史料。自出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或拓墨流传,或撰文介绍,或引以正误,或资而论考,不少学者、专家对此作了评价和展开了研究。然而,这些评介和研究,虽多有确切之言和精辟之见,但却不乏舛讹失实之处和值得商榷之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

## 一、发现经过

关于《天妃碑》的发现经过,尽管时间至今相去并不久远,也留下了一些记录,但却难得一篇可窥其完貌者。现根据这些有关记载,订坠补遗,述其概略,以昭示于后者也。

《天妃碑》在1930年<sup>①</sup>发现于长乐县城之南山,由县知事吴鼎芬肇置县署思善斋侧,并捶拓流传。后吴离任,碑又为蔓草淹没无

<sup>①</sup> 关于石碑的发现时间,尚有二说:一云在1929年,见如李永选《郑和碑考》(手抄本),王铁藩《郑和在福建》(《福建社联通讯》1985年第4期)等;一说在1931年,见如郑鹤声等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中册(齐鲁书社,1980年),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台湾德馨室出版社,1980年)等。据长乐一中张国英先生来函告悉,经陈明清先生查核,吴鼎芬曾二度任长乐县长,第二次在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1930—1931年),石碑系其上任之第一年即1930年发现的。可见1929年说显然有误,1931年说亦应订正。

闻。1936年,省立图书馆(乌山图书馆)馆长萨士武,偶于馆内检得该碑拓本,于是撰写了《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一文,于《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0期(1936年4月10日)上发表,遂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当时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长王伯秋,因公赴京,晤及南京国学图书馆长柳贻征<sup>①</sup>,柳持文向王问及此碑是否尚存。王回长乐后,便在草丛中又找到了这方碑刻。这年7月,国立编译馆编纂郑鹤声应邀来闽为“福建省中等学校校长教职员暑期讲习会”讲学,偕萨士武等往长乐,谒见王伯秋,并一起登南山之塔,观天妃之碑,访郑和之遗迹。随后郑鹤声写了一篇访问记,对石碑的重要性作了宣扬<sup>②</sup>,王伯秋则拟筹建碑亭加以保护。时值抗战,因恐该碑沦于敌手和遭战火破坏,故将碑移置南平保存,碑亭也由此而没有建成。直到1948年春,经长乐县参议员李永选提请省教育厅,准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陈克家运回长乐,交县民众教育馆保管,不久移置孔庙泮池前。该碑于1961年列为福建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于长乐师范附属小学里原孔庙泮池旁之新建的碑亭内。

当年王伯秋拟建碑亭未果,却留下了自撰《明郑和天妃灵应碑亭记》一文。此文鲜为人知,录之以飨读者。

往读《明史》至郑和奉使西洋,未尝不叹和之伟绩,拥无训练之舟师,航未探测之海洋,虽以成祖命,踪迹建文,迫不得已,然卒能远致南洋三十余国,相率而朝贡于明,和之功与张骞、班超抗矣,乌得彼宦者而小之?及奉命督政闽东,兼长长

① 柳贻征曾写过一篇介绍《天妃灵应之记》碑的文章,载《边疆》1936年12月第1卷第9期。

② 郑鹤声:《访问长乐郑和天妃灵应碑亭杂记》,《大公报》1936年11月6日《史地周刊》第110期。



乐，于官廨思善斋侧，得知天妃灵应碑。吏云：民国初始发见于邑之南山前，前令致廨中，苔封而土覆者久矣，几经剔抉，拓而读之，于和专使所至，及先后年月皆详。按《长乐县志》，仅《名胜篇》中之南山三峰塔寺前，载有郑和重修之文。碑记所称长乐南山之行宫，于永乐十年奏建；又称右有南山塔寺，事实悉符，足资考证。于是既拓赠海内外学者，为之阐扬，更建亭护之。夫和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先后七奉使，每役率舟师近三万人，莫不自长乐解缆，循马江而放之海，故往还驻长乐时至多且久，最后望风开洋。留至九阅月，舟师于以集合，船舶于以修造，而三万貔貅，又必于以食息。其未发也，必贵中土之产物，以遣远人；其既归也，必携海外之珍奇，以献邦国。其影响长乐经济、实业、文化，与夫远大之图倡导遐迩者何如。而赢粮景从，随以远航，为今日南洋商旅之先锋者，盖不知凡几也。则斯碑之保存，宜使与南山马江同永矣。抑有感者，今日强邻逼处，海疆岌岌可危，和可以自长乐发轫，以绥异族，以振国威，吾人岂皆不能为和之所为乎！书而刊之石，冀览其碑者，不仅资为考证，当人人有新激发也。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湘乡王伯秋撰<sup>①</sup>

## 二、碑文勘校

《天妃碑》刊立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580多年来，虽几经周折，但碑身保存基本完好，碑文字迹全然可读。石碑高162、宽78、厚16厘米。全碑阴刻，额篆“天妃灵应之记”6字，字框上端及两侧有明月祥云纹样。正文楷书31行，共1177字，四周框以缠枝番莲

<sup>①</sup> 原载《福建文化》1937年11月第5卷第26期。

纹。碑文记述了郑和奉命率领舟师出使西洋和赖天妃护祐于长乐南山修建宫殿,以及7次往使西洋各国的时间、经过等情况,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资料。

然而,尽管碑身完好,碑文可读,可是,引载者却多增阙舛错。就拿碑文字数来说,有记为1668字者<sup>①</sup>,有记为1176字者<sup>②</sup>,实计应是1177字。再看抄录转载全文者,至今尚未见有不需勘误的。举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为例:

页、行	误	正
42.5	天妃灵应之纪	天妃灵应之记
42.17	若历通衢	若履通衢
42.18	护佑	护祐
42.24	永垂祀典	永传祀典
42.25	屡驻	累驻
42.3	旧观	旧规
43.18	番王	王
43.25	回献	归献
44.1	祖刺法	祖刺法
44.2	花福鹿	花福禄
44.3	麋里羔兽	麋里羔兽

又例如台湾学者徐玉虎著《明郑和之研究》:

页、行	误	正
121.12	迤北之国	迤北之北
121.12	固违矣	固远矣
121.14	占城国	由占城国

① 如《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明郑和之研究》。

② 如张维华主编:《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年);陈廷杭等:《郑和下西洋在福建的史迹调查》,《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121. 15	古国	古里国
121. 15	忽鲁谟国	忽鲁谟斯国
122. 2	若历通衢	若履通衢
122. 4	侵略	侵掠
122. 6	永垂祀典	永传祀典
122. 7	屡驻	累驻
122. 7	俟凡	伺风
122. 10	趣事	趋事
122. 12	事告	事君
122. 12	不力	不应
122. 13	宿夜	夙夜
122. 16	陈祖仪	陈祖义
123. 2	番王	土
123. 6	回献	归献
123. 9	在福鹿	花福禄
123. 10	麋里羔兽	麋里羔兽
123. 10	沈沙	沉沙
123. 10	或遣王叔	或遣土男,或遣王叔

即使是新近出版的《郑和史迹文物选》<sup>①</sup>,也存在几处错误:

页、行	误	正
53 左 22	捧琛执贄	捧琛执贄
53 左 31	护佑	护祐
53 左 16	众顾如斯	众愿如斯
54 左 4	苏幹刺	苏幹刺
54 右 6	助佑	助祐

诸如以上所列之例很多,此不赘举。总之,凡见载碑文者,只要认真对照阅读,都可发见有错。这种辗转传抄以讹传讹之误,不仅难于正确地理解碑文之原意,甚至造成某些错误的解释。为此,给见不到原碑而需征引碑文从事研究者提供一份准确的碑记全文,是很

①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有必要的。兹将石碑原文照录如下：

### 天妃之神灵应记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贄，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贐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城，迥隔于烟霞縹緲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祐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神之感应，未易殫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记文，以彰灵贐，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圯，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舣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俱备。余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栋连云，如翬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竭诚以事神，

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敢不竭忠以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一、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一、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一、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一、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刺国，有伪王苏幹刺，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刺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一、永乐十五年，统率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祿并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稳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贡捧金叶表文朝贡。

一、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

一、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祐之功，如是勒记于石。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

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使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 三、度藏地点

关于《天妃碑》的度藏地点，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石碑刊立于南山三峰塔寺<sup>①</sup>。另一种看法认为，石碑刊立于南山天妃宫<sup>②</sup>。过去，论者各抒己见，学术界两种观点并立，没有引起什么讨论。近几年来，关于石碑度藏地点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否定前一种看法的意见，其主要理由是，《天妃碑》作为崇奉道教的刻石，应是刊立在天妃宫中而决不会立于佛教寺院内<sup>③</sup>。不同的宗教信仰，决定了石碑的度藏地点，以此为理由而作的推论倒是挺有说服力的，亦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并普遍地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天妃碑》度藏于南山天妃宫，这种观点乍一看，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名正言顺之事。然而，若把天妃宫的建置和变迁与石碑的刊立和出土时间联系起来考察，就不能不令人深表疑窦了。

南山天妃宫始筑于永乐十年（1412年），是郑和第四次奉使西洋于长乐太平港伺风开洋时奏建的，后来被改为吴航书院。据《长乐县志》载：

天妃宫在西关外花眉山，原在西隅南山之阳，乾隆二十六

① 如《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又见李永选：《郑和碑考》等。

② 如萨士武：《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又见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福建文化》1937年11月第5卷第26期等。

③ 参见陈明清：《郑和下西洋在长乐的史迹》，《福建社联通讯》1985年第4期；张国英《郑和所立〈天妃灵应之记〉碑的若干考析》，提交福建省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年，知县贺世骏以水神面山非宜，将宫改作书院（互见吴航书院），移祀天后神于今所。<sup>①</sup>

当事者知县贺世骏作《吴航书院记》云：

辛巳（乾隆二十六年）夏，适都人士有河阳朱子祀易置塔山之请，余因思其地旷无城市喧嚣之声，其境幽有物外烟霞之概，遂额为吴航书院，更新学舍共得三十余所。<sup>②</sup>

邑人董绍安有《育才堂记》亦载：

辛巳冬，集邑绅士共谋移置塔山天后宫于西关外，就故址拓为吴航书院，中奉朱文公神位，旁以及门诸先生配，复增书室三十余间。<sup>③</sup>

可见天妃宫于乾隆二十六年即 1761 年改建为吴航书院是无以疑义的。此后，吴航书院又历经重修扩建，民国《长乐县志》卷十三《学校·书院》记载了 3 次较大规模的整治。一次是“嘉庆十二年知县杨清轮修葺，堂前复建屋三间”。另一次是“咸丰十年绅士郑元模等劝捐重修”，其并记云：

乾隆初安成贺公移天后宫于河阳即故宫为书院，虽始兴实仍旧贯地。嘉庆间阳湖杨公劝增膏伙。添修学舍，而讲堂如故，计有永乐始建及今五百年矣。

还有一次是“光绪三年，知县徐承禧倡捐暨各绅士劝募，鸠集多资添置产业，增修学舍，厚加膏伙，重整院规”。吴航书院一直很好地沿用保存了下来。在民国六年修纂的《长乐县志》之《卷首图》所载的一幅“吴航书院”图中，尚能看到其完整的规模和布局。说明这座由郑和创建的天妃宫改建扩筑的吴航书院至 1917 年仍依然存在。

① 孟昭涵修、李驹纂，《长乐县志》卷 18《祠祀》，民国七年铅印本。

②③ 民国《长乐县志》卷 20 上《艺文录》上。

据李永选记述,其“规模宏敞”,是直到“抗战期中”才被毁去的<sup>①</sup>。

这就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如果说《天妃碑》原是庋藏于天妃宫中,又没有随移祀天后神于西关外花眉台,而仍留置于旧址即吴航书院内,那么一定会与历经修葺保存完好的吴航书院共存亡。可是吴航书院毁于抗战期间,而《天妃碑》却早在书院毁去之前的1930年便已经出土了。不稍说,石碑不是存立于吴航书院,而是在书院以外的其他废墟中被发现的。既然如此,石碑在刊立之当初,并非庋藏于天妃宫内,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有的人则认为三十年代中期尚存于南山的那座建筑物不是吴航书院而是三峰塔寺<sup>②</sup>。究竟孰是孰非,这可以说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假设三十年代尚存的是三峰塔寺的话,以上的论断就很难站得住脚了。也就是说,已经塌圮而不复存在的是天妃宫即后来的吴航书院,那么石碑便可能是从其废墟中出土。这对于庋藏于天妃宫之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尽管以上所述吴航书院的来龙去脉足已可证明有的人认为是三峰塔寺是错误的,但如果了解一下三峰塔寺的建置沿革,那将会更明了。

三峰塔寺初建于北宋崇宁年间,“明永乐十一年(1413)太监郑和同僧重修”,题其额曰今名<sup>③</sup>。至宏治三年(1490年)毁拆改建为南山书院,<sup>④</sup>当时县令潘府作《南山书院序并歌》,详细记述了拆寺改立书院的原因及经过:

皇帝元年,用大臣议天下郡县毁私创寺观,及禁滥充僧道徒。长乐知县潘府闻诏,欢欣鼓舞,乃再拜稽首言曰:网异端崇

① 长乐县文化馆油印:弘治《长乐县志》第26页李永选书眉签注。

②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史迹文物选》;陈明清:《郑和下西洋在长乐的史迹》。

③ 民国《长乐县志》卷7《名胜》。

④ 宏治《长乐县志》卷1《学校》。



正学吾志也。况承明诏，旷古奇逢，于今盛典，巨子当力行之。遂召诸僧道，宣谕朝廷威福，驱其徒二十余人悉归子农。明日具米醪躬牵僚属耆老劝农东郊，过三峰塔门，亟毁撤之，用置劝农亭。府日登亭观稼，农悦益勤厥务，是年大有，乃复毁其殿左右廊，增置预备仓，分周贫、济乏二廩，积谷以万计。府欣然曰：民食稍羸矣。遂毁南山寺堂，因其形胜，更相度之，改立南山书院，用以养蒙士。……<sup>①</sup>

有的人认为“三峰塔寺的毁朽年代，不见文字记载”<sup>②</sup>。其实《南山书院序并歌》已经清楚地讲明了这一点。

南山书院“迨后倾圮，未有议而复之者”<sup>③</sup>。因此，到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知县贺世骏感叹“长邑人材自昔称盛，而书院之建缺焉。其何以罗群英，宏教育，为国家储桢榦”，于是才有“移置塔山天后宫于西关外，就故址拓为吴航书院”之举<sup>④</sup>。由此可见，三峰塔寺在宏治年间就已毁拆殆尽，而由其改建的南山书院至少于乾隆二十六年以前亦已倒塌无复重修而荡然无存了。李永选认为“南山书院后改为吴航书院”<sup>⑤</sup>，王铁藩未加考证也持是见<sup>⑥</sup>，显然是错误的。南山书院与吴航书院虽同为书院，但创置时间不同，所在地点各异。前者创置于明宏治年间，因废三峰塔寺为之，后者创置于清乾隆二十六年，就天妃宫故址拓成。两者在时空上都没有直接联系。那座于长乐县文化局保存的民国廿四年拍摄的长乐县城照片上依稀可见的至三十年代中期尚留于南山的建筑物，是吴航书院而非三峰塔寺，这是无庸置疑的。

① 民国《长乐县志》卷20上《艺文录》上。

② 陈明清：《郑和下西洋在长乐的史迹》；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史迹文物选》。

③④ 董绍安：《育才堂记》，民国《长乐县志》卷20《艺文录》上。

⑤ 长乐县文化馆油印：宏治《长乐县志》第26页李永选书眉签注。

⑥ 王铁藩：《郑和在福建》。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们对《天妃碑》刊立于天妃宫的观点表示怀疑乃至否定,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其推论也应是成立的。那么,《天妃碑》既不立于三峰塔寺,也不置于天妃宫内,其度藏地点又在哪里呢?

在刊立《天妃碑》的明宣德六年(1431年),南山上的建筑物有3座。除了郑和于永乐十一年同僧重修并题其额的三峰塔寺和创建于永乐十年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的天妃宫外,还有就是在这一年鼎建的三清宝殿。后者,正是石碑的度藏之所。当然,不是由于否定刊立于前面两个地点,便推测石碑就一定是度藏在最后的一个地点内。要说《天妃碑》度藏于三清宝殿,这并非毫无根据,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论证。

其一,郑和于第7次奉使西洋驻泊长乐太平港候风开洋前,在南山“复修佛宇神宫”即修葺三峰塔寺和天妃宫之同时,又“鼎新三清宝殿一所”。这座三清宝殿的建筑规模、布局和陈设装备,虽不见具体文字记载,不过从石碑对它的简略描述看,是“殿庑宏丽”,“画栋连云,如翬如翼”;是“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俱备”。可见这座由郑和及随行者们“发心施财”而新建的三清宝殿,比起复修的佛宇神宫,其“胜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当然也成为当时人们活动的中心了。因而,把一方新镌刻的崇奉天妃并记下西洋事宜的石碑度藏于新建的作为祝圣之所的三清宝殿内,与钟鼓供仪焕然相映,溶为一体,岂不更显“靡不俱备”吗?倘若从当时人们的心理分析,正如下西洋官军们之“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来鼎建这座三清宝殿一样,同时将《天妃碑》立在刚刚建造起来的三清宝殿内而不立在旧的天妃宫中,也许是一件更符合于“众愿”的顺理成章之事。这是不难想象的。

其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碑末“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句,此为论证石碑度藏于三清宝殿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依据。所谓

“正一”是道教的两大派之一。所谓“住持”，原为佛教僧职，后道教亦采用此制，指道观中之负责人。那么这个杨一初究竟是那座道观的住持？据明侍郎长乐人陈省《三清殿祝圣道场记》载：“邑无释老之宫，惟兹殿在城以内南山”<sup>①</sup>。说明三清宝殿是长乐唯一的一座道观，杨一初作为正一住持，其身份一定是指三清宝殿而称的，很有可能他还是膺郑和之选来专任新建的三清宝殿之负责人的。假如这一推论可以肯定，那由杨一初“稽首请立”的《天妃碑》，理所当然也就会庋藏于自任住持的三清宝殿之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清宝殿屡经修葺，遂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殿圯”而“基存”<sup>②</sup>，《天妃碑》也就这样随之被埋没了。直到1930年人们从废墟中发现了它，于是才得以重见天日。

#### 四、刊立缘由

关于《天妃碑》的刊立缘由，碑文本身已经作了明确的解答。即刊立石碑，“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话虽讲的明白，然而，只有稍加分析，才能真正认识郑和立碑的动机和目的。

先说“著神之德”。天妃本称妈祖，原是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出生于莆田湄洲屿的一个林姓青年巫女。她“生而神异”<sup>③</sup>，“能言人休咎”<sup>④</sup>，“能知人祸福”<sup>⑤</sup>，其神事活动在附近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死后被尊为“道贤神女”或“龙女”<sup>⑥</sup>，为民间所信仰。由于地方

① 民国《长乐县志》卷20上《艺文录》上。

② 乾隆《长乐县志》卷4《庙祀》。

③④ 李俊甫：《莆田比事》卷7《神女护使》。

⑤ 黄岩孙：《仙溪志》卷9《三妃庙》。

⑥ 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引自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外郡行祠》。

势力的推崇,封建统治者的支持,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遂不断地提高了妈祖的神格,助长了妈祖灵验的迷信,加速了妈祖信仰的传播。因其屡著灵迹,自宋以来,历代皇帝褒封有加,被捧上了“天妃”这样崇高至尊的位置。其影响远播海内外,成了“有祷辄应”<sup>①</sup>的海上保护神而深为广大航海者所崇奉。

天妃,“凡估于海者,无不尊信之”<sup>②</sup>。郑和下西洋,“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历诸番“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sup>③</sup>,进行这么多人参加如此庞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就更不例外了。在7次下西洋中,天妃数显灵验,郑和多蒙护祐。据载:

永乐三年,钦差太监等官往西洋。舟至旧港,遇萑苻截劫,顺流连舰而至,势甚危急。众望空罗拜,恳祷天妃,忽见空中旌旗旒旒,云巖影耀沧溟,突而江流激浪,帆转帆翻,贼艘逆潮不前,官兵忽荡进上流,乘潮挥戈逐之。一击而魁首就俘,再击而余孽远溃,自此往返平静。<sup>④</sup>

永乐五年九月戊午,……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刺加诸国返,言神多感应。……<sup>⑤</sup>

永乐七年,钦差太监郑和往西洋,水途适遇狂飈,祷神求庇,遂得安全。<sup>⑥</sup>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

① 程瑞学:《灵慈庙记》,引自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9《祠祀》。

② 柳贯:《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柳待制集》卷14。

③ 《天妃灵应之记》碑。

④ 《天妃显圣录·灵应·旧港戮寇》。

⑤ 《明成祖实录》卷52。

⑥ 《天妃显圣录·历朝褒封致祭诏诰》。

九年归献。<sup>①</sup>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刺国有伪王幹刺，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sup>②</sup>

又巩珍《西洋番国志》云：

至于当洋正行之际，烈风陡起，怒涛如山，危险至极。舟人惊骇，仓忙无措，仰赖神灵显然临庇，宁帖无虞。<sup>③</sup>

又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云：

直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sup>④</sup>

郑和下西洋“大获征应”<sup>⑤</sup>。真可谓“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sup>⑥</sup>也。

郑和把舟师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归功于赖神护祐之德，把生擒番王剿灭蛮寇归功于皆神之赐。每于往使回归，便上奏朝廷，于是皇上下诏致祭，修建神宫，不一而足。

永乐五年，“回京奏神功广大，奉旨著福建守镇官整盖庙宇，以答神庥”<sup>⑦</sup>。又“新建龙江天妃庙成，遣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告”<sup>⑧</sup>。

永乐七年，“归奏上，奉旨差官致祭，尝其族孙宝钞各五百贯”<sup>⑨</sup>；又“回朝具奏，遣太监郑和、太常寺卿朱焯，驰传诣湄山致

①② 《天妃灵应之记》碑。

③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

④ 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

⑤ 杨俊说：《湄洲屿志略》卷2《祀典》。

⑥ 《天妃显圣录·历朝褒封致祭诏诰》。

⑦ 《天妃显圣录·灵应·旧港戮寇》。

⑧ 《明成祖实录》卷52。

⑨ 《天妃显圣录·历朝褒封致祭诏诰》。

祭”<sup>①</sup>。又“于鬲斗筑坛祀南海神”<sup>②</sup>。

永乐十年，“奏建”长乐南山天妃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sup>③</sup>。

尤其是在永乐七年，明成祖朱棣特加封号“护国庇民灵应弘仁普济天妃”，并规定“岁以正月十五及三月十三日遣官致祭”<sup>④</sup>；还于永乐十四年御书碑文镌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于龙江天妃宫中<sup>⑤</sup>。

这样那样的屡显灵迹，如此这般的祭祀、修建神宫乃至赐封、御制石碑，所有这些都让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么一个事实：不管天妃的神力是何等的虚无缥缈，然而，利用人们崇奉天妃的这一宗教信仰来取得航海活动的成功，这在第1至6次的下西洋中，是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的。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于第7次也就是最后1次下西洋之前夕，郑和不仅在出发地太仓刘家港将“神之殿堂，益加修饰，弘胜旧规”，“复建岵山小姐之神祠于宫之后，殿堂神象，焕然一新”<sup>⑥</sup>；在驻泊基地长乐太平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1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焕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sup>⑦</sup>，还亲领“兴平二卫指挥、千户、百户，并府县官员，买办木石修整（湄洲）庙宇，并御祭一坛”<sup>⑧</sup>。进行了一系列的盛大规模的修建神宫和祭祀活动，而且在刘家港和太平港分别刊立了《通番事迹记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以颂扬天妃护祐之功德。

①⑧ 《天妃显圣录·历朝褒封致诏诰》。

② 《闽都记》卷26。

③⑦ 《天妃灵应之记》碑。

④ 《明成祖实录》卷61。

⑤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

⑥ 《通番事迹碑》，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

无论是建宫祭祀也好,还是刊立石碑也好,与其说是“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祐之功”<sup>①</sup>,倒不如说是为了祷祝确保第7次下西洋的顺利进行。这一切,无非是要进一步让那“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名员”<sup>②</sup>的随行者们相信“神之灵无往不在”,只要“竭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sup>③</sup>,使人们又一次从中找到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寄托,增强战胜惊涛骇浪的信心和激发克服艰难险阻的勇气。

当然,郑和能够顺乎“众愿”,并立碑以“著神之德”,表现出对天妃如此的虔诚敬奉,说到底,是要人们“竭诚于神明”,从而达到让人们“竭忠于国事”<sup>④</sup>,也就是为奉使西洋献身为目的的。

再说“以贻永久”。郑和以此为目的而立碑,也并非偶然。

郑和下西洋,是发生于十五世纪初明帝国进入全盛时期的航海盛事。雄才大略的永乐帝朱棣筹策这场规模浩大的航海活动,选用了“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sup>⑤</sup>的内官监太监郑和为统帅。郑和以他“博辨机敏”<sup>⑥</sup>、“才负经纬、文通孔孟”<sup>⑦</sup>、“有智略、知兵习战”<sup>⑧</sup>的非凡才能,在统领舟师下西洋中,“出使四方,不辱君命”<sup>⑨</sup>,而深受永乐帝的赏识,“甚倚信之”<sup>⑩</sup>。随之下西洋的将士,也因功“升赏”、“赐钞”有嘉<sup>⑪</sup>。郑和下西洋,作为明成祖积极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然而,当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北京奉天、华盖、谨身三

①③④ 《天妃灵应之记》碑。

② 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

⑤ 袁忠彻:《古今识鉴》卷8。

⑥ 《明书》卷156《郑和传》。

⑦⑨ 引自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⑧⑩ 《明外史·郑和传》。

⑪ 《明成祖实录》卷78。

大殿被灾,明成祖“怀兢惧,莫究所由”,诏大臣直谏时政之弊的时候<sup>①</sup>,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条上时务十五事”<sup>②</sup>。其中以“连年四方蛮夷相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sup>③</sup>,“遣内官赍往外蕃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钱出外国……失其宜”<sup>④</sup>,而把下西洋斥为“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者。一些支持过下西洋的廷臣也非议纷纷,连当年推荐郑和为下西洋指挥的袁忠彻亦“谏取宝之非”<sup>⑤</sup>。作为下西洋倡导者和决策者的明成祖屈于迷信,未加审势,遂把下西洋列入“所行果有不当”,“庶图悛改,以回天意”的八项“事宜”之一,敕令“下番一应买办物件,……往诸番国宝船及迤西迤北等处买马等项,暂行停止”<sup>⑥</sup>。局势的顿然改变,面对朝臣们的反对,这对于忠君事国,颠连海上近20个春秋的郑和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问题还不止于此。没过多久,成祖“晏驾”,继之登上帝位的仁宗,便“走系所,呼原吉,……问敕诏所宜”。原户部尚书夏原吉“对以赈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趾采办诸道金银课”,仁宗“悉从之”<sup>⑦</sup>。于是下诏: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宁家。……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sup>⑧</sup>

下西洋事业终于被全盘否定,称盛一时的航海活动就这样中止了。

① ③⑥:《明成祖实录》卷120。

② 《明史》卷163《李时勉传》。

④ 《续文献通考》卷11。

⑤ 《明史》卷299《袁忠彻传》。

⑦ 《明史》卷149《夏原吉传》。

⑧ 《明仁宗实录》卷1。



洪熙元年二月，“命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南京”<sup>①</sup>。大概是因为郑和是先朝之功臣，才被授予南京守备之职。然而，对其权力却作了限制。《明仁宗实录》卷七上载：

二月戊申，命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南京。于内则与内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协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附马都尉沐昕高议的当，然后施行。

比起统率舟师下西洋，登上陆地充任南京守备的郑和，也就显得不那么有作为了。

即便到了宣德朝，郑和仍然得不到象永乐帝那样对他的宠信。例如宣德二年（1427年）四月。因南京“修理宫殿”，请给工匠“赏赐”事，竟遭到宣宗的责难：“遣人谕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礼之事，不可妄请”<sup>②</sup>。又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郑和因督造南京大报恩寺不周，“迁延年久”，特敕“将未完处，用心提督，俱限今年八月以里，都要完成”，并毫不客气地给予“迟误了时。那监工的都不饶”的警告<sup>③</sup>。

只是到了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体祖宗之至仁，善辑宁于庶类，已大赦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之”，于是想遣人“赍诏往谕”<sup>④</sup>，这才又启用了这位当年的大航海者郑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朱瞻基可谓是一位向往建树“际天极地皆王臣”帝业的皇帝，但是，招谕诸番国的活动，却为什么等到登上帝位后的第5个年头才开始着手进行呢？有人认为经过数年是以休养生息，恢复经济<sup>⑤</sup>。其实不然，更主要的应是由于力主“罢

① 《明仁宗实录》卷7。

② 《明宣宗实录》卷16。

③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1《聚宝山报恩寺》。

④ 《明宣宗实录》卷67。

⑤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

西洋取宝船”的朝臣之强烈反对,才迟迟未能成行的。要不然,为何在宣德五年正月夏原吉一死去,宣宗似乎迫不急待地于当年六月就特诏遣郑和下西洋?<sup>①</sup>大概是夏原吉一死,不再有人站出来那么强硬地反对之缘故吧。可见反对下西洋的势力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占上风的,郑和才因此在政治上一直遭到冷遇。

诏遣下西洋的这一年,郑和已年过花甲,又经一番挫折和非难,再也不如以前几次下西洋那样充满进取精神了。这从郑和临行前提出“重新盖造”南京城内三山街祀拜寺,并“题请其子孙世守之”的要求<sup>②</sup>,而宣宗不仅给予满足,并且破例恩准他从南京内监官或工部支取应用人匠及材料等,以免临时误了工程,来鼓励和催促其“候风信开船”<sup>③</sup>,多少可以看出郑和被动、消极的一面,也许郑和已经估计到这第7次奉使西洋将是自己一生数次浮海的尾声,也许他亦已意识到自己所为之贡献毕生精力的伟大事业很难说不会再遭到反对派的非议而能昭示永久,因而,在最后1次下西洋之前,刊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一方面“著神之德于石”来安定人心鼓舞士气,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记诸番往回之岁月”,籍此以永垂业绩。

事实真的就是这样。郑和在第7次下西洋归国途中于1433年(宣德八年)客死古里<sup>④</sup>,以身殉职,而称盛一时的下西洋壮举,也以第7次为绝响。明成化九年(1473年)。宪宗有意遣人再下西洋,诏索郑和“出使西洋水程”,兵部尚书项忠“使吏检旧案”,车驾郎中刘大夏“先人检得之,藏置他处,吏检不得,被笞,复人检,三日不

① 《明宣宗实录》卷67。

②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661卷《江宁府都汇考·祠庙》。

③ 《郑氏世系家谱·敕书》,引自《郑和家世资料》。

④ 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100回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

得”<sup>①</sup>。项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安能失去？”刘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凡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sup>②</sup>此后，再无言下西洋者。郑和出使西洋的档案，不仅“为刘大夏所匿”<sup>③</sup>，给后人了解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困难；而且刘大夏对郑和下西洋的一句之贬，更给后世造成了莫大的影响，几百年来，难得公允之评价。郑和在最后下西洋之前亲自撰立《天妃碑》，可谓有先见之明也。

通过以上对郑和境遇的分析，我们对郑和为什么要刊立《天妃碑》的又一个目的——“以贻永久”，就不难理解了。

《天妃灵应之记》碑是一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碑刻，诚然它可以为我们研究郑和下西洋提供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我们决不可忽视对碑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对它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也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其学术价值。

① 刘世节：《刘忠宣公年谱》卷1。

②③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

# 郑和行香碑考

竖立于泉州城东郊灵山圣墓柱廊西侧的“郑和行香碑”，是现存有关郑和航海史的 7 方珍贵刻碑<sup>①</sup>之一。自 1928 年张星烺于《史学与地学》杂志<sup>②</sup>上发表《泉州访古记》一文对此作了介绍之后，这方刻碑遂为学术界所注目。然而，长期以来，它虽被多数学者视为一条稽考郑和出使年月之“佐证”资料，但是，却很少有人对刻碑本身的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立碑者及碑刻所记之事实等方面加以考证，以祈进一步把握这方刻碑的史料价值。

## 一

《郑和行香碑》为辉绿岩石琢成，高 99.5、宽 42.5、厚 9.3 厘米，碑面阴刻汉字 5 竖行，全文如次：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sup>③</sup>。

① 即云南晋阳的《故马公墓志铭》，江苏南京的《大报恩寺残碑》、《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太仓的《周闻墓志铭》，福建长乐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泉州的《郑和行香碑》，以及斯里兰卡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② 《史学与地学》1928 年第 4 期。

③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

立碑者镇抚蒲和日其人,唯一可以找到的有关他的文献资料,仅见于《蒲氏家谱》记云:

日和,字贵甫,寿岁<sup>①</sup>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光〔元〕至正间,清真寺损坏不〔治〕,里人金阿里与之共成厥事,重修门第,皆以大石板砌成之,极其壮丽。右匾额上镌有名字,至于〔今〕犹存。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sup>②</sup>

虽然见于家谱所记之人名为“蒲日和”,与刻碑之“蒲和日”异,但从记述的事实来看,立碑者蒲和日领衔“镇抚”,而谱中蒲日和“加封泉州卫镇抚司”;蒲和日立于圣墓的郑和行香碑至今尚在,而家谱则云蒲日和之“圣墓立碑犹存”,两者同属一人显矣。家谱记载的名字为“蒲日和”应是辗转传抄之误也,其确实姓名当以碑记“蒲和日”为正。

此条材料,弥足珍贵。只有通过它,才使我们对这位立碑者能有所认识。

据家谱记载,蒲和日曾于元至正间(1341—1368年)与里人金阿里共葺清净寺。对于这次修寺,亦可见于《重立清净寺碑》之记述:

宋绍兴元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寺因废坏不治,其徒累抗于官,墨〔司〕不决有年矣。至正九年,闽海宪金赫德尔行部至泉,为政清简,民吏畏服。摄思廉不鲁罕丁令舍刺甫丁哈悌卜领众

① 岁应为崧之误,参见陈自强:《蒲寿崧史料考辨》,《泉州文史》1982年第6、7期合刊。

② 引自张玉光、金德宝:《报告发见蒲寿庚家谱经过》,《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分诉,宪公从审得情,任达鲁花赤高昌俊玉立正议,为之□理复征旧物,众志成城。于是金阿里愿以己资,一新其寺<sup>①</sup>。

以上碑文较家谱更为详细地记述了至正九年(1349年)重修清净寺的来龙去脉,所云与家谱记载的为同时同事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碑中却没有提及蒲和日?此不免令人有家谱所载属牵强附会之感。但如果从谱云被修新的寺门“右匾额上镌有名字,至今犹存”以观,则蒲和日于“元至正间,清净寺损坏不治,里人金阿里与之共成厥事”,不仅非杜撰之说,而且可以看出他在这次修寺中是作出重大贡献的。

按碑文所载,这座创建于宋绍兴元年(1131年)的清净寺,其废坏程度是相当严重的,不仅一般教徒望而兴叹,就是官方也无能为力,足见非耗巨费而莫可为也。然而对于这样一座“废坏不治”的寺院,蒲和日则能与金阿里一起捐巨费予以修复,并把门第用大石板砌得“极其壮丽”,如果他不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如果他不具备有富厚的财力,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尽管家谱没有说明蒲和日捐费修寺的经济来源,但只要我们从他出身于海商家族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到蒲和日如此乐施,是有可能而不奇怪的。

在《蒲氏家谱》中,蒲和日列居第八世,为第七世蒲寿崧之次子、寿庚之侄。这一由“南蕃”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家族,别说其先世居广州“总诸蕃互市”而“大富盛甲一时”<sup>②</sup>,即使大约于十三世纪初迁居泉州<sup>③</sup>以后,肇基者蒲开宗(蒲寿庚之父)经营海外贸易也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功。他曾以贩运蕃货和招徕蕃商而作出的贡献

① 《重立清净寺碑》文载《泉州文史》1980年第1期。

② 岳珂:《程史》卷11《番禺海獠》。

③ 何乔远:《闽书》卷152《畜德志》。

之大,被宋廷赐以“承节郎”的荣誉官衔<sup>①</sup>。传至蒲寿晟、寿庚之世,更使蒲氏家族飞黄腾达起来。蒲寿庚不仅“总诸蕃互市”<sup>②</sup>，“擅蕃舶之利三十年”<sup>③</sup>，两兄弟又以“平海寇有功而得官”<sup>④</sup>，寿庚并于“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sup>⑤</sup>。蒲家成了亦官亦商的泉州首户。宋元鼎革之际，蒲寿庚背宋降元，由于他有归附之功，也由于他“素主市舶”<sup>⑥</sup>，招致蕃商，授官至“福建行省中书左丞”<sup>⑦</sup>。蒲氏不仅军政大权在握，而且垄断了蕃舶之利，真可谓“富贵冠一时”<sup>⑧</sup>。

这样一个亦官亦商的显赫家族，当然不能不给他们的后代带来很大的影响，“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sup>⑨</sup>。查家谱第八世，寿庚3个儿子均先后走向仕途，长子蒲师文至元十八年（1281年）继父提举泉州市舶<sup>⑩</sup>，大德元年（1297年）擢升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sup>⑪</sup>。然而，入元之后，蒲寿庚的哥哥寿晟却佯著野人服卜居法石山，以诗赋自娱，过隐居生活去了。其儿子大概也由于他不仕于元的关系，只有长子师孔因“娶铁参政长女”，而“以荫补承务郎监福州水口镇，后升任监丞”罢了<sup>⑫</sup>。蒲和日则没有步入官场。家族的经商传统，必然决定了他以从事海外贸易为业的生涯。当然，有赖于那种“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元亡乃已”<sup>⑬</sup>的家族威望，凭借着世代通商海外的丰富经验，还有那与来自阿拉伯的贸易

① 真德秀：《真文忠公集》卷25《重建太守倪公祠记》。

②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

③ 《宋史》卷47《本纪》47《瀛国公传（二王附）》。

④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52。

⑤ ⑥⑩⑬ 何乔远：《闽书》卷152《蕃德志》。

⑥ 《元史》卷156《列传》43《董炳文传》。

⑦ 《元史》卷10《世祖本纪》。

⑧ 《八闽通志》卷86《拾遗》。

⑨⑪ 《蒲氏家谱》。

伙伴的特殊血缘关系，遂使蒲和日成了一名豪商巨贾。

我们所作的这种推测，并非没有道理。当回过头来把它与捐资修寺联系起来，更足为据了吧。正是由于经营海外贸易而博得的巨利，才使这位“秉清真教”、“礼拜日勤”的伊斯兰教徒有可能那样地慷慨施舍，与金阿里以巨费去“一新其寺”。蒲和日，应是一位虔诚、乐施的穆斯林富商。

家谱记述的另一件事，是蒲和日于永乐十三年<sup>①</sup>随郑和下西洋。他是否参加过郑和航海活动？没有佐证资料可寻。如果从立碑者名前冠以“镇抚”官职，是象家谱所云“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的那样，则足从其说。那么，蒲和日是以何等职种加入使团随郑和下西洋的？这里略述笔者的一点看法，与有的学者提出并为学术界所普遍追认的观点商榷。罗香林认为：

蒲和日似其人较习武事，依《郑和家谱》所载，随敕奉差诸官员名分析，或于出国时曾任指挥一类职务。<sup>②</sup>

事实果真这样吗？此云蒲和日较习武事，出国时曾任指挥一类职务，大概只是由他归国后晋升为镇抚而作的推测，根本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这一点。见如上述，蒲和日并非习武从戎之士，而是一位出身于亦官亦商的阿拉伯家族的巨贾。在膺选随郑和出使时，蒲和日当然不会是“曾任指挥一类职务”的普通“从征将士”。其得到郑和的赏识，一定是由于他有着熟悉海外事情，晓习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特别才能，因此而成了一名犹如马欢那样“善通番语，遂膺是选”<sup>③</sup>的重要辅佐人员。

① 查《天妃灵应之记》碑载，这一年郑和无下西洋之举，乃永乐十五年之误。

② 罗香林：《蒲寿庚》第104—105页。

③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占朴后序》。



蒲和日是在下西洋回国后因功而被擢为泉州卫镇抚的。“镇抚”一职，乃“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sup>①</sup>，是把握大权之官。蒲和日能够得到这样重要的升赏而居于如此要职，这不能不说他在佐郑和下西洋中是立下不小功绩的。为了铭记郑和至圣墓行香，多半更是为了显耀自己由此而得居的镇抚官职，他才在圣墓立下了这块永垂纪念的石碑。

上述二件事，或可置信。但纵观之，一位为生活于宋末元初的人的后代，至正九年可捐资修寺，至永乐十五年，又能随郑和远涉重洋，这在年岁上确有令人持疑之处。

这一被有的学者提出来“存疑待考”的蒲和日之年岁问题，这里不妨从蒲家世系和所涉及之事件，对此作一番推测。

前面说过，蒲和日是蒲寿晟之次子，列居蒲家第八世，据家谱记载，与之同居第八世的有年代可考的是蒲寿庚的3个儿子。他们举士擢官均在1300年前后<sup>②</sup>。一般按“三十而立”来算，他们的年龄在那时将是25至30岁左右。那么，蒲和日属其同辈，亦差不多应同处这一年龄。这样的话，到至元九年（1349年）修寺时，他大约是80来岁。乃至60年后的永乐十五年（1415年）随郑和下西洋之际，蒲和日该是140岁之高龄了。

虽然类似这样的长寿老翁在同一时代亦可见得，譬如至正九年参与修寺的夏不鲁罕丁“年逾百有二十”，仍“精健如壮岁”，至“洪武三年庚戌乃终”，“盖寿百四十二岁”，其子“亦寿百一十岁”<sup>③</sup>。但是，一位年已140来岁的人，活着够不容易的了，还要随

① 《辞海》，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

② 蒲师文“大德元年（1297年），以武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蒲师斯“以人才进举至元甲申（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擢为翰林太史院官”；蒲均文“贞元二年（1296年），以才学著名，诏为右谏德兼中书省知制”。

③ 《泉州府志》卷75《拾遗》。

从郑和船队颠连于“鲸波接天”、“浩浩无涯”的“西洋”之中，并立下了功绩，诚可谓“奇迹”也。也许奇迹可能发生，不过对于这一年岁，别说读者，就是笔者也不能不深表疑窦。然而，根据家谱之记载，并与行香碑联系推之，大概不会比上述推测有更好的解释。要说家谱有关随郑和下西洋事之记载是张冠李戴，那么行香碑之立碑者又作何解呢？我认为，尽管年岁难为人所肯，但在未发现其他新资料足以证明立碑的“蒲和日”非家谱中之“蒲日和”，两者不是同一人之前，我们姑且从之。至少是今天，与其否定年岁而否定蒲和日随郑和往使以视碑记为“谜”，不如肯定年岁而肯定蒲和日随郑和往使以视碑记为“实”，这似乎更见顺理成章矣。

## 二

接着，让我们就碑文所记事实作一番探讨。

如果说最早介绍郑和行香碑于学术界的是张星烺，那么，首先把它征引来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则是冯承钧。他于1934年9月发表的“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一文第一次引证了这一史料<sup>①</sup>，为在此之前的国内外学者考证郑和下西洋所未及。此后，它便成了不少学者引之为探讨郑和奉使年月的一条重要史料。只是由于法人伯希和在考证郑和下西洋的航次及其年月时，征引为主要依据的《明史》对永乐五年之郑和第2次下西洋缺乏记载，遂至产生考证上的递次错误<sup>②</sup>，而冯承钧翻译此书时亦蹈其谬，把永乐十五年

① 《禹贡》1934年第2卷1期。

②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中华书局，1955年。

郑和于圣墓行香作为“郑和第四次奉使的年月”来考定<sup>①</sup>。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亦持是说<sup>②</sup>。这一见解,直到1935年和1936年,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文<sup>③</sup>和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刻<sup>④</sup>的发现,才纠正了被学者们视永乐十五年的第5次为第4次下西洋的错误。虽然冯承钧在所著《中国南海交通史》一书中论及“郑和下西洋”时,更正了上述之失误<sup>⑤</sup>,但对于郑和7次下西洋年月作出系统、全面考证的要算是金云铭了<sup>⑥</sup>。至此,郑和行香碑才真正显示了它的史料价值。

如上所述,郑和行香碑作为一条史料并非为学术界所疑义。然而,问题不止于此。要把握碑记的可靠性,有两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求解的。

其一、郑和于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亲抵泉州圣墓行香,在时间上究竟可能不可能?

据《明实录》记载: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古里、爪哇、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哇、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

- ① 冯承钧:《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禹贡》1934年第2卷1期;《〈瀛涯胜览〉校注序》,《禹贡》1934年第2卷6期。
- ② 例可参见〔日〕山本达朗著、王古鲁译:《郑和西征考》,《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5年第4卷2、4期;夏璧:《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禹贡》1934年第2卷8期。
- ③ 郑鹤声:《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之年岁》,《大公报·史地周刊》1935年10月25日第57期。
- ④ 萨士武:《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4月10日第80期。
- ⑤ 冯承钧:《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
- ⑥ 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福建文化》1937年第5卷26期。

慰司使臣辞还，悉赐文绮裘衣，遣中官郑和等赉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sup>①</sup>

《殊域周咨录》亦载：

永乐十四年，王遣使偕占城、爪哇诸国贡马及犀象方物，中官郑和等赉及锦绮红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

由此可知，郑和第5次下西洋，奉诏时间是在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而其成行，则在永乐十五年，此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和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为证。《天妃灵应之记》碑云：

永乐十五年，统率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赉捧金叶表文朝贡。

这里只言“永乐十五年”，无明确记录当年中的具体月份。暂且撇开行香碑所记之月日，而由一般下西洋的航海规律，亦不难推知其船队开洋的大致时间。

从很早的时候起，特别是唐宋以来，我国古代人们就操舟进行了远程航行。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确地利用信风，频频往返于太平洋、印度洋和波斯湾中。“北风航海南风回”<sup>②</sup>，自我国东南沿海南下的船舶，通常是“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sup>③</sup>。泉州西郊九日山祈风石刻为此

① 《明实录》卷183。

② 王十朋：《宋王忠文公文集》卷31《提舶生日》。

③ 朱曦：《萍洲可谈》卷3。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sup>①</sup>。

郑和之航海,无疑也是遵循这一信风规律而进行的。永乐十五年的第5次下西洋,一定是在秋冬间发航。证以其余6次奉使开洋之年月,亦如是<sup>②</sup>。

郑和第5次下西洋,奉诏于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而实际出发则在翌年秋冬间。如果再从郑和统领舟师屡次驻泊福建长乐太平港候风开洋来看<sup>③</sup>,泉州更非其“鞭长莫及”之地。这说明了郑和于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亲抵泉州圣墓行香,在时间上显然是可能的。

其二、郑和亲抵圣墓行香的这一行动,究竟有没有此种必要?

如所周知,郑和出身于伊斯兰教世家,祖父、父亲均为朝圣天方而归者——哈只<sup>④</sup>。郑和同样是一名回教徒。尽管他于12岁左右入宫后受戒于佛门<sup>⑤</sup>,在从事航海活动中亦曾参拜天妃<sup>⑥</sup>,又敬奉印度教神<sup>⑦</sup>,但他始终虔诚地奉行回教。永乐十一年,他重修西安清真寺<sup>⑧</sup>;在频频往返于东南亚时,于爪哇、满刺加等地传播伊斯兰教<sup>⑨</sup>;宣德五年奏请“重新盖造”“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即净觉寺)”<sup>⑩</sup>,并“题请其了孙世守之”<sup>⑪</sup>;在最后1次下西洋时,分舩

① 李玉昆:《试论宋元时期的祈风与祭海》,《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5期。

② 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福建文化》1937年第5卷26期。

③ 参见拙作:《郑和舟师驻泊福建的航次与时间》。

④ 袁嘉谷:《滇绎》卷3《郑和条》。

⑤ 姚广孝题记:《佛说摩利支天经》。

⑥ 杨俊说:《湄洲屿志略》卷2《祀典》。

⑦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

⑧ 《西安府志》卷62《古迹志》。

⑨ 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香港民报出版部,1982年。

⑩ 《郑和家谱·宣宗赐南京礼拜寺敕》。

⑪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661卷《江宁府都汇考·祠庙》。

差选通事等赴回教圣地麦加朝圣,还画天堂图真本归献皇帝<sup>①</sup>。仅举数例,足见郑和对自己的民族宗教的崇信是坚忠不渝的。

再说座落于泉州城东郊灵山南坡的这座“西方圣人之墓”,是唐代来朝遂传教泉州的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四贤卒葬之所<sup>②</sup>。早在元代以前,这里便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信仰对象。据竖立于该墓柱廊下的阿拉伯文碑记载:

人们因虔信他俩能赐福,一旦遭遇艰难,进退维谷,即前来瞻礼,祈求默示光明,并有奉献,俱获益,平安回退。<sup>③</sup>

由于圣墓“屡显灵异”,故“郡人士咸崇奉之”<sup>④</sup>,在民间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郑和,当奉成祖敕令欲往使那远在“天方”的忽鲁谟斯等回教国家时,亲自前来晋谒这座“有求必应”的圣墓,于此行香祈保航海平安、招谕顺利,是极其自然的事。

郑和至圣墓行香,大概也包含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从第四次下西洋开始,郑和之航海活动是奉成祖之敕令以招谕印度洋以西的国家为对象的。为了沟通与这些回教国的联系,在其统领的这支 27000 余人的庞大使团中,有诸如马欢、郭崇礼、费信<sup>⑤</sup>、哈三这样的“通事”和熟悉伊斯兰世界的各职人员等一大批热心奉行回教的随从出使者,郑和亲抵圣墓行香,亦代表了这些穆斯林随行者的共同心愿。特别是在第 4 次“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

①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天方国》。

② 何乔远:《闽书》卷 7《方域志》。

③ 《重修圣墓阿拉伯文碑》,引自《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④ 《江长贵重修圣墓碑》,引自《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⑤ 据金云鹏《续云南通志稿·郑和传》云:“信,亦天方教人”,引自《国学论衡》1935 年第 5 期。

波寂,安妥得济”<sup>①</sup>,更驱使郑和在第5次往使之际,迫切地来到“西方圣人之墓”,为自己、也为了随行往使的穆斯林们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心灵上的安慰了。

事实给我们的设问一个有力的回答:郑和亲抵圣墓行香的这一行动,是很有必要的。

### 三

通过以上对立碑者及碑记之事实所作的考察,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两点认识。

第一、大家知道,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元帝国,在其长达约90年的统治时代,奉行的是优遇蒙古人、色目人,压迫汉人、南人的民族等级制度。元朝末年连续不断地爆发于江南各地的农民起义,实质上可以说是这种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在推翻蒙古统治而汉人政权朱明王朝建立以后,民族地位的转化,决定了汉人歧视异族的必然性,从而大大地助长了那种元末就已经出现的排外风潮。

泉州,曾经是“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sup>②</sup>的国际都市,这里为“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sup>③</sup>,侨居着数以万计的色目人及其后裔。由于元末的“亦思巴奚战乱”,遂使这种排外风潮在泉州尤甚。这场肇始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前后长达10年的色

① 刘序:《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引自郑鹤声等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

② 庄弥邵:《罗城外墟记》,《泉州府志》卷11《城池》。

③ 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

目人拥兵作乱，“大肆淫虐”<sup>①</sup>，“炮烙州人，杀戮惨酷”<sup>②</sup>，“民大被荼毒”<sup>③</sup>。泉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出现了“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sup>④</sup>的那种人吃人的悲惨景象<sup>⑤</sup>。战乱酿成的祸害，进一步激起了泉州人民的民族仇恨。当陈友定军人泉时，“凡西域人尽歼之”<sup>⑥</sup>，大批的色目人被杀戮或被驱逐。原来聚居于泉州城的色目人及其后裔，纷纷向城外迁移和避居内地，或改姓氏或从母姓，以“昧其来源”。今陈埭的丁姓和白奇的郭姓，便是这一时期隐姓避居于当地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之后裔<sup>⑦</sup>。

作为色目人之一支的蒲姓更难逃厄运。由于“其先世（即指蒲寿庚）导元倾宋之罪”，明太祖“禁蒲姓不得读书人仕”<sup>⑧</sup>。也由于据城叛乱的色目人头子那兀纳是蒲氏之婿<sup>⑨</sup>，其境遇更是可想而知的。据《蒲氏家谱》记载，自明开始，蒲氏后裔都或改姓避居城郊，或逃远走于外，曾经是显赫一时的蒲氏家族急趋衰落了。

在这种排外风潮席卷下的蒲氏家族，史料为我们揭示的是“流离”与“末落”。然而，蒲和日竟能称其本姓，膺选随郑和下西洋并被擢升泉州官府之要职，这确是一件异乎寻常之事。是什么原因使蒲氏改变厄运而重又显达起来的？它意味着那种歧视异族的偏见正逐渐被放弃，排外风潮业已趋于平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在继洪武以后的永乐之世。

①②③ 《金氏族谱》之《丽史》。

④ 何乔远：《闽书》卷125《英旧志》。

⑤ 《晋江县志》卷15《纪兵》。

⑥ 释大圭：《梦观集·吾郡》。

⑦ 参见庄为玑：《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落》，《泉州文史》1980年第4期。

⑧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陈埭丁姓研究》、《白奇郭姓不是郭子仪后裔而是回族人》，《海交史研究》1978年第1期。

⑨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邵远平：《元史类编》卷18。



在“靖难之变”中登上皇帝宝座的明成祖,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伟大的抱负。为了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他不象其父亲明太祖朱元璋那样消极和保守,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对外政策,筹划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壮举。与这种“宣德化而柔远人”<sup>①</sup>的政策相应,在国内也施行了一些尊重外国人和保护外来宗教的措施。如1407年5月颁布的“永乐敕谕”云:

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sup>②</sup>

这道敕谕,虽然旨在保护国内的伊斯兰教寺和穆斯林,但是,对于当时改变歧视异族、止息排外风潮,无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是明成祖治世时期,积极的对外政策的实施,遂而改变了色目人受歧视、被迫逐的境遇。而只有在这种形势的需要下,才有可能让蒲和日不讳本姓随从郑和往使海外,才有可能冲破洪武时期不许蒲姓读书入仕的禁锢,被朝廷命为泉州卫镇抚之要职。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碑记非伪,立碑的蒲和日得为蒲寿庚的后人”,则有些记载说“蒲姓在当时已被流放,非事实矣”<sup>③</sup>。这就错了,我们决不能因为肯定立碑者蒲氏是事实,而反过来否定蒲姓在明初遭迫逐的这一事实。两个事实的先后存在并不矛盾,论者之所以误下上述之论断,正由于其忽略了蒲姓从“被流放”到家族成员中有人成为“立碑者”之间的重大转变,是明成祖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展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需要的结果。

① 《天妃灵应之记》碑。

②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③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附《拾遗》。

第二、恩格斯指出：“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着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郑和亲抵泉州圣墓行香亦不例外。如前所述，郑和前往圣墓行香是可能而又必要的。然而，尽管他是一名忠贞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圣墓的崇高声望吸引着他到这里来行香，但是，正如他的其他宗教活动一样，无不是围绕着下西洋而进行的，与这场伟大的航海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面说过，泉州在宋元时代曾经是“梯航万国”的“都会”<sup>①</sup>，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具有长期从事航海活动的丰富经验。特别是聚居于此的那成千上万的来自海外各国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蕃客”，多是活跃于海上的通商者。入明以来，虽然明统治者施行海禁政策，泉州港在“朝贡贸易”中只限通琉球<sup>②</sup>，但这个宋元时代通西洋的著名港口，依然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洪武时代，明政府几次遣使海外，多从这里启航<sup>③</sup>，“奉舶西洋”或“发舶西洋忽鲁谟斯”者尝命泉州人为使<sup>④</sup>。明太祖时代是如此，明成祖治世时期也是这样，当筹策展开下西洋活动时，当然不会忘却泉州是航海家的摇篮。在永乐三年（1405年）的第一次出使时，郑和之“同僚”王景弘即便先期来到这里“雇泉州舟”、聘“东石名舫”参加下西洋<sup>⑤</sup>。从上述情况分析，郑和亲抵圣墓行香，只能说是他前来泉州的目的之一。他的又一个目的，显然是到这里来招募那些富有航海经验、熟悉海外事情，抑或通晓番语的随行人员。据史料记载，在郑和使团中，无论是

① 庄弥邵：《罗城外壕记》，《泉州府志》卷11《城池》。

② 《明史》卷81《食货志》。

③ 如御史张敬之和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渤泥，见《明史》卷325《渤泥传》。

④ 泉州人林鸾，洪武九年（1376年）和十七年两次奉使“西洋”和“西洋忽鲁谟斯”，见《泉州凤池林李宗谱》。

⑤ 《西山杂志·三宝下西洋》。

领导人员，还是一般的庶务人员，有不少是泉州地方人士<sup>①</sup>，蒲和日正是在这时候而被膺选者之一。

当然，郑和的行香活动对于他招募随员之举，比从中去寻找那虚幻飘渺的慰藉，更获取了“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作为一名钦命之官，亲自上圣墓行香，如果是在宋元之际，这也许算不上什么，而处于伊斯兰教备受欺凌的情况下<sup>②</sup>，就显得非同反响了。不管郑和本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以他的“钦差总兵太监”的身份至圣墓行香，在客观上则表明了明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和崇仰。这种尊重和崇仰，给予曾遭欺凌的穆斯林们所带来的影响而使之激发出来的某种力量，将是不可估量的。郑和由此而博得伊斯兰教徒们的信赖乃至对下西洋事业的大力支持，这是可以肯定的。当时，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泉州穆斯林应该不少，而蒲和日只不过是因功升赏著于他者也。

如果说“郑和下西洋即是以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为主角，以东南亚、印度、西亚各国的伊斯兰教徒为配角而展开的不平凡的伊斯兰教的事业”<sup>③</sup>的话，那么，泉州的穆斯林们一定为之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① 参见拙作：《随郑和下西洋的福建人》。

② 从“永乐敕谕”保护伊斯兰教寺可以反证。

③ [日]寺田隆信著、庄景辉译，《郑和》，海洋出版社，1988年。

## 郑和舟师驻泊福建的航次与时间

郑和下西洋舟师驻泊福建长乐太平港,这是文献和实物资料所证明了的历史事实。然而,郑和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9年间,统率官军27000余人,大船百余艘,曾7下西洋,而其舟师究竟几次驻泊福建?时间多长?却少见学者们对此进行过探讨。近年来,随着新的“郑和研究热”的展开,这一被忽视了的郑和下西洋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钩稽史籍,可以看到有关郑和下西洋舟师驻泊福建长乐太平港的航次与时间方面的记载大致凡三:一为明确记录驻泊的航次与时间;一为只记录驻泊的航次而时间不具;一为没直接记录驻泊航次与时间而有迹可考的。下面,逐而分述之。

一、明确记录驻泊航次与时间的是第3次(永乐七年,1409年)、第4次(永乐十一年,1413年)和第7次(宣德六年,1431年)。

第3次:《星槎胜览》云:

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使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到占城国。<sup>①</sup>

---

<sup>①</sup>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占城国》。

作者费信,于“永乐宣德间,选随中使至海外,经诸番国,前后数四,二十余年”,这部“历览风土人物之宜,采辑图写成帙”<sup>①</sup>的纪行著作,是记述郑和下西洋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成书于明万历初年,采集有关档案资料而成的严从简之《殊域周咨录》亦云:

永乐七年,命中官郑和等,往赐其国,和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号,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自福建长乐港停,十二月于五虎门开洋,顺风十昼夜到占城国。<sup>②</sup>

随从此行的费信著述的《星槎胜览》和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所记录的第3次下西洋舟师驻泊太平港及其时间是很清楚的:自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停泊”至十二月“开洋”,先后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多月。

其他史书也记述了舟师驻泊太平港,然后由五虎门开洋的事实。曾任官万历间兵部职方郎中的茅瑞征所作的《皇明象胥录》载:

永乐七年,命中使郑和等,往赐其国,自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sup>③</sup>

一部记录明代中国与海外诸国往来针路的明人著作《海国广记》亦载:

永乐七年十二月,太监郑和自长乐五虎门开洋,西南顺风十昼夜,至其国(占城)东北百里海口,……<sup>④</sup>

此外,在一些地方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述。太平港一名之由来,就是因下西洋舟师驻泊于此而得称的。《长乐县志》说:

①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附四卷本《星槎胜览序》。

②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占城国》。

③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占城》。

④ 慎懋赏:《海图广记·占城》。

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七年,内侍郑和使西海,舟皆泊于此,因改今名。<sup>①</sup>

又据《重纂福建通志》云:

(永乐)七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时称郑和为三宝。下西洋师还,闽中从征将士升赏有差。<sup>②</sup>

这一记载,尽管年月有误<sup>③</sup>,但它不仅说明郑和舟师是从福建出发航海的,而且告诉了我们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郑和在此次下西洋前曾驻长乐“造巨舰”、择选“从征将士”。对此,《长乐六里志》提供了更为具体的例证:

长乐人黄参,字求我,……明永乐七年,太监郑和驻长乐造舰下西洋,参从征有功,授忠武尉,累迁游击定远将军及总管府中军。<sup>④</sup>

据如上述,可以认为,《星槎胜览》和《殊域周咨录》两书所载之日期,应是指大船队行动的时间。而郑和本人当于永乐七年(1409年)夏五、六月左右结束第2次下西洋回国之后、第3次出使之前,便已先期来长乐督造下西洋船舶和选招随员了。为了祈保航海安全,郑和还在太平港边上建造天妃宫<sup>⑤</sup>并于熨斗妈祖庙“筑坛祀南

① 《长乐县志》卷5《水利》。

② 《重纂福建通志》卷271《明祥异》。

③ 福考郑和第2次下西洋于永乐七年夏回国,《重纂福建通志》所载永乐七年春正月出使之期误也。参见徐玉虎:《明史中郑和下西洋年代之谬误考》,《大陆杂志》1960年第20卷6期;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福建文化》1937年第5卷第26期。

④ 李永选:《长乐六里志》卷7《人物》。

⑤ 《八闽通志》卷58《祠庙》载:“天妃宫在县西南太平巷(港),永乐七年太监郑和奉命下西洋泊于此,因创是庙,国子博士林慈为记。”

海神”<sup>①</sup>。

第4次：从出使航程和赉赐国家来看，郑和的航海活动自第4次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1、2、3次最远到达印度洋西岸之古里(Calicut)，而从第4到7次则渡过阿拉伯海，访问了印度洋以西的忽鲁谟斯(Ormuz)，乃至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Mogedoxu)等国。较之于以前各次，第3与第4次间隔的时间特别长。郑和在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第3次出使返航后<sup>②</sup>，于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再奉敕命<sup>③</sup>，开洋时间则在第2年冬季<sup>④</sup>。即使以奉敕命至开洋时间计，其中也长达近1年，这也许是为实行新航海计划做各种准备的时间<sup>⑤</sup>。而这一段时间，下西洋舟师就驻泊在长乐太平港。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地志既多且详。如《长乐县志》云：

永乐十年壬辰，首石山鸣讖云：首石山鸣出大魁，十洋成市状元来。是年山鸣，适三宝太监驻军十洋街，人物臻集如市。<sup>⑥</sup>

《长乐六里志》亦云：

永乐十年，郑和奉使西洋，统领舟师驻泊江左、光浴、沿江，和登云门山，重建云门寺。<sup>⑦</sup>

又《天妃灵应之记》碑载：

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

① 王应山：《国都记》卷26。

② 《明成祖实录》卷72。

③ 《明成祖实录》卷68。

④ 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

⑤ [日]寺田隆信著、庄景辉译：《郑和》三《渡过阿拉伯海》。

⑥ 《长乐县志》卷3《大事志》。

⑦ 李永选：《长乐六里志》卷1《大事》。

《长乐县志》亦载：

南山三峰寺，在县治西登高山上，登高山即塔坪山也。宋崇宁间，有僧造小台，时讲经其上。后邑舍人林安上就其故址改筑一庵，建炎间复造浮屠七级。明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同寺僧重修，工竣，题其额曰“三峰塔寺”。<sup>①</sup>

显然，郑和于永乐十年十一月奉敕命后，便统领下西洋官军“辏集”于长乐了。直到十一年（1413年）冬启航出海，舟师无疑在太平港驻泊了近1年光景。郑和本人则奔忙于种种筹策整备之中。在这里，他重修了洋屿云门山上的云门寺，奏建作为官军祈报之所的南山之行宫。次年，又与寺僧重修了三峰塔寺，并曾于四月里亲往西安清真寺“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寻得了有才干的本寺掌教哈三为与之同行的通译官<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明人王应山所著之《闽都记》的一则记载：

太平港在县西隅，今水次吴航头是也。《闽中记》云：吴王夫差尝略地至此作战舰，称吴航云。国朝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舟于此，奏改今名。又建天妃宫一所，其东有十洋，古谚云：十洋成市状元来，和时造舟贸易如云，未几马铎、李骐大魁天下。<sup>③</sup>

前述《重纂福建通志》和《长乐六里志》载，永乐七年第3次下西洋，郑和曾驻长乐督造巨舰，第4次下西洋又造舟于此，可见打造通西洋之船舶，乃是郑和以及官军在长乐留住的主要任务之一。经过了近1年的筹备工作就绪后，船队候风开洋了，“以通译番书，亦被使

① 《长乐县志》卷7《名胜》。

② 刘序：《万历重修清静寺碑记》，引自郑鹤声等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

③ 王应山：《闽都记》卷26。



未”的马欢，记述了此行“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顺风往西南驶向下西洋的第一站占城国的情形<sup>①</sup>。

第7次：要引证第7次下西洋舟师驻泊长乐太平港的史料，当首推《天妃灵应之记》碑最可依凭。这块在宣德六年（1431年）最后1次下西洋前立于长乐南山三清宝殿的郑和自撰碑记云：

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新近在福建南平发现的郑和铸造的1口青铜钟，亦为郑和第7次下西洋舟师驻泊福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其钟铭云：

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sup>②</sup>

随从这一次出使的“总制之幕”孔珍也记载说，下西洋的船队正是“自福建长乐县五虎门开船”的<sup>③</sup>。祝允明《前闻记》则对此次驻泊长乐太平港的时间作了很具体的记录：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龙江湾开舡，十日到徐山，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门，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sup>④</sup>

与前引费信《星槎胜览》和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载第3次郑和舟师驻泊长乐太平港的时间一样，《前闻记》记述第7次下西洋船队的航海行程及其日期中揭示的这一时间，也是再明确不过的了。自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至十二月九日出五虎

①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占城国》。

② 梅华全、卢保康：《南平市发现明代郑和铸造的铜钟》，《福建文博》1982年第2期。

③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占城国》。

④ 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

门,在这里驻泊了整整 10 个半月。在这一次“仍往诸番,舩舟兹港”时,郑和不仅“复修”南山三峰塔寺之“佛宇神宫”,“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 1 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sup>①</sup>。还亲自“领兴平二卫指挥、千户、百户并府县官员,买办木石”诣湄洲天妃庙“修整庙宇,并御祭一坛”<sup>②</sup>。

二、记录驻泊航次而时间不具的是第 1 次(永乐三年,1405 年)和第 5 次(永乐十五年,1417 年)。

第 1 次:《明史·郑和传》载:

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sup>③</sup>

《重纂福建通志》亦载:

成祖永乐三年六月,命三保太监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sup>④</sup>

以上所述言之虽较含混,但若以前引之记载证之,亦甚明了。纂史家采用“复”字,即再也,这无疑表明了郑和船队从刘家港航抵福建,在太平港驻泊下来,再由此经五虎门扬帆的意思。停留的时间多长?虽未言及,但从每驻泊斯港“伺风开洋”<sup>⑤</sup>考之,“复自福建扬帆”的日子,一般应在“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sup>⑥</sup>之时。这就是说,下西洋舟师自刘家港泛海至福建,必须在长乐太平港候冬季东

①⑤ 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

② 《敕封天后志》,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

③ 《明史》卷 304《郑和传》。

④ 《重纂福建通志》卷 1《通纪》。

⑥ 朱熹:《漳州可谈》卷 2。

北信风开洋。这样一来,此次驻泊福建的时间,至少有3、4个月左右。据《西山杂志》记载,这一次,副使王景弘还特地到泉州“雇泉州舟”,并“以东石沿海名舩导引”下西洋<sup>①</sup>。

第5次:有关第5次的航海记录,是先后7次郑和出使中最少的1次。不稍说,这也给考证此次下西洋舟师是否驻泊福建带来了困难。唯一而又最宝贵的论证依据是现存于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圣墓回廊内的《郑和行香碑》,其云: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

行香者郑和,这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当然是在舟师结集福建期间,特地来到圣墓行香,祈求庇祐下西洋平安的。立碑人蒲和日身为回教世家,熟知海事者之后裔,是“永乐十五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因“有功”而被“加封泉州卫镇抚”的<sup>②</sup>。下西洋舟师在福建驻泊时,郑和前往泉州圣墓行香,并择蒲和日这样的人物随从,是必要和可能的<sup>③</sup>。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这条史料,否则不免陷于视郑和是慕名而专程从北京至圣墓行香、蒲和日应选亦如其抵西安寻哈三之误。只有把它与有关记载比较阅读,并把引之为证所得的结论与下西洋舟师屡次驻泊长乐太平港的事实联系起来考察,才会觉得以蒲和日所立的郑和行香碑来论证第5次下西洋舟师也曾驻泊福建是可信而又足据的。

至于驻泊的时间,实难考之。明成祖下达第5次出使的诏令是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sup>④</sup>,而翌年五月十六日郑和尚于泉

① 《西山杂志·三宝下西洋》。

② 参见《蒲氏家谱·蒲和日传》,引自张玉光、金德宝:《报告发见蒲寿庚家谱经过》,《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 参见拙作:《郑和行香碑考》。

④ 《明成祖实录》卷103。

州圣墓行香,实际出发又如往常那样在这一年的秋冬期间<sup>①</sup>。姑且不从郑和奉敕命之时算起,而自抵圣墓行香之日计之,至秋冬间开洋,其驻泊福建的时间亦有好几个月以上。这一推测大概是不会错的。

三、没有直接记录航次与时间的是第2次(永乐五年,1407年)和第6次(永乐十九年,1421年)。尽管如此,但只要留心史料之记载,也并非无蛛丝马迹可寻。

第2次:查《罪惟录》有载:

永乐四年,乃遣太监郑和为使,貳以侯显,……帅舟师三万七千人,发福建五虎洋,行赏西洋、古俚、满刺加诸番。<sup>②</sup>

查继佐这一记载的时间是有误的,但说明了有侯显同行的这次郑和出使,也一样自福建五虎门发舶。考侯显随郑和下西洋凡2次,第1次是在永乐五年(1407年),郎瑛《七修类稿》云:

永乐丁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諭。<sup>③</sup>

永乐丁亥即永乐五年,《罪惟录》所记永乐四年应为五年之误<sup>④</sup>。由郑和、侯显帅舟师“发福建五虎洋”行赏诸番的此次航海活动,毫无疑问是指第2次下西洋。因之可以证明郑和第2次下西洋曾在长乐太平港驻泊,然后由五虎门开洋。再看看《泉州府志》的一则可资佐证的记载:

天妃宫在郡城德济门内。……明永乐五年,以出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其庙。自是节遣内官及给事中行

① 《郑和》三《渡过阿拉伯海》。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29《郑和传》。

③ 郎瑛:《七修类稿》卷12《三宝太监》。

④ 郑鹤声等辑此条史料加按云“应为三年”,是错误的,侯显第1次随郑和下西洋是永乐五年而不是永乐三年。见《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

人等官出使琉球、暹罗、爪哇、满刺加等国，率以祭告祈祷为常。<sup>①</sup>

这里所说之天妃宫即现存泉州南门之天妃宫也。郑和于永乐五年，正当第2次下西洋时，以出使西洋太监之身份，特奏请令当地守臣修葺这座天妃宫，这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驻泊福建这样密切的因缘关系，就不可能有此奏修泉州天妃宫之事。这难道不是一条可以证明第2次下西洋舟师曾驻泊福建的好材料吗？

第2次下西洋舟师在太平港驻泊的时间没有多长。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壬子(二日)，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sup>②</sup>，而九月十三日，成祖则诏令刚刚回国不久的郑和再度统领舟师出海<sup>③</sup>。由此看来，就是由于等候信风的关系，郑和船队也必在此后较短的时间内使开洋了。

第6次：前述会稽人马欢，曾“以通译番书”随郑和使团“三人海洋，遍历番国”，“编次《瀛涯胜览》一帙以归”<sup>④</sup>。明监察御史古朴为其书所作的后序则为我们留下了藉以稽考的可贵记载，云：

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监郑和统率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劳，而二君善通译番语，遂膺斯选，三随辘轳，跋涉万里，自闽之五虎发迹，首入占城，……<sup>⑤</sup>

考马欢3次随郑和使团奉使西洋诸国，即除前述永乐十一年(1413年)参加郑和使团第4次的航行外，另2次分别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参加郑和使团第6次的航行和宣德六年(1431年)参加

① 《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② 《明成祖实录》卷71。

③ 《明书·本纪》。

④ 《瀛涯胜览校注·马敬序》。

⑤ 《瀛涯胜览校注·古朴后序》。

郑和使团第7次的航行<sup>①</sup>。以上引文所云“三随辘轳”，显然也包括永乐十九年的第6次了。“自闽之五虎发迹”，犹如其他史料所载一样，就是指舟师在太平港停留，然后由五虎门开洋的。我们之所以说有马欢随行的第6次下西洋舟师也驻泊福建，理由就在于此。

郑和第6次出使是于永乐十九年正月奉命的<sup>②</sup>。但不能理解为成祖下令之日，就是郑和舟师下西洋之时。诏令往往提前颁发，正是让郑和有一定的时间来为此行做各种准备工作，尔后候风择日开洋。这从以前数次的出使情况可以得到证明。即使是此次也一样，由巩珍《西洋番国志》中的一道敕书得悉，郑和是在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以后才启航的<sup>③</sup>。这期间，舟师当也早就“辘集”于长乐太平港了。

如果说上述数四征引的资料及所作的论证尚不足为据的话，那么，不妨再列举二、三可供考之的史料。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云：

命和为使，贰以侯显，妙择译人马欢，鞏从之行，总率巨艚艘，发自福州五虎门，维艚挂席，际天而行。<sup>④</sup>

黄景昉《国史唯疑》云：

太监郑和使诸夷舟，自福州五虎门发，历数万里，所至二十余国。……闽呼和三宝大人，不敢名。今三山（即福州）故家，间蓄异器，或发自地下伏藏，侈曰此三宝大人物，遗烈可知。<sup>⑤</sup>

何求《闽都别记》云：

今太监郑和又名三保，同太监王景宏、侯显三人，往福州

①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

② 《明成祖实录》卷119。

③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敕书》。

④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

⑤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2。

东南诸番国赏赐宣谕,采取宝贝。命动拨各省库银,官军护送,由福州长乐登舟。诏书既下,有司官先在长乐十洋地方造舟,工匠数千,该处便有人搭楼开店贸易,人如云集,竟成大市。先有古谶云:十祥(洋)成市状元来,果未几年,马铎、李骥俱中状元,谶应不谬。至舟已赶造完竣,三保太监等皆至长乐,併随从驾官座海舟,其余赏赐之物,并口粮军兵甲仗诸色工匠,分配海船五百余号,俱在太平港即吴航头登舟。<sup>①</sup>

如此这般的记述不乏其载。虽然没有说明郑和下西洋舟师驻泊的航次与时间,但都为考证郑和下西洋舟师驻泊长乐太平港提供了可靠而有力的依据。

论及于此,可以说已经对郑和 7 下西洋究竟几次驻泊福建及其时间多长的这一问题,作了比较明晰的回答,有如郑和本人在最后 1 次下西洋驻泊长乐太平港时自己撰文并勒记于石的《天妃灵应之记》中所说:

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

综之,兹将郑和舟师驻泊福建的航次与时间列表以清眉目:

航 次	时 间
第一次(永乐三年)	永乐三年六月至冬
第二次(永乐五年)	永乐五年九月至冬
第三次(永乐七年)	永乐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	永乐十年十一月至十一年秋冬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至十五年冬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	永乐十九年正月至冬
第七次(宣德六年)	宣德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九日

<sup>①</sup> 何求:《闽都别记》卷 15 第 272 回。

见如上述,郑和 7 下西洋舟师每次都曾驻泊福建长乐太平港,时间短者 2、3 个月,长者则达 10 个月以上。事实说明,郑和舟师驻泊太平港,不是作临时的短暂停留,而是把这辟为下西洋的基地港,在这里修造船舶、选招随员、候风开洋,才屡屡结集于斯的。上引不少史料,多直接记录郑和下西洋舟师自福建五虎门发船,正是由于官军驻泊太平港,于此登舟开洋,而把这里视为基地港之缘故吧。至今长乐一带还保存着不少当年郑和舟师驻泊时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遗址,流传着许多父老抵掌相谈的遗闻轶事,这无疑是考察郑和舟师驻泊福建航次与时间所得结论的最好证明。



## 随郑和下西洋的福建人

福建人素以善于航海著称于世，然而更值得其骄傲的是，他们参加了被誉为“明初盛事”的郑和下西洋这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十五世纪初期，在“靖难之变”中登上皇帝宝座的明成祖朱棣，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sup>①</sup>，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往来，在频繁向海外遣使的同时，乃命太监郑和统领一支由钦差正使太监、副使监丞、少监、内监、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舍人、户部郎中、鸿胪寺序班、阴阳官、阴阳生、医官、医士、余丁、教谕、官校、旗军、勇士、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买办、书算手、铁锚、木艚、搭材、水手、民梢人等<sup>②</sup> 27000 余员，大船数十艘<sup>③</sup> 组成的庞大舟师，7 次出使西洋，遍历东南亚、南亚、西亚，直至非洲东岸 30 余国，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轰轰烈烈的海上活动。在筹策这么一场伟大的航海活动，组织这么一支人数众多、分工明细、机构严整，而于“鲸波接天，浩浩无涯”<sup>④</sup> 的大海中能“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

---

① 《明史》卷 304，《郑和传》。

② 根据《瀛涯胜览》、《郑和家谱》和《前闻记》的记载。

③ 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之人船数目，史书所载各异，每次出使之数亦不同。综而观之，一般为人员 2700 余名，大船 60 余艘。

④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

狂澜,若历通衢”<sup>①</sup>的舰队时,雄才大略的永乐帝及其朝臣们当然不会忘记早在宋元时代就已经活跃于印度洋和波斯湾的福建人了。

从郑和7下西洋舟师累次驻泊福建<sup>②</sup>,在这里“造巨舰”<sup>③</sup>、“选火长”<sup>④</sup>、“雇名舫”<sup>⑤</sup>来看,随之下西洋的福建人必众。但是,随从郑和下西洋者数以万计,而有姓名和事迹可考的却百不及一,记其籍贯者更为少数。据笔者经眼史料所载,明确原籍是福建的有11人。这较之未载人史籍者,可谓是微不足道之数。尽管如此,也实属难能可贵的了。见史载郑和使团人员之姓名者计70来人<sup>⑥</sup>,绝大部分籍贯不详,而福建人约占百分之十六,人数之多为他省所莫及。这11人,分布于郑和使团的各个部门,如果按郑鹤声先生对郑和使团人员职种所作的分类<sup>⑦</sup>,他们当中即有领导人员、辅佐人员、技术人员、武装人员和庶务人员等。兹作如下考证:

### 1. 领导人员

王景弘、侯显这两位郑和航海史上的铮铮有声者,到底是什么地方人?竟不见诸史书记载。别说王景弘,就是清人张廷玉编纂的《明史》曾为其立小传附于郑和名后的侯显,亦无述及<sup>⑧</sup>。史家的这一疏忽,致使王、侯二人的籍贯问题,学者们视为无从稽考,连现代

①② 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

③ 《重修福建通志》卷71,《祥异》。

④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

⑤ 《西山杂志·三宝下西洋》。

⑥ 笔者据经眼史料所作的统计。

⑦ 参见郑鹤声等编:《郑和下西洋史料汇编》(上册)第3章第1节《郑和使团人员的组织》。

⑧ 《明史》卷304《郑和传附侯显传》。

新编的《辞海》，也只得缺如<sup>①</sup>。

近年发现的《西山杂志》<sup>②</sup> 记载：

王景弘，闽南人<sup>③</sup>。侯显，晋江侯厝人<sup>④</sup>。

至此，这一长期悬挂的历史问题，总算大白了。他们是随郑和下西洋的福建人中首要之人物。

王景弘是以“(郑和)其侪”<sup>⑤</sup>，及虽“位”次郑和而与郑和同挂“正使太监”之衔，跟郑和一起统领舟师下西洋的。在郑和7下西洋中，他4次与之同往。分别参加了永乐三年(1405年)的第1次、永乐五年(1407年)的第2次、永乐七年(1409年)的第3次以及宣德六年的第7次航行。史载：

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sup>⑥</sup>

永乐丁亥(五年，1407年)，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sup>⑦</sup>

永乐七年己丑(1409年)，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sup>⑧</sup>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sup>⑨</sup>，帝以践祚岁久，而诸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sup>⑩</sup>

在郑和使团的领导人中，与郑和同行使者，唯王景弘次数最

①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

② 《西山杂志》，清嘉庆十三年蔡秋兼抄本。

③ 《西山杂志·三宝下西洋》。

④ 《西山杂志·四监通异域》。

⑤⑥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占城国》。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

⑦⑧ 《明史》卷304《郑和传》。

⑨ 郎瑛：《七修类稿》卷12《三宝太监》。

⑩ 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作“宣德五年”。

多，算得上是郑和在航海事业上的 一位最亲信的同僚。

虽然，有关他的事迹史籍没有留下比较完整的记录，但从鳞爪资料中看出，他在与郑和同领舟师下西洋时是立下赫赫功绩的。这由明宣宗《赐太监王景弘诗》便可窥视一斑。诗云：

南夷诸国蟠海中，海波险远迷西东。  
 其人习性皆颛蒙，浮深泳浅鱼鳖同。  
 自昔不与中华通，维皇太祖天命隆。  
 薄海内外咸响风，中兴功烈维太宗。  
 泽及远迹如春融，明明皇考务笃恭。  
 至仁怀绥靡不容，三圣相承盛德洪。  
 日月所照悉服从，贡琛纳贄来无穷。  
 昔时将命尔最忠，大船摩曳冯夷宫。  
 驱役飞廉决鸿濛，遍历岛屿凌巨罅。  
 覃宣德意化崆峒，天地广大雨露浓，  
 覆载之内皆时雍。朕今嗣统临外邦，  
 继志述事在朕躬。岛夷仰望纷喁喁，  
 命尔奉使继前功。尔往抚谕敷朕衷，  
 各使务善安田农，相与辑睦戒击攻。  
 念尔行涉春与冬，作诗赐尔期尔庸，  
 勉旃尔庸当益崇。<sup>①</sup>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航海史上的著名人物，却“史”不列传。这也许是世人蔑视宦官，以及集下西洋功绩于郑和一人的缘故吧。然而，王景弘不愧是一位可与郑和相提并论的伟大航海家。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论及王景弘客死海外之说。长期以往乃至今天，相传王景弘在下西洋时死于爪哇，一些书籍也有如此这般

① 《宣庙御制总集》，引自《郑和下西洋史料汇编》（上册）。

的记述。郑健庐《南洋三月记》云：

相传景弘卒于南洋爪哇，今三宝洞旁之土墩，即为景弘之墓，相传为三宝大人埋骨之地。<sup>①</sup>

李长傅在《郑和小传及其航行南洋之概略》一文中云：

第三次永乐十年(1412年)十月出发，……归途寄泊于爪哇，曾至三宝垅，王景弘死焉，葬于其地。<sup>②</sup>

徐鳌润在《郑和海外的古迹》一文中云：

“三宝垅”原名垅川，因三保太监登陆此港故名；“三宝洞”据传是随郑和出海的王景弘的葬身处。<sup>③</sup>

香港曾铎波在《郑和下西洋考略》一文中云：

郑和最亲信的副使王景弘，在第七次率领访问东南亚各国，……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的航行，因为《明史》并没有记载王景弘返回中国的事。据考在三宝壘三保庙左边附近的亭阁竖有一块墓碑，就是王景弘病逝的葬地。<sup>④</sup>

新编《辞海》未加考证，亦云：

(王景弘)明宦官，航海家。永乐三年任郑和的副使，出使西洋，以后郑和第二次、第三次、第七次航行时他都同行。宣德九年又出使苏门答腊，后死于爪哇。<sup>⑤</sup>

这一为世人所传，为书刊所载的王景弘客死爪哇之说，事实果真如此吗？看来作一番考证是很有必要的。

实际上只要留心历史文献的记载，要否定这种说法并不难。

王景弘最后1次出使海外，是继与郑和一起第7次下西洋后

① 《南洋三月记》206《游三宝洞古迹》。

② 《南洋研究》1931年6月，第3卷第6号。

③ 台湾《中央日报》1958年7月11日。

④ 《香港南洋输出入商会成立四十五周年会庆特刊》(1984年)。

⑤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

的 1 次单独奉命出使,是在郑和去世后的宣德九年(1434 年)。《明史·苏门答刺传》载:

(宣德)九年,王弟哈利之汉来朝,卒于京师。帝悯之,赠鸿胪少卿,赐谥,有司治丧葬,置守冢户。时王景弘再使其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入朝。<sup>①</sup>

王景弘此次出使,究竟有没有归返祖国?上文“时景弘再使其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入朝”,就是说,王景弘奉使苏门答刺时,国王派其弟跟着他来中国,王景弘确是回国来了。另有史料为据:

(宣德九年)十二月甲戌,敕行在工部及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太监王景弘等:南京工部凡各处采办买一应物件并营造物件,悉皆停罢<sup>②</sup>。

此敕所谕有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如果说此文在时间上有点交错含混的话,那么,可再举史料佐证:

正统元年(1436 年)三月丁卯朔,敕南京守备内外官员太监王景弘等:比闻南京永承运等八库递年收贮财物数多,恐年久损坏,负累官攒人等。<sup>③</sup>

正统元年(1436 年)三月甲申,敕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遣官运至北京交纳,毋得沿途生事扰人。<sup>④</sup>

见如上述,这不仅可以否定王景弘于第 3 次下西洋归途中死葬爪哇三宝瓏的说法,而且所谓第 7 次下西洋是他最后 1 次航行,《明史》未载其返国之事,亦显误矣。宣德九年以后,才真的未见有王景弘再度奉使海外之记载。既是如此,又何谈客死爪哇呢? 尽管

① 《明史》卷 325《苏门答刺传》。

② 《明宣宗实录》卷 115。

③ ④ 《明英宗实录》卷 15。

王景弘卒年无考,但他死在国内是毋庸置疑的。

过去一般认为郑和在最后航海回国后死于国内<sup>①</sup>,而王景弘则在第7次下西洋归途中病死于海外,因此,把爪哇三宝瓏的郑和墓误传为葬王景弘之所。其实恰巧相反,郑和是在第7次下西洋时于1433年客死古里后运葬爪哇的<sup>②</sup>。那被人讹传为王景弘病逝葬所的爪哇三宝庙边上的土墩,至今当地的人们仍相信那是郑和的坟墓<sup>③</sup>,史实证明,这是正确的。

侯显是郑和使团中又一位福建籍领导人员,他曾2次与王景弘一起随郑和下西洋。一是参加第2次航行,《七修类稿》记云:

永乐丁亥(1407年),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sup>④</sup>

二是参加第3次航行,据《皇明四夷考》载:

永乐七年(1409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统三万人往西洋。<sup>⑤</sup>

侯显除随郑和2次出使外,还单独奉命“五使绝域”(二访西藏,三下西洋)<sup>⑥</sup>,由于他“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二佐郑

① 持此见者,如:法国人希和认为:“他(郑和)死的地方应是南京,其墓尚在。”(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日人寺田隆信认为:“结束第七次的航海,郑和归国时,已经年过六十,而很快就病逝了。”(庄景辉译《郑和》);朱僕认为:“郑和死的地点,大概是在南京。”(《郑和》)。

② 参见庄为玘:《论明版的郑和〈西洋记〉》,香港《华侨日报》1984年4月12日。又郑一钧:《郑和死于1433年》,《光明日报》1983年3月16日。

③ 曾钰波:《郑和下西洋考略》,《香港南洋输出入商会成立四十五周年会庆特刊》(1984年)。

④ 郎瑛:《七修类稿》卷12。

⑤ 郑晓:《吾学编》卷67。

⑥ 指永乐元年使乌思藏延聘僧人;永乐十一年出使尼八刺、地浦塔二国;十三年出使榜葛刺;十八年出使诏纳朴儿;宣德二年再使乌思藏。见《明史》卷304《郑和传》附“侯显传”,《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制典”第132卷《官寺部列传》。

和,均“未尝辱命”,赢得了“威名与郑和亚”<sup>①</sup>的赞誉。

明初朝廷向海外诸国赏赐宣谕,多以福建人为使。永乐间,明成祖还曾以安溪人李兴使阁婆、苏门答刺<sup>②</sup>;以莆田人马彬使占城、真腊和暹罗<sup>③</sup>。明太祖也是这样。泉州人林骛在洪武九年(1376年)“奉舶”西洋,洪武十七年(1384年)再次受命“发航西洋忽鲁谟斯”<sup>④</sup>。可见,王景弘、侯显与郑和一起奉使西洋,也并非福建人中之仅见,不过,其劳绩著于他者也。

## 2. 辅佐人员

作为辅佐人员随郑和下西洋的福建人,可举其姓名者有蒲日和。据《蒲氏家谱》载:

日和,字贵甫,寿崧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元至正间,清真寺损坏不治,里人金阿里与之共成厥事,重修门第,皆以大石板砌成之,极其壮丽。右匾镌有名字,至今犹存。至永乐十三年<sup>⑤</sup>,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sup>⑥</sup>

在家谱谱系中列日和居第八世,为第七世寿崧之次子。虽传说中所云在年代上似有出入,但记载蒲日和于永乐十五年随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是可以相信的。他因功被封为泉州卫镇抚,于圣墓立下的石碑至今犹存,便是证据。

① 见《明史》卷304《郑和传》附“侯显传”,《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闾典”第132卷《官寺部列传》。

② 《西山杂志·四监通异域》。

③ 张燮:《东西洋考》卷2。

④ 《泉州凤池林李宗谱》。

⑤ 有抄本为十五年。据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记载,永乐十三年郑和无下西洋之举,此乃十五年之误。

⑥ 张玉光、金德宝:《报告发见蒲寿庚家谱经过》,《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那么,他是以何等职种参加郑和使团下西洋的?有的学者认为:

蒲日和似其人较习武事。依《郑和家谱》所载,随敕奉差诸官员名分析,或于出国时曾任指挥一类职务。<sup>①</sup>

其实不然,言其较习武事,出国时曾任指挥一类职务,这只是由他回国后晋升为镇抚而作的推测,在传中并没有迹象可以说明这一点。我认为,与其说他“较习武事”,不如说他熟悉海外事情,善于经商,更合乎事实。蒲日和能捐资与金阿里共葺清真寺,并把那座“损坏不治”的寺院重修得“极其壮丽”,如果没有较为富厚的财力是不可能的。其资金,无疑是这位经商世家的后代通过经营海外贸易博得的。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与其说他“任指挥一类职务”,不如说他是一名晓习阿拉伯语的“通事”更来得确切。郑和在第5次下西洋前来泉州时,不仅到圣墓行香,而且“至清真寺祈祷”<sup>②</sup>,并访问了居住在当地的阿拉伯和波斯人的后裔穆斯林。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sup>③</sup>的使命,正如郑和于永乐十一年前往陕西求得“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哈三一样<sup>④</sup>,当然也在阿拉伯人聚居的泉州地方寻找类似的人才了。蒲日和一定是以“秉清真教,慎言谨行”,通晓阿拉伯或波斯语言而膺选加入郑和使团的。在辅佐郑和下西洋中,他立下了功劳,回国后被升赏,擢为泉州卫镇抚并主圣墓事宜。为了铭记郑和至圣墓行香之事,大概也为了显耀自己由此而得居的镇抚官职,他才在圣墓立下了这块以垂纪念的石碑。

我们之所以把蒲日和列为犹如马欢那样“善通番语、遂膺是

① 罗香林:《蒲寿庚》104--105页。

② 刘序:《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

③④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前集目录》。

选”<sup>①</sup>的辅佐人员,原因就在于此。

### 3. 技术人员

郑和使团中的技术人员,有主持观测天文气象的阴阳官;有负责防治瘴疠疾疫的医官医士;有司掌航向驾驶的火长等等。这些“事大责重”的技术人员,尤其是掌管航海技术方面的技术人员,则主要是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人<sup>②</sup>。福清人林贵和便是其中的一个。

明吴宽《吴文定公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五《封文林郎广东道监察御史林公墓表》记载:

惟林氏之先为鲁人,后避晋永嘉之乱,散居南土。有讳通者,仕为福清尉,家于闽。八传至诚山公,公之大父也。父曰贵和,贵和通易,善卜筮之说。国朝永乐间五从中贵人泛西海,入诸夷邦,往返辄数年,竟无恙,考终于家。<sup>③</sup>

林贵和以通易卜筮之说而被选随郑和出使,可能属于下西洋之职中之阴阳官。《瀛涯胜览》、《郑和家谱》、《前闻记》以及《西洋通俗演义》诸书均举郑和使团有阴阳官一员,林贵和当为其一。阴阳官为“观星斗”之官也<sup>④</sup>,凡天文、占候及星人之流,悉归其管。船队在海上航行用以司日月星辰,风云气色测候之事。阴阳官之职掌,还在于卜休咎、占吉凶,凡舟师活动事宜,悉听其占卜而行。在视神主宰一切的航海时代,卜筮自尤重大。虽诞而无稽,然诸事之预测、推算无不取决于此不可。阴阳官一职,是至关重要的。郑和7次下西洋,而林贵和则“五从中贵人泛西海”,可见他是一位执其职之诚可任者。

①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古朴后序》。

②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

③ 本文引自刘铭恕:《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9月第3卷。

④ 罗懋登:《西洋通俗演义》第15回。

就随行次数而言,林贵和 5 次从使,较之于郑和航海史上赫然著名者马欢之“三随辘轳”<sup>①</sup>、费信之“四次随征”<sup>②</sup>更胜一筹,皆他人所莫及也。他是所见史料记载随郑和下西洋次数最多者之一<sup>③</sup>。巩珍在其纪行著作中云:

(下西洋前)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sup>④</sup>

以郑和“统率官兵数万,乘驾宝舟百艘”<sup>⑤</sup>观之,被选取为火长的福建人当为数不少,可惜的是史籍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

#### 4. 武装人员

这里所说的武装人员,即郑和下西洋率领的官兵也。这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部队,主要是抽调沿海卫所的军士组成的<sup>⑥</sup>,其大部分则来自福建属卫<sup>⑦</sup>。每当他们归国后,明廷尝或以远涉艰辛,且有战功劳绩,给予升官<sup>⑧</sup>;或以航海劳苦,且去家日久给予赐钞<sup>⑨</sup>。《重纂福建通志》也有郑和第 3 次下西洋舟师还,“闽中从征将士升赏有差”的记录<sup>⑩</sup>。《闽书》武军纪更列举了不少“以征西洋功”而分别擢官为试百户、百户、副千户、千户、指挥僉事者。他们当中有的就

①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古朴后序》。

②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自序》。

③ 据新近发见的《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云:永乐宣德间“命内臣下西洋忽鲁谟斯等国,选侯偕行”。“三十五年,六使绝域”。但其中有 1 次“中道取回”,实为 5 次随行,故次数仅与林贵和等也。

④⑤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

⑥ 《(重刊)兴化府志》卷 49《兵纪》。《闽书》卷 68《武军纪》。

⑦ 洪熙元年(1425 年)十月,仁宗曾以罢西洋宝船后留下的原“皆江南属之,便于舟楫”的下西洋官军 1 万人用于营造献陵,见《明宣宗实录》卷 10。

⑧ 《明成祖实录》卷 72。

⑨ 《明成祖实录》卷 78。

⑩ 《重纂福建通志》卷 71《明祥异》。

是福建人。例如：

柳兴，莆田人，兄得能，洪武中以卫军选舵工驾船捕倭，卒。兴仍前役，永乐初随太监郑和等下西洋，有杀贼功，历升（百户）。<sup>①</sup>

此外，在参加郑和使团的福建籍武装人员中，我们还在地方谱牒中见到一位在南京充军时随郑和下西洋而殉职的永春人刘孟福，族谱云：

孟福，生明建文己卯年（1399年），卒宣德辛亥（1431年）十二月十一日。年三十三，在南京充军，从中官往番邦，死在思门达劣（即苏门答刺）。娶本里林氏春娘，年二十九岁，闻讣痛悼，死而复生。<sup>②</sup>

刘孟福是参加宣德六年的郑和第7次下西洋而死于苏门答刺的。随郑和下西洋之官兵成千上万，在那长时间、远距离的海上航行中，象刘孟福这样的为国捐躯者肯定不少。但如刘大夏所谓“军民死且万计”<sup>③</sup>，实乃夸张之辞也。

随郑和出使的人员，有留居海外未归者。一个闽籍武装人员，就在苏洛留居了下来。据黄藏荪《苏洛华侨概况》云，有一位叫白本头的泉州人，入伍当兵，随郑和下西洋，在苏洛登陆后，因与当地摩罗族妇女相爱，不愿再随船队起行，而留在苏洛，遂成了该岛的第一个华侨。其坟墓及生前住所，至今犹存。

留居海外的这种情况，亦见于《明史》“婆罗传”记载：

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宝印

①② 何乔远：《闽书》卷70《武军纪·兴化卫左千户所》。

③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

一，玺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sup>①</sup>

其虽无姓名可考，也不知属使团中之何等人员，但所云为福建人随郑和下西洋留居婆罗者明矣。

### 5. 庶务人员<sup>②</sup>

随郑和出使之福建人，除上述几种人员外，大批的应是诸如买办、书手、民梢以及养马、厨役等<sup>③</sup>那样的庶务人员。这些人员往往也有因功论赏，回国后当了一官半职的：

黄参，长乐人，字求我。……明永乐七年(1409)太监郑和驻长乐造舰下西洋，参从征有功，授忠武尉，累迁游击定远将军及总管府中军<sup>④</sup>。

严观，闽县人。永乐中以西洋功升任，今袭(试百户)。<sup>⑤</sup>

王佐，连江人。其先王通保，永乐中以西洋功授本所(即福州中卫后千户所)试百户。嘉靖末以倭功升任，今袭(百户)。<sup>⑥</sup>

陈连生，连江人。永乐中以西洋功升任，今袭(试百户)。<sup>⑦</sup>

郑和7次下西洋，皆以福建长乐太平港为基地港，该使团中的各种人员，尤其是大量的庶务人员，决不会舍近求远，而一定是就福建地方选用的。那些“从中官郑和下西洋”，上晋江青阳山寺庙祈祷，“奉其香火以行”的晋江人，其中大概也有不少是属庶务人员吧。

以上分5类列举了见于史籍记载的11个随郑和下西洋的福

① 《明史》卷323《婆罗传》。

② 所谓庶务人员即杂佐人员也。这里把见于史载其名，但不明其下西洋前之身份和加入使团后之执职的随行人员均归于此类。

③ 《明成祖实录》卷78。

④ 李永选：《长乐六里志》卷7《人物》。

⑤ ⑥⑦ 何乔远：《闽书》卷68《武军纪》。

建人，象这样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实乃少数，而更多的是那些名不垂青史、功不铭丰碑的人们。殊不知当年有多少福建人参加了郑和下西洋，并在这场称盛一时的航海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郑和宝船尺度的探索

郑和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9年间,这位“才负经纬”的三保太监先后奉命统领近3万舟师,7次下西洋,出使亚、非30多个国家。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

发生在十五世纪初明帝国进入全盛时期的这一航海盛事,吸引着国内外不少学者向它倾注了研究热情,对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其中的“宝船之迷”,则是最耐人求索的了,长期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共同关注,但至今争议莫属。本文不避粗浅,就郑和宝船的尺度略谈一些看法。

## 一

最早为我们揭示郑和宝船尺度的《瀛涯胜览》,据明钞说集本之卷首记载:

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sup>①</sup>

为了把握这条史料的价值,简略了解一下作者及其所著之《瀛涯胜

---

<sup>①</sup>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占城国》。

览》一书是很有必要的。撰写这部重要著作的是会稽人马欢，这位“才干优裕”的回教徒，在“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sup>①</sup>之际，曾“以通译番书”而“首膺斯选”，于永乐、宣德间“三入海洋，遍历番国”。所记述“历涉诸邦”之状况“莫不悉备”。作者还在自序中为我们描绘了郑和率领的船队，其“舟楫之雄壮，盖古所未有”的情形。出于“使后之人，于千载之下，知国家道同天地，化及蛮夷有若是之盛”的“用心”，作者对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忠实的记录。他“金帛宝货略不私己，而独编次《瀛涯胜览》，一帙以归”<sup>②</sup>。这种苦心编撰以及视之过于珍宝的可贵精神，使这部著作的价值更显重要了。成书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的《瀛涯胜览》，马欢“目击而身是历之”记录下来的最直接的资料，特别是对宝船尺度的记述，是十分珍贵的。

作为随郑和下西洋人员的纪行著作问世的还有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费信的《星槎胜览》。在这两部书中，虽无明确记述宝船的尺度，但均对其规模作了描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西洋番国志》中的一段记载：

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sup>③</sup>

这里所记宝舟“巨无与敌”跟前述马欢所记之宝舡“古所未有”恰相吻合，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正是“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的具体注释。巩珍的这一记述并不是无所凭据的，他与马欢、费信一样，曾于宣德六年（1431年）“叨从使节，涉历遐方”，随郑和第7次下西洋。有的学者认为成书迟于《瀛涯胜

①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后序》。

② 《瀛涯胜览校注·序》。

③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



览》十八年的《西洋番国志》，“多利用马欢之记录”<sup>①</sup>，然而，如果说“所纪各国之事迹，……悉凭通事转译而得”<sup>②</sup>的话，那么，对于“宝舟”的记述，正是巩珍所亲自目睹的事实。

马欢 3 次、费信 4 次、巩珍 1 次，分别跟随过郑和船队下西洋，3 人曾同时参加了第 7 次的航海活动。因此，无论是“宣德九年（1434 年），编次成集”的《西洋番国志》<sup>③</sup>，还是成书于正统六年（1436 年）的《星槎胜览》，与马欢的《瀛涯胜览》同处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总之，这 3 部著作，都是作者亲历见闻之记录，是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最可靠的原始史料。

在此之后，明人之著作记及郑和下西洋事者，有陆容的《菽园杂记》、祝允明的《前闻记》、归有光的《震川集》和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等。而其中提到宝船尺度的有《客座赘语》，作者顾起元明万历年间官至吏部左侍郎，原籍昆山，与费信是同乡。他在笔记中云：“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sup>④</sup>。《郑和家谱》亦有同样的记述<sup>⑤</sup>。明末还出现了一部以郑和出使西洋为体裁的讲史小说《西洋通俗演义》，（即《西洋记》）。内容演述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历史故事，生动而又具体。此书第十五回详细记述了下西洋船只的名称及其“制度”，揭载如下：

宝船 九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  
 马船 八桅，长三十丈、阔一十五丈；  
 粮船 七桅，长二十八丈、阔一十二丈；  
 座船 六桅，长二十四丈、阔九丈四尺；  
 战船 五桅，长一十八丈、阔六丈八尺；<sup>⑥</sup>

① ② ⑤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

③ 钱曾：《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条》。

④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 1《宝船厂》。

⑥ 罗懋登：《西洋通俗演义》第 15 回。

罗懋登著述的《西洋通俗演义》，成书于郑和下西洋结束后 1 个半多世纪的明末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此书虽属文学著作，但许多研究家普遍认为对考证郑和宝船尺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sup>①</sup>，亦如著名海外交通史学者冯承钧在校注几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西洋记》所采《瀛涯胜览》之文可资参考者不少，未可以其为小说而轻义也”<sup>②</sup>。

至清雍正间修定明代历史时，宝船的尺度被载入了“正史”。《明史·郑和传》云：

“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费金币，此次遍历诸番国。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sup>③</sup>

从上面例举的几部记及有关郑和宝船尺度的重要著作可以看出，所载事实是相一致的。虽经转抄征引，在文献中却没有发现任何把宝船的长宽尺度颠倒或搞错的现象，可谓一脉相承。后者诸笔记、小说、谱牒乃至官修正史，与前者当事人行纪所记基本无异，均明确指出宝船之最大尺度达“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仅《明史》“四十四丈”例外。差异不大，无关宏旨）。由此看来，无论是后者抄袭前者，还是后者可能在撰述中参阅了某些见于当时而不见于今的其他文献，然其结果则一样。这就更进一步说明马欢的记述是可信的。

郑和下西洋的全部档案，被当年的反对派兵部郎刘大夏付之一炬，而宝船的尺度却在上述著作中得以保留下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尤其是象出自马欢这样的第一手史料，记录者与目击物的

① 周世德：《中国沙船考》，《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962 年年会论文集》第 2 分册。

②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校注序》。

③ 《明史》卷 340《郑和传》。

关系是直接的,因此,在没有发掘出更有力的史料之前,马欢记述的宝船尺度不应轻易否定或者随便修改。

## 二

见如上述,史书记载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的尺度是可靠的。那么,就这一尺度,以今天的宏观究竟有多大?明代的度量衡与现在是有差别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斛斗秤尺制度,当时的1尺相当于今31.10厘米<sup>①</sup>。由是宝船的长与宽应分别为138米和56米。如此巨型的木帆船,是否有可能保证船体结构的强度?也就是说,从造船技术工艺上看,宝船造得这么大能行吗?回答是肯定的。我们不仅可以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依据,而且考古出土的实物更为此提供了佐证。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来的宋代海船,虽然在年代和船体规模上与宝船相距很远,但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及其内在联系<sup>②</sup>,使我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宝船的一个“缩影”。这就为论证上述问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古代船舶的建造是按照严格的尺度进行的。“船之制虽不同”,但“大小广狭皆有成式”<sup>③</sup>。宝船的长宽比值为2.45左右,这种船型的选择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木船不宜造得过于狭长,以避免海中风浪的冲击而产生断裂的危险。因此,大型木船一般长宽比值都比较小<sup>④</sup>。特别象宝船造得这样长,势必扩大船宽以保证纵向的强度。尽管宝船的长度是空前的,可是所采用的形制,在古代却很常

①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5章。

② 参见拙作:《郑和宝船建造地点的探索》(未刊稿)。

③ 《龙江船厂志》卷6,《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18册。

④ 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

见。宋代就有“船形制圆短”的内河船<sup>①</sup>，和“方正若一木斛”的航海大船<sup>②</sup>。泉州宋船的长宽比值为 2.5 左右，恰与宝船几相一致<sup>③</sup>，说明宝船的船体结构是相当合理的。

宝船体宽达 56 米，保证这样大幅度的横向强度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对泉州宋船的考察和结合明代文献资料来看，宝船也应是采取多舱和密舱制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泉州宋船以 12 道隔梁分隔成 13 舱，采用水密舱壁建造。隔板厚达 10 至 12 厘米，每道隔梁用 3、4 块木板榫接而成，并和肋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做法从功用到结构及装配形式，与近代铆接钢船上的水密舱壁及其周边角钢都非常相象，不仅是抗沉性的有力措施，而且在保证横向结构的强度和增强纵摇的承压力方面，均起了重大作用<sup>④</sup>。明代出使琉球时所造的“长一十五丈”的海舶，便“分为十二三舱”<sup>⑤</sup>，比泉州宋船长 5 丈而增加了 10 个舱位，即随着船体长度的加长而增设了 10 道隔梁和肋骨。由此可见，只要增加横向结构的设施，船体的横向强度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这就是：从船体强度理论研究，当船长于 90 米，船体所受纵向弯曲力距很大，木质船体的强度要求很难保证。在与现代钢船比较后推算出宝船“船底板和甲板板厚约为钢船的 20 倍，分别为 340 毫米和 380 毫米”，因而得出了“这是非常惊人和难以办到的”结论，认为建造“长四十四丈，

① 张舜民：《画墁集》卷 8。

② 朱熹：《漳州可谈》卷 2。

③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10 期。

④ 席龙飞、何国卫：《对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及其复原尺度的探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78 年第 2 期。

⑤ 陈侃：《使事记略》，《玄览堂丛书续集》第 16 册。

广一十八丈的宝船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其实,只要留心一下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就不会因为船体壳板达到上述的厚度而感到惊奇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就认识到木质船舶结构的这一特点,用加厚船壳板的办法来造大船了。不稍说象泉州古船那样,底板和舷侧板分别为2至3重木板构成,总厚度在18厘米以上,还可以从史籍中找到更有力的证明。

中世纪著名的游历家、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沿海曾看到“共有六厚板,叠积层累”的船舶<sup>②</sup>。采用“全木巨枋,挽叠而成”<sup>③</sup>造船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国内如此,在国外也不乏其有,如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七月,“红毛艘渡闽求市”,驾驶来航的船舶“长二十余丈,双底,木厚二尺,外沥青固之”<sup>④</sup>便是一例。对此,万历间举福建乡试第一不仕、家居讲学的晋江人李光缙,在他所著《景璧集》中也有更加详细的记载:“红毛之渡闽自此始,……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鑿金錫之”<sup>⑤</sup>。按明尺计算,2尺约合为今622毫米。由此可见,为了承受纵向总弯曲力矩,宝船的船底板和甲板板必须达到340毫米和380毫米的厚度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船板的厚度的确非常惊人,然而古代人民却办到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根据宝船的尺度所作的弯曲力矩估算是可信的话,那么,这一从船体强度理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非常重要,它告诉人们:用厚340毫米底板和380毫米的甲板板建造“长四十四丈、广一十八丈”的宝船,船体强度是有保证的。科学的论证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当文献记载又为此证明历史上曾经建造过这种

① 杨樵、杨宗英、黄根余:《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第3期。

② 《马可波罗游记》,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③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

④ 《物理小识》卷8。

⑤ 李光缙:《景璧集》卷9。

厚度的船舶时,就更是毋庸置疑的了。

如何把船板牢固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对于船体强度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象宝船这样的大船,木头的连接方法虽不见记载,但从泉州宋船所反映的事实,亦可推知其大概。宋船各部船板,除了用平接、搭接和榫接外,并用参钉、吊钉等各种不同形状和不同用处的铁钉加固。特别是在某些重要部位,还使用长50多厘米、宽5厘米的宽铁钩钉钩连,单第八舱的隔舱板与船底板的衔接处,就残留有14处遗迹。在“船身紧凑接缝之处,均施巨铁钉以固之”<sup>①</sup>的同时,于船板之间的缝隙中填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成的“凝结粘固之力,不亚于胶”<sup>②</sup>的捻合物。这些措施保证了船的坚固性和水密性,大大地加强了船体的强度<sup>③</sup>。泉州宋船发掘出来后,为了搬迁之便拆散船体时,参加工作的许多有经验的造船老师傅为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采用的先进造船工艺惊叹不已,他们认为,即使再大的船舶,以这种办法施工建造,也是没有问题的。宋代的这种先进造船工艺必然为明代所承袭并进一步发展。用榫接、铁片加固、捻合的办法,解决了多木头、长木头连接易松动、易漏水的缺点,使船体在承受交变弯曲中强度得到保证。可见只要船型设计合理,并不受到木构件尺寸大的影响。因此,宝船的建造,就工艺技术方面而言,也不是不可能办到的。我国古代的巧工哲匠在造船方固的许多发明和创造,不仅在当时用来建造大型海舶,即使在今天的船舶建造中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

事实证明,宝船长100多米,从强度分析是可能的。象这样大型的木帆船,无论是船型设计,还是建造工艺,虽然在许多方面与今人甚至现代造船工作者的认识相距很远,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

①② 《马可波罗游记》,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③ 参见拙作:《泉州出土海船结构的历史分析》。

的史实。

### 三

从造船史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宝船尺度存在的可能性作一考察,也是很有必要的。

每一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宝船的出现,是明代造船业继唐宋以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大家知道,公元七世纪以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和西域诸国政治关系的复杂化,曾经是连结东西方文明世界的交通大动脉——陆上“丝绸之路”,再也不是那样顺畅无阻了,取而代之的海上“丝瓷之路”愈臻重要,阿拉伯人的东渐,促使海外贸易更加活跃起来。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刺激下,我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在秦汉的基础上步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时期。

航海大船的出现,是唐代造船业发展到高度水平的标志。中外典籍对此多有记载,如九世纪中叶,曾到过中国、印度经商的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烈曼,在他的游记中就记述了唐船特别巨大,抗风力强,能够在风浪险恶的波斯湾畅行无阻,并因体积大,吃水深而不能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口的情形。在唐代被誉为中国四大港口之一的泉州,亦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西山杂志》记载有天宝中(742—756年)泉州所造海舶的尺度和式样:

舟之身長十八丈,次面寬四丈二尺許,高四丈五尺余;底寬二丈,作尖圓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銀鑲艙舷十五格,可貯貨品二至四萬担之多。<sup>①</sup>

降至宋代,我国从公元三世纪以后兴起的远洋航行,在这一时

<sup>①</sup> 《西山杂志·王尧造舟》。

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sup>①</sup>，造船业在繁荣的海外贸易的推进中，大大地向前发展起来。当时，“印度中国间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sup>②</sup>，“海船之往来波斯湾、中国海间者，华船为最大，多广州、泉州所造”<sup>③</sup>。宋代船舶种类之多、规模之大、性能之好、设备之完善，远远地超乎于前代。只要从宋廷每因遣使而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所顾募的客舟，便可见斑窥豹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云：

（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若夫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之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sup>④</sup>

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末 20 年的长期战乱和破坏，从开国至永乐初的 30 多年中，明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以发展生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出现了新的繁荣<sup>⑤</sup>。在各种生产获得发展的同时，造船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象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 年）“诏濒河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sup>⑥</sup>，明成祖永乐六年（1403 年）“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sup>⑦</sup>，这样大规模的造船屡见于文献记载。足见明代尤其是明初造船实力十分雄厚。郑和宝船则是在这时候建造的。

无须征引更多的史料，以长篇幅来论证入唐以降我国造船业的发达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上述几条史料是足够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了。我们之所以对宝船产生之前的唐宋造船业作一简略的回顾，

①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第 2 分册。

②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2 册。

③ 俞、考二氏：《马哥孛罗》2 卷。

④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34。

⑤ 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 年第 3 期。

⑥ 《明会要》卷 62。

⑦ 《明成祖实录》卷 29。



旨在明了它为明代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宝船的建造提供了优越的技术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前提,要建造 100 多米长的宝船的确是难以想像的。经过了从唐代的 18 丈海船,到宋代的 30 来丈神舟这样一个漫长的生产实践历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提高,木帆船建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而突破前代造船技术的水平,成功地建造了我国造船史上尺度最长的宝船。这就告诉了人们,宝船的产生是有其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当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宝船尺度的出现,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自然而又足信。

如果把宝船的尺度进一步推到世界造船史方面来看,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在整个中世纪,我国的造船技术在上世界上是居于先进地位的。从“公元十二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在太平洋上的航运事业逐渐让位给中国人”<sup>①</sup>,到十五世纪中叶随着郑和下西洋的息止,“对印度洋的统治权落入了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之手”<sup>②</sup>的数百年间,中华民族曾经在海上称雄于世界。尚若不是以国外所望尘莫及的造船技术为先决条件,那是绝不可能的。西方的造船和航运的许多原理,落后于中国几世纪甚至 10 个世纪以上,如中国船尾的方向舵和水密舱壁的创造,就早于西方 400 多年<sup>③</sup>。正如恩格斯在论述欧洲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时曾指出的:“在整个中世纪内,使用的船只都不大”<sup>④</sup>。1492 年哥伦布远航时的旗舰,乃至世界大型钢铁船出现之前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木帆战船,怎能与郑和宝船比拟。因此,决不能由于外国在古代木帆船长度不超过 100 米来否定宝船的尺度,而宝船的尺度正是我国造船业在整个中世纪遥遥领

① ②③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

先于世界的表征。

论及这里,不能不提到社会调查与考证宝船尺度的关系。有的人到曾制造过航海木帆船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由于那些船厂的老工人所见所闻的大型木帆船很少有船长超过60米的,因此得到一致的结论:“《明史》上记载的宝船尺度是不可信的”<sup>①</sup>。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告诉我们,在研讨某一历史问题中,社会调查是重要的,它可以弥补文献之不足,而获得珍贵的材料。但必须指出,研究对象的年代,决定着现实社会调查的作用和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宝船产生的年代离今天并不算遥远,然而它毕竟已是近6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今天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是不能代替数百年前的客观事实的。

研究家之所以把明代的造船业视为我国造船发展史上继秦汉、唐宋以降的又一个高峰,正意味着从此之后木帆船的建造及其以季风为推动力的运洋航行,开始步入了日趋衰落的时期。而大型钢船的出现和代兴,决定了木帆船一蹶不振的命运。近百年来木帆船的制造怎能与宝船时代同日而语。不用说曾经制造过航海木帆船的地方的船厂老工人未所闻见超过60米的木帆船,即使是30米以上的也为数不多吧。就是这些闻见过的所谓航海木帆船,也只不过是局踣于沿海活动而已。由于现实生活所需要的以及对于造船史的缺乏了解,而所见所闻的木帆船不过60米,这是不足为怪的。当人们大为惊叹“苏哈尔”号从阿拉伯湾启航,沿着海上“丝瓷之路”,经过8个来月的航行,抵达广州港时,却很少人会想到这当代的“辛伯达远航”在中世纪是极其平常而又普遍的事<sup>②</sup>。

人们往往只用直观的眼光对历史问题作简单的推测,这种推

<sup>①</sup> 《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第3期。

<sup>②</sup> 参见房仲甫:《天方古舟喜重来》,《人民日报》1981年6月22日。

测及其所得的结论显然是不带研究性质的。因此,以今天的社会调查来否定宝船的尺度是没有说服力的,而只有充分的占有史料,才能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

#### 四

正如研究其他历史问题一样,考证宝船的尺度主要是依靠史料而进行的。在文博考古发现还不能提供资料之前,尤其是这样。虽然直接记述宝船尺度的文献资料很少,但是,类似这种大型海船的具体描述在许多古籍中却不难见到。不仿列举几例:

南宋曾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在其所著《岭外代答》中云: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则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sup>①</sup>

中世纪的四大著名旅行家之一、曾在元廷服务了17年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云:

中国商人乘载往还印度群岛之船,……每一大船,需二、三百水手以驾驶之,此盖巨者,能容五、六千筐胡椒。<sup>②</sup>

继马氏之后半个世纪来到中国的另一著名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在遍游亚、非各地后记述说:

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浆之大,约等于橈,以十五人摇

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② 《马可波罗游记》,引自《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之，大者尚须加至三十人也。一般共浆二十，摇者两旁对峙。<sup>①</sup>

明代弘治间(1488—1505年)曾“督粮广西”、官终兵部右待郎的黄衷，就舟师海贾所经历，询悉南海山川风土，衷录成编的《海语》一书，有《畏途篇》记载：

成化二十一年丁巳(1485年)，宪朝遣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备封册之礼，如此占城。官治大舶一艘。……军民之在行者千人，……误触铁板沙，舶坏，二使溺焉。<sup>②</sup>

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言：

舶三等，……大者上下八层，桅长十四丈，有舶师、历师、将卒、客商千人。<sup>③</sup>

相继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卷五中，对海舶作了更详细的记录：

海舶百种不止，约有三等。……其大者上下八层，最下一层，镇以沙石千余石，……二三层载货与食用之物。海中最艰得水，须装淡水千余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称是。……桅之大者长十四丈，帆阔八丈。水手二三百人，将卒、铕士三四百人，客商数百。<sup>④</sup>

清初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康熙七年(1668年)管理钦天监监务，著有《坤舆图说》，此书卷下亦有海舶一章，所记与《职方外纪》略同，并补充说：

① 《伊本巴都他游记》，引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

② 黄衷：《海语》卷3。

③ 《物理小识》卷8。

④ 引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

若多船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船后尾楼,夜点灯笼照视,灯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凑成,行海昼夜无停。<sup>①</sup>

这几条史料,与巩珍《西洋番国志》述及宝船一样,没有记载船舶的长宽尺度,而所描述的是与船舶的尺度有关的许多具体情况。从这些既多且详的记述中,可见船体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这对于考证宝船尺度,无异将起到“触类旁通”的重要作用。当把上述史料与马、费、巩著作的有关记载作比较,并且与郑和在《天妃灵应之记》碑中所描绘的一些情形联系起来看,就使我们在考证宝船尺度时的视野广阔得多了。当然,不能否认在浩瀚的史料中有或出于古人夸张之笔而失实,或经辗转抄袭而舛讹之现象,不过,应该肯定更大量的史料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就拿以上列举的几条史料来说吧,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不同书籍的不同记载,却反映着一个同样的史实,难道能否定这样大型海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吗?作者的特殊身份及其著作在学术上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使这些史料征引来论证宝船尺度的存在,显然是个很好的借鉴。

必须指出,征引史料考证宝船尺度,不仅应作认真的分析鉴别,而具有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很重要的。否则,就往往会忽视一些史料的珍贵价值,甚至在引证中得出错误的结论。有的人在经过一番论证之后,指出郑和宝船的尺度应是“长18丈,宽4.4丈”,并认为这是“古代世界上最大的船”<sup>②</sup>。大家知道,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出现30丈以上的大型海船了,这是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明确记载的。论者曾征引过这条史料,认为所记“较切合实际情况”而以此为“借鉴”<sup>③</sup>。可惜的是,在引述“(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的同时,却忽视了紧接之后的“若

① 引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

②③ 《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第3期。

夫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之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之句。论者的这一疏忽,使自己颇费苦心进行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化为无据之谈。无须再列举前面述及的象“红毛艘”这样 20 余丈的船舶,来说明“长 18 丈,宽 4.4 丈”并不是古代世界上最大的船,而否定这一结论的,恰恰是论者自己曾引为“借鉴”而又忽视了的同一条史料。

关于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在征引史料论证宝船尺度时注意的。

## 五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①</sup>伟大导师列宁的这一教导,对于探索宝船尺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就是说,对于宝船尺度研究中的问题,务必提到明帝国“进入了全盛时期”<sup>②</sup>这一历史范围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郑和下西洋是否需要造那么大的船,这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之一。有的人是这样认为的:郑和统领将士卒共 27800 余人,62 艘大船,每船平均 450 人左右,长五、六十米载重几百吨的船已够大了,宝船的尺度应为“长 18 丈,宽 4.4 丈”<sup>③</sup>。对于论者提出的这一看法,且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其一,是装载官军及应用物资的需要。对一艘“往还三年”<sup>④</sup>远洋航行的宝船来说,具备充裕的船上人员的日常生活应用物资是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② 翦伯赞等:《中国历史概要·古代的中国》。

③ 《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第 3 期。

④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

非常必要的。它包括官军“一应正钱粮”；“随舡合用军火器、纸札、油烛、柴炭”；“内官合用盐、酱、茶、酒、烛等件”<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淡水，“凡舟船将过洋，必设水柜，广蓄甘泉，以备食饮。盖洋中不甚忧风，而以水之有无为生死耳”<sup>②</sup>。一艘出使琉球的15丈船舶必备“水四十柜”<sup>③</sup>或“有水井二口”<sup>④</sup>，并且还考虑到“多备以防久泊”<sup>⑤</sup>。出使琉球可谓近在咫尺况且如此，而“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sup>⑥</sup>，更以“水船载运，积贮仓楮，以备用度，斯乃至急之分，不可暂弛”了<sup>⑦</sup>。可想像其淡水之蓄积量该有多大。这些按“年例”，“照人数依例关支”<sup>⑧</sup>的应用物资，加以所需之淡水，就算是每船450人吧，将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其二，是装载赏赐品和贸易物货的需要。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出于为了进一步在国内强化统治、国外扩大声威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以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追求奢侈品满足腐朽生活为真正目的的。因此可以说发展海外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主要任务<sup>⑨</sup>。这是不难从马、费、巩之著作中得到证明的。《瀛涯胜览》祖法儿国条说：

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

① ③⑧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敕书》。

②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

③ ⑤ 陈侃：《使事记略》。

④ 张学礼：《使琉球记》。

⑦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

⑨ 陈公元：《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海交史研究》第3期。

纹丝、磁器等物。<sup>①</sup>

《星槎胜览》一书,也记载了“使船”与所至诸国开展贸易活动的情况。《西洋番国志》也记述了柯枝国的当地商人“专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以待中国宝船”,交换瓷器、丝绸等。中国宝船亦往溜山国“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sup>②</sup>。可见郑和不仅是“使者”,更主要的是作为“贸易者”而下西洋的。这样一来,宝船上装载的就不只限于上述之日常生活应用物货,而更大量的是用与海外各国交易珍珠香药的“陶瓷、丝绣、币帛”<sup>③</sup>等商品,还有用来“赏赐番王头目人等綵币等物”,和他国“进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纹丝等件”,以及“下西洋官员买到磁器铁锅人情物件”<sup>④</sup>,亦为数不少。再看看巩珍述及宝船满载而归时的情形,那就更说明问题了。记云:

……分艖次前后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厮等各国事毕回时,……将各国诸色钱量通行打点,装封仓艖,停候五月中风信已归,结艖而还。<sup>⑤</sup>

其二,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需要<sup>⑥</sup>。统治者的意旨和需求,往往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奇迹的前提,宝船的出现就是这样。在国力强盛的永乐年间,大明以来政府对海外贸易的严加限制开始有所宽弛。明成祖朱棣为了提高他在国外的威望,扩大他的政治影响,给官方的对外贸易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便是采取“开读赏赐”的形式,以“昭示恩威”,而达到“其王亦采方物赴中

①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

②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

③ 《西山杂志·三宝下西洋》。

④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敕书》。

⑤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满刺加国》。

⑥ 《明史》卷340《郑和传》。



国进贡”<sup>①</sup>的目的。在遣使海外诸国中,最受明成祖信任的郑和下西洋次数最多。为了使郑和的航海活动成为“腾今迈古”之“鸿规”、“盛典”<sup>②</sup>,最直接而又最可表现的,当然是建造大型海舶和组织大规模的船队了。这种耀武扬威于“四海”,显示富强于“万方”的需要,正是建造“盖古所未有”<sup>③</sup>之大型宝船的重要原因。历史上统治者出于某种需要而建造超乎于同时期的特大巨舶也是有的。船舶是一国文化的表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郑和下西洋的“巨无与敌”的宝船和庞大船队,“威武雄壮、声势浩大”,遂使“东西诸番震惧”,而“人贡者屡多”<sup>④</sup>。

综合地分析一些史料,就不会只看到仅仅是为了运载人而不需要造得太大这样一个直观的现象。以上三个方面的事实说明,不单是远洋航行的需要,特别是明王朝政治上“耀兵”、经济上“示富”的需要,促使郑和下西洋建造起这么大的船舶来。

## 六

了解一下古人对船舶尺度及其容量的认识,对于比较准确地把握郑和宝船尺度及估算其容量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尽管笔者在这方面接触的史料不多,研究得很不够,然而,于此论及,旨在给人们在这方面的探讨能有所启发。

历史文献记录船舶的尺度,主要是以长、宽几丈几尺几寸来表示的。这种计算尺度的方法所见有两种:一是虚算法;一是实算法。

①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旧港国》。

②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

③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序》。

④ 《西山杂志·三宝下西洋》。

所谓虚算法,如:

船面自头至梢柒丈玖尺叁寸。<sup>①</sup>

头、尾通长八丈三尺。<sup>②</sup>

这种方法一般比较常见,而多为直接记录:舟长××阔××。

所谓实算法,据《万历温州府志》记载:

其量船之法,但从中,身长则前至舵门下,后至舵楼。梁内阔则上丈走风梁上面,两傍除去栏河,方为实数。<sup>③</sup>

以这种实数表示船的尺度比较少,也可能是见于史籍而我们没能鉴别出来,而以虚算法视之。但有的则作了明确的记述,清初李鼎元记出使琉球的10丈船舶云:

舟长七丈,首尾虚梢三丈,深一丈三尺,宽二丈二尺,较历来封舟几小一半。<sup>④</sup>

以上两种计算方法表明,船舶的虚与实尺度相差是很大的。船首尾两端向外伸展是我国航海木帆船的一大特点,比西欧帆船大得多,这对于减少纵摇有利<sup>⑤</sup>。因此“尾营”和艏柱的倾斜度一般都很大。由于这个特点,使船舶的前后虚梢长度增加了。前引1艘10丈长的船舶,如按实数计之只有7丈,而头尾的虚梢部分却有3丈,几乎占全长的三分之一。这与明代造船的统一规格是基本一致的。据《明会典》和陈侃《使事记略》载:

底长六丈,头长一丈一尺;梢长一丈一尺;底阔一丈一尺,底梢宽六尺,底头宽七尺五寸。<sup>⑥</sup>

① 《龙江船厂志》卷3。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50。

③ 引自〔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2章,风间书房,昭和五四年版。

④ 李鼎元:《使琉球记》。

⑤ 杨德:《对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的几点看法》,《海交史研究》第4期。

⑥ 引自杨燊:《中国古代的船舶》,《大连海运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

按照上述出艄占船体通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的比例计算,郑和宝船长44丈4尺,除去头尾虚艄,自艤门下至舵楼的实际长度应是32丈左右,依明尺换算当今约100米。这一尺度比有些人以现代船舶的计算法式进行估算的宝船水线长124米还要短得多,而宝船的宽度当不例外。这就是我们所应看到的宝船尺度实数,尝若有朝一日要复原宝船,这也是值得参考的。

古代计算船舶的容量也与今天不同。古人对于船舶的载重概念,是以船舶满载时的搭载能力与区别于空船的实际容量来计算的,一般把它称为“力胜”。《宋会要辑稿》云:

自今装载扬,……漕水军等处税仓和余斛斗,并依装转般仓斛斗空、重力胜例,并以船力胜五十石为准,实装细色斛斗四十石,与破牵驾兵士一名,其空船亦依差装转般仓例。<sup>①</sup>

元代出海商船公凭上必须开具的项目中,就列有“船只力胜若干”<sup>②</sup>,指的便是这个意思。船“力胜”亦与船身长、船面阔一样被用来表示船的规模并代称,面计量多用“斛”、“石”、“料”为单位。如“万斛船”<sup>③</sup>、“万石船”<sup>④</sup>、“三百料船”<sup>⑤</sup>,或记为“每船载一千石”<sup>⑥</sup>、“可载二千斛”<sup>⑦</sup>、“约可载二千料”<sup>⑧</sup>,等等。它们都是指能够搭载货物或者旅客的纯船内容量,而不是指船体及其甲板建筑物的总容量。可见古代以“力胜”表示船舶载重与今用排水量来表示船舶载重;古代称“万斛船”与今称“××吨船”,两者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①⑧ 《宋会要辑稿·食货》50。

② 《通制条格》卷18。

③ 陶宗仪:《说郛》卷37。

④ 张舜民:《画墁集》卷8。

⑤ 沙克什:《河防通义》卷下,引自〔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5。

⑦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

具有很大的“量”的差别。

然而,要了解古代人们怎样计算船舶容量,及其与尺度的关系如何是很不容易的事。大概由于古代船舶类型之繁多,也由于古人对于船舶记述的复杂化,使今天的研究者很难从中理出一个普遍可循的估算法式来。就以学术界最关注的“料船”为例。1艘“三百料船”的容量是这样计算的:

若用三百料船,可载一百五十块,棹梢水手一十八人。船四十五尺,除前后水仓占一丈五尺外,有三丈,每尺为一十料,每一料容重六十斤。<sup>(1)</sup>

但是,这种非常明了的计算方法,并不能通用于其他“料船”。从与尺度的关系上看,不仅长度非以料数逐次减递,而且在每1料之容量方面也相差悬殊。参见下表:

料	名 称	长度	年代	备 注
2000	客 舟	10 余丈	宋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1000	海 船	10 丈	宋	《宋会要辑稿》
1000	湖 船	20 丈	宋	《梦梁录》
800	湖 底 船	8.3 丈	宋	《宋会要辑稿》
500	湖 船	10 余丈	宋	《梦梁录》
400	八 槽 船	8 丈	宋	《宋会要辑稿》
400	铁壁犂嘴船	9.2 丈	宋	"
400	战 座 船	8.95 丈	明	《龙江船厂志》
400	巡 座 船	8.8 丈	明	"
300	运 石 船	4.5 丈	宋	《河防通义》
200	一 颗 印 巡 船	5.87 丈	明	《龙江船厂志》
200	巡 沙 船	6.1 丈	明	"

(1) 沙克什,《河防通义》卷下,引自[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

《宋会要辑稿》云：

以五百料船为率，依条八分装，发留二分揽载私物，如愿将二分力胜加料装粮，听。八分正装计四百硕（石），

每四十硕破一夫钱米；二分加料计一百硕，旧法第二十硕破一夫。<sup>①</sup>

这里的每 1 料容量等于 1 石，而前引每 1 料容量为 60 斤。如按沈括《梦溪笔谈》所云“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sup>②</sup>的话，那么同为 1 料，两者便差重 30.5 斤。因此，即使标明“××料船”，也不能以“××石”为其容量来划等号。顺便一提，目前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料、斛、石实际上是一回事”<sup>③</sup>，应该予以纠正，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仅举下例足以说明，古代计算船舶容量及其与尺度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用现代船舶之“营造法式”所能进行模拟研究的。这一点在以宝船长和宽推测深度，并估算其容量时切不可忽视。为了便于说明，先把见于文献记载较为完整的 7 种海船列如下表：

船种	长	宽	深	舱	桅	力胜	年代	备注
海舟	18丈	4.2丈	(高)4.5丈	15	10丈有奇	二至四万担	唐天宝间 (743—756)	《西山杂志》
使高丽客舟	10余丈	2.5丈	3丈		10丈	二千斛	北宋宣和间 (1119—1125)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海鹞船	10丈	1.8丈	0.85丈	11		一千料	南宋嘉泰三年 (1203)	《宋会要辑稿》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 43。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 3。

③ 王曾瑜：《谈宋代的造船业》，《文物》1975 年第 10 期。

泉州宋船	11.4丈	3.3丈	1.1丈	13	9.4丈	200吨以上(排水量374.4吨)	南宋末年	《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初探》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
使琉球船	15丈	2.6丈	1.3丈	23	7.2丈		明嘉靖十三年(1534)	陈侃《使事纪略》
·	18丈	2.2丈	(高)2.3丈		18丈		清初	张学礼《使琉球记》
·	10丈(前尾置舱三丈)	2.2丈	1.3丈	24	10丈有奇	十一万斤有奇	清初	李鼎元《使琉球记》

通过上表的比较所示,有这么两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船舶长、宽与深的关系。如前所述,古代船舶的建造“皆有定式”,但是,由于类型繁多,使我们很难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长、宽与深的比例应成正比,而在表中所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举长15丈的明使琉球船与长10余丈的宋使高丽客舟为例,照理说,前者的长比后者增加近5丈,深度也应来得大才对,然而适得其反,只过它的五分之二。此外,还可以明末的使琉球船与清初的使琉球船作一比较(见表),两艘深度同为1丈3尺的船舶,其长度之差竟有5丈之多。看来,船深并非长、宽所能决定,至少可不是普遍所能决定的。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推算宝船船深之难而必持之以慎。

不过,由宝船与客舟均造于福建<sup>①</sup>,而长宽比值又相接近推之,其船深肯定要比有的人用现代沙船尺度比推算的“H=10.54公尺”<sup>②</sup>要深得多。文献所记宝船“船大,难进浏河”<sup>③</sup>及“宝舡”所至“西洋”诸国“皆于海中驻泊”<sup>④</sup>,或“大舡难进”<sup>⑤</sup>或“易小舡入

① 参见拙作:《郑和宝船建造地点的探索》(未刊稿)。

② 《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第3期。

③ 《康熙崇明县志》,引自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

④ ⑤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爪哇国》。

港”，与此不无关系吧<sup>①</sup>。

第二，船舶长、宽、深与容量的关系。见于史料记载得知1艘古代船舶的长与宽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准确地推知其船深，这是前面述及的结论。接着要谈的是，即使知道了船舶长、宽、深尺度之后，也并不等于就能够准确地估算其容量（排水量亦称是）。这一似乎是违背了最基本的船舶研究常识的见解，不是没有依据的。如果说在前面列举“料船”说明古人计算容量及其与尺度的关系是相当复杂时，我们已经对此不无觉察，那么，在这里则是从今人与古人对于船舶的认识差距太大，即现代的船舶理论研究与古代客观史实相适应中见到的。

请看表中泉州宋船栏，这是根据出土实物残体研究复原的尺度，以及由此计算出来的容量。再看客舟栏，这是北宋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后人留下的史实记载。当我们把二者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问题在那里了。就二者的尺度而言，客舟长10余丈当与宋船11.4丈应相差无几；宋船宽3.3丈比客舟2.5丈略多些；宋船深1.1丈则远不及客舟之3丈。据此可以推知在容量方面客舟应比泉州宋船略胜一畴。但是，泉州宋船为200吨以上，客舟反而只有2000斛合今约110吨<sup>②</sup>，真难以置信今人以现代船舶理论研究的结果与古人的记述差距如此之大，近在1倍左右。如果徐兢没有明确记述客舟“可载二千斛粟”，而让今人为它估算容量的话，显然是要强加到“200吨以上”的。反之，如果在宋人的眼里，这艘“200吨以上”容量的泉州船一定只不过是“可载二千斛粟”而已。

同样的道理，有的人所作的宝船排水量估算在“30724吨”，或

<sup>①</sup>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旧港国》。

<sup>②</sup>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3“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又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宋市斤相当于今1.936市斤”而计算的。

者“29512—35415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种明显过于夸大史实的庞大吨位，不免给人一种错觉，并由此产生种种疑惑而来否定宝船的尺度，这是不应该有的事。宝船尺度研究中所出现的这些现象，使我们一再强调必须充分地发掘史料，并通过它来论证宝船尺度的问题，这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当然，我们决不忽视以现代船舶理论研究宝船尺度所得的结果的重要参考价值。

如题所示，本文仅仅是对郑和宝船尺度的一点探索而已，与其说是在论证问题，倒不如说是提出问题更来得恰切些。对于宝船尺度的研究，史学工作者之所短，正是科技史专家们之所长。本文在这方面的不足，笔者一定会闻见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从中得到不少教益。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 明初三十六姓迁居琉球中的蔡襄后裔

明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命行人杨载使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之入朝贡方物。至此,“自古不通中国”的琉球,与明廷建立了密切的朝贡关系<sup>①</sup>。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太祖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36户(姓),以便贡使往来<sup>②</sup>,中山王大喜,即令36姓择居于唐荣(俗称久米村)<sup>③</sup>。终明之世乃至清代,这批迁居琉球的闽籍人及其后代,在加强中琉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拟根据琉球久米村系家谱资料<sup>④</sup>,论证36姓之一的蔡襄后裔定居久米村“数传蕃衍”和族人为中琉关系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蔡氏来华病故安葬于闽的情况;同时,对其“世系源流”问题略加考析,从而揭示一项中琉友好关系中的史实,提供大家研究参考。

---

① 《明史》卷323《外国四·琉球》。

② 此据同上注所载。36户亦作36姓,参见《明会要》卷77《外蕃·琉球》。赐姓琉球的时间,久米村系家谱资料记为洪武二十五年。

③ 《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第6分册《家谱资料二(上)》。

④ 据《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第6分册《久米村系家谱总目录》载蔡崇家族修有大小宗谱11部,本文之论述,仅依据《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第6分册《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所收录的其中之5部。

## 一

日本国那霸市史編集委员会編集、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出版的《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第六分册《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收录有蔡氏家谱5部。1部大宗《蔡氏家谱》，3部小宗《蔡氏家谱》，1部小宗《蔡氏家谱抄》。据谱中之《修家谱序》和《蔡氏本源总考》等云：元祖讳崇，号升亭，行2，年27，丰臆、额广、风雅，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乃宋朝鼎甲端明殿大学士忠惠公讳襄字君谟六世孙，以太祖赐姓36居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授御奉敕始迁中山，择居于唐荣，中山之有蔡氏于是乎始矣。

蔡氏迁居琉球之后支分派衍，五部家谱对此载之甚详，兹依次述之于后。

第一部《蔡氏家谱》(一世蔡崇)，创修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当时，中山王尚贞“念效命诸臣勤劳可嘉，恐岁月已深，致灭其功，爰命群臣各修祖谱，永垂为例”，于是蔡氏十世蔡彬奉命纂修家谱，以“使祖宗世系序昭穆辨功德著也”。但由于“犹属草创而未及悉详”，因此，十一世蔡炳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继志述事，姑就其故牒而重修之”<sup>①</sup>。这部大宗家谱以“讳崇为元祖”。其世系列如下表：

崇(一世)——濠(二世)——璟(三世)——宝(四世)——  
 迁(五世)——瀚(六世)——朝器(七世)——烜(八世)——坚  
 (九世)——彬(十世)——炳(十一世)——瑛(十二世)——烜  
 (十三世)——懿(十四世)——禧(十五世)——修(十六  
 世)——吉(十七世)——选(十八世)——元(十九世)

<sup>①</sup> 第一部《蔡氏家谱·修家谱序》。

第二部《蔡氏家谱》(七世蔡朝用),系于“雍正七年己酉(1729年),命谱司考正群臣谱牒”之际,由十一世蔡文溥“就故牒而重修,考究加详”以成之。此部家谱前一部分破损,然仍留有九世蔡国器于康熙二十九年(1692年)“谨识”的似乎是原谱序之后半,其云:“考其世系,历为九代而支分派多,合族之事不能胜载于大宗之谱矣,故予以始祖升亭公六世孙讳瀚第3男讳朝用者为小宗而另修谱牒。”其世系列如下表:

朝用(七世) — 廷(八世) — 国器(九世) — 应瑞(十世) — 文溥(十一世) — 其栋(十二世) — 功熙(十三世) — 德迪(十四世、功熙第三男) — 献达(十五世) — 天桂(十六世) — 大栋(十七世)

第三部《蔡氏家谱》(十一世蔡文河),这部小宗家谱不录修撰者和时间,起始于十世蔡应瑞之第4子蔡文河。其世系列如下表:

文河(十一世) — 光祖(十二世) — 任贵(十三世、光祖第一男)辅国(十四世) — 灵通(十五世) — 丕烈(十六世)

第四部《小宗蔡氏家谱》(十一世蔡耀),由十四世蔡肇业修撰,完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序》云:“我曾祖讳耀号照亭公,十世大宗讳彬号适庵公之第3子、十一世大宗讳炳之第3弟也。炳为继别之大宗,照亭公为继祧之小宗,此定制不可易也。故于嘉庆十六年辛未仲春,请以上世大宗适庵公之庶子皆分而设谱。我曾祖照亭公分为小宗,首系于谱,为我小宗祖也。”其世系列如下表:

耀(十一世) — 塘(十二世) — 国铎(十三世) — 肇业(十四世) — 邦辅(十五世) — 呈书(十六世) — 丕显(十七世) — 元铭(十八世)

第五部《蔡氏家谱抄》(十一世蔡温),出自十一世蔡温之笔,撰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蔡氏家谱抄》有与以上之第一、二、四部家谱一样的《序》、《蔡氏世系图》,以及与上述家谱内容基本一致的

《蔡氏祖源宗德总考》。但仅记录蔡温 1 人事迹，而其传人均无列传。蔡温系小宗，其祖源据《蔡氏祖源宗德总考》云：“洪武年间，升亭公奉敕到琉球受使，故我家谱纪以升亭公为一世，……六世讳瀚，瀚生七世讳朝器，朝器第三之弟讳朝辅，乃吾小宗也。……朝辅生八世讳奎，奎生九世讳锦，锦生十世讳铎，铎乃温之严父也。”家谱抄起始于十世铎之次子蔡温。其世系列如下表：

温(十一世)    翼(十二世)    寅(十三世)——佑(十四世) 楨(十五世)    慎(十六世)

仅据上述 5 部家谱统计，蔡氏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迁居琉球，至清咸丰间(1851-1861 年)的 4 个半多世纪中，“浸昌浸炽，扶瓜瓞之绵绵，愈久愈隆，歌螽斯之蛰蛰”<sup>①</sup>，所传 19 世，计 500 来人，真可谓“数传蕃衍，而蔡氏满于东土”<sup>②</sup>。

## 二

从家谱的记载可以看出，蔡氏家族在赐予 36 姓之中是居于显赫地位的，人才辈出，正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随“册封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使琉球的“随封”蔡宪文(福州南台人)向紫金大夫蔡文溥“赠言”所云：“洪武间备三十六姓之列来教是邦，历□□□余载，惟吾宗最推重望，似此英才接踵，贤哲挺生。”<sup>③</sup> 其族人或为官生，或擢通事，或进都通事，或授长史，或奉敕拜升大夫，享有“官爵”者计 137 人。他们当中有象九世蔡坚、蔡国器，十一世蔡文溥、蔡文河，十二世蔡培，十四世蔡肇业那样领銜“紫金大夫”

① 第四部《小宗蔡氏家谱·序》

② 第一部《蔡氏家谱·修家谱序》。

③ 第二部《蔡氏家谱·蔡氏家谱总考·蔡氏世系流源》。

者；又有如十一世蔡温，授法司官品衔，加升“紫地五色花织冠”者。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蔡氏家族都备受“宠荣”。

“蔡氏藩衍，事业尤盛”，自明至清，其家族不仅在“敷文教于中山”方面，为发展琉球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掌中国往来贡典”方面，更为中琉两国的友好往来立下了汗马之劳。兹将蔡氏族入奉使来华者的世系、姓名、年龄、官爵、勋庸列表如下：

世系	姓名	年龄	官爵	庸 勋
二世	濂	1399- 1463	通事	宣德九年三月十三日与陈康共奉使为谢恩通事赴闽上京 正统四年月初九日奉使为庆贺通事随长史梁求保赴中华
	濂	1401- 1433	通事	正统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通事随长史梁求保赴闽
三世	璟	1426- 1486	长史	天顺八年八月初九日奉使为庆贺长史随王弟尚武赴闽上京 成化四年八月十五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通事林茂等赴闽上京 成化六年九月初七日奉使为谢恩长史同通事梁应等赴闽上京 成化九年九月初三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通事魏鉴等赴闽上京
	璋	1445- 1504	长史	成化六年九月初七日奉使为谢恩存留在船通事随长史蔡璟赴闽 成化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奉使为谢恩存留在船通事随王舅武实正议大夫程鹏赴闽 成化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奉使为谢恩存留在船通事随长史李荣赴闽 成化十九年八月初六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正议大夫程鹏赴闽上京

	璩	?	都通事	<p>成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p> <p>成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使为谢恩存留在船通事随王舅马审礼长史郑玖赴闽</p> <p>弘治二年九月十二日奉使为庆贺皇上嗣登宝位都通事随王舅麻勃都正议大夫梁德赴闽上京</p> <p>弘治六年八月二十日奉使为进贡庆贺存留在船都通事随正议大夫梁德赴闽</p> <p>正德三年九月十八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赴闽上京</p>
	齐	?	都通事	<p>天顺七年八月初四日奉使为谢恩都通事随王舅王察都长史梁宾入闽上京</p> <p>成化五年八月十五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上京</p> <p>成化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奉使为谢恩都通事随王舅武实长史李荣赴闽上京</p> <p>成化十年九月初三日奉使为谢恩都通事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上京</p>
	曦	?	长史	<p>天顺八年八月初九日奉使为庆贺通事随王弟尚武赴闽上京</p> <p>成化二年十月十二日与林共奉使为进贡通事赴闽</p> <p>成化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奉使为庆贺太子都通事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上京</p> <p>成化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奉使为谢恩长史随王舅马怡世正议大夫程鹏赴闽上京</p> <p>成化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正议大夫梁应赴闽上京</p> <p>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正议大夫程鹏赴闽上京</p>
四世	明	?	都通事	<p>成化八年八月十六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通事随正议大夫郑玖赴闽</p> <p>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奉使为官生谢恩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p> <p>弘治二年九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长史梁能赴闽</p>

			<p>弘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梁德赴闽上京</p> <p>弘治八年八月十六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都通事随正议大夫郑玖赴闽上京</p> <p>弘治十年七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程琏赴闽上京</p>
宝	?	都通事	<p>成化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使为请封通事随长史梁应赴闽上京</p> <p>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奉使为官生谢恩通事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上京</p> <p>弘治二年九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通事随长史梁能赴闽上京</p> <p>弘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梁德赴闽上京</p> <p>弘治八年八月十六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都通事随正议大夫郑玖赴闽上京</p> <p>弘治十年七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程琏赴闽上京</p> <p>弘治十四年八月初九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程琏赴闽上京</p>
实	?	都事通	<p>成化十九年八月初六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p> <p>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p> <p>弘治二年九月十二日奉使为进香通事赴闽上京</p> <p>弘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梁德赴闽上京</p> <p>弘治六年八月二十日奉使为庆贺都通事赴闽上京</p>
宾	?	长史	<p>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为官生谢恩事奉旨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上京</p> <p>弘治二年九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长史梁能赴闽上京</p>

				<p>弘治六年八月二十日奉使为庆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梁德赴闽上京</p> <p>弘治八年八月十六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长史同正议大夫郑玖赴闽上京</p> <p>弘治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正议大夫郑玖赴闽上京</p> <p>弘治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正议大夫郑玖赴闽上京</p> <p>正德元年九月初二日奉使为进贡庆贺长史随王舅亚嘉尼施赴闽上京</p>
五世	权	?	火长	<p>弘治十年七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火长随正议大夫程璉赴闽</p> <p>弘治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使为进贡火长随正议大夫郑玖赴闽</p>
	柏	?	长史	<p>弘治十年七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程璉赴闽</p> <p>弘治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郑玖赴闽</p> <p>正德二年八月十九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长史同正议大夫程璉赴闽上京</p>
	模	1474-1513	通事	<p>弘治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郑玖赴闽</p> <p>弘治十四年八月初九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程璉赴闽</p> <p>弘治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程璉赴闽</p>
	迁	?	长史	<p>正德三年八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正议大夫梁能赴闽上京</p> <p>正德五年八月十九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正议大夫梁能赴闽上京</p> <p>正德七年八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都通事金良等赴闽上京</p>



六世	进	?	通事	正德九年八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署大夫事长史陈义赴闽上京 正德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长史同正议大夫陈义等赴闽上京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通事程禄等赴闽上京
	邃	?	通事	正德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通事随正议大夫陈义赴闽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长史蔡迂赴闽 嘉靖二年八月十七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通事随正议大夫郑绳赴闽上京
	澄	?	通事	嘉靖四年八月十五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长史金良赴闽
	瀚	1502— 1566	正议大夫	嘉靖四年八月十五日奉使为进贡通事随长史金良赴闽上京 嘉靖八年八月十五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都通事梁椿等赴闽上京 嘉靖十年八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长史同正议大夫金良赴闽上京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奉使为谢恩长史随王舅毛实赴闽上京 嘉靖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为进贡庆贺太子正位等事奉使为正议大夫同王舅殷达鲁赴闽上京
	廷美	?	正议大夫	嘉靖十年八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都通事随正议大夫金良赴闽上京 嘉靖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奉使为进贡庆贺长史同正议大夫陈赋等赴闽上京 嘉靖二十年九月初七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通事郑元等赴闽上京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正议大夫梁显等赴闽上京

	廷会	?	正议大夫	<p>嘉靖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林盛赴闽</p> <p>嘉靖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奉使为进贡庆贺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陈赋赴闽</p> <p>嘉靖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奉使为进贡庆贺存留在船通事随王舅殷达鲁赴闽</p> <p>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都通事随长史梁显赴闽</p> <p>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长史同正议大夫陈赋赴闽上京</p> <p>嘉靖三十年八月十六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同长史梁炫等赴闽</p> <p>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九日奉使为进贡谢恩正议大夫同长史蔡朝器等赴闽上京</p> <p>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使为进贡谢恩正议大夫同都通事梁灼等赴闽上京</p>
七世	朝庆	1521 1560	都通事	<p>嘉靖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为侧闻明旨以慰远望事奉使为都通事同使蕃吴罗等赴闽</p> <p>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为护送进贡方物及漂流朝鲜人口事奉使为都通事赴闽上京</p> <p>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梁显长史蔡廷美赴闽上京</p>
	朝器	1525 1587	正议大夫	<p>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奉使为进贡谢恩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陈赋长史蔡廷会赴闽</p> <p>嘉靖三十年八月十六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蔡廷会赴闽</p> <p>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长史梁炫赴闽</p> <p>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九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长史同正议大夫蔡廷会赴闽上京</p> <p>嘉靖四十年九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长史随王舅源德赴闽上京</p> <p>隆庆三年二月十五日为进贡及庆贺东宫正位等事奉使为长史随王舅毛廉赴闽上京</p>

			万历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同都通事红文绶等赴闽上京
朝用	1526— 1576	长史	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九日奉使为进贡谢恩上京通事随正议大夫蔡廷会赴闽上京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奉使为迎接天使都通事随长史梁炫赴闽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奉使为探听天使舟回朝消息都通事同使者马三路等赴闽 隆庆元年二月十七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长史同都通事郑禄等赴闽上京
朝俊	1532— 1581	通事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奉使为迎接天使副通事随长史梁炫赴闽 嘉靖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为护送进贡谢恩方物等事奉使为通事同使者吴桐秀等赴闽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为接回朝京官员事奉使为通事同使者麻加宁等赴闽 隆庆三年二月十五日为护送进贡庆贺方物等事奉使为通事同使者马沈布等赴闽
朝杰	1539— 1587	通事	隆庆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使为进贡谢恩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郑宪赴闽 万历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蔡朝器赴闽 万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补贡数硫黄事奉使为存留在船通事同火长林世荣赴闽
焕	?	通事	万历二年二月二十日为庆贺皇上嗣登宝位等事奉使为存留在船通事随从王舅马忠叟赴闽
熾	?	都通事	万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遵奉勘合袭封王爵事奉使为都通事随长史梁灿赴闽
朝信	1551— 1608	长史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为进贡谢恩请封等事奉使为都通事随长史郑道赴闽上京

				<p>万历三十年九月初四日奉使为庆贺谢恩长史随王舅毛继祖赴闽上京</p> <p>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奉使为庆贺谢恩长史赴闽上京</p>
八世	烜	1566— 1587	都通事	<p>万历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为补贡数硫黄等事奉使为通事随署正议大夫事都通事郑礼赴闽</p> <p>万历十五年三月初五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都通事随正议大夫郑礼赴闽上京</p>
	延	1575— 1644	正议大夫	<p>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奉使为进贡存留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郑逅赴闽</p> <p>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金仕历赴闽上京</p> <p>天启六年二月初九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同都通事郑藩献等赴闽上京</p>
九世	坚	1587— 1647	紫金大夫	<p>万历三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奉使为进贡长史同使者马成驥等赴闽上京</p> <p>万历四十二年奉使为长史随王舅吴鹤龄捧国王题请复贡期表章赴闽上京</p> <p>万历四十五年十月初四日奉使为议大夫同王舅毛继祖等捧国王题请俯察藩情赐复贡期疏章赴闽上京</p> <p>天启元年奉使为进贡兼请封正议大夫同王舅毛凤仪等捧国王题请赐复贡期疏章赴闽上京</p> <p>崇祯六年十月十五日奉使为谢恩紫金大夫同王舅吴鹤龄护送天使赴闽进京</p> <p>崇祯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奉使为进贡紫金大夫同使者毛继善等捧国王题请纳税贸买丝绌等事疏章赴闽上京</p>
	国材	1612— 1643	都通事	<p>崇祯七年九月十一日奉使为进贡在船通事随正议大夫蔡锦赴闽</p> <p>崇祯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蔡锦赴闽上京</p>

	国器	1632— 1644	紫金 大夫	<p>顺治十年二月二十一日为王舅通事随马宗毅与招抚使谢必振船一同赴闽上京</p> <p>康熙九年五月十一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十一月十五日同耳目官吴宗则捧题请循会典许交易表章入闽进京</p> <p>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奉使为探问接贡正议大夫翌年三月初十日同都通事曾伊祖赴闽</p> <p>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五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十一月同耳目官毛文祥等赴闽上京</p>
	彬	1642— 1681	正议 大夫	<p>康熙二年随谢恩使紫金大夫金正春赴闽</p> <p>康熙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使为接贡都通事翌年三月初九日同使者蔡纯等赴闽</p>
十世	应瑞	1651— 1707	申口 座	<p>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使为存留在船通事随耳目官向承恩正议大夫明佑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入闽</p> <p>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赴京都通事十一月十七日随耳目官毛起龙正议大夫蔡铎赴闽上京</p> <p>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初二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十一月同耳目官翁忠祐赴闽上京</p>
十一世	炳	1657— 1694	通事	<p>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奉使为进贡存留通事十二月初七日随耳目官吴世俊正议大夫郑永安赴闽</p> <p>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奉使为进贡通事十一月十七日随耳目官温允杰正议大夫金元达赴福州</p>
	灼	1662— 1713	正议 大夫	<p>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存留通事十一月十七日随耳目官毛起龙正议大夫蔡铎赴闽</p> <p>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三日奉使为迎接敕书钦赏并贡使事为都通事十一月初九日同使者温允俊等赴闽</p>

				<p>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十一月十四日随耳目官毛兴龙正议大夫蔡应祥赴闽上京</p> <p>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初四日奉使为御代替之御使者十一月二十二日附搭接贡船同都通事蔡文汉赴闽</p> <p>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七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翌年二月十二日同耳目官毛九经赴闽上京</p>
	文浦	1671— 1745	紫金大夫	<p>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三十日奉使为接贡存留通事十一月十八日同才府毛文杰都通事郑士伦等赴闽</p>
	温	1682— 1761	法司	<p>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奉命为进贡存留官务兼奉宪令学习地理事十一月初三日随耳目官向朝贵正议大夫毛文哲赴闽</p>
	文河	1683— 1750	紫金大夫	<p>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奉使为接贡存留通事同才府安察都通事梁承实十一月二十五日赴闽</p> <p>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使为谢恩进京都通事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随王舅向龙翼紫金大夫程顺则与天使船赴闽上京</p> <p>康熙六十年六月十六日奉使掌敕书并咨文事随王舅向龙翼闰六月十五日开洋</p> <p>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十二月初二日同王舅向克济赴闽</p>
十二世	坝	1681— 1714	都通事	<p>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奉使为进贡存留通事十一月二十四日随耳目官温开荣正议大夫蔡肇功赴闽</p> <p>康熙四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十一月十八日随耳目官孟命时正议大夫阮维新等赴福州</p> <p>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奉使为进贡上京都通事八月卧病九月卒奉使之事不果</p>

	埔	1687— 1748	申口 座	康熙五十年二月初六日奉使为接贡总管十一月二十四日随都通事魏鸾等赴闽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奉命为紫金大夫使赞通事随紫金大夫程顺则与册封宝船赴闽上京 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为进贡事奉使为二号船都通事随耳目官毛健元正议大夫蔡渊等十一月十五日赴闽 雍正十年奉命为送还漂流商船使十一月二十九日与贡使耳目官温思明正议大夫郑仪等赴闽 乾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为进贡事奉使为正议大夫十一月二十六日同耳目官向维豪赴闽上京
	其栋	1693— 1741	正议 大夫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使为庆贺通事随王舅翁国柱正议大夫曾历赴闽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使为进贡赴京都通事十二月初二日随王舅向克济正议大夫蔡文河赴闽 乾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使为谢恩进贡正议大夫六年正月十八日赴闽
	培	1690— 1762	紫金 大夫	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为进贡事奉使为存留事通事随耳目官毛健元正议大夫蔡渊十一月十五日赴闽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四日为谢恩并进贡事命为都通事随王舅向克济正议大夫蔡文河等十二月初二日赴闽
	光祖	1711— 1766	中议 大夫	乾隆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奉使为进贡存留通事十二月二十日随耳目官向永成正议大夫郑秉哲赴闽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奉使为进贡二号船都通事随耳目官向全才正议大夫阮超群赴闽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奉命为北京大通事然未赴闽而卒
十三世	垣	1688— 1722	都通 富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奉使为进贡副通事随耳目官向乾秉正议大夫杨联桂赴闽

			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为进贡事奉使为赴京都通事随耳目官毛弘健正议大夫陈其湘赴闽遇难
	功熙	1711— 1764	正议大夫 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奉使为接贡存留通事次年正月初五日同都通事阮大鼎才府向克类赴闽 乾隆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奉使为进贡请封赴京都通事随耳目官毛元翼正议大夫蔡宏谟十一月十四日赴闽次年上京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三十日奉王命为恭请金安长史同通达理官毛文龙赴中华
	任邦	1747— 1794	边达理座 乾隆四十九年奉使为进贡二号船总管翌年四月初九日随耳目官向猷正议大夫毛景裕赴闽
	任重	1732— 1796	中议大夫 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一日奉使为接贡存留通事翌年五月初三日同才府麻向茂都通事蔡德蕴赴闽
	任贵	1755— 1802	边达理座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奉使为进贡头号船总管随耳目官马继谟正议大夫陈天龙翌年八月十四日赴闽 嘉庆七年二月朔日奉使为头号船总管随耳目官向铨正议大夫梁焕安十月朔日赴闽不知去向
十四世	懿	1716— 1775	申口座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朔日奉命为接贡存留通事随都通事红秉毅才府吴永隆翌年正月初五赴闽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朔日奉命为进贡都通事随耳目官毛自焕正议大夫魏献兰等翌年正月初六赴闽
	德蕴	1729— 1791	正议大夫 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奉为进贡正议大夫同耳目官向崇猷翌年三月初九日到闽病卒于馆驿 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朔日奉命为进贡二号船都□□年三月初九日同才府麻永健等随耳目官向崇猷正议大夫蔡懿与头号船赴闽



	肇业	1756— 1827	紫金 大夫	<p>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一日奉命为接贡船都通事次年五月初三日同才府麻向茂赴闽</p> <p>嘉庆五年二月初一日为进贡事奉命为在船通事随耳目官向必显正议大夫阮翼等坐驾二号船十月二十日与册封宝舟二只及进贡头号船一齐赴闽</p> <p>嘉庆十一年二月初一日为进贡请封事奉命为朝京都通事随耳目官杨克敦正议大夫梁邦弼等九月十六日赴闽</p> <p>嘉庆十五年二月初一为进贡通事奉命为正议大夫同耳目官向国柱驾头号船于十一月十八日赴闽上京</p>
	肇基	1759— 1822	申口 座	<p>嘉庆六年二月初一日为接贡事奉命为存留通事随才府向迪义大通事林家槐等十月初七日赴闽</p> <p>嘉庆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命为护送天使之大通事十月初五日随齐费两位大人坐驾头号船及谢恩船并奉还船只赴闽上京</p> <p>嘉庆十五年二月初一日为进贡事奉命为二号船都通事随耳目官向国柱正议大夫蔡肇业等坐驾二号船十月十八日赴闽</p> <p>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为进贡事奉命为正议大夫同耳目官向邦正坐驾头号船九月十一日赴闽上京</p>
	景福	1770— 1837	中议 大夫	道光五年二月朔日奉使为接贡总管同才府蔡谟都通事毛超叙九月十二日赴闽
十五世	献图	1771— 1835	遇达 理座	嘉庆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奉命为进贡二号船总管随都通事蔡肇基十月十八日赴闽
	邦佐	1784— 1854	中议 大夫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为进贡事奉命充为总管随耳目官向元模正议大夫梁必达等坐驾二号船九月三十日与进贡头号船赴闽

十六世	邦弼	1781— 1863	中议大夫	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一日为进贡事奉命为在船通事随庆贺王舅夏超群正议大夫毛有增等坐驾三号船九月二十四日与头号船赴闽
	修	1777— 1832	中议大夫	嘉庆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恭奉命为国学官话诗文之总师十月赴华 嘉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命为接贡存留通事同才府向元麟都通事魏崇仁九月初六赴闽 道光四年二月初一日为进贡事奉命为二号船大通事同耳目官向廷楷正议大夫梁光地九月十一日赴闽
	呈书	1802— ?	申江座	同治三年二月初一日为进贡事奉命为大唐船都通事随耳目官东国兴正议大夫毛发荣等十月十三日赴闽 同治八年二月初一日为接贡事奉命为都通事十月二十日赴闽

从表列可知,蔡氏族人在明清两代的中琉交往中,有60人先后193次分别奉命为进贡、庆贺、谢恩之通事、长史、正义大夫等来华。据《明实录》、《大清实录》记载,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至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485年间,中山王(含并山北、山南后)遣使入华469次,而蔡氏族入则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次数的来航。这不能不说其“奉使中国远涉惊涛不无可观之功”<sup>①</sup>。

### 三

明清时代受遣入朝的琉球贡使、通事,以及奉命随使赴闽“读书习礼”的琉球学生,频频来华。这些人在中国滞留期间,有不少因

① 第一部《蔡氏家谱·修家谱序》。

病去世而葬于中国者。据日人东恩纳宽惇所著《泰、缅甸、印度》一书记述,琉球馆里崇报祠内所立之死者牌位,来华球人先后逝世的有 900 多人;藏于琉球馆里的 1 本《灵簿》记录了自清顺治五年(1648 年)以来在福州逝世的 578 个球人名单,其中有墓所的 490 人,墓所不明的 88 人,迁回琉球安葬的只有 16 人<sup>①</sup>。

蔡氏家谱记载来华族人中,亦有 7 人不幸逝世葬在中国的。明末两人:一是八世蔡烜,万历十五年(1587 年)三月初五日奉使为进贡谢恩都通事随正议大夫郑礼来闽上京,病故于北京会同馆,葬城外安禅寺;一是九世蔡国材,崇祯十五年(1642 年)三月初七日奉使为进贡都通事随正议大夫蔡锦来闽上京,次年三月十四日自北京返回途中,在苏州府病故,尝闻墓在城中。清代来华病故安葬于福州南郊的 5 人,即十一世蔡耀,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题请附进贡通事蔡炳赴闽读书,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在柔远驿病故,葬于福州府南过江上渡坑地方;十一世蔡灼,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二月初七日奉使为进贡正议大夫,翌年二月十二日同耳目官毛九经来闽,将赴京时偶然卧病卒于柔远驿,葬在南台下渡祖山;十二世蔡其栋,乾隆五年(1740 年)奉使为谢恩进贡正议大夫,次年正月十八日同正使翁鸿业来闽,在柔远驿风痰病故,葬于南台下渡清流山;十四世蔡懿,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二月初一日奉命为进贡正议大夫,翌年三月初九日同耳目官向崇猷来闽,将上京时遂病,于柔远驿,葬在王厝陈坑山地方;十四世蔡肇政,嘉庆六年(1801 年)二月二十六日为读书习礼事请王命附存留通事蔡肇基赴闽,第二年七月间染病死于柔远驿,葬在福州府南过江上渡。

对琉球国进贡遣官病逝安葬中国者,清廷以“隆礼外臣”待之,

<sup>①</sup> 引自朱振声:《从福州的几处古迹看古代中琉关系》,《海交史研究》第 3 期,1981 年。

“敕赐御祭”。蔡灼、蔡懿、蔡其栋亦蒙“优恤”。皇帝赐给祭葬棺价银 20 两，以为营葬立石封识之用；由福建布政司堂上官备办祭品，委粮驿道领官员捧谕祭文亲临柔远驿隆礼致奠；令择吉地造坟，建御碑于墓左，永为荣光；准留随从 4 名驻闽守丧 3 载，日给粮银以奉祭祀<sup>①</sup>。皇帝钦赐之祭文，由内阁撰拟，其文字与 1963 年调查发现的康熙皇帝御赐毛得范祭文碑<sup>②</sup>一样，只是更换一下死者的姓名和身份而已。例如蔡懿之《御祭文》曰：

皇帝谕祭琉球国进贡副使正议大夫蔡懿之灵曰：远人效归化之义，入贡天朝，国家隆恤死之恩，均施外域。尔蔡懿因使入贡，跋涉远来。龟勉急公，间关况瘁，方期早竣厥事，不意在途递殒，朕用悯焉，特颁祭典，以慰幽魂，尔如有知，尚克歆享。

尤为可贵的是，家谱中还保存有当年蔡氏向山主买地造坟的 3 份契约。这为了解蔡氏安葬的具体地点及其墓穴尺度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录用于此，以飨读者。

#### 闽县林士恺卖地契

立卖山契人林士恺，今有承祖山壹所，坐产闽县地方，士（土）名益老园。今因粮迫，拔出吉地壹穴，托中卖与琉球国蔡老爷处，三面言议，得讫山价银壹拾伍两，广正其银，即日收讫，其地听从买主择吉造坟，行门放水。其地横阔肆丈，深陆丈，四至明白，并无升合苗米，并无重张典挂他人，与房分伯叔弟兄无干。如有来历不明，系恺之事，与买主无干。今欲其凭，立卖契一纸为照。

① 参见《蔡氏家谱》之记载。

② 此碑“文革”中被毁，照片存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康熙伍拾貳年伍月 日立卖山契人林士恺,中人李尔彦、娄惟有,地理先生张兆浦,每人有花押。

#### 封阡券文

立卖山契人吴德修,今有承租阡分份下山场壹所,座产侯官县四十五都清流山地方。内拨出吉地壹穴,横阔肆丈,长陆丈,上至吟,下至路,左至吴家园,右至江家界,四至俱载明白。凭中卖与琉球国蔡府,三面言议,本日得论价古并银肆拾两,天平其地,听从买主择吉造坟,顺处行门,便处放水。其地系自己物业,与别房伯叔兄弟侄无干(干),并未曾重张典挂他人财物,其升甲苗米并来历不明,俱系卖主之事,与买主无涉。两家情愿,各无反悔。今有凭立卖山契壹纸为照。

乾隆六年肆月吉日立卖山契人吴德修,代认中人林君荣、林君煌,在见人梁廷耀,代书王臣,和每人有花押。

#### 闽县林道润、道良卖地契

立卖山契人林道润、道良等,承租置有民山壹峯,坐落侯官县南关外四十五都,坐山土名王厝陈坑山地方。内发(拨)吉地壹穴,长叁丈陆尺,宽貳丈肆尺,前至陈家园为界,后至林家界为界,四至俱载明白,托中卖与琉球国副使正议大夫蔡懿处。本日得论过山价银壹拾肆两广戮,其地听从蔡家择吉安葬造墓,便处开门,吉处放水,永远子孙祭扫。此地果系润等承租物业,与伯叔兄弟侄无干(干),此中并无灰骸枯骨夹插,亦无钱粮色米挂搭,以及重张典当来历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系润等出头抵当,与买主无涉。今砍(欲)有凭,立卖山契壹纸付执,永远为照。

担当保认中石家义、石藏官、梁济威,每人有花押。乾隆肆

拾年捌月二十日，立卖山契林润良，每人有花押。

犹如其他客死于闽买地安葬在福州的球人那样，蔡氏之墓式也采用中国形制。家谱中附有蔡其栋墓图 1 幅，即可见其大概。墓之结构与现存于福州仓山的琉球墓一样，类似明清时代福建民间流行的“公座椅”式形制<sup>①</sup>。墓前左方立有《谕祭御碑》。可惜的是，蔡氏坟墓今已荡然无存。

在蔡氏奉命来华死葬于福建的族人中还有 1 位蔡夫人。5 部家谱均记载了她的事迹：

明朝琉球贡物内有花布美丽绝伦，是乃系蔡夫人之所织也。厥后夫人奉敕进京，至长乐而亡，皇上怜其远死他乡，敕使福建布政司建庙于长乐县，题曰琉球蔡夫人之庙。屡有灵效，地方人敬之。至今每月布政司发赐庙米几斗，著为定规。但世久人湮，为族氏某之女，为何事进京，共难稽考。然女人之身，永奉大邦尊敬者，诚系异事。故记以垂后世。<sup>②</sup>

对于琉球蔡夫人的事迹，乾隆《长乐县志》卷四《祀典志·祠庙》有比较具体的记述：“蔡夫人庙，在二十四都梅花澳。相传明万历年，夫人为琉球国人，尝梦神人书其掌中云：东涌起风沙，得道在梅花，罗帕与金合，相逢总一家。因织龙袍入贡，册封精巧妙明懿德夫人，召入京，舟次梅花，遇风登岸，寓宋直家。适朝命免进京，旋病卒。宋直葬于马鞍山，时显英灵，土人立庙祀之。”同卷《祀典志·坟墓》亦云：“蔡夫人墓，在梅花马鞍山八宝坑。相传葬时风雷大作，次日失其所在，但见土邱环水而已，俗号田螺穴云。”田螺穴位于长乐梅花镇东海边上，遗址至今尚存。蔡夫人庙在梅花镇内，年久失修，而规

① 徐恭牛：《福州仓山区琉球墓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

② 第一部《蔡氏家谱·蔡氏家谱总考·蔡夫人事迹》。

模犹在。有关琉球蔡夫人的事迹，难考其详，也充满了迷信色彩，但却在中琉关系史上留下了一则值得称颂的佳话。琉球方面有关于她的记载，中国方面不仅有文字记载还留有遗迹，这大概不能否定她曾经存在的事实。

#### 四

蔡氏家谱记述其元祖蔡崇之“源流”，系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宋朝鼎甲端明殿大学士蔡襄之六世孙。家谱所载蔡崇的世系和原籍是否有误？在论证蔡氏迁居琉球的情况之同时，对此加以考析，很有必要。

谱记蔡崇为蔡襄六世孙，这在世系上显然是不对的。史称蔡襄兴化仙游人，卒于宋治平四年（1067年），享年五十六<sup>①</sup>。由此推之，当生于公元1012年（北宋大中祥符五年）。而蔡崇在迁居琉球的洪武二十五年是“年二十七”，即生于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从出生年份看，两者上下相去350余年，若按每传1世为30年计算方法，蔡崇大致应为蔡襄之十二世孙。奇怪的是，先后编修的几部大小宗谱却都记之为六世孙，这确实是撰者以讹传讹的一大疏忽。不过，生活在琉球的蔡氏子孙对自己系蔡襄之后代是信奉无的，而且忠惠公的业绩对于蔡氏族人也亦有深刻的影响。此引蔡谿（二世）之女亚佳度创建祠堂一事便可为证。家谱记载这一事实云：

亚佳度，年十七守义寡居，……每日纺绩织纴以为恒业，历年蓄积，至成化八年壬辰，卜地于唐荣东北之间，自能捐资创建祠堂以奉蔡家神主，著为定规。且亚佳度意想宋朝忠惠公造万安桥时有观音现圣而成此桥，至今海清国泰而万民得免乎风涛险阻者，此诚忠惠公之功德而观音灵符之所系也，由是

① 《宋史》卷320。

亚佳度又奉观音于祠堂而题曰“清泰”。<sup>①</sup>

只是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随徐葆光使琉球的“护封守备”蔡添略赠紫金大夫蔡温(十一世)《蔡氏世纪》1卷及《忠惠公尊影》和《洛阳桥全图》各1幅,遂使“吾家蔡氏以升亭公(崇)为始祖,而宗系所出以忠惠公为本而不知其先者”的琉球蔡氏族人,“始知忠惠公乃系南唐司空用元公六世孙”。对“蔡氏本源远出于西周而今支派蔓延散居于八方者不可胜数”之溯源和衍派,才有了较为全然而详细的了解<sup>②</sup>。

说蔡崇是蔡襄之后裔,在这收录于家谱中的“崇祯甲戌福建长乐榜眼陈全撰”的《叙中山蔡氏世系图》和“正统二年岁次丁巳仲秋既望翰林院讲官江右胡广拜撰”的《赠中山蔡先生台号序》,以及“册封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的《题四本堂集后四绝句》等一些有关著录中也都所云云。看来世系记载虽有出入,但“高门遣裔自端明”<sup>③</sup>是不会有错的。

那么,蔡崇既系蔡襄之后裔,其原籍也应系兴化仙游才是,但家谱却记他为“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明史》的一则记载中亦云:“成化五年,其贡使蔡璟云:祖父本福建南安人,为琉球通事,传至璟,擢长史,乞如制赐诰赠封其父母。章下礼官,以无例而止”<sup>④</sup>。

① 亚佳度捐资创建祠堂,第1、2、4、5部家谱均有记载。亦参见周煌《琉球国志略》卷13《烈女》,郑秉哲《球阳》卷3《尚圆王纪》。

② 《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六·解说》中云,至康熙五十八年蔡添略随使琉球赠蔡温《蔡氏世纪》等后,蔡氏族人始知蔡襄之事迹,因而认为在此300年前亚佳度建祠堂时所谓仰忠惠公之功德则非事实,是康熙五十八年以后才附加上去的。撰文者大概没有详阅家谱之记载,其实蔡温等始知的不是忠惠公本人之事迹,而是蔡襄所出之本源,两者并不矛盾。这一点《解说》误矣。

③ 第二部《蔡氏家谱·纪录》之《十一世讳文溥祝岭亲方·赠言》中徐葆光《题四本堂集后四绝句》。

④ 《明史》卷323《外国四·琉球》,《明宪宗实录》成化五年三月壬辰条亦有同样记载。



蔡璟为二世蔡讷之长男<sup>①</sup>，其祖父即元祖蔡崇。可见蔡崇以泉州府南安县为籍并非杜撰。这便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蔡襄之后曾有人迁居南安而传至蔡崇而被赐往琉球。然而，笔者尚未发现国内有关于蔡襄之传人迁居南安的记载。四堂本《蔡氏家谱》（即第二部）中的“十一世讳文溥祝岭亲方”传下载“随封”蔡宪文的一篇《赠言》，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论证线索：

吾宗系出弋阳，自治祖讳炉公，唐宣宗朝官拜凤翔节度使，至昭宗朝谪次从王潮入闽为建阳长官，遂卜居于麻沙镇水北。六传至司空讳用元公，始迁莆之枫亭市赤湖焦。又六传至端明殿学士讳襄公始发祥<sup>②</sup>。……厥后裔孙遂以端明公为一代祖。后因族相（蔡京）祸乱，族中子姓尽轻弃乐土，或徙居漳泉，或移寓江浙，在殊方纪殊方之别。然而祖功宗德积累深厚，随其所外，子孙各具昌盛。

蔡崇也许就是“徙居漳泉”的一支“族中子姓”。当然，这还有待于发掘史料来作进一步的考证。

综上所述，明初迁居琉球的蔡崇系蔡襄之后裔，这大概不会是攀龙附凤之说，记其原籍为泉州府南安县，也应是言之有据的。这一结论，一定会随着今后新史料的发现而得到翔实且有力的证明。

① 《历代宝案》1集卷17载：“本国长史蔡璟告称：伊父实达鲁，永乐年间身膺通事，屡承朝贡。在于福建福州府闽县高惠里聘母梁氏，就买当地民人范祖生房屋贰间。于永乐年间带男一口，与母完聚，入籍长乐……”此称璟之父为实达鲁，与家谱所载不一。实达鲁与谥是否为同一人？是否于永乐间入籍长乐？均尚待考证。

② 此记蔡炉从王潮入闽6传至蔡用元，又6传至蔡襄，这在世系上是有误的。王潮入闽至蔡襄出生，其间仅130来年，不可能有12世之传。于此存疑，有待今后另辟文探讨，但在这里并不影响本文之论点。

## 泉州在明琉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采取了强硬的海禁政策，不仅严禁民间“片板不许下海”，而且在对海外诸国的“朝贡”往来方面，也采取措施加以严格的限制。泉州，这个称盛于宋元时期的国际贸易港埠，进入明代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成了仅限琉球人贡于明的口岸。然而，泉州自洪武初设置市舶司至成化八年（1472年）他迁的100来年间，作为海外各国人明朝贡的“正道”之一，在明琉两国的频繁交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 一

琉球“居东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国”。十四世纪中叶，琉球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尚为姓，而中山最强”。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文物<sup>①</sup>。自此，明琉建立了“朝贡”关系，开始了两国间的往来。

明太祖即位后，虽相继遣使外夷，播告建元，而“使者所至，蛮夷莫长，称臣入贡”<sup>②</sup>，但对于海外诸国人明朝贡所采取的态度却

① 《明史》卷323《琉球》。

② 《明洪武实录》卷71。

是消极的,并制定种种的限制措施加强对朝贡的控制和管理。洪武初设宁波、泉州、广州3处市舶司,以掌管海外诸国之入贡事宜。要求各国贡舶必须在指定的港口靠岸,明确限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sup>①</sup>。按照这一规定,琉球的人明朝贡只能从泉州港入口,所贡方物俱由泉州市舶司“验入”。这样一来,泉州成了琉球入明朝贡的“正道”,成了明琉两国间交往的唯一进出口岸。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复置曾被罢设的“三市舶司”<sup>②</sup>,又于三年(1405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来远驿于福建、安远驿于浙江、怀远驿于广东“以馆之”<sup>③</sup>。来远驿就设在泉州城南之东桥,专门接待来贡使者<sup>④</sup>,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泉州作为法定通贡口岸的地位。

洪武五年九月,明太祖因“高丽贡献使者往来烦数”,谕中书省臣限其贡期及贡品数额,“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毋令过多”,亦令告谕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国,及“新附远邦凡来朝者”一并遵行<sup>⑤</sup>。对于“叛服不常”的日本,甚至限“其期为十年”。惟以琉球“恭顺”而“任其时至入贡”<sup>⑥</sup>。于是琉球国以请封、谢恩、朝贡、贺节、进香等名誉,频频来朝。1年中1贡再贡,有时1年数贡。如洪武间的十六年(1383年)、十七年、二十一年,1年4贡;三十年(1397年)、三十一年,1年5贡;二十九年多达7贡。永乐间1

①③ 《明史》卷81《食货志》。

② 《明史》卷75《职官志》。

④ 《泉州府志》卷4《封域》。

⑤ 《明太祖实录》卷76。

⑥ 《明史》卷81《食货志》。同条记载恭顺而任其时至入贡者还有占城,但据《明太祖实录》卷76载,占城已于洪武五年列入“限其贡期”的国家之一。《明会典》卷105《朝贡一·东南夷上》亦云:“(洪武)八年,谕安南、高丽、占城等国每三年一朝贡”。

年3贡、4贡的亦不少,也常有5贡、6贡者。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至成化八年,不仅年年入贡,而且很少是1年1贡的,一般都是1年3、4贡乃至5贡,最多的宣德元年(1426年)竟有8贡<sup>①</sup>。对于琉球屡屡遣使人贡,“天朝虽厌其烦”,而“不能却也”<sup>②</sup>。

为了杜绝海外商人前来求献方物和防止冒充使臣入贡,明太祖还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命礼部向海外诸国颁发“勘合文册”,以辨识真伪<sup>③</sup>。“凡中国使至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为伪者,许擒之以闻”<sup>④</sup>;而凡人贡者“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sup>⑤</sup>。据《明会典》载,十六年赐予勘合文册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苏禄国峒王、柯枝、渤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刺、古麻刺,计15国<sup>⑥</sup>。以后渐及诸国,“尝来朝贡者皆给勘合文册”凡59国<sup>⑦</sup>。琉球国也在赐予勘合文册的国家之列<sup>⑧</sup>。然而,在这些入明朝贡的海外各国中,琉球奉贡尤数,而明廷待之最厚。无论是明太祖还是明成祖,乃至英宗及其后的历朝皇帝,都给琉球以最优惠的待遇。不仅不却其1年之再贡或数贡,既便在朝贡往来中发生越轨犯法之事,仍每以“眷王忠诚”待之以礼,不咎其过。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中山来贡,其通事私携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人都为门者所获,当入官”,太祖“诏还之,仍赐以钞”。永乐二年(1404年)“山南使臣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事发,当论罪”,成祖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而“悉贯之”。永

① 《明宣宗实录》卷15-23。

② 《明会典》卷77《外番一·琉球》。

③④ 《明太祖实录》卷153。

⑤ 《明史》卷81《食货志》。

⑥ 《明会典》卷108《朝贡四·朝贡通例》。

⑦ 高货:《鸿猷录》卷6《四夷来干》。

⑧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乐十三年(1415年)冬“贡使还至福建,擅夺海舶,杀官军,且殴伤中官,掠其衣物。事闻,戮其为首者,余六十七人付其主自治”,次年遣使谢罪,成祖“待之如初”。正统元年(1436年)使者“初入闽时,止具贡物报闻,下人所赉海肥、螺壳,失于开报,悉为官司所没人”,后英宗从使者“乞赐垂悯”,“命给直如例”<sup>①</sup>。以上略举数例,由此可见明廷对琉球的态度是十分宽容和非常友好的。琉球也因此而成为海外诸国中“修职最勤”者,与明廷保持着最为密切的“朝贡”关系。《明实录》所记载的从洪武五年(始入贡)到成化八年(泉州市舶司迁往福州)的100来年间,琉球派遣使者入明朝贡248次<sup>②</sup>,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明廷任琉球“时至人贡”持续了100来年,直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才对其贡期作出限定。《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一年四月戊子”条载:“琉球国使臣程鹏奏,乞如常例岁一朝贡。下礼部复奏,去年福建守臣言:琉球国使臣,登岸杀死怀安县民陈二观夫妻,焚其房屋,劫其财物,访察不获。今鹏等将还,宜令赉敕省谕,并定以贡期,上从之。……自后定为例二年一贡,止许百人多不过更加五人,除国王正贡外,不得私附货物,并途次骚扰”<sup>③</sup>。从那以后,琉球的朝贡由此而稀疏了下来,不复“祖制”。《明会典》卷一〇五《朝贡一·东南夷上·琉球国》云:“永乐以来,国王嗣位,皆请命册封,后惟中山王至,中山王世称尚氏。谕令二年一贡,每船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贡道由福建闽县”。这里记贡期为“二年一贡”和贡道由“福建闽县”是“永乐以来”的事,显然有误。关于限定贡期的起始时间

① 《明史》卷323《琉球》。

② 据《明太祖实录》卷77—257、《明太宗实录》卷17—274、《明太宗实录》卷3(9)、《明宣宗实录》卷15—111、《明英宗实录》卷1—349、《明宪宗实录》卷3—101所作的统计。

③ 《明宪宗实录》卷140。

有如前述。至于贡道，在成化八年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之前，琉球的频频入明朝贡，无疑是按所规定的贡道自泉州登岸的。虽然在此之前也曾出现贡舶擅投他港的现象，但明廷对于贡道的限定是很严格的。这从《明宪宗实录》卷六六的如下之记载，便可窥其一斑，云：“成化五年（1469年）四月，广东市舶司奏：有番船被风吹至九星洋，审知是琉球国所遣使臣，来贡者告欲贸易土货，往福建造船回国。礼部复奏，宣移文广东巡抚等官，严加译审，果无虚诈，方许贸易。乃谕各夷，今后进贡，务由福建故道。”一直到了成化五年，明廷还重申入贡必由所限贡道的规定。这里所云之“故道”，显然是指“泉州通琉球”的这一“正道”。在成化八年市舶司迁往福州之前，即便琉球贡舶渐抵福州城南之河口<sup>①</sup>，然而应该认为，其人贡仍是以泉州为“正道”的。假如说“永乐以来”便是“贡道由福建闽县”，那么就决不会于永乐元年在泉州复置掌管海外国家入贡事宜的市舶司，并于三年在泉州设以馆贡使的来远驿。只有到了成化八年泉州市舶司迁往福州以后，贡道才改由福建闽县，泉州的“正道”地位才由福州所代替。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二

琉球“虔事天朝，为外蕃最”<sup>②</sup>。这种频频来朝人贡的密切关系，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实际上是一种“互市”而已。正如明人王圻所云：“凡外夷贡者，我朝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

① 林珙：《福建市舶提举司记》。

② 《明史》卷323《琉球》。

其互市”<sup>①</sup>。对于这种互市,明廷为显示“怀柔远人”,往往采取给予蠲免征税的优惠和实行商价收买的政策,“命有司凡海外诸国人贡有附至私物者,悉蠲其税”<sup>②</sup>。永乐十五年(1417年)礼部还奉旨对琉球来贡者“附搭诸物货,都免抽分,照例给与价”<sup>③</sup>。琉球的不断人贡,显然是“慕利”而来的。成化十一年限定2年1次为贡期后,琉球使者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八年一再奏请“乞如常例”<sup>④</sup>,甚至卑谦地自称人贡于明是“以小事大,如于事父”,但礼部认为“其意实欲假进贡之名,以规市贩之利,不宜听其所请”<sup>⑤</sup>,得不到明廷的批准。琉球之所以“连章奏请”,“不过欲图市易”<sup>⑥</sup>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

在这样的朝贡贸易中,琉球人贡的物品,有马、硫磺、磨刀石和刀、金银酒海、金银粉匣、玛瑙、象牙、螺壳、海吧、擢于扇、生红铜锡、生熟夏布、牛皮、降真、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苏木、乌木、胡椒等数10种。其中以马人贡最常数量也最多,截止成化八年琉球的248次朝贡中,明确记其“贡马”的有多达158次。明廷不仅接受源源不断的人贡马匹,而且还派使者前往琉球市马。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深子名使琉球,九年四月还,“以文绮百匹、沙罗各五十匹、陶瓷六万九千五百事、铁釜九百九十口,市马四十四匹、硫磺五千斤”<sup>⑦</sup>。十六年(1383年)九月,遣

① 《续文献通考》卷31《市余考》。

② 《明洪武实录》卷67。

③ 《琉球历代宝案》第1集卷12。按洪武二年九月规定,朝贡附至蕃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6分。参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

④ 《明宪宗实录》卷140、177。

⑤ 《国朝会典》卷107《礼部四·朝贡》。

⑥ 《明史》卷323《琉球》。

⑦ 《明太祖实录》卷95、105。

内官梁珉“以货币往琉球易马”，“得马九百八十三匹”<sup>①</sup>。而明廷所赐的物品，有瓷器、铜钱、铁釜、文绮、纱罗、彩缎、纒丝、钞锭和海舟等。琉球之国俗“市易不贵纨绮，但贵磁器、铁釜等物”，因此“赐予及市马，多用磁器、铁釜”<sup>②</sup>。但丝织品也在赐予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除了明廷馈赠外，来贡使者还尝到“苏州收买沙罗段疋”<sup>③</sup>，甚至“以所赐绢匹等物，往苏州府地方贸易纱罗纒丝，回还服用”<sup>④</sup>。

实际上，“海岛之国，惟琉球最称贫瘠。盖地无物产，人鲜精能，商贾又复裹足不入其境，故一切海上奇诡靡丽之珍之出乏焉”<sup>⑤</sup>。其所贡献之方物，特别是胡椒、苏木、象牙等均转贩自东南亚诸国。琉球国王尝派遣使者前往暹罗、满刺加、爪哇等国收买方物以充朝贡。《明实录》载：“琉球国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古，驾船载瓷器等物，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sup>⑥</sup>；“国王尝遣人往满刺加国收买贡物”<sup>⑦</sup>。琉球方面的各姓家谱也有不少类似的具体记载。红氏“二世通事讳铎，弘治二年（1490年）庚戌九月初三日为交易事奉使为通事同正使嘉满度前往大泥国（今马来半岛东岸即泰国北大年府一带），收买方物回国预备下年进贡”<sup>⑧</sup>；蔡氏“五世都通事樟，正德四年（1509年）己巳八月十八日奉使为交易通事同正使勿赖之致等带磁瓷等物前往暹罗国，收买苏木、胡椒等货回国预备下年

① 《明太祖实录》卷155。

② 《明太祖实录》卷95、105。

③ 《明英宗实录》卷251。

④ 《明英宗实录》卷182。

⑤ 夏子阳：《使琉球录》卷下。

⑥ 《明英宗实录》卷86。

⑦ 《明宪宗实录》卷115。

⑧ 《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第6分册《红氏家谱》。



进贡”<sup>①</sup>。琉球遣使往东南亚诸国收买方物主要是用铜钱和瓷器作交易的。琉球贡使入朝屡屡请求赐予铜钱,天顺三年(1459年),中山王尚泰久还特别奏请“将附搭苏木等货,照永乐、宣德间例,给赐铜钱”<sup>②</sup>。明廷赐予琉球的铜钱,不仅仅用于国内流通,更主要的是用来收买方物。成化元年(1465年)八月十五日中山王尚德上呈明廷的一通表文,对请求给赐铜钱的目的作了充分的表述:“自太祖高皇帝开基以来,屡修职贡,皆蒙圣恩将附搭物货,照数估价给与永乐通宝,并应代铜钱,回国流通使用,收买方物甚便。前因王府失火,铜钱货物俱被烧毁,不堪行使,国用匮乏。近年以来,附搭货物,只给绢匹等货,回至本国,缺钱买下年方物。缘本国唯产硫磺、马匹,其余物货出于诸番。收买方物,惟铜钱流通,使益节次,具本奏乞,未蒙恩赐。今特遣正议大夫程鹏、长史梁宾等官,驾胜字号海船贰只赍捧表文一通,及装载硫磺肆万斤、马叁拾匹、象牙壹佰陆拾斤、胡椒叁佰伍拾斤,赴京进贡。今臣恭惟皇上嗣登宝位,仁恩广大,普及万帮,待臣小国若抚赤子,如蒙准奏,乞敕该部查照永乐及宣德年事例,将附搭物货,给与铜钱回国流通,庶得国用不乏,职贡如常。臣不胜感激之至。除咨礼部知会外,谨具奏闻。成化元年八月十五日,琉球国中山王尚德谨上奏。”<sup>③</sup> 作为另一种主要赐予品的陶瓷器,不仅为琉球国俗之所贵,而且素以海外各国人民所喜爱。琉球通过入明朝贡获得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并用它与东南亚诸国交易入贡方物。近代以来,在冲绳全岛,无论是城堡遗址,还是沿海港口附近的住宅遗址,出土了数量庞大的比任何时代都多的明

① 《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第6分册《蔡氏家谱》。

② 《明英宗实录》卷301。

③ 《琉球历代宝案》第1集卷12。

中前期的中国陶瓷<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明廷对琉球“任其时至人贡”的年代。如此大量陶瓷的输入,不单是为了满足豪族抑或居民的需求,而有相当大的部分则转贩到东南亚及其他各国去。琉球在这一时期作为转口贸易基地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sup>②</sup>。通过朝贡,确切地说通过中国——琉球——东南亚诸国的陶瓷与香料的转贩,给琉球带来了巨利,成为其“国用”的主要来源。这就使得我们不难理解琉球国“世修职责,逾久益勤”<sup>③</sup>的原因之所在了。

琉球以中国铜钱和陶瓷与东南亚各国交易方物入贡于明,实质上扮演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中介贸易的角色。这对于琉球入明朝贡的法定口岸泉州来说,其地位之重要,则不只是在于与琉球的直接往来,而是通过琉球与海外诸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三

泉州作为明琉朝贡往来的进出口岸,其在两国间的友好交往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泉州素以盛产丝绸和陶瓷闻名遐迩。宋元时期生产的华丽“泉缎”和精美青瓷远销海外,是深受各国人民欢迎的主要贸易品<sup>④</sup>。在明代,也为“朝廷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赐予品。著名的南安翁绢、惠安北镇布等,商贩于境外,几遍天下。宣德三年(1428年)明廷特在泉州“创设染局”<sup>⑤</sup>,正统年间(1346—1449年)又“置泉州织造局”,管理丝绸绢帛的织造和印染,以备赏赉之用<sup>⑥</sup>。据称明代泉州

①② [日]三上次男:《冲绳出土的中世纪中国陶瓷》,《琉球史学》第8号。

③ 《中山世谱》卷5。

④ 参见拙作:《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

⑤ 《晋江县志》卷2《规制》。

⑥ 《明史》卷82《食货志》。

织造业十分发达,并有“染色为天下最”之誉。陶瓷器的生产,在明代泉州的整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据考古调查,德化、安溪、晋江等县的明代窑址数以百计,其外销产品数量远远超过宋元时代。尤其是磁灶窑、德化窑生产的陶瓷器皿,在海外享有盛誉。输入琉球的陶瓷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泉州周边一些窑口的制品。当然,手工业生产的兴盛,为明廷的赏赉提供了物品,也活跃了商品市场。那些“巧于趋利”的商人们,不顾明政府一再申严海禁,仍冒然违法下海经商,特别是运载陶瓷、丝绸等物货与琉球互市。泉州商人把到琉球经商称之为“做琉球”。在朝贡贸易的影响下,人们趋之若鹜地往琉球做生意,使得明廷不得不令刑部出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驾海交通琉球国”<sup>①</sup>。足见当时违禁前往琉球经商者为数不少。

泉州又以善于造船航海著称于世。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太祖嘉琉球修职益勤,特赐闽中舟工36户(姓)<sup>②</sup>,导引进贡。中山王即命他们“卜宅于久米村(那霸港附近)而居之”<sup>③</sup>,其“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事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sup>④</sup>。此后琉球之“大夫官、长史官、通事官、司贡者也,文臣也,以通中国书及闽三十六姓之后为之”<sup>⑤</sup>。洪武间所赐之36姓,有言“皆河口人”<sup>⑥</sup>,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福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

① 《明英宗实录》卷217。

② 《明史》卷323《琉球》。三十六户亦作三十六姓,参见《明会要》卷77《外蕃一·琉球》。关于赐姓琉球的时间,《那霸市·资料篇》第1卷第6分册《家谱资料》记为二十五年。

③ 《唐荣旧记全集》。

④ 《明神宗实录》卷438。

⑤ 何乔远,《名山藏》卷103《王享记二·琉球》。

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郭造卿闽中兵食议》。

宁人。……船主、喇哈、舵公皆出焉”<sup>①</sup>，泉州又是限通琉球的口岸。因此，36 姓中有不少乃系泉州地方人。南安蔡氏便是其中之一。《明宪宗实录》“成化五年三月壬辰”条载“琉球国中山王长史蔡璟，以其祖本福建南安县人，洪武初，奉命于琉球国，导引进贡，授通事，父袭通事，传至璟，升长史。至是，奏乞照例赐诰封赠其父母，下吏部，以无例而止”<sup>②</sup>。由日本国那霸市史編集委员会編集、于昭和五十五年（1980 年）出版的《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第六分册《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收录的《蔡氏家谱》，对蔡璟祖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载。据谱中之《修家谱序》和《蔡氏本源总考》等云：元祖讳崇，号升亭，行 2，年 27，丰臆、额广、风雅，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以太祖赐姓 36 居首，洪武二十五年（1382 年）授御奉敕始迁中山，择居于唐荣。从家谱的记述还可以看出，蔡氏家族在赐予 36 姓中是居于显赫地位的，人才彬彬辈出。正如康熙五十年（1719 年）随册封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使琉球的附封蔡宪文向紫金大夫蔡文溥“赠言”所云：“洪武间备三十六姓之列来教是邦，历□□□余载，惟吾宗最推重望，似此英才接踵，贤哲挺生”。其族人或擢通事、或进都通事、或授长史、或奉敕拜升大夫，先后分别奉使为进贡、庆贺、谢恩事多次来朝。其家族不仅在“敷文教于中山”方面，为发展琉球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掌中国往来贡典”方面，更为中琉两国的友好往来立下了汗马功劳<sup>③</sup>。

此外，还有不少泉州人在明琉交往中充当明廷的通事官。世居泉州的林氏四世祖林易庵和五世祖林琛（纯斋）曾担任接引琉球贡

① 茅元仪：《武备志》卷 14《海防》。

② 《明宪宗实录》卷 64。

③ 参见拙作：《明初三十六姓迁居琉球中的蔡襄后裔》。

使的工作。《林李宗谱》老长房四世祖恩赐冠带《易庵公传》云：“公为通衢公长嗣，讳恭惠，字乾甫。……初为里老，后本道府以公谙译语，荐之为通事官，引日本诸国入贡京城。成化二年（1466年），复与长男琛，引琉球入贡，事毕以年迈表辞。蒙恩钦赐冠带，寿七十六。……当景泰、天顺间，公奉简书使外国，能使其人输诚以献，不辱朝臣嘉命，……酬庸报功，冠带之赐，恩及儿曹。长子袭公职，仍赐冠带，非一世也”<sup>①</sup>。林恭惠在成化间充当琉球贡使的译员，他的儿子仍继任其职，均受过明朝皇帝的嘉赐，可见在引琉球人贡方面是作出成绩的。

明廷在赐琉球国闽中 36 姓导引进贡的同时，并赐船以作“贡舟”。琉球国造船航海技术十分落后，“缘小邦，物料工力俱少，不能成舟”。自洪武以来，皆靠“给赐海舟载运”，“以供往来朝贡”<sup>②</sup>。据统计至永乐时，明廷已赐给琉球国海船达 30 只<sup>③</sup>。永乐以后，亦常见有琉球使者“奏乞一海船，以便岁时朝贡”的请赐<sup>④</sup>。明廷赐予琉球的船只，一般由福建负责“以赐”<sup>⑤</sup>。自古以来，泉州的造船业就相当发达。宋代泉州建造的航海大船列为泉州的“土产”<sup>⑥</sup>，为中外商客所乐用。每因朝廷遣使均先期来泉州雇募客舟，并屡屡被宋政府诏令大批建造<sup>⑦</sup>。元代泉州是我国二大造船中心之一，航海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和兴克兰（广州）二埠”<sup>⑧</sup>。1974 年泉州湾后渚

① 《林李宗谱》抄本，厦大历史系资料室藏。

② 《明宣宗实录》卷 16。

③ 安里延：《日本南方发展史》页 65。

④ 《明英宗实录》卷 116。

⑤ 《明英宗实录》卷 17。

⑥ 《太平寰宇记》卷 102《江南道》。

⑦ 《泉州府志》卷 29《名宦》、卷 31《列传》。

⑧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2 册《拔都他自印度来中国之旅行》。

港宋代海船的出土,为宋元时代泉州造船技术之进步提供了有力的证据<sup>①</sup>。正因为此,明廷的多次遣使海外,皆由泉州发舶<sup>②</sup>。永乐宣德间称盛一时的郑和下西洋,亦在泉州雇海船、招水手、聘通事,并以晋江东石名舩为导引而从泉州扬帆<sup>③</sup>。据《崇武所城志》记载,明廷曾将崇武所的“四百料官船一只”,“送琉球国中山王,差长史郭祖尾去国”<sup>④</sup>。《崇武所城志》的这一记载,证明了明廷赐给琉球的“贡舟”多为泉州地方所建造的事实。

①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② 例如洪武三年御史张敬之和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渤泥,洪武九年和十七年泉州林鸾奉船西洋;永乐十三年少监张谦奉使渤泥,分别参见《明史》卷325《渤泥》、《林李宗谱》和顾珀《重修天妃宫记》。

③ 《西山杂志·三宝下西洋》。

④ 《崇武所城志·战船》,《惠安政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明初福建的海防建设及其遗迹

## 一、明初的海防形势

元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残酷统治，朱元璋定都南京，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帝国。然而，朱明王朝立国之初，面临的军事形势仍是相当严峻的。蒙元残部虽远遁漠北，但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每有卷土重来之势。“塞下之险，东起开、铁，北历喜峰，西亘偏头、五灰，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遥，……设险守国，盖其难哉”<sup>①</sup>。为了防御北元，朱元璋在今长城一线，遍立卫所，分军把守，以为屏蔽。东南海疆的局势也很不平静，朱元璋在军事部署的重点放在北方边境的同时，亦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巩固海防的建设。

明代初年，造成“海疆不靖”的主要因素，一是那些由日本南朝失败的政客、武士、浪人与走私的商人结合形成的所谓“倭寇”；二是在统一全国战争中被朱元璋征服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逃往海上组成的反明集团。

倭寇侵扰我国沿海，在元代就已经出现。大德年间（1297—1307年），浙江庆元遭到倭寇两次焚掠<sup>②</sup>。至正时（1341—1368年）倭寇在福建金门登陆，焚掠马坪附近诸村<sup>③</sup>。入明以来，愈显猖獗，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

② 《元史》卷99《兵纪》。

③ 《同安县志》卷29。

“时出剽掠,扰濒海之民”<sup>①</sup>,不断侵寇山东、断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地。据《明太祖实录》所作的统计,洪武年间(1368—1398年)则达23次:

时 间	事 态	出 典
洪武二年正月	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	卷 38
四月	倭寇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劫夺财物	卷 41
八月	倭人寇淮安镇	卷 14
洪武三年六月	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	卷 53
洪武四年六月	倭夷寇胶州,劫掠沿海人民	卷 66
洪武五年三月	倭夷寇海盐之澉浦,杀掠人民	卷 73
四月	倭夷寇苏、松、温、台濒海诸郡	卷 74
七月	倭夷寇福州之福宁县,前后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	卷 75
洪武六年六月	倭夷寇即墨、诸城、莱阳等县,沿海居民多被杀掠	卷 83
七月	倭夷寇胶州、海州	卷 91
洪武八年十二月	倭夷登岸大肆劫掠潮州濒海居民	卷 102
洪武十三年七月	倭夷寇劫广东府东莞等县	卷 132
八月	倭夷寇广东海丰县,杀掠吏民	卷 133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	倭贼寇浙江定海	卷 167
洪武二十年七月	倭人登台州,杀其巡检	卷 183
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	倭寇至台州境上,杀掠居民	卷 198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	倭船十二艘由城山洋艾子口登岸,劫掠宁海倭夷由穿山浦登岸,杀虏军士男女七十余人,掠其财物	卷 199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倭夷自水桶澳登岸劫掠	卷 211
九月	倭夷寇雷州遂溪县	卷 212
洪武二十六年四月	倭夷寇潮州南澳	卷 227
洪武二十七年十月	倭夷寇金州,卒人新市,烧屯营粮饷,寻掠军士而去	卷 235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	贼船九艘泊潮州吉头澳,约五百余人劫掠南棚等村	卷 236
洪武三十一年二月	倭夷寇山东宁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劫掠居人,杀镇抚倭贼二千余人,船三十余艘入寇海滨寨	卷 256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 55《沿海倭乱》。



以上是仅限于《明太祖实录》之所载,若加上散见于其它史书志乘之记录,其数更多<sup>①</sup>。倭寇“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sup>②</sup>,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元末“群雄并起”之际,初以“贩盐”为生的张士诚、方国珍“揭竿倡乱”,拥兵盘踞沿海地区,长期与朱元璋相抗衡。张士诚北跨淮海,南据浙西,“带甲数十万,沃野数千里”<sup>③</sup>，“兵强积富”<sup>④</sup>。方国珍西据括苍,南兼瓯越,“海舟千余,货货无算”<sup>⑤</sup>,势力亦相当强盛。太祖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方武装集团先后被朱元璋殄灭,然而其余部大都逃窜流亡于沿海岛屿,继续与朱明王朝为敌。他们“交舶万艘,常候风潮,毒机矢以待”<sup>⑥</sup>,伺机反抗,并与倭寇等海上势力相勾结,四处骚扰,如史所云:“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sup>⑦</sup>。以张士诚和方图珍之“遗孽”、“余烬”纠集起来的这股反明力量,为祸亦烈。

倭寇及海上反对势力对朱明王朝构成的严重威胁,明太祖是十分忧虑和警惕的。可是面对这种祸患,他采取的是“闭关自守”的对策。明太祖认为:“日本蕞尔夷,而数为侵盗,我不欲与之争,而我封戍而已”<sup>⑧</sup>。于是,他一方面严励推行“片板不许下海”<sup>⑨</sup>的海禁政策,一方面实行加强海上防御建设的措施。

① 例见《宁波府志》卷22、《福宁府志》卷6、《八闽通志》卷60、《惠安县志》卷20及《筹海图编》卷3、《明史纪事本末》卷55《日本考略》等。

②⑦ 《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4《太祖平吴》。

④ 《明太祖初录》卷171。

⑤ 《明太祖实录》卷240。

⑥ 章演:《图书编》卷35。

⑧ 王世贞:《弇州史料·东欧王世家》。

⑨ 《明史》卷205《朱纨传》。

海禁始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条云：

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之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元船户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sup>①</sup>

对此《明史纪事本末》更明确指出，“时国珍余党人海剽掠故也”<sup>②</sup>。《明太祖实录》该条下又云：

朕以海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sup>③</sup>

海禁政策的推行，显然是为了阻断大陆臣民与张士诚、方国珍余党的联系，杜绝与海外的往来而诱发“寇乱”，是以加强内部的控制，稳定沿海地区的统治秩序为目的的。

明太祖不仅禁沿海吏民出海、通番，即使是对于海外各国的“朝贡”，也作了种种限制。洪武初设市舶司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分别只限于通日本、琉球和占城等国<sup>④</sup>，并限定以“三年一聘”或“比年一来”为贡期<sup>⑤</sup>，还特别向日本颁发了“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sup>⑥</sup>。尽管如此，仍以“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sup>⑦</sup>，而于洪武七年九月罢“三市舶司”<sup>⑧</sup>。这以后政府又多次重申禁令：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禁濒海民

① 《明太祖实录》卷70。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③ 《明太祖实录》卷70。

④ ⑤⑥⑦ 《明史》卷81《食货》。

⑧ 《明太祖实录》卷93。

私通海外诸国”<sup>①</sup>；二十七年（1394年）十月“申严交通外番之禁”<sup>②</sup>；三十年（1397年）四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sup>③</sup>，甚至“以防倭故”而“禁民人海捕鱼”<sup>④</sup>，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而“禁民间用番香番货”<sup>⑤</sup>。明太祖一再申严禁令，并且作出了严厉的制裁规定：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响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sup>⑥</sup>

对有犯者“必寘以重法”<sup>⑦</sup>，以保证海禁政策的推行和实施。

与此同时，明太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加强海上的防御力量，在北起辽东南至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海防建设。

首先，筑城置卫，分布要害。海防建设在朱元璋取得政权之后便着手进行了，但在沿海要害之处遍置军卫、建筑城堡，则是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以后开始的。这一年，“倭寇上海，帝患之”，遣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汤和向“习海事”的方国珍从子方鸣谦咨询“御倭之策”，鸣谦曰：

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不无烦客兵也。<sup>⑧</sup>

① 《明太祖实录》卷139。

② 《明太祖实录》卷205。

③ 《明太祖实录》卷252。

④ 《明太祖实录》卷159。

⑤ ⑦ 《明太祖实录》卷231。

⑥ 熊鸣岐：《昭代玉章》卷2。

⑧ 《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汤和遂“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sup>①</sup>。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福、兴、漳、泉四郡视要害，筑海上十六城”，“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sup>②</sup>。据统计，明初在辽东，山东，江南、北，浙江，福建，广东所设军卫达50余处，卫下辖所及巡检司数以百计，还有水寨和墩堡、烽堠之增置，当不绝书<sup>③</sup>。

其次，建造战舰，巡徼海上。明太祖以倭夷“时出剽掠，扰濒海之居”，多次“命造海舟，剪捕此寇”<sup>④</sup>。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配备“船五十艘”<sup>⑤</sup>。十二月雷州卫同知张秉彝“言便易四事”，首先提请“预造战船，以防海道之寇”<sup>⑥</sup>。由于战船的装备不足，“濒海州县屡被倭害，官军逐捕往往乏舟，不能追击”，五年（1372年）七月“诏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sup>⑦</sup>。为了便于在海上追捕倭寇，九月“诏浙江、福建濒海诸卫改造多橈快船”<sup>⑧</sup>。六年（1373年）正月，德庆侯廖永忠以“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奏请“添造多橈快舡”，并建议“命将领之”。他认为，这样一来“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徒欲战不能敌，欲退不可走，庶乎可以剿捕也”。明太祖“善其言，从之”<sup>⑨</sup>。八年（1375年）四月，又“命宁靖侯叶升巡行温、台、福、兴、漳、泉、潮州等卫，督造防倭海船”<sup>⑩</sup>；十三年（1380年）六

① 《明史》卷120《汤和传》。

②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5《沿海倭乱》。

③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

⑤ 《明太祖实录》卷54。

⑥ 《明太祖实录》卷59。

⑦ 《明太祖实录》卷75。

⑧ 《明太祖实录》卷76。

⑨ 《明太祖实录》卷78。

⑩ 《明太祖实录》卷99。

月,“诏延安侯唐胜宗督浙江属卫官军造海船”<sup>①</sup>;十七年(1384年)八月,“命荜阳侯郑遇春、东川侯胡海督金吾等卫造海舟一百八十艘”<sup>②</sup>。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因苏州太仓等地“所造海舟岁月已久,檣楫摧坏,一有缓急,则假漕运之舟代之,器用不便”,难于御敌,往往“失机误事,其害非细”,故“令军卫急造海舟”<sup>③</sup>。同年,“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皆置船二艘”<sup>④</sup>。朝廷还曾向为造防倭海船做出贡献的军卫将士“赏钞有差”<sup>⑤</sup>。

第三,按籍抽丁,隶卫为军。洪武二十年(1387年)四月,“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周德兴“选丁壮万五千余人”,“分隶诸卫,以为防御”<sup>⑥</sup>。十一月,信国公汤和“籍绍兴等府民三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兵,凡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以防倭寇”<sup>⑦</sup>。此外,曾“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祜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元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sup>⑧</sup>;“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登户万人为水军”<sup>⑨</sup>。为了提高这些招籍来的各卫所军士的素质和军事能力,明太祖还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分别命魏国公徐辉祖和安陆侯吴杰经浙江、永定侯张全往广东,“训练海上军士防倭”<sup>⑩</sup>。

① 《明太祖实录》卷132。

② 《明太祖实录》卷164。

③ 《明太祖实录》卷199。

④ 《泉州府志》卷25《海防》。

⑤ 《明太祖实录》卷222。

⑥ 《明太祖实录》卷181。

⑦ 《明太祖实录》卷187。

⑧ 《明太祖实录》卷70。

⑨ 《明太祖实录》卷143。

⑩ 《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第四,严肃军法,赏罚分明。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羽林卫指挥使毛骥败倭寇于温州下湖山,追至石塘大洋,获倭船12艘,生擒130余人及倭弓等器,送京师。太祖诏令中书定赏格:“凡点旗军士、弓兵生擒贼一人者赏银十两,斩首一级银八两;民人生擒贼一人银十二两,斩首一级银十两,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于班师之日验功赏之”<sup>①</sup>。二十八年(1395年)七月,谕兵部臣曰:“近在外卫所遇有寇盗卒起守御,指挥、千户不亲率兵剿捕,但遣百户、旗手领之,是以失机误事。自今各卫所地方设有寇三四十人,即调官军一二百人;寇有数百人,即调数千人,刻期捕获,毋令滋蔓。如指挥、千户不躬率士卒及调兵失律误事者罪之。于是兵部榜示天下”<sup>②</sup>。二十九年(1396年)正月,又定擒获倭贼升赏格:

凡各卫指挥获倭船一艘及贼者,金事升同知,同知升指挥使,仍赏白金五十两、钞五十锭;千户擒获者升指挥金事,百户擒获者升千户,其赏俱。与指挥同在船军士能生擒及杀倭贼一人者,赏白金五十两。将较军士与倭贼陆地交战能生擒或杀获一人者,赏白金二十两、钞二十锭。<sup>③</sup>

对“倭寇侵犯海隅”时,“身能奉职,死能尽忠”者,明太祖是十分重视的。洪武五年(1372年)七月,明州卫指挥金事张亿率兵讨倭寇中流矢卒,“上闻而悼之,遣使致祭”,并“诏恤其家”。其悼文中以“名垂竹帛”给予高度评价<sup>④</sup>。对立功者行赏,其例甚多,《明太祖实录》可见不少记载<sup>⑤</sup>。而对于那些玩忽渎职者则严加惩处,或“削

① 《明太祖实录》卷74。

② 《明太祖实录》卷239。

③ 《明太祖实录》卷244。

④ 《明太祖实录》卷75。

⑤ 例见《明太祖实录》卷86、156、166、167、212、217、242、256等。

其官”或“以军法伏诛”，此亦不乏其事例<sup>①</sup>。

## 二、福建的海防建设

明初的海防形势大致有如上述。接着，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福建沿海的军卫建设作一具体的考察。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在朱元璋构筑“海上长城”的防御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据《明太祖实录》载：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奉命经略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sup>②</sup>。可见明初福建沿海之卫、所及巡司的建置并筑城，是周德兴经略福建部署和实施的。但其时间却史载不一，《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则云：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福建沿海五卫指挥使司，曰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所属千户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鳌、铜山、玄钟，以防倭寇。

一说在洪武二十年，一说在洪武二十一年，所载时间不同在一些府志或县志中也有类似记录。如《泉州府志》卷二四《军制》载泉州地方的卫所建设：

二十年，城水澳为永宁卫，亦领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隶福建都指挥使。又复城小兜为崇武所，城厦门为中左所，城福

① 例见《明太祖实录》卷102、167、183、199、227、235、246等。

② 《明太祖实录》卷188。

全为福全所、城金门为全门所，城高浦为高浦所，别为守御千户所，亦隶福建都指挥使。

同志卷二五《海防》却云：

洪武二十一年，命汤和行视闽粤，濒海地筑城增兵，置永宁指挥使及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千户所。

福建沿海的卫、所及巡司究竟是在哪一年设置并筑城的？先搞清楚这一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明太祖遣周德兴往福建，《明史·周德兴传》记云：“帝谓德兴：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当勉为朕行”<sup>①</sup>。这里没有说明周德兴奉命往福建的具体时间。《明太祖实录》对此却有明确的记述，其卷一八一载：“洪武二十年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其卷一九三又载：“二十一年秋七月辛巳，江夏侯周德兴还乡，赠黄金二百两、白金二千两、钞千锭、文绮三十匹”。由此可见，周德兴经略福建是始于“往福建”的洪武二十年四月，止于“还乡”的二十一年七月之前。《明史·周德兴传》云：“德兴至闽，按籍金练，得民兵十万余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防海之策始备”<sup>②</sup>。福建的“海防之策”无疑是在周德兴经略福建的这段时间里“始备”的。要论其确切的完成时间，应该说是在二十一年的上半年。这与史载信国公汤和奉命往浙江沿海“筑城籍兵戍守，以防倭寇”中的有关记述是相吻合的。洪武十九年（1386年）汤和“往浙江”<sup>③</sup>，在“宁海、临山诸卫滨海之地见筑五十九城”的“事毕还奏”时间，是洪武二十年十一月<sup>④</sup>。《明史·汤和传》云“明年，闽中并海城工竣”<sup>⑤</sup>，

①② 《明史》卷132（周德兴传）。

③ 《明太祖实录》卷240。

④ 《明太祖初录》卷187。

⑤ 《明史》卷126。



这里的所谓“明年”，指的是汤和完成浙江海防事务的第2年，也就是洪武二十一年。汤和在这一年六月率妻子陆辞还凤阳新第时，也提到“自闽越并海之地筑数十城”<sup>①</sup>。还有，明太祖曾在汤和于浙江籍兵筑城事毕后的第2个月即二十年十月，赐“浙江沿海诸卫军士六万二千八百五十三人钞人五锭”<sup>②</sup>，依此惯例，他亦曾“给赐福建福、兴等卫军士十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布二十万三千五百匹，绵花五万八千五百斤，钞各有差”，其时间就在“洪武二十一年六月”<sup>③</sup>。这一时间，也是“闽中并海城工竣”后不久的一个很好证明。因此，史称福建卫、所和巡检司的增建、移置，以及籍兵筑城的时间在“洪武二十一年”，才是更合乎事实的。

不过，志书中的有些记载，有的把二十一年建筑的卫、所和巡检司城，却说成是在此之后由周德兴所造的。如《读史方輿纪要》云：永宁卫“二十七年以卫濒海乃筑城以备倭”<sup>④</sup>，《泉州府志》亦云：永宁卫“二十七年江夏侯周德兴改为卫，遣指挥童鼎筑城”<sup>⑤</sup>。又如《福建通志》载：铜山所城“明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檄筑”<sup>⑥</sup>。《诏安县志》甚至说悬（玄）钟所城“明洪武三十年江夏侯周德兴奉诏置”<sup>⑦</sup>。这些记载校之于《明实录》等显然有误。永宁卫是洪武二十一年周德兴置卫筑城的五卫之一，铜山所和玄钟所也在当年周德兴置所筑城的十二所之列，这是毋庸置疑的。再说，洪武二十一年七月，汤、周已完成他们“经略海上”的使命而告老归凤阳家乡，于是才有二十二年二月明太祖命汤和与周德兴节制凤阳留守司并

①③ 《明太祖实录》卷191。

② 《明太祖实录》卷187。

④ 《读史方輿纪要》卷99。

⑤ 《泉州府志》卷11《城池》。

⑥ 《福建通志·城池志》卷1。

⑦ 《诏安县志》卷7《建置志》。

训练属卫军士之事<sup>①</sup>。至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周德兴则“以其子驥乱官,并坐诛死”了<sup>②</sup>。此时周德兴不仅早就离开福建,而且已经死去,前称周德兴于二十五年檄筑铜山所城、二十七年遣筑永宁卫城、三十年奉诏筑玄钟所城,是完全不可能的。有的把真正是二十一年后增置并筑城的,也记在了周德兴之名下,厦门(中左)所城便是如此。《泉州府志》记载:厦门城“明为中左所城,洪武二十七年江夏侯周德兴造”<sup>③</sup>。厦门置所筑城的时间,前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载二十一年二月置福建5卫12所中没有厦门,《读史方輿纪要》记之为“二十七年移永宁中左所官兵于此”<sup>④</sup>,应是可信的。其所城之筑,与周德兴全然无关,说为周造,纯属牵强附会。

史载周德兴在福建沿海要害处置卫指挥使司5、守御千户所12、巡检司45和水寨5。5卫即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12所即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高浦、金门、六鳌、铜山、玄钟。45司指的是哪些?志乘没有具体的记录,所载亦有出入。如《泉州府志》卷二五《海防》云周海兴“设巡司一十九”,卷二四《军制》却说德兴“于沿海要害处置巡检司十八”。查《泉州府志》参阅《读史方輿纪要》之记载,“本府各县巡检司共一十九处”<sup>⑤</sup>,分别是惠安之峰尾、小岞、黄崎、獼窟、涂岭,南安之澳头,安溪之源口,晋江之围头、乌浔、深沪、祥芝,同安之高浦、塔头、田浦、官澳、峰上、陈坑、烈屿、芷溪。但是,其中惠安的涂岭巡司废于洪武二十年,南安的澳头、安溪的源口和芷溪均设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而且后三者皆不在沿海,志书把它们列为周德兴所置,事实并非如

① 《明太祖实录》卷195。

② 《明史》卷132《周德兴传》。

③ 《泉州府志》卷11《城池》。

④ 《读史方輿纪要》卷99。

⑤ 《泉州府志》卷24《军制》。

此。实际上周德兴在泉州地方增设或从内地移置于沿海的巡检司只有 15 处。据《福建通志》和沿海各府、县志以及《读史方輿纪要》而作的统计,明初福建沿海所置之巡检司中,明确载为周德兴置并筑城者(个别无同时筑城)为 38 处,它们是水澳、大笕筲、清湾、高罗、延亭、松山、北茭、蛤沙、松下、迎仙、冲沁、嵌头、青山、吉了、小屿、峰尾、小岞、黄崎、獭窟、祥芝、乌浔、深沪、围头、高浦、塔头、官澳、田浦、陈坑、峰上、烈屿、濠门、岛尾、古雷、后葛、井尾、洪淡、金石、东沉赤山。此外闽安镇、官母屿设于洪武二年(1369 年),石梁蕉山、小祉始设于洪武六年(1373 年),壁头、牛头、泽朗始设于洪武十二年(1379 年),这 7 处应系原设而沿置者,合计为周置巡检司 45 处。5 水寨即烽火门、南口、浯屿、小埕、铜山。《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六《海防》引《万历府志》载“洪武初,命江夏侯经略海,徼置卫所筑巡检司城防其内侵,又于外洋设立烽火门、南日山、浯屿水寨三。”而《漳州府志》卷二三《兵纪》亦载:“铜山寨旧在井尾澳,洪武间江夏侯周德兴所置五寨之一”,夹注五寨为“烽火、小埕、南日、浯屿、铜山。”又《铜山志》卷三《武备志》载:“明初江夏侯入闽筑砦备倭置五寨,铜山其一也。寨旧建井尾澳,景泰间移铜山。”据此,5 水寨均为周德兴经略福建时置是可能肯定的。《八闽通志》云烽火门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sup>①</sup>,《闽书》和《重纂福建通志》分别记小埕、铜山设于景泰年间(1450—1456 年)<sup>②</sup>,皆误也。

兹将 5 卫、12 所、45 司、5 寨的地理形势、城堡规制和驻军情况等逐一考之于下。

### 1. 卫指挥使司

福宁卫,在福州(今霞浦)东龙首山。明洪武二年(1369 年)海

① 《八闽通志》卷 43《公署》。

② 《闽书·捍圉志》;《重纂福建通志》卷 86《海防》。

寇侵境，镇守福建附马都尉王恭檄百户宁祥守御，洪武四年（1371年）始筑城，周3里、高1.6丈、厚1丈，辟4门。洪武二十一年置卫，江夏侯周德兴拓城东隅，计周4里，增高为1.9丈，堞1512，窝铺29。驻军5000余名。

镇东卫，在福清县方民、新安二里间，去县治20里，与海坛交接，北对松下塔，南对南屿礁。洪武二十一年置卫筑城，江夏侯周德兴督造。城周880余丈、宽1丈、高2.3丈、辟门4，窝铺3，女墙1349。驻官军8687名。

平海卫，在莆田县东90里，扼海上冲，北峙草屿、连盘，东控鹭鸶、乌丘，西挹湄洲，与琉球、日本相望，南有南哨澳，北风可泊舟，莆藩篱喉舌也。洪武二十一年置卫筑城，周860.7丈、高1.4尺、广1.8丈，辟门4，东、西2，南2，上各建楼。堞高0.6丈，计堞1310，窝铺30。城形势北仰南俯，三面际海，以海为池，北据高山，筑台以了视海洋。海坛、南日、湄洲会哨于此。驻官军5516人。

永宁卫，在晋江县东南50里，东滨大海，北界祥芝及浯屿寨，南连深沪、福全，为泉襟裾。自宋以来，这里一直是军事要地。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置水澳寨，元为永宁寨。洪武二十一年改永宁卫，筑卫城周875丈、广1.5丈、高2.1丈、辟门5，南曰金鳌，北曰玉泉、东曰海宁、曰东瀛、西曰永清，上各建楼。窝铺32。城外有濠，广1.6丈。驻官军6935名。

镇海卫，在海澄县二十三都（原隶漳浦）大武山之南鸿江之上，本名岐岛，西南有鸿儒屿，东南有东镇屿、南镇屿、连进屿，又有将军礁、半洋洲，联互海滨为洪卫。镇海、六鳌、古雷、甘山、莱屿为最冲。洪武二十一年置卫筑城，周873丈、广1.3丈、高2.2丈。辟东、西、南、北门4，各建楼。女墙1668，窝铺20，堞口720。城下陡绝，以海为濠。驻官军5000余人。

## 2. 守御千户所

大金千户所,在霞浦县南五十二都,为外洋紧要,洋中岛屿有笔架山,山南系罗湖汛,山北界烽山营。旧为西白巡检司,洪武二十一年江夏侯周德兴檄筑为千户所城,周 582 丈,东、西、南辟门 3,濠堑沿城。驻官军 1120 名。

定海千户所,在连江县二十七都,距县 80 里,极冲要汛,凭山俯踞,远吞万顷。旧名亭角,元设亭角澳巡检司,洪武二十一年改设守御千户所并筑城,移巡检司于蛤沙。城周 600 丈,高 2 丈,西、南辟门 3,沿城凿濠。驻官军 1520 名。

梅花千户所,在长乐县东 40 余里梅江头山上,据险要冲,最称雄峙。洪武二十一年江夏侯周德兴檄福州左卫指挥李荣筑为千户所城,三面跨海,东为城门,西为水关,南连沙冈为南门,延袤 3 里,周 648 丈、高 1.8 丈、广 0.6 丈,女墙 1220,敌楼 24,窝铺 20。驻官军 1458 名。

万安千户所,在福清县东南 120 余里平南里,与连盘、门楸后三汛为临海要冲。洪武二十一年置所筑城,周 525 丈,高 1.6 丈,东、西、南辟门 3,各建楼其上。女墙 827,窝铺 13,敌楼 18。驻官军 1449 名。

莆禧千户所,在莆田县东 90 里新安里,西南有文甲澳,亦滨海要地。洪武二十一年置所筑城,周 590 丈、广 1.2 丈、高 1.2 丈,辟门 4,各建楼。堞高 0.6 丈,计堞 1049。窝铺 20。东南北阻海,西凿旱濠,长 210 丈、广 2 丈、深 0.8 丈。驻官军 1221 名。

崇武千户所,在惠安县东南 45 里,北接湄洲,南接日湖,东西距海,南峙祥芝,泉上游也。北宋元丰二年(1079 年),以海寇猖獗置小兜巡司,巡徼晋江、同安、南安、惠安 4 县沿海地。元置巡司。明洪武二十一年,周德兴移小兜巡检司于小岞,而置所筑城于此。城周 737 丈、广 1.3 丈、高 2.1 丈。辟门 4,各建楼。窝铺 26。驻官军 1120 名。

福全千户所,在府城东南 87 里,西南接深沪,与周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船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洪武二十一年置所筑城,周 650 丈,广 1.3 丈、高 2.1 丈。辟门 4,各建楼。窝铺 16。城内有营房 853 间,驻官军 575 名。

金门千户所,在同安县东南海中。金门旧名浯洲屿,西连烈屿、厦门,南达担屿、镇海,料罗尽其东,官澳极其北。料罗、乌沙诸处皆为番船入犯之径,其控扼要害,则在官澳、金门。洪武二十一年置所筑城,城北阻山,东、西、南阻海,周 630 丈、高 1.7 丈连女墙为 2.5 丈、广 1 丈。辟门 4,各建楼其上,南、北、西月城 3。窝铺 36。城外环濠,深广丈余。城内有营房 860 间,驻官军 1535 名。

高浦千户所,在同安县西南 60 里安仁里,西有松屿,与海澄三月港相接,为滨海要冲。洪武二十一年徙永宁中左所官戍此更今名。周德兴造所城周 452 丈、高 1.7 丈、广 1 丈。辟门 4,俱砌月城,建楼其上。窝铺 16。城内有营房 1025 间,驻官军 1258 名。

陆鳌千户所,在漳浦县东南 60 里,为邑外障,海中有横屿长里许,又有双洲俗呼洲门,自广入闽海船必经之道。有虎头山,与鼓雷山对峙,商舶渔舟聚焉。明初置青山巡司,洪武二十一年改所筑城,周 552.6 丈、广 1 丈、高 2 丈,辟门 4、水门 1,各建楼其上。女墙 865,窝铺 15。城外以海为濠。驻官军 1898 名。

铜山千户所,在诏安县东山岛东北,原为民间牧藪,土名东山。洪武二十一年置所筑城,周 551 丈、广 1 丈、高 2.1 丈。辟 4 门,东曰晨曦、西曰恩美、南曰答阳、北曰拱极,西南各建楼,东、北临海二门俱闭塞。女墙 855,窝铺 16。驻官军 1222 名。

玄钟千户所,在诏安县东 40 里,乃闽海尽处。洪武二十一年置所筑城,周 550 丈、广 1 丈、高 2 丈。辟门 4,各建楼,其东、西门阻海,北门通路,南门塞之。女墙 861,窝铺 15。环海为濠。驻官军 1168 名。

### 3. 巡检司

水澳巡检司,在福鼎县东南 50 里四都,旧为桐山巡司,洪武二十一年移置于此,筑城周 160 丈、高 1.5 丈。

大笕箐巡检司,在福鼎县东南 50 里六都。洪武二十一年移蒋洋巡司于此,筑城周 160 丈,高 1.5 丈。

清湾巡检司,在霞浦县东五都,洪武二十一年置司并筑城,周 160 丈。设弓兵 100 名。

高罗巡检司,在霞浦县东四十三都,洪武二十一年置司并筑城,周 160 丈。设弓兵 100 名。

延亭巡检司,在霞浦县南五十三都,洪武二十一年置司并筑城,周 160 丈。设弓兵 100 名。

松山巡检司,在霞浦县东 10 里,下有港风涛险恶,后沙汇为迳,海中有屿横列如屏,曰屏风屿。洪武二十一年置司。

北茭巡检司,在连江县东二十六都,北茭山穿入海复为巨石涌出者为北茭礁,长横三百控海,民强悍习水性,贼船畏之。计福郡水洋南至福清江口,北至福宁沙埕,共千七里有奇,可称海滨天堑者,长乐南茭、福宁沙埕、连江北茭耳。本名获芦镇,宋设水砦于此,元为获芦巡司。洪武二十一年改置,筑司城周 150 丈,设弓兵 120 名。

蛤沙巡检司,在连江县东北 50 里,崖石峭立如壁,与定海相为唇齿,亦冲要戍守处。洪武二十一年江夏侯周德兴移亭角巡检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设弓兵 100 名。

闽安镇巡检司,距省城 80 里,在闽县江右里,为会城东面之险要。海水潮汐与马江汇于闽安镇,有两口,一东出双龟门,外绕壶江、五虎;一南出琅琦门,外绕广石、梅花,为江海之锁钥,会城之门户。洪武二年置巡检司,顺治十五年(1658 年)筑城。设弓兵 60 名。

官母屿巡检司,在府东百里大海中五虎山下。五虎门为冲险海汛,南界长乐梅花汛,北界连江定海汛,洋中有进屿、芭蕉、虎榭、熨

斗等屿,其熨斗、馆头、妈祖庙诸澳可泊舟。洪武二年置巡检司于此。设弓兵 60 名。

松下巡检司,在长乐县东南 35 里,为长乐之咽喉,福清之门户。自梅花至松下,中历后山、门口、黄崎、仙崎、漳港、壶井、蛤屿、漳坂诸屿,皆波涛冲激,傍岸水浅,大船难进,独松下渐南与福清接壤为客船停泊之区。海坛包其东,南有观音澳、苏澳可暂憩,故松下之备宜豫。洪武二十一年移福清海口巡检司于此,设弓兵 70 名。嘉清三十七(1558 年)拓寨为城。

小祉巡检司,在长乐县东 20 里,明洪武六年(1373 年)设防倭巡检寨司,驻弓兵 70 名。嘉靖间(1522--1566 年)筑寨为城。崇祯六年(1633 年)移置大祉澳。

石梁蕉山巡检司,在长乐县东南 30 里,依山濒海,东有磁澳,北有猫屿,为舟船出没之所。明洪武六年设防倭巡检寨司,设弓兵 70 名。嘉清三十八年(1559 年)拓寨为城。

壁头巡检司,在福清县东江阴里,临海要冲,洪武十二年(1379 年)移南日巡司(元置南日里)于此,改今名。设弓兵 60 名。

牛头巡检司,在福清县东南平南里,洪武十二年移迳江巡司(元末置迳江口)于此,改今名。设弓兵 100 名。

泽朗巡检司,在福清县东南化北里,洪武十二年移练门巡司(元置练门)于此,改今名。设弓兵 40 名。

迎仙巡检司,在莆田县东北 40 里待贤里,前临海后负江,为滨海要地。宋初置司于其东施水亭,熙宁四年(1071 年)徙迎仙市北,崇宁元年(1102 年)徙迎仙市西,洪武二十一年改置于此,筑城周 150 丈、广 1.1 丈。辟门 2,各建楼其上。堞 308,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冲沁巡检司,在莆田县东 40 里兴福里,三面阻海,与崎头、三江、澳港相接。司旧置兴化县寻阳山下,洪武二十一年移置于此,筑



城周 150 丈,广 1.1 丈,辟门 2,各建楼。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嵌头巡检司,在莆田县东 80 里武盛里,界山海间,为登涉要地。洪武二十一年移莆禧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广 1.1 丈,辟门 1,各建楼。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青山巡检司,在莆田县东 90 里奉国里,东、西、南三面阻海,夷舟多由此入,南日山峙其南,渡海不过 50 里,为郡之门户。洪武二十一年移南哨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广 1.1 丈、辟门 2,各建楼。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吉了巡检司,在莆田县东南 80 里新安里华胥山下,前控南日,右引小屿,左带湄洲,迫临大海。宋时建寨名击蓼,亦极了,以莆地至此而极也。洪武二十一年置巡检司,改今名。筑城周 150 丈、广 1.1 丈,辟门 2,各建楼。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小屿巡检司,在莆田县南醴泉里小屿山下。洪武二十一年移仙游枫亭驿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广 1.1 丈,辟门 2,各建楼。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峰尾巡检司,在惠安县东北 40 余里,北障沙格,南距黄崎,犄于兴化吉了、湄洲诸岛,盗船多泊于此,兵船番汛焉。左支一潮入枫亭,与黄崎对峙如门,诸商所集之地也。洪武二十一年移沙格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广 1 丈、高 1.8 丈,西、北辟门 2,窝铺 6。设弓兵 100 名。

小岞巡检司,在惠安县东南小岞山下,南接牛屿,北接湄洲。城立山巅,前盱大岞,后盼黄崎,西面环海。屿前后皆为湾澳,贼舟不敢登。洪武二十一年移小兜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广 1.2、高 2 丈,南、北辟门 2,各建楼,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黄崎巡检司,在惠安县东黄崎山下,高山犄起,下瞰无际大海,湄洲、南日在其东北,峰尾、小岞互为犄角。黄崎尤为险要,海多礁屿,生寇不敢径至,一潮水可达鞞川。洪武二十一年移德化清奉巡

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广 1 丈,南、北辟门 2,各建楼。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獭窟巡检司,在惠安县南,岛屿海中,北障前头山,南紫覆釜,南北风皆可行舟。舟入泉州港必经之地,岱屿、祥芝在外,烽火可相应。洪武二十一年移南安芦溪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广 1.6 丈、高 2 丈,西、北辟门 2,各建楼。窝铺 8。设弓兵 100 名。

围头巡检司,在晋江县东南,正临大海,南连浞洲,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宋嘉定十一年(1218 年)置宝盖寨,元寨废,洪武二十一年移永春陈岩巡司于此,筑城周 160 丈高 1.6 丈,南、北辟门 2,各建楼。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乌浞巡检司,在晋江县东南 90 里,南临大海,东接深沪,西连福全,有圳上澳在深沪、福全间。洪武二十一年移安溪大西坑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高 1.8 丈,东、西辟门 2,各建楼。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深沪巡检司,在晋江县东南 25 里,东滨大海,北永宁卫,南福全所,西邻浞尾,通南日,接铜山。由深沪接永宁卫为佛堂澳,海寇出入必经之地。元置巡司,洪武二十一年移府南港边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高 2 丈,南、北辟门 2,各建楼。窝铺 7。设弓兵 100 名。

祥芝巡检司,在晋江县东,东抵外洋大海,南至永宁卫及郡城,与崇武所相对。洪武二十一年移石湖巡司于此,筑城周 150 丈、高 2 丈,南、北辟门 2,窝铺 6。设弓兵 100 名。

高浦巡检司,在同安县西南,洪武二十一年移县西积仓坂尾巡司于此,筑城周 140 丈、广 0.7 丈、高 1.8 丈,南、北辟门 2。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塔头巡检司,与高浦司相近。洪武二十一年周德兴移巡司于此,筑城周 130 丈、广 0.8 丈、高 1.7 丈,南、北辟门 2,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田浦巡检司,在金门镇北,旧置于安溪源口渡,洪武二十一年移安溪源口渡巡司于此,筑城周 140 丈、广 0.7 丈、高 1.8 丈,南、北辟门 2。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官澳巡检司,在金门镇北,去峰上 20 里。峰上民勇战斗,置精兵其处,倭来必不越而攻官澳,然非官澳,则峰上之守亦孤,唇齿相依也。洪武二十一年移德化东西团巡司于此,筑城周 160 丈、高 1.7 丈,南、北辟门 2。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峰上巡检司,在金门镇东,汛居浯洲屿最东,其澳曰料罗,同海外大嶝、小嶝、古浪屿诸岛相望。洪武二十一年移南安莲河巡司于此,筑城周 192 丈、广 1 丈、高 1.8 丈,辟门 1。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陈坑巡检司,与峰上巡司相近,洪武二十一年移晋江石井巡司于此,筑城周 180 丈、高 1.7 丈,辟门 1。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烈屿巡检司,在金门镇南海中,屿周 20 余里,大小山数十,唐时置牧马监于此,与金门隔潮并峙,海上有警则烈屿先受其锋。洪武二十一年移南安澳头巡司置此,筑城周 180 丈、广 1.1 丈、高 1.7 丈,辟门 1。窝铺 4。设弓兵 100 名。

濠门巡检司,在海澄县三都嵩屿,洪武二十一年移海沧洋巡司于此,筑城 150.6 丈、北辟门 1,建楼其上。

岛尾巡检司,在海澄县东南二十三都,海防险要,洪武二十一年置司筑城,周 115 丈,东、西辟门 2。

古雷巡检司,在漳浦县东南九都,临海,北风湾泊之所。洪武二十一年移小溪巡司于此,筑城,设弓兵 100 名。

后葛巡检司,在漳浦县东南九都大洋社,洪武二十一年置司筑城,周 115 丈,东、西、南辟门 3,设弓兵 100 名。

井尾巡检司,在漳浦县二十三都海屿中,凡船舟南风则泊于此。洪武二十一年置司筑城,周 115 丈,东、西、南辟门 3。设弓兵

100名。

洪淡巡检司,在诏安县五都北浦,洪武二十一年置司筑城,周110丈,东、西辟门2。设弓兵80名。

金石巡检司,在诏安县五都山东社,洪武二十一年置司筑城,周115丈,东、西、南辟门3。设弓兵80名。

东沉赤山巡检司,在诏安县五都山西社,洪武二十一年置筑城,周115丈,东、西、南辟门3。设弓兵80名。

#### 4. 水寨

烽火门水寨,在福鼎县东南90里秦屿。秦屿与烽火山对峙,矗立如门,外临屏风、筋竹、大箭、小箭、七星、四泷等山,内有白鹭、南镇、黄岐等汛,与沙埕、三沙相为犄角。其居霞、鼎之交,当闽、浙之冲,岛屿棋布,塘汛星罗,诚本郡之外卫,亦省会之重门,备御最切。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水寨,以卫官领兵守之,后改设钦依把总1员,统守兵1684名,兵船28只,拨福州左、中和福宁3卫军及大金守军协防。烽火门水寨北界浙江蒲门,南界连江濂澳,礮山、大金、浮罗、箬头帮皆其汛地。会哨地方若寇由浙而南,则烽火分兵北割,井下与浙船会,南则与连江县定海所、小埕水寨兵会哨于西洋山。其后以汛地延袤300余里,难以速及,清兵分船为2枝,1泊官澳,1泊箭山,并增中哨防守三沙。正统九年(1444年)移松山。

小埕水寨,在连江县东120里定海所前,北接烽火,南接南口,内有蛎坞可避风,洋面有月屿、青屿、贵屿、五官屿。小埕为省城门户,与定海犄角,其汛地乃远至东涌,拒贼于外海。洪武二十年置寨,以卫官领兵守之,后改设钦依把总1员,统守兵1640名,兵船46只。递年春冬2汛,春为大汛,防东南风,冬为小汛,防东北风。巡抚调福州左卫官11员,领旗军1389名;调镇东卫梅花、万安2所官17员,领旗军2542名;调福宁卫定海所官4员,领旗军400名,押送赴寨,分配各船,匀5哨贴驾出洋。前哨汛北茭、西洋山;后

哨汛竿塘、白犬山；左哨汛竿塘下目山；右哨汛上、下竿塘山；远哨汛东涌山，北与福宁烽火、南与兴化南日寨会。

南日水寨，在兴化府东南海中南日山下，环岛 22 里，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冲，南可以阻湄洲、岱坠之扼，亦要区也。有西寨澳仔系深水，南风可泊船；鲎壳澳系深水，北风可泊船；镜仔澳系深水，可寄椗。水程至象城 60 里，至平潭 120 里，洋中有小日、乌丘、东甲、西甲为最要地，又有大麦、小麦、大饼、小饼、赤屿、西罗盘、东罗盘、旗山、鼓山、分流礁、五虎礁、兔屿等岛。洪武二十年置水寨，以卫官领兵守之，后设钦依把总 1 员，统守兵 1500 多名，置战船巡防，拨兴化、平海、泉州 3 卫军协守。水汛与兴化象城对峙，山顶设烟墩了望，北会哨至松下、南茭，与小埕会；南会哨于平海之湄洲。景泰（1450—1456 年）后移吉了之东，仍以南日为名而旧寨遂废。

浯屿水寨，在同安县东南大海中，扼大、小担 2 屿之险，绝海门、月港接流之奸，水道四通，为漳州海澄、泉州同安 2 邑门户。其地亦名五澳，实番人巢窟也。洪武二十年置水寨，以卫官领兵守之，后设钦依把总 1 员，统守兵 2200 名，又卫所贴驾军 580 名，兵船 32 只，后福哨、冬乌等船共增至 48 只，永宁、漳州卫军协防。所辖汛地，由岱屿南接于漳州，分兵 4 哨，出汛时 1 屯料罗，1 屯围头，1 屯崇武，1 屯永宁。每汛与铜山、南日两寨及浯铜游兵合哨，稽风传筹。嘉靖间移置厦门。

铜山水寨，在漳浦县二十三都井尾澳，洪武二十年置，以卫官领兵守之，后改设钦依把总 1 员，统福船、哨船、冬船、快子船共 46 只，守兵 1141 名，遇汛贴驾征操军 555 名，拨镇海卫陆鳌、玄钟 2 所军协防。所辖北自金石以接浯屿，南自梅岭以达广东，为漳郡滨海重镇。非汛期则团泊寨澳，轮番出哨，遇汛期则分哨四出，前哨镇海，左哨陆鳌、右哨沙洲，后哨鲎壳澳，而横屿、菜屿、井仔湾、大小甘山则外洋岛屿最险要者。景泰间移置铜山。

综上所述,制如下表,以供便览。

类别	名称	地 址	城 堡 规 制					驻军
			周	广	高	门	窝铺	
卫	福宁	霞浦县东	4(里)	1	1.9	4	29	5000
	镇东	福清县方民、新安二里间	880	1	2.3	4	43	8687
	平海	莆田县城东90里	860.7	1.8	1.4	4	30	5516
	永宁	泉州府城东南50里	875	1.5	2.1	5	32	6935
	镇海	漳浦县城东北95里	873	1.3	2.2	4	20	5000
守御千户所	大金	霞浦县五十二都	582			3		1120
	定海	连江县二十都	600		2	3		1520
	梅花	长乐县东北40余里	648	0.6	1.8	2	20	1458
	万安	福清县平南里	525		1.6	3	13	1499
	莆禧	莆田县新安里	590	1.2	1.2	4	20	1221
	崇武	惠安县东南45里	737	1.3	2.1	4	26	1221
	福全	泉州府城东南87里	650	1.3	2.1	4	16	575
	金门	同安县东南海中	630	1	1.7	4	36	1535
	高埔	同安县安仁里	452	1	1.7	4	16	1258
	陆鳌	漳浦县东南60里	552.6	1	2	4	15	1898
	铜山	诏安县东山岛东北	551	1	2.1	4	16	1222
	玄钟	诏安县东南40里	550	1	2	4	15	1168
巡检司	水澳	福鼎县东南四都	160		1.5			
	大箕	福鼎县东南六都	160		1.5			
	清湾	霞浦县东五都	160					100
	高罗	霞浦县南四十三都	160					100
	延亭	霞浦县南五十三都	160					100
	松山	霞浦县东10里						
	北茭	连江县东北二十六都	150					120
	蛤沙	连江县东北50里	150					100
	闽安镇	闽县江右里						60
	官母屿	闽县五虎山下						60
	松下	长乐县东南35里						70
	小祉	长乐县东20里						70
	石梁	长乐县东南30里						70
燕山壁头	福清县江阴里						60	

巡 檢 司	牛头	福清县平南里					100	
	泽朗	福清县化北里					40	
	迎仙	莆田县待贤里	150	1.1	2	8	100	
	冲沁	莆田县兴福生	150	1.1	2	8	100	
	嵌头	莆田县奉国里	150	1.1	2	8	100	
	青山	莆田县东90里	150	1.1	2	8	100	
	吉了	莆田县新安里	150	1.1	2	8	100	
	小屿	莆田县醴泉里	150	1.1	2	8	100	
	峰尾	惠安县东北	150	1	1.8	2	6	100
	小岞	惠安县东南	150	1.2	2	2	8	100
	黄崎	惠安县东	150	1	2	2	8	100
	獭窟	惠安县南	150	1.6	2	2	8	100
	祥芝	晋江县东50里	150		2	2	6	100
	乌浔	晋江县东南90里	150		1.8	2	4	100
	深沪	晋江县东南25里	150		2	2	7	100
	围头	晋江县南80里	160		1.8	2	4	100
	高浦	同安县西南	140	0.7	1.8	2	4	100
	塔头	同安县西南	130	0.8	1.7	2	4	100
	官澳	金门镇北	160	0.65	1.7	2	4	100
	田浦	金门镇北	140	0.7	1.8	2	4	100
	陈坑	金门镇东	180	1.1	1.7	1	4	100
	峰上	金门镇东	192	1	1.8	1	4	100
	烈屿	金门镇海中	180	1.1	1.7	1	4	100
	濠门	海澄县嵩屿	150.6			1		
	岛尾	海澄县东南二十三都	115			2		
	古雷	漳浦县东南九都						100
	后葛	漳浦县东南九都	115			3		100
井尾	漳浦县东南二十三都	115			3		100	
洪淡	诏安县五都北浦	110			2		80	
金石	诏安县五都山东社	115			3		80	
东沉赤山	诏安县五都山西社	115			3		80	
水 寨	烽火门	福鼎县东南90里秦屿					1684	
	小埕	连江县东二十七都	2110		1	2	1640	
	南日	兴化府东南南日岛					1500	
	浯屿	同安县东南浯屿					2200	
	铜山	诏安县二十三都井尾澳					1141	

### 三、崇武所城遗迹

明初福建沿海建造的数十座卫所司城堡,随着时间的流逝,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崇武所城是至今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唯一遗迹。这里,我们就对其历史与现状作一具体的考察,以窥视明初福建海防建设之一斑。

#### 1. 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崇武位于惠安县东南 50 里之半岛上,北连湄洲湾,南控泉州港,东濒台湾海峡。早在 3、4 千年前,就有人类在这些地方定居和活动了。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析晋江北乡置惠安县,即管这里为崇武乡守节里。自宋以来,崇武凭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其地位越来越显重要。她不仅逐渐发展为通海联陆的商贸之“都会”<sup>①</sup>,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成了福建沿海的一个军事“重镇”。

北宋熙宁间(1068—1077 年),建小兜巡检检察于此,同时在泉州沿海置寨的还有石湖等处。晋江之石湖“专管晋、南、惠、同陆路地方”,而惠安的小兜为“海人州界首”,负责巡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沿海一带,设有巡检 1 员、监税务 1 员<sup>②</sup>。从建寨的时间、管辖的区域和所设官员的职务来看,置小兜巡检寨,恐怕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海寇患郡,更为重要的是以巡监海上,查缉商船走私漏税为目的的。北宋中前期,泉州的海外通商已相当活跃,但至宋元祐二年(1078 年)之前,宋政府只在广州和两浙路的杭州、明州(今宁波)置市舶司来“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sup>③</sup>,负

① 《崇武所城记·碑记·南门关夫子庙序》。

② 《崇武所城记·城池》。

③ 《宋史》卷 167《职官志》。



责进出口商舶的遣发及对其货物进行抽解征税,防止商舶货物的走漏等。泉州当时还没有这种专门管理市舶货物的市舶司机构之设置,中外舶商必须经广州市舶司勘验或抽解,才能到南海贸易和来泉州做买卖。这些市舶条例的规定,给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和国外商客前来贸易造成了诸多不便。因此,也就出现了“冒法私走”、“稳匿透越”的严重现象。小兜巡检寨设于这个时候,并置“巡检”、“监税务”官职,尽管防御海寇是其重要职责,然而可以说在元祐二年泉州设置市舶以前,她在检查监督舶商防止“偷税”和“违制”方面,则起着更加主要的作用。

元祐二年泉州设置市舶司之后,改变了过去那种“民益不堪”的规定和弊端,遂使泉州的海外贸易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南宋时期寇患的增加,小兜巡检寨也因之而不断地加强了她的军事地位,日益显示出军事上的重要性。北宋年间,泉州境内设有5处巡检寨,惠安之小兜是其一。南宋泉州沿海置水澳、法石、石湖、宝盖寨和小兜巡检寨,而其中“紧要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sup>①</sup>,当时又有“先小兜、次石湖”<sup>②</sup>之誉,足见小兜寨所处地位之重要。元丰二年(1079年),海寇犯郡,拔禁军100名置小兜寨弹压,“后抽还禁军,改招土军,增十人”<sup>③</sup>,驻军数为110名。乾道七年(1171年),“岛寇毗舍邪掠海滨”,又“增二百人”<sup>④</sup>。小兜寨之规模发展到额管军士310人,有寨屋100间<sup>⑤</sup>。

“南宋之初,盗贼屡作”,泉州“置兵立戍,所以为海道不虞之备

① 《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② ③④ 《泉州府志》卷24《军制》。

⑤ 关于宋时的寨屋间数,《崇武所城志·城池》云:宋“造军房三十六间”,此误矣。据《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载:“寨屋原管一百间,今见存三十余间,余皆倒坠,合行添盖”,可见应为100间。而《泉州府志》卷24《军制》云:“真德秀造营房六十有二”,乃是修葺倒坠的寨屋间数。

者至详而密”，但自开禧(1205—1207年)之后，“武备空虚，军政废坏”。小兜巡检寨在嘉定初(1208—1224年)只剩土军41人，水军107人，见存寨屋38间，余皆倒坠<sup>①</sup>，于是海盜“窥见军弱，辄萌侵軼之志”，他们“劫米船以丰其食，劫番船以存其财，掳丁壮掳舟船以益张其势”<sup>②</sup>。盜氛日炽，海道不宁，给人民的生活及政府的课利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影响。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知泉州，“遍行海滨，审视情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振军政，以固海疆。他不仅增屯要害，新置宝盖寨，而且对原各巡检寨逐一进行整治。如小兜寨，新招增补水军等152名，修复建造营房62间，并储蓄军粮，葺理器甲，使寨守之制，色色具备。与此同时，还“立诸寨巡海界分”：自岱屿以北至兴化军蓼寨而止，为小兜、石湖两寨主之；自永宁以南至漳州柵寨而止，为水澳、宝盖主之；岱屿之内至永宁而止，为法石主之<sup>③</sup>。小兜被视为是“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sup>④</sup>。入明以后，据《崇武所城志·城池》载：“洪武二十年丁卯，江夏侯周德兴奉命语略海棋，置卫所以备防御，遂将小兜巡检司移于小岞，乃置崇武千户所。因此为崇武乡，故名城其地。”崇武成为江夏侯周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而设置并筑城的12守御千户所之一。

## 2. 规制和设施

崇武所城是明初福建沿海建造的12座所城(包括洪武二十七年筑厦门中左所城)中规模最大的1座，仅稍次于福宁等5座卫城。

**城墙** 城滨海而建，以花岗岩条石砌筑，周围737丈，基厚1.5

①④ 《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② 《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③ 《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

丈,连女墙高 1.7 丈,城面即马路,有垛子 1304 个。城墙外甃以石,内垒土。永乐十五年(1417 年),都司谷祥临视,城增高 4 尺,连女墙高为 2.1 丈。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曾三引贼攻城 6 昼夜,城大坏,千户朱紫贵揭呈兴泉道盛唐,委惠安县典史陆辅勘佑,呈详都御史王依例扣取各官军粮钱、钞银,分给所中上中下富户杨若愚等 40 人领之,募匠筑内边城墙高 6 尺,马路修阔 1 丈 2 尺,副千户徐鸾督修。清康熙嗣位之初,旨下南浙闽粤沿海地方迁弃,城堆屋毁尽化为丘墟。越后城池再修,宫室重建,但历久远而城又渐圯。嘉庆十年(1805 年),惠安知县吴忠倡修南门内外城墙 20 余丈,其作《募修崇武所城序》,对崇武所城的重要性及修葺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窃惟惠邑崇武一城,雄峙海上,所以制险御侮非常也。凡沿海列戍,不啻星罗台布,而全城居民之多,滨海扼要之重,无过于崇武。本署县莅任后,即亲巡各澳,以慎防守。至崇偏历四门,查内外城墙坍塌段落甚多,急应修葺。嗣后朱溃帮匪船,近逼澳口停泊,本县恐其登岸滋扰,漏夜星驰堵御。匝月以来,随同本府宪王会营,昼夜巡防,击沉大号匪船,始行开窄。查崇武澳为商船渡台捷径,往往洋盗伺劫,在近澳一带,游奕俱多,乘间登岸滋事。本县不惜多费,不惮劳瘁,现在建筑炮壁,设立窝铺,为善后计。凡一工一料,总为保护斯民起见,指日即可竣工。惟城墙坍塌处所过多,若此时一律兴修,需费甚钜,然捍卫所关,岂容稍置。现拟将最紧要之南门城外墙三段,计二十一丈,又南门内墙左右,各先修二十丈。兹蒙本府宪指廉首倡,本县保赤心殷,急公恐后,谨已循照捐输,但所需工料约计千元,非藉协力助襄,不能成事,合行给簿,在城绅士乡耆,一体劝捐,庶观成较易,务须踊跃乐输,期于旬日内,集有成数覆县。并义举老成公正之人,凡一切庀材鸠工,责成经理,无令胥役干与,以杜浮冒,俾得迅速完竣。匪特该绅士等有家室晏安之乐,将见滨海

垣墉，规模巩固，御外侮而奠生民。本署县延跂以待”。<sup>①</sup>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知县雷仑到崇武观风，伤所城之残缺，劝众捐金并尝共督修理，城复固。环城有窝铺26座，西南1铺，地势高峻，风雨易于飘摇，舟辑辘泊，奸宄难以测识，设有不戒，乘夜依浅，捣虚薄城，故此铺极为要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朱彤、张旌劝捐，纯用石砌筑，为坚久备御之计。

**城门** 城四方设门，北门原有月城，永乐十五年，都司谷祥加筑东、西2月城，唯南无月城，建亭1座在城门内，门外筑照墙为屏蔽。月城呈半圆形，设外城门与内城门不同朝向。内门每扇高9.5尺，阔3.8尺，木制用铁板包钉。铁板并钉重146斤，必擦桐油，方耐海雾。前有附板函，如警急则下板重闸，坚壁而守可固。外门较小，每扇高7.7尺，阔2.6尺，俱包铁钉擦油。4城门上各建楼，门楼同城筑，岁久倾坏。嘉靖四年（1525年）八月，千户徐洪等会议，以西门路当往来之冲，无楼不成边防，劝捐重建，规模视昔尤壮。后里中鸠众修整，益加华丽，上祀关帝神象。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十一月，千户钱鼎呈请军钞及劝捐起盖东门楼。万历四十年（1612年），千户祖爓请公帑重修，吴炜募众塑玄天上帝于上。崇祯五年（1632年）千户朱康宪重修。天启四年（1624年）千户徐赞垣等劝捐重修南门楼，塑观音佛祖像于上。北门楼亦经重修，祀赵元帅于上，今尚存。

**城濠、水涵** 城依地势建筑，高下起伏，城濠周围不相通。岁久淤填，俱耕为园地。山城原无濠滩，每遇秋冬之交，飞沙填宿，至与城齐，五尺之童，可附而窥，缘而登也。畚鍤担移之役，无时不劳苦土民。固后胡、赤涂墩、赤山东3处，开荒插薯使然。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惠安县令陈淙申详两院，竖碑禁革，不许耕种，留为荒

<sup>①</sup> 《崇武所城志·碑记》。

埔,产米除豁,数年幸无沙患。后有忘害之人,不遵宪示,营钻再垦,致沙又半至城,官府再给示禁革。通城水涵4口:1在东门楼兜,1在第4铺敌台边,1在下田庵前,1在西谢井边。又水关1道,亦在下田水涵之北,地尤低下,海潮直抵城脚,暴雨不住,易致水患。万历元年(1573年),淫雨异常,涨满至城堞,城被冲倒,水关一带崩陷,后千户胡熊等请饷督修,仍旧重新砌筑。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城池,以水关1道,奸贼可以通往,故筑密以恃无恐。

根据《崇武所城志》及《惠安县志》记载,崇武所城自建立后,在明清两代先后进行过19次的修葺增筑,兹列表如下:

时 间	修 葺 者	工 程
洪武二十八年	千户钱忠	重修门楼
永乐十五年	都司谷祥	城增高4尺,并筑东、西2月城
正统八年	都指挥刘亮、千户寇祺	增筑敌台1座于城东门外
嘉靖四年	千户徐洪等	重建西门楼
嘉靖二十二年	千户钱鼎	起盖东门楼
嘉靖二十三年	千户朱彤	修治垣堞
嘉靖二十五年	千户胡恩敬、朱彤	重建南、北二门楼,修筑北城墙 600余丈
嘉靖三十七年	千户朱紫贵倡修、富 户杨若愚等领之,副 千户徐鸾督修	筑内边城墙高6尺,墙上马路 修阔1丈2尺,窝铺26座
嘉靖三十九年	千户朱紫贵	修葺雉堞之圯毁者
万历元年	千户胡熊等	水关一带城崩陷,仍旧重新砌筑
万历二年	千户胡熊	于城南、北、西三面卜建敌台4座
万历二十九年	千户钱际昌等	修筑西月城
万历四十年	千户祖燦	重修东门楼
天启四年	徐赞垣等	重修南门楼
崇祯五年	千户朱康宪等	重修东门楼,并筑城下二准头;修 南门楼西房鞞屋,并筑城下二准头
康熙五十三年	里人张鸣麟	重修东门楼
康熙五十五年	总督觉罗满保、巡抚 陈瑛	再修城池,重建宫室
嘉庆十年	知县吴忠倡修	修南门城内外墙20余丈
道光二十一年	知县雷仑劝众共修	重修城池

至今仍保存有与修筑所城有关的碑记3方,录之以飨读者。

### 建崇武城楼记

崇武所,隶永宁卫,去泉州郡治百里,居民数千室,城郭甚完,盖滨海要害之区也。岁远,城垣日浸崩塌,所司屡申白不报。嘉靖二十五年,千户胡思敬、朱彤白之郡守程公秀民,慨然曰:吾责也。即白之巡按御史赵公应祥。故事凡此建设,必取诸军民,军民无敢异议。公曰:将以安之而先以扰之,可乎?于是下惠安知县陈良法,议以官帑百金撰才能,千户朱彤董工,修筑北城墙,约长六百余丈,重建南北城楼,工始是年九月初六日,越明年五月十三日讫工。朱彤请记。

夫崇武者,武人之所有事也,非牧民之亟也。牧伯馭其民,兴文化诲犹不给,而暇崇武乎?方今礼乐会同,海宇宁谧,圣天子崇儒明道,四方冠裳之伦,靡不忻然以文章道术自献其知。而程公博学闳识,远守海滨,顾于武备汲汲焉。崇武处海滨尤远,楼城之事微矣,为史者耳目所及,尚不欲新。矧新其微者于所尤远哉!

盖闻王者制治,地有远近,无非愿治之民。君子临斯民之上,事有巨细,因其毕举兼施,不使一物不得其所。兴文崇武,为道不同,要以保厘安全之,而安不忘危,学武者,所谓兴文之地,盖今之所好在文,其所先务不在文也。昔者周单于聘楚过陈,道秽不治,叹曰:其将亡乎!夫道之秽尤甚微,而可与于存亡之数无巨无微,无远无迹,无武无文,一事治则事事举,治一心存则心心举存。凡文武室翕,因革张置,无非为政者之文章也。观崇武城楼,而程公为政可知。是故不得不记。

又闻城楼倾百余年,海寇猖獗,出没风涛之间,肆旷而直陈,民无保障。而介冑之夫,穷年日夕,司斥堠,负矢石,廛守

御，将安所凭丽乎？万一斯所不虞，诸州城邑贴席乎哉？然则斯所固诸州唇齿，其地非远，其事不得谓之微也。程公不毫发有捐手下，而官帑之费不奢，废坠振兴，盗贼屏息，士卒归依，闾阎乐利，吾知德教修明，而道术有所施。是作也，盖有禅圣天子礼乐文儒之化，又不得笈笈谓之崇武而已。斯所可记楼城云乎哉。公光明介洁，博厚宽洪，民有杜父如母之歌。斯邦也，金城汤池之固，其不在城楼也夫！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八月之朔，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前二奉敕提督江西、贵州等处学校、晋江蔡克廉撰。

#### 惠安仁侯靖予陈公禁垦护城碑记

国家东南边戍，棋置海上，崇武所，惠安县戍地也。地郭聚民，寇入可内保守而外备御。不但完海上之室家，安可壮内地之楼橹。斥鹵广漠，飞沙所掩。国初，留近城地禁民耕垦，命名其莎莽蔓生，缀带盘根，则土膏用坚，风尘不动。而比者开其埔，阑入近城地插薯、取煨煤，沙松易飞，风劲易吹，东北一带，壅而成丘，高且齐城，则楼车无难，跋跲可越，墙不贵，女堞无用雉矣。

令君陈公靖予奏牒大府，申厉旧禁。视旧所城，稍画出之，起自旗尾，任尽大岞港所有垦荒科产，为之融派除豁。由是滨海垣墉，不增自高，不障自坚。崇武所诸生卓应绳、甘棠等，诣何乔远曰：公计海上，虑远而周。夫一夫之衣食几何，全城之人民实重。公保我城，不特一时，及我子孙。维先生为我记之。予曰：斯地也，吾所常游也。陈公此举，信可征来，请书而碑之，使全戍之人，世拜公赐。

公名淙，别号靖予，浙江会稽人。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秋八月，晋江何乔远撰。

### 后湖埔即赤土墩禁示碑

泉州府惠安县，为海氛警急，城塹平地，乞除沙患，以固边防事。蒙分巡兴泉道詹[ ] [ ]批，据本县申详，崇武所后湖埔等处，禁止居民不许开凿荒埔、插薯、掘煤等缘由。蒙批：

崇武孤悬海陬，匪直一惠之保障，实全郡之藩篱也。后湖埔一带荒地，不许划土扬沙，雍塞城填，致妨守御。自开国以来，已悬厉禁矣。何物奸民，假名给帖，违禁垦种，贪小利而忘大害，于一己得矣，其如全城之隐忧何？既经该县清查，立定界址，建竖石碑，世代永永不许开垦。原帖追涂，产米除豁。历年逋粒，亦姑免追。如仍前故违，从重究罪。更通谕军民人等如悉。此檄。

城内建有公署、军营房、仓廩和中军台等主要设施。

**公署** 所署位于城中偏北，与城同时并建。署中为正堂后为燕堂，又后面为旗纛庙。正堂前左右列为廊庑共10间。又前为仪门，外为大门，上盖谯楼。正堂岁久倾圮，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徐鉴捐资俸重建。弘治间（1488—1505年）钱贵移建议门于内庭，改仪门为大门，上建谯楼。正德十四年（1519年），千户钱鼎重修仪门。嘉靖四十年（1561年），朱紫贵重修谯楼，后谯楼倾坏，万历六年（1578年）徐鸾以财用不敷，姑行拆御，惟修大门，所内两廊，亦荡然无存，后于东西盖2厅。正堂之东，弘治间建镇抚司，后东祀福德牌，西为吏书抄誊文移卷房。所后东隅设监牢2间，关押人犯。所堂东房为军器库，贮盔甲火药器械等物，西房为龙亭库，收藏龙亭仪仗等物。

**军营房** 洪武中建城设军守御，置军营共987间。每间1厅2



房,接以后厨舍 1 落,总旗 2 间,小旗 1 间,或 2 军共居 1 间。营房按驻军 10 伍分建于东、西、南、北门:1 伍营房在东门兜;2 伍营房在东门庵山上寮;3 伍营房在南门;4 伍营房在南门街;5 伍营房在南中街及南城角;6 伍营房在西门街及西城麦埕处;7 伍营房在西街并第 7 巷处;8 伍营房在西门大街等处;9 伍营房在北门街并所后右畔;10 伍营房在东门街南北二边畔。后因每伍各拔军回原地方屯种及逃移,营房被附居民者混冒占住,更易起盖,遂为民居。

**仓廩** 在所治之西,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建。永乐二年(1404 年)增建官厅 1 座。后公廨 1 座,其公廨东西 2 房,乃是仓官刘润新盖。原设廩 6 座,后废其 4,只存东西 2 廩。岁贮秋屯粮米 8765 石。正德十四年(1519 年),巡按御史沈秦录派折递年征收秋屯米 3630 石。天启六年(1626 年),复改折秋米 1000 石,每石征银 7 钱,收惠安县库。至明末递年只收秋屯米 2630 石。

**中军台** 位于城中仓兜山顶头,隆庆元年(1567 年)四月,总兵戚继光建,拔 3 名军守之,了望东、南、北海上往来舟楫,及伏路墩堠去处。此台在城中之巅,遥望四方,如海洋有好歹船只,不待墩报而先知,故不可不设。有警时,千户官在台中指挥,通城军民人等,尽照派定垛口各执器械防守,后被风雨摧坏,胡熊捐资修葺,又废。天启四年(1624 年)邑大尹缪伯升捐劝重修,颜其匾为“中天台”,未几废。

城外附属有演武场、边围墩台、挥寨和汛地。

**演武场** 教场原设在西门外,离城 3 里曰西埔,后改在东门外。嘉靖十年(1531 年),千户朱彤管操,凿石为记,左竖 12 队,右竖 12 队,分为界限,以杜侵犯。造册画图,申详都司胡印铃发所存照,自是军民遵守。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朱彤重建官厅 1 座,并筑露台居中,操时总旗在此旗下驻扎。官厅两旁另盖小厂 2 间。上司按临阅操,则下各官俱在此中居处,便于伺候。明末被毫强一

占耕作及划掘葬坟,至清朝官军废,官厅倾倒无存。

**边圉墩台** 洪武初,倭寇巨测,扰害乡落,制惠安县疆里设有墩台 23 座,皆用民夫守了。中建望楼,以便起居饮食。置烟墩,夜遇寇至则举火,昼遇寇至则竖旗,使数十里之地顷刻见知而为之备。正统十二年(1447 年)定崇武所辖地方,上至惠安县二十七都护海宫为界,下至二十六都青山宫炉内为界,内设墩台 4 座,即大岞、赤山、古雷、青山,拨军守之。至清不设边防,而墩台废。

**捍寨** 在大岞地方,距所城 3 里许,因为官厂,罩其石于中,周围 40 余丈,西辟 1 门。先年所中拨军守之,承平事废。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修建所城边墙缺石,令人拆毁,将石搬运添筑。嘉靖四十年(1561 年),千户朱紫贵申请各军月粮及坦城租银重建。今存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赐进士第朝议大夫广东布政使司右参议前尚宝司丞、邑人庄应祯撰《重建捍寨记》碑刻,节录之以了解其大概:

崇江在惠之南峤,自洪武中筑城以备倭夷,置守御千户所,召军士隶于屯营,其间居民庐舍杂处,崇墉短堞,枕盼洪涛,盖天塹百二之胜也。倭缘是不敢窥边者垂二百余年。承平既久,衅孽渐萌。顷岁,漳、潮之玩宪不逞者,辟易窜倭岛中,诱致其国之人浮舟楫之寇。方庚申夏,署篆者失备,倭乘雨夜,黄缘攀堞,城为之一陷。

说者谓大岞捍寨,昔人屯兵之后,于地理有关,实崇武之藩篱也。藩篱撤去,庭户势能不溃危乎?于是千户侯朱紫贵,图修复之计,上其议于兵备道万公。即获允,遂捐己奉,不足者,军民敛余缗助之。迺寻厥旧址,审厥面势,增厥式廓,鸠工贞度,荷土垒石,登登陲陲,版锸具举,众不告劳。以辛酉岁正月初三日甲子经始,越五月十八日乃竣事。

内为官厂,罩所谓贼石于其中,周垣四十丈,雉堞凡若干

堵。登台远眺,则风帆上下,了然在目。入崇武城而东望之,隐然荷叶之状。以察贼艘,以镇风声,而崇江百二之胜,于是乎复完矣。<sup>①</sup>

大岞捍寨废于清,今已无存。

**汛地** 崇武所北门外有青岐,南日寨后哨兵船兵分泊 2 只于此,南有前屿、浯屿寨前哨兵船分泊 8 只在此。东有墓窟、三屿,浯屿前哨分 2 只泊此。又有湄洲游兵船不时上下,分泊协守。但前屿、三屿不利南风,立夏后,南颶盛发,当急移于石湖及青屿 2 处,可保无虞。此法之设不惟奸民不敢肆其毒,即倭奴无所乘其隙。至清朝而水寨汛防之法遂弃。

### 3. 驻军与职能

明朝崇武所城的驻军编制,在未置所筑城以前,倭寇登岸,就于惠安县民三丁抽一以防倭。之后,民丁编入册籍,遂为定例。所设正千户 1 员、副千户 2 员、管伍官百户 10 员、镇抚 2 员。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为调拔官军事,将玄钟所军调移崇武,10 人为队,队 1 小旗,5 队则 1 总旗,共驻军 1120 名,备器械 1742 件付。另 10 百户设官船 10 只、快船 2 只。官船 1 只,坐驾军 100 名,快船 1 只,坐驾军 55 名,俱在本处,如遇倭至,驾船出海备御。崇武所属南日水寨汛地,令军出海守把岱坠,故曰“出海军”。隆庆元年(1567 年),总兵戚继光亲诣崇武所,将在城在乡旗军余丁,抽选精壮出汛,坐驾哨船,立哨长 1 名、队长 2 名、兵 10 名、火兵 1 名,每年头三、四、五月为春汛,十、十一月为冬汛,及期驾船出海备御,余月休息,曰之“征操军”。又将食粮旗军、屯粮余丁及不食粮军丁尽数阅选,稍壮者月造支粮米 6 斗,立哨长 1 名、队长 2 名、军 10 名,有警则守城,无事则操练,每年春分开操,端午上操,冬则霜降开操,冬

<sup>①</sup> 《崇武所城志·碑记》。

至止操，故曰“城操军”。并编立“陆路军”，以卫所城池失事，往往皆非攻陷，率由掩袭而入，此无伏路之兵故也。因此所设正军 10 名，付管墩官提调。各去 3 里许冲要路口，每夜轮出各路伏哨，每给起火 6 枝，统 3 把。遇警则放火统为号，使城内中军台知情，击鼓传通城登陴守备捍御。成化中（1465—1487 年）还由于“崇武为泉、惠咽喉奥区，增兵协守，诚为至要”，而拨延平卫军 75 名、泉州卫军 50 名，共 125 名，委官 1 员领之，每年二月初一日到所协守城池，十月初一回卫。正德十五年（1520 年），奉勘合革除。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为倭寇关白，又拨泉州新营兵 2 哨，以哨官 2 员统之，驻扎西门外及古雷、大岞人家等处，协同防御。一旦“遇有警息”，在城者“不论官军民户人等，及乡绅举监生员子弟，当依垛子编号之处，协齐固守”<sup>①</sup>；而海路水寨汛地哨兵船兵一起出击，共同抵御。后因“逃亡无补者多”，至明末驻城军伍仅存操海军 602 名，屯种军 194 名<sup>②</sup>。乃至清朝，水寨汛防之法遂废。

崇武所城及其生活、军事设施的建设和重兵镇守，不仅成为一座布局合理、军备完善的城堡，而且与上下、卫所水寨相互联动，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城郭宫室、陆海军民、甲兵钱谷，于焉咸集”<sup>③</sup>。其“孤悬海噬，匪直一惠之保障，实全郡之藩篱”，<sup>④</sup>“寇人可内保守而外备御，不但完海上之室家，亦可壮内地之楼橹”<sup>⑤</sup>。发生在洪武年间的一次“倭寇千余舩大岞登岸，焚掠居民”，所千户张荣“指戈跃马”率军“迎战”，“倭亦遁去，崇民赖头安堵无故”<sup>⑥</sup>。特别

① 《崇武所城志·军伍·守城》。

② 《泉州府志》卷 24《军制》。

③ 《崇武所城志·崇武所志序》。

④ 《崇武所城志·碑记·后湖埔即赤土墩禁示碑》。

⑤ 《崇武所城志·碑记·惠安仁侯靖子陈公禁垦护城碑记》。

⑥ 嘉庆《惠安县志》卷 20《武职·军功》。

是在海寇猖獗的明末及至清初,沿海人民惨受倭害,福建地方所遭剽掠尤甚,崇武所城亦在抗倭中充分发挥了其军事职能。据《明实录》、《泉州府志》、《惠安县志》、《崇武所城志》记载,明末清初倭寇、海贼骚扰惠安达 17 次。崇武首当其冲,仅嘉靖末年(1522—1566 年),便有 7 次直接进犯崇武及其附近村庄: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掠崇武诸村。

嘉靖二十三年,掠张坑。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犯小兜海门,掠鱼商船,崇武所千户朱彤,率兵入海捕获之,献俘于府;七月,海巨贼李大用大寇大岞、三峰、溪底、东湖、凤洋诸村,彤追捕之,是暮贼退;庚戌,复合鯨大举,势甚锐,彤执枪偕率赴敌,力援诸村。贼窥朱氏兵,捐器械登舟以去。

嘉靖三十七年,倭夷拥众人寇闽中,陷郡邑,声势籍甚,仍由海道窥崇武。倭猝抵城下,城无宿备,人情震骇。千户钱储冒矢石,为士卒先,穷 7 昼夜,贼攻愈亟,储惧兵力少懈,捐俸金及贖富民粟以饷,民益激奋死守,贼多折伤,势屈潜去,城赖以完。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倭结巨舰,乘夜雨密蒙,潜梯城而上,分布巷陌,黎明方发。署篆者失备,势已难支。众从千户钱储(时已解绂)、百户王铁御倭,备战累日,力尽矢竭,钱、王死之,所城沦陷,填尸遍野。倭驻城 40 余日,掳掠一空。时分巡兴泉道佥事万民英选锋厉甲,亲操矢石,当士卒前行,召千户朱紫贵以“毒贼汲饮炊”之计,而贼饵晨炊者辄死,公揣贼穷,麾兵进剿,诸军鼓噪从之,贼且困且惧,夜弃城入海上以去,万民英继檄舟师伏海岛要害,爽击之,贼死者不可胜计,而崇武城复。

以上 7 次倭患,其中 6 次被所军伍追捕击退,1 次失守城陷。史籍记述了所城官军英勇抗倭杀贼、保境安民的情形,也记述了所城沦陷,郭蹂惨甚的状况。两种不同场景的比较,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倭寇的屡屡犯境,假如没有所城戍备,军伍抵御,人民的生

命、财产将遭到惨重的浩劫，亦更加表明了所城存在的重要军事价值。

#### 四、海防建设的历史作用

明初，福建沿海要害之处筑城置卫、所、巡检司，“守以军余，督以弁职，传报警息，凡以防倭于陆”<sup>①</sup>，而于外洋设立水寨，以防倭于海。烽火门北枕浙海为头颅，铜山南踞潮洋为尾闾，南日山左右腋北跨小埕、南肩浯屿，而南日居中为腰肢。5寨分兵会哨，声势联络，“贼寡则各自为战，贼众则合力并攻。窥烽火则小埕即赴援，南日、浯屿、铜山相继翼之，是击首尾应；窥铜山则浯屿即援，南日、小埕、烽火门相继翼之，是击尾首应；窥南日则小埕、浯屿即赴援，而烽火、铜山相继翼之，是击腰首尾并应”<sup>②</sup>。水寨“与卫所表里”<sup>③</sup>，可謂是“沿海要害处各置巡检司城，复于外海建水寨，以扼海门之险，凡所以明斥堠、严会哨，声势应援，计非不周”<sup>④</sup>，基本上实现了明初为对付海上反明势力的颠覆活动，尤其是倭寇侵扰的战略意图，正如何乔远在《闽书》中所云：“江夏侯经略海上，城寨方新，士伍骁健，又孰有寇？”<sup>⑤</sup>确实是“倭缘是不敢窥边”，而起到了“赖以戍边，实以保民”<sup>⑥</sup>的应有作用。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福建海防建设在保护朝贡和执行海禁政策上的功能。洪武初年，设市舶司于泉州，规定“泉州通琉球”<sup>⑦</sup>，泉

① 《重纂福建通志》卷16《历代守御》。

②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11《戎备》。

③⑤ 《泉州府志》卷25《海防》。

④ 《晋江县志》卷7《武卫志》。

⑥ 《崇武所城志·碑记·崇武所朱侯爱民御寇碑记》。

⑦ 《明史》卷81《食货》。

州成为琉球入明朝贡的进出口岸。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复置曾被罢设的市舶司<sup>①</sup>,又于三年“以诸蕃贡使益多”而置来远驿于福建“以馆之”<sup>②</sup>,专门接待来贡使者的来远驿就设于泉州城南。<sup>③</sup>虽然明廷对琉球的人贡作了限制,但据《明实录》所记载的从洪武五年(1372年,始入贡)到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迁福州)的100来年间,琉球派遣使者入明朝贡达248次。与此同时,明朝政府的多次遣使海外,也从泉州发舶。如洪武三年(1370年),御史张敬之等出使渤泥<sup>④</sup>;洪武九年(1376年)和十七年(1384年)泉州林骛两次“奉舶西洋”<sup>⑤</sup>;永乐13年(1415年)少监张谦奉使渤泥<sup>⑥</sup>,便是其例。无论是琉球贡使来朝还是明廷遣使海外,福建的沿海卫所水寨无疑为保护使者由泉州登岸或启航的安全往来,亦起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然而,卫所水寨也成了查禁私人出海贸易活动,执行海禁政策的工具。海,闽之田也。“闽人生息益众,非仰通番无所给衣食,又闽地狭山多,渠渎高陡,雨水不久蓄,岁开口而望吴越东广之粟船”。<sup>⑦</sup>而明廷厉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责令“沿海寨司”之官“稽察”,违禁者“捕治”,海禁严急,商船不通,“民何以存活乎”?<sup>⑧</sup>严重地影响了沿海人民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海防建设之严密与滨海人民为求生存而“贷货通番愈遏愈炽”的矛盾,导致“外寇之来皆由内寇纤引之”的恶果,<sup>⑨</sup>体现了其严重的负面功能。海禁是作为明初巩固海防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来的,因此,厉

① 《明史》卷75《职官志》。

②③ 《泉州府志》卷4《封域》。

④ 《明史》卷325《渤泥》。

⑤ 《泉州凤池林李宗谱》。

⑥ 《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天后宫》。

⑦⑧⑨ 《泉州府志》卷25《海防》。

行海禁成为沿海卫所水寨所必须例行的职责之一。这样一来,卫所水寨也就必然地具有正、负两面不同的功能。一方面在抵御倭寇、戍边安民中作出贡献,而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在稽查走私、厉行海禁中发挥作用。

明初的海防建设,尽管存在着消极的负面功能,但它在威慑来敌、抗倭保境方面的历史作用,则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 明清时期泉州青花瓷的生产与外销

经过文物普查,目前在晋江流域的泉州地区发现的青花瓷窑址近 200 处,主要分布于德化、永春、安溪、南安等县境内。

德化位于泉州西北部,是我国古代陶瓷生产及外销的产地之一。明代德化已有釉下青花瓷的生产,至清代,青花瓷在技术和质料上已臻成熟,成为德化青花瓷生产的全盛时期。全县 15 个乡 41 个村,已发现的青花窑址达 130 多处,散布于城乡各地,其中以西北部的上涌、葛坑、汤头和南部的浔中、三班等乡最为密集。较有代表性的窑址有:位于上涌乡红村的陈七垵窑、后格垵尾窑,门头村的黄仔坂窑,桂格村的和玉窑,辉阳村的仙亭厂窑;位于葛坑乡下玲村的石坊窑;位于汤头乡汤头村的山边洋窑;位于浔中乡宝美村的岭兜窑,良太村的后所窑、宏祠窑,浔中村的石排格窑;位于三班乡奎斗村的碑坝窑、三班村的桐岭窑、蔡径村的洞上月记窑等。主要器形有盘、碗、碟等,饰以云龙、花草为多,也有书写文字的,多见款识。

永春县紧邻德化南部,境内的桃溪是晋江上游两源之一。全县已发现青花窑址 13 处,集中分布于介福乡和苏坑乡。此外在湖洋乡、东平乡也有部分窑址。介福乡有陈兰窑、黑坝窑、外窑、长垵窑、风流岭窑、过路溪窑、白格窑、南社岭窑;苏坑乡有洋坪窑、嵩安窑;湖洋乡有碗窑芒窑;东平乡有石蔗山窑等。器形以碗盘为大宗,主要纹饰为云龙、折枝花果、圆点纹等。

安溪地处晋江上游,西溪、兰溪贯穿县境。明清青花窑址多分布在两河流域,以东部、中部和西南部最为密集。主要窑址有魁斗乡的草北窑、翰苑窑、尾峇窑;长坑乡的月眉窑;龙洞乡的珠塔内窑、福昌内窑;尚卿乡的科名官仔尾窑、科洋琵琶峇窑等。以烧造碗、盘类为主,纹饰多花草、山水,或配以诗赋构图。

南安至今发现有3处青花窑址,皆分布在东田乡高山村附近。它们是位于田仔坑田的碗蒋坑窑、碗盆山北的西琦窑、虎脚营山北的东洋窑,烧制碗类,饰以花卉、山水等。

泉州青花瓷窑发现不少,据有关志书记载,青花瓷的烧制最迟在明代嘉靖时期便已经开始了。然而这时还处于初始阶段,器形简单,多为碗类,烧制技术不够发达,胎体表面粗糙,釉多泛黄面带冰裂纹,青色呈灰淡泛紫成灰蓝色,圈足低矮,斜削,不施釉,露出火面红,器心和器底多留有旋纽。纹饰也比较简单,器外壁多描绘花卉、山水、动物纹等。器内则多书写“福”、“禄”、“寿”等单字款。不过,各窑口的发展不平衡,其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德化屈斗宫的产品胎质细腻而坚硬,釉色洁白而均匀,器形为碗、碟、盘、盏、灯座等。纹饰主要有鱼鸟、花草、葫芦、琴等。而安溪窑的产品,碗圈足深挖过肩,底露胎,青花兰色较浓,釉里泛黑,饰以鹤、狮、菊等图案。进入清代,窑口不断增加,生产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窑口之间的联系也较明代广泛和直接。产品种类增多,除碗、盘、碟外,还有盏、匙、炉、鼻烟壶等。器物造型比较讲究,如碗器壁修挺,盘的圈足施削浑圆,呈泥鳅背;纹饰的题材和图案趋于一致,一些常见的花纹在安溪、永春、德化等窑均被普遍采用,体现了泉州青花瓷生产的时代特征和地方风格。

青花瓷器的种类有碗、盘、碟、杯、盏、匙、香炉、鼻烟壶、盂和灯座等。造型大方面不笨重,形态规整而端庄。常见的碗可分为直口收腹、侈口收腹、敞口直腹、敞口腹下折角、敞口曲腹5式;盘可分

为敞口斜腹、圆唇浅腹、圆唇收腹、敞口曲腹、浅腹足 5 式；碟可分为圆唇斜腹、圆唇外侈收腹、圆唇收腹、敞口曲腹 4 式；杯可分为直口收腹、直腹下收平底内、侈口腹下鼓、敞口直腹、侈口腹下折角 5 式。

青花瓷器的胎质因时代的不同和窑口的区别呈现出细微的差异。一般来说，清代的胎质比明代的细腻轻薄，烧成温度较好，而明代的较为粗重，杂质较多。德化窑的产品质量比其他窑口略胜一筹，这与德化悠久的烧瓷历史和元明时代高质量的白瓷烧造基础是分不开的。釉色大多白中泛灰或泛青，不如景德镇的洁白纯净。有的釉而因火候较低而泛黄并带冰裂纹。施釉方式因烧造方法的不同而出现差别，有的全器满釉，有的外底露胎，有的则圈足尖粘沙。

青花瓷器的纹饰发色暗淡，多为灰蓝色，有的甚至接近染料中土靛的颜色，像景德镇青花瓷那样鲜艳明亮的色泽则很少见。同时，由于窑温控制得不好，常见青花晕散模糊的状况。装饰内容取材广泛，画而生动活泼，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俗性。最常见的是植物纹，如牵牛花、菊花牡丹、葡萄、瓜果、杨柳、芭蕉和松、竹、梅等，常饰于碗、盘上。动物纹是泉州青花瓷器的典型纹饰，有龙、凤、麒麟、乳雁、蝴蝶、虫、鱼，一般都与植物、花卉图案紧密结合，如飞龙腾云、狮子戏球、飞凤牡丹、鸳鸯戏水，蝴蝶恋花等。人物与自然景物构成的装饰图案，常见于碗腹盘底，如顽童扑蝶、孩童读书、仕女泛舟、隐士对弈等。文字装饰也是泉州青花瓷较有特色的装饰之一，有单字和诗句两种，单字如“福”、“禄”、“寿”、“春”、“花”等多见于碗内心；诗句多见于碗腹盘底，内容广泛，有的单以诗句装饰，如安溪松仔坑窑带成化仿款的青花碗题“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也有题于画面上的，如安溪洲坑窑青花人物盘题“要知古今事，须读九车书”；德化陈七垅窑的碟在小品青花旁题“春色杏花

香千里”等，构成了完美而充满意境的图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几何图案，象德化的圆圈点纹、永春的雁阵纹，简洁而规整。装饰手法可分为手绘和模印两种。手绘是画工直接用毛笔在瓷胎上绘画。图案清晰流畅，笔法自由奔放，画风朴实。是泉州青花早期的装饰手法。各种装饰多因器而作，在构图上注意与器形的统一。圆矮的碗类器重在加强横向展开的动势，多采用回旋连续纹；立高的瓶类器注意纵向表现，饰以山水纹样；扁平的盘类器则注重圆面布局，以团花为图案。同时还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选择不同的装饰题材和装饰部位，如盛食器碗、盘、碟饰以鱼水、蔬果、瓶、罐等饰以山水、人物或花鸟。模印是把纹样刻制成模涂上颜料在胎体上印盖。这种手法可提高工效，利于成批生产，在较晚的德化、安溪等窑都见使用。

青花瓷器的款识形式多样，多写在器物的底部，有双字款也有单字款。款识内容以作坊款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印章款、纪年款、吉字款和画形款等。

泉州地区悠久的烧瓷历史和先进的烧造技术，为青花瓷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德化、安溪等地不仅蕴藏丰富的高岭土和盛产青料钴石矿，而且燃料充足，尤其是具有文明以来烧造优质白瓷的经验，为青花瓷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青花瓷器均是用匣钵装烧的，由于装烧的方法及垫烧所用的材料不同，必须采取相应的施釉方法，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效果。同类器物叠烧的，在器底均施出一圈露胎，即所谓的“涩圈”，使得器物叠烧而不互相粘连。德化窑中的青花小碟和杯口沿多不施釉，这是采用口缘相对的办法烧造的。使用垫饼垫烧的器物，外圈是无釉；用细沙垫烧的，器物底部粘有一圈沙粒，或留有沙粒的痕迹，即通常被称为的“沙足器”。青花瓷器一般是在龙窑或阶级窑中烧成的。龙窑依山而建，似一条火龙由上面下，窑内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还原

焰。阶级窑由分室窑发展而来,有一定的坡度,所以具有抽力,而且可以利用烟气预热以后各窑坯体,这样既可以节省燃料,又可以烧还原气氛。这两种窑炉都适宜青花瓷的烧造。前面提及,青花瓷器的款识多种多样,在同一座窑炉中器物上可见有几个不同的作坊款,如德化的宝寮格窑,瓷器上有“合泉”、“德源”、“方全”等字样,这很可能是几家窑户分别制胚,然后集中在同一窑炉中烧造的。这种既分工又联合的经营形式的具体情况是很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的。

明清时期泉州生产的青花瓷器,除供当地使用外,更大量的是运销海外。史籍记载和实物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厦门志》记载出洋货物中有永春窑的瓷器,而且还记述说,德化窑的产品经过厦门港口输往噶喇叭、三宝城、实叻、马辰、埭仔、暹罗、柔佛、六坤、宋居腊、丁加卢、宿务、柬埔寨、安南、苏禄、吕宋诸国。《德化县志》也记载了清初青花瓷器畅销日本和东南亚。此外,在其他志书中,亦可见不少有关的记述:最早到达亚洲的欧洲列强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初同福建南部的泉州、漳州、厦门等港口进行瓷器贸易;十七世纪初荷兰人抢占台湾,并以此为据点,从泉州、漳州、厦门转贩瓷器运销世界各地;英国人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从厦门运载了大批瓷器归国。泉州的青花瓷器正是通过各种渠道运销海外的。在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必经之地的亚洲群岛,就发现了大批清代德化窑的青花瓷器,这显然是德化青花瓷外销南洋途经亚洲群岛留下的遗物。

在国外出土和流传的青花瓷器中,也有不少是泉州地区窑口的产品。在日本的秋田县谷地中馆、青森县浪同城、北海道胜山馆和熊本县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德化、安溪等窑口的青花瓷,其中有饰狮子戏球和花卉、人物、动物以及“福”、“寿”吉祥文字的碗、碟等。明代安溪生产的题诗青花瓷盘在冲绳岛也有发

现。输往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产品数量很多,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都发现有德化窑的青花瓷。特别是在印尼出土的半寿纹盘、圆圈占纹小碗、牵牛花碗、花篮纹盘、寿字纹碗等,都是德化、永春、安溪窑中极为常见的产品。在叙利亚哈马古城出土了许多德化的青花瓷器。雅加达博物馆藏的一件书写阿拉伯文字并在底部印有“成化年制”款识的青花碗,也是德化窑烧制的。此外,在埃及福斯塔特古城址出土的中绘吉祥纹四边饰以半寿字纹盘,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出土的圈点纹小碗、云龙纹盘、牵牛花碗、云龙火珠纹碗、花篮纹盘、菊花纹碗等,在德化、永春、安溪等窑口均大量被发现,说明这些窑口的青花瓷器运销到了非洲。大批实物的发现和出土,有力地揭示了明清时期泉州青花瓷器生产及其外销的盛况。

# 明末清初的福建海商与陶瓷贸易

明末清初是中国海上贸易的转换时期，福建海商在这由官府垄断转向私人经营为主体的海上贸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海上私商的崛起，促使以陶瓷为主要输出品之一的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明末清初，福建海商活动之雀跃，陶瓷贸易之繁盛，其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 一

“海者，闽人之田也”<sup>①</sup>。福建内陆崇山峻岭，东南大海浩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人们以海为田的谋生方式。“资食于海外”<sup>②</sup>，利用舟楫之便而通商贸易构成了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自古以来，沿海人民的海上活动便相当活跃，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从各个阶层涌现出来。特别是入宋以后人口增多，耕地寡少的社会问题愈显突出，使得更多的人投身于海商行列。自宋初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250年间，全福建路人口从467815户<sup>③</sup>增至1599214户<sup>④</sup>，增加了3倍以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

② 《泉州府志》卷19《物产》。

③ 《太平寰宇志》卷102。

④ 《文献通考》卷11。

上。尽管开垦土地,围海造田,扩大了耕地面积,然而“生籍繁夥,虽饶确之地,耕耨殆尽”<sup>①</sup>。人多地少的矛盾,犹如时人谢履所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sup>②</sup>,正是福建人口过剩无地可耕而造船发达海商勃兴的真实写照。宋元以来,“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sup>③</sup>。沿海人们经营海外贸易蔚然成风。这一时期,海外贸易是由政府所垄断的。虽然我们从朝廷颁发的许多严禁“私相市易”<sup>④</sup>,打击“贩舶商旅藏隐违禁”<sup>⑤</sup>的诏令中可以窥视那种“不请公据而擅行”<sup>⑥</sup>和“冒犯法禁私漏”<sup>⑦</sup>等走私营利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在官府的控制下进行的。福建海商兴贩牟利于海外,足迹通及东亚、东南亚、西南亚乃至非洲广大地区。“海贾归来富不赀”<sup>⑧</sup>,不仅从商者众,而且出现了许多“货用甚饶”、“其富不赀”的著名商人<sup>⑨</sup>。“海商”成为福建沿海人民谋求生计的一种重要职业。

然而,进入明代,与宋元时期不同,统治者对海外通商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和严格的限制政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由于倭寇的侵扰及海上反对势力的颠复活动,造成“海疆不靖”对朱明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对于这种祸患,明太祖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措施,严厉推行“海禁”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诏“禁濒海民不得私出

① 《宋史·地理志》。

② 《輿地纪胜》卷134。

③ 《东坡全集》卷56《论高丽进奏状》。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63之《權易》。

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

⑥ 《朝野群载》卷20。

⑦ 《真文忠公文集》卷43。

⑧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

⑨ [日]斯波义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海”<sup>①</sup>，接着又多次重申禁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sup>②</sup>；“申严交通外番之禁”<sup>③</sup>；“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sup>④</sup>，甚至“禁民入海捕鱼”<sup>⑤</sup>，“禁民间用番香番货”<sup>⑥</sup>。同时采取严厉的制裁规定，对有犯者“必寘以重法”<sup>⑦</sup>，以此来保证海禁政策的推行和实施。这种“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sup>⑧</sup>的海禁政策，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和大大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闽人生息益众，非仰通番无所给衣食”，官府海禁严急，商船不通，“民何以存活乎”<sup>⑨</sup>？商民“不得下水”，等于“断其生路”。因此，“素以航海通番为生”的福建沿海人民不顾“重以充军处死”之治<sup>⑩</sup>，冲破海禁，下海贸易。洪武年间，“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sup>⑪</sup>。明成祖时，“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sup>⑫</sup>。甚至在宣宗时出现“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sup>⑬</sup>。正统时，“旧濒海居民贸易番货，……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sup>⑭</sup>。可见福建海商“货货通番愈遏愈炽”<sup>⑮</sup>，在明廷申严海禁之政策下“尚犹结党成风，私相贸易”<sup>⑯</sup>。海商摆脱宋元以来官府控制下的朝贡式贸易的束缚，走向自由化，私人海上贸易迅速

① 《明太祖实录》卷 70。

② 《明太祖实录》卷 139。

③ ④ 《明太祖实录》卷 205。

⑤ 《明太祖实录》卷 252。

⑥ 《明太祖实录》卷 159。

⑦ ⑧ 《明太祖实录》卷 231。

⑨ 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

⑩ ⑪ 《泉州府志》卷 25《海防》。

⑫ 《东西洋考》卷 7《徇税考》。

⑬ 《明永乐实录》卷 12。

⑭ 《明宣宗实录》卷 103。

⑮ 《福建通志》卷 270《洋市》。

⑯ 《明史》卷 323。

发展起来。

明中叶以后,尤其是到了嘉靖时期,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下海通番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以葡萄牙为急先锋的西方殖民势力在控制印度洋海域后,于正德六年(1511年)开始叩关中国。西方殖民者的东来,更助长了走私之风潮。明廷为整肃海疆,则一再强化海禁,把海商通番贸易当做打击的对象。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规定对“迎贩私货”、“交结番夷”、“揽造违式海舡”者“严定律例”<sup>①</sup>。四年(1525年)八月,令“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法戍边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sup>②</sup>。八年(1529年)十一月,“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富主。势豪违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sup>③</sup>。十二年(1533年)九月,命“兵部其亟徼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sup>④</sup>。十五年(1536年)七月,封锁海上走私的水道、岛屿,设捕盗馆,对“民有出海货买,在百里外者,皆诣捕盗官处”<sup>⑤</sup>。海商们为了对付明廷的严厉打击,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铤而走险,组织海上武装集团,以“倭寇”、“海盗”的形式,频繁活动于沿海,与官府进行公开的对抗,形成了海禁愈严,走私愈烈,海盗愈多的局面。这种在海禁中海商转为盗寇的情况,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的许孚远曾做过精辟的论述:“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由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用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闽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

① 《明世宗实录》卷38。

② 《明世宗实录》卷54。

③ 《明世宗实录》卷108。

④ 《明世宗实录》卷154。

⑤ 《明世宗实录》卷189。

使然，而漳为甚。先是海禁未通，民业私贩，……当事者尝为厉禁，然急之而盗兴，盗行而寇入。嘉靖之季，其祸蔓延，攻略诸省，荼毒生灵”<sup>①</sup>。仅举福建海商集团之一的头目“通番巨寇”洪迪珍为例，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由海商转为海盗的。洪迪珍初止通贩，嘉靖三十四、五年，载日本富商泊南澳得利，自是岁率一至，致富巨万，尚未有引倭为寇为患实迹，或中国人被倭虏掠，辄以物赎之，遣还其人，人颇德之。戊午（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复来浯屿，诸恶少群往接济，络绎不绝，官府不能禁，设八浆船追捕，竟无一获，又妄获商船解官，于是迪珍始轻官府。官府又拘系其家属，迪珍始无反顾之期，与倭表里为乱<sup>②</sup>。象洪迪珍这样走上亦商亦盗之道路的过程是颇具代表性的。它是明政府强化海禁的结果。

面对这种势态，明政府疲于应付，岁无宁日，实际上不仅无力禁止沿海人民的纷纷下海通商，反而是“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sup>③</sup>。“海禁愈严，贼夥愈盛”<sup>④</sup>，嘉靖年间，是福建海商队伍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阶段。

海禁引发的“祸患”和造成的社会恶果，使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主张兴开市舶。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上奏疏力陈通番舶可供御用，充库藏，民以自肥的好处<sup>⑤</sup>。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兵部尚书赵文华在条陈海防奏疏中，提出弛海禁的建议<sup>⑥</sup>。刑部主事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

① 《敬和堂集》，《明经世文编》卷270。

② 《海澄县志》卷24《丛谈》。

③ 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

④ 唐枢：《御倭杂著》，《明经世文编》卷400。

⑤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番》。

⑥ 《明世宗实录》卷422。

中指出“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他认为“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明廷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用强制的手段禁止海上私人贸易是行不通的。因此，到了隆庆改元（1567年），即采取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禁例”的建议，“许贩东西二洋”<sup>①</sup>，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海禁政策开始松弛。虽然明政府的开禁是有限的，采取了一些控制航海区域，实行“引票”制度，限制进口货物，重征税课，抑止海商博利等措施，但是，由于开放了海禁，“市通则寇转为商”，消除了官府与海商双方的紧张对立，使私人经营海上贸易合法化，为素来“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sup>②</sup>的福建沿海人民，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能够比较自由地经营海上贸易的环境。至此之后，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福建海商趋于兴盛。

## 二

福建海上私商的崛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明末清初呈现出繁盛景象。

出海经商者人数多、规模大。嘉靖以来，福建沿海下海通番者遍布各地，“漳之诏安有海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响、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sup>③</sup>。“福清冯淑等三百四十人泛海通番”<sup>④</sup>。漳泉一带通番商船，更是“往来络绎于海上”<sup>⑤</sup>。隆万年间，福建海商迅速增多，形成了

① 《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② 《明神宗实录》卷262。

③ 《武备志》卷124《福建事宜》。

④ 董应举：《崇相集》第2册《漫言》。

⑤ 张时激：《芝园全集》，《明经世文编》卷213。

出洋经商的高潮。沿海之兴化、泉州、漳州,内地之福宁、福清、连江、长乐,“户习风涛,人熟勾引,百人为舟,方舟为党,旨给船由,开洋射利”<sup>①</sup>。据李光缙《景璧集》云:泉州安海“浮大海争利,十家而九”<sup>②</sup>。高克正《折吕宋采金议》亦云:漳州“澄民习夷者,十家而七”<sup>③</sup>。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压冬”<sup>④</sup>海商25000余人,其中海澄籍人则占百分之八十<sup>⑤</sup>。长乐县嘉登里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因出洋经商而“死海、死盗、死倭及病归死者不下五、六十人”<sup>⑥</sup>。福建海商到吕宋经商的很多,何乔远《闽书》载“其地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地曰洞内者,其久贾以数万”。《明史·吕宋传》亦载福建人至吕宋“商贩者至数万人”。《同安县志》还记述了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八月初五日“漳泉贩吕宋者数万人,骈首为番僧所杀”。在漳泉各地的族谱中也留下了许多福建海商如安海颜氏家族的颜嘉色等17人、黄氏家族的黄中和等16人、陈氏家族的陈永泽等14人、柯氏家族的柯占民等5人,海沧石塘谢氏家族的谢侍銮等30人,厦门吴氏家族的吴烈庚等往吕宋经商的记载<sup>⑦</sup>。到日本贸易的福建海商也不少。据万历四十年(1612年)兵部的估计,往日本的福建海商,“合福、兴、泉、漳共数万计”<sup>⑧</sup>。商贩于南洋者更是不计其数。天启五年(1625年)一艘由泉州驶往吧城的商船,除船主和水手80人外,载有大商人40名和带货小商贩360名<sup>⑨</sup>。谱

① 陈荐夫:《水明楼集》卷14。

② 《景璧集》卷14《二烈传》。

③ 《东西洋考》卷11《艺文考》。

④ 泛海通商,往往不归,名为“压冬”。

⑤ 《澄州县志》卷18《倭乱》。

⑥ 《崇相集》第2册《谕嘉登里文》。

⑦ 参见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

⑧ 《明神宗实录》卷498。

⑨ 《吧城日记》。

牒资料亦有具体的记载：有安海颜氏家族的颜钟浪等 21 人、黄氏家族的黄容官等 17 人、陈氏家族的陈士勋等 3 人、柯士家族的柯仲攀等 3 人，龙海许氏家族的许良辑等 2 人，海沧谢汝棋等 28 人到印尼。还有陈胤欤“商于暹罗”、许廷选“往暹罗”、柯兆焰“往安南”、陈选通“往外夷槟榔屿”、吴昭球兄弟“俱往实叻”等<sup>①</sup>。

不仅出海经商者人数众多，趋之若鹜，规模也越来越大。万历十七年（1589 年）。“以漳州人贩海通倭，定东西洋各派船四十四艘”<sup>②</sup>，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sup>③</sup>，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达到了 137 艘<sup>④</sup>。从月港出海的船舶，“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sup>⑤</sup>。仅就中国开往日本的商船，据有关资料记载统计，在明末清初的 42 年里，共达 1111 艘。每年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17 万两白银<sup>⑥</sup>。张燮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夥者也”<sup>⑦</sup>。

泛海通番范围广。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所谓东西二洋，《东西洋考》释云：“盖东西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罗诸国”<sup>⑧</sup>。据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福建巡抚规定的每年出洋以 88 艘为限的商船之航行地点及船数分配给引所载，我们可以了解更为详细的通商国名或港名，列如下表：

① 参见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 年。

② 谈迁：《国榷》卷 75。

③ ⑤⑦⑧ 《东西洋考》卷 7《徕税考》。

④ 《明神宗实录》卷 316。

⑥ 参见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及《长崎荷兰商馆日记》、《平户荷兰商馆日记》等。

洋别	国名或港名	船只数
东 洋	吕宋	16只
	屋月、沙瑶、玳瑁、宿雾、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单	各2只
	磨蕙英、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岸塘、吕达	各1只
	东洋船只合计	44只
西 洋	下港、暹罗、旧港、交趾	各4只
	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	各3只
	马六甲、顺化	各2只
	大泥、乌丁礁材、新村、哑齐、交留巴、思吉港、文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宁、陆坤	各1只
	西洋船只合计	44只

福建海商与“东西洋”通商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43个。他们不仅活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沿岸国家和地区，与西欧各国也发生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虽极远番国，皆能通之”，其航海商贩之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资本雄厚贸易量大。明中叶以来，下海经商者一般都是“各船所认所主，装载而还，各自买卖，未尝成群”<sup>①</sup>的零星松散的小本商贩。后来，由于海上贸易的“强弱相凌，自相劫夺”，也为了对付禁海官兵的剿捕，海商“因各结宗，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并逐渐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sup>②</sup>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涌现了如安海的李寓西、陈斗岩、沈儒人、曾友泉、史小楼等那样的一大批被誉为“上贾”的巨商，也出现了象漳州人谢老、严山老、洪迪珍、许西池，龙溪人张维，诏安人吴平、曾一本等许多著名的海商集团头目。他们以雄厚的资本进行巨额的贸易而博

①② 范表：《玩鹿亭稿》卷5。

获其利，“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剖脰脍，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sup>①</sup>。海商对外贸易量之大，可以从政府征收船税的数额反映出来。隆庆部分开禁后，明廷在月港设立榷税机构，由驻澄之漳州府海防同知掌收船税。隆庆六年（1572年）“开设船税，仅数千金”，万历四年（1576年）“饷溢额至万金”，十一年（1583年）“累增至二万有余”，到二十二年（1594年）“饷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sup>②</sup>，在20年间，船税增加了将近5倍。

论及于此，我们不能不提到拥有大批船只、势力强盛、影响最大的郑氏海商集团。“性情荡逸，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sup>③</sup>的郑芝龙跟随母舅程黄“行贾香山澳”，从事海外贸易，不几年先后继承了义父“积累巨万”的海商李旦和接受了“积颇饶”的海商颜思齐的资产而很快地称雄海上。天启七年（1627年）郑芝龙接受明廷的招抚，在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活动，仅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六、七两个月内就运往长崎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丝织品140760匹<sup>④</sup>。顺治十一年（1654年）曾派26艘大型船舶到日本贸易，十二年（1655年）又派24艘到东南亚等地贸易<sup>⑤</sup>。与此同时，不断打击和剪灭海上贸易的竞争对手，扩张自己的势力，从而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史称郑氏“独有南洋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

① 周起元：《东西洋考序》。

② 《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③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

④ 参见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及《长崎荷兰商馆日记》、《平户荷兰商馆日记》等。

⑤ 《吧城日记》。



行”<sup>①</sup>，“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sup>②</sup>。到了郑成功时期，郑氏海商资本的积累更进一步发展，拥有“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万”，“饷粮虽就地设处，向有吕宋、日本、暹罗、咬留吧、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sup>③</sup>。郑氏海商集团称盛一时，富可敌国，明末清初福建海商的资本之雄厚和贸易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活动中心港口的出现。福建海岸漫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有许多天然良港。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多处避开官府而进行商贸活动的新港埠。其中漳州的月港、晋江的安平成了海商活动的中心，著名的对外贸易口岸。

月港位于漳州城东南 50 里，“昔为斗龙之渊，浴鸥之渚，结茅而居者，不过捕鱼纬萧，沿作生活”<sup>④</sup>。进入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人们置海禁于不顾，下海贸易。宣德八年（1433 年）有专门令漳州卫同知“严同番之禁”<sup>⑤</sup>。景泰（1450—1456 年）以来，“民多货番”<sup>⑥</sup>，到成弘（1465—1505 年）之际，月港“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百万”，有“小苏杭”之称<sup>⑦</sup>。嘉靖（1522—1566 年）间，月港已是“居民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积，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罗，南通佛郎机、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sup>⑧</sup>。隆庆开禁后，明廷特别在月港设县治，曰海澄，加强海上贸

① 邵廷霖：《东南纪事》卷 11。

② 林时对：《荷锄丛谈》卷 4。

③ 《台湾外纪》卷 10。

④⑦ 《海澄县志》卷 15《风土志》。

⑤ 《福建通志》卷 270《洋市》。

⑥ 《漳州府志》卷 25《宦绩》。

⑧ 朱纨：《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增设县志以安地方疏》。

易的管理,并置“督饷馆”征收船税。隆万(1567—1620)时期,“易私贩而为公贩”,月港进入了全盛的发展阶段,从事海外贸易的“富商巨贾,捐亿万,驾滕艚,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蓬,约千寻之修纜”,航行于东西洋<sup>①</sup>。月港呈现了“富商远贾,帆樯如栉,物货浩瀚,应无虚日”<sup>②</sup>的空前繁荣景象。其“籍舟楫之利,以腴丽甲天下”<sup>③</sup>,成为闻名于世的一大商港。

安平(即安海)港位于泉州南部围头湾内,离县治60余里。宋元时代,作为“号为天下最”的泉州港的重要支港,其民“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sup>④</sup>,已是相当繁荣的港口市镇。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后随即在安海建津榷税。在明代,由于安海“县治去远,刁豪便于为奸”<sup>⑤</sup>，“素以尚贾善贸闻于世”的安平商人“浮沧海远及诸夷”，“纵横海上与夷人争利”<sup>⑥</sup>，成为闽南私商活动的一个重要港口。隆万时，安平商人利用月港“开洋”后的合法地位，作为出洋贸易的转输港口，“漳郡海澄乡宦竞设内港渡，往来安平，以济商人，甚为称便”<sup>⑦</sup>。于是安平港与月港并驾齐驱，成为福建最大的两个海上贸易商港。安平商人泛海通商，其中以往吕宋者尤多，李光缙《景璧集》云“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路通，浮大海争利，十家而九”<sup>⑧</sup>。特别是这里成为郑氏海商集团的重要据点和对

① 郑怀魁：《海赋》。

② 张邦奇：《张文定甬川集》。

③ 《海澄县志》卷23《艺文》。

④ 《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

⑤ 黄堪：《海患呈》。

⑥ 《安海志》卷12《海港》。

⑦ 《安海志》卷14《桥渡》。

⑧ 《景璧集》卷14《二烈传》。

外贸易基地。郑氏在安海“开府其间”，“第宅弘丽”，“甲于泉郡”<sup>①</sup>。其利用大量的海商资本，开展海外贸易活动。据载，1654年11月至1655年九月间，有41艘属于“国胜爷”的商船从安海开至日本长崎。1655年3月，从这里开往台湾、巴达维西、东京、暹罗、广南、马尼拉等地的商船有20多艘<sup>②</sup>。正是由于郑氏海商集团的着力经营，使安海港在明天启间（1621—1627年）跨入了全盛时期，甚至超过月港而跃居当时私人海上贸易港口之首位。其“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sup>③</sup>。

应该说，如果没有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和海商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明代月港和平安港的繁盛。

### 三

明末清初海商的崛起和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经济交流。“以我之绮纨瓷珎，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争趋之”<sup>④</sup>。中国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远销世界各国，海外的大宗货物也络绎不绝，满载而来。瓷器是除生丝、丝绸制品、蔗糖、茶叶以外的又一主要贸易品。

中国以盛产瓷器而著称于世，价廉物美的陶瓷历来是深受各国人民欢迎的外销商品。据《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统计，在1602年至1682年的80年中，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转手输出的陶瓷竟达1600万件以上<sup>⑤</sup>。民间海商的交易更是难以估量。中国瓷器

①③ 《台湾外纪》卷4。

② 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额的考察》，《史学杂志》第62篇第1期。

④ 《东西洋考》卷7《餉税考》。

⑤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每年都大批地出口日本、菲律宾、东南亚和非洲、欧洲各地。在日本,《出岛荷兰商馆日志》载1641年6月24日一艘郑芝龙派去的商船有瓷器1447件。《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载同年6月26日、7月1日、7月4日从安平港运入茶碗1400件、茶壶197件和其他瓷器1000件。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菲律宾,成为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在东南亚,中国瓷器的进口以巴达维亚为据点而销往其他各地。据估算每年总数达379670件<sup>①</sup>。输入非洲和欧洲的中国瓷器,不仅有文献的具体记载,而且有考古发掘的大批遗物为佐证<sup>②</sup>。有人曾对中国瓷器在明末清初的大量外销而感慨地说:“世界对瓷器的要求是如此之多,以致于最后都充满了中国的杯和茶壶”<sup>③</sup>。

瓷器源源不断地远销海外,刺激了福建制瓷业的迅速发展。明末清初以烧制青花瓷器为主的窑址如雨后春笋遗布境内各地。经过文物普查,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有数百处。主要分布在三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即闽江上游的建阳地区、晋江流域的泉州地区和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地区。重要窑址有建阳地区的浦城县碗窑<sup>④</sup>,崇安县主树垅窑、老鹰山窑、郭前窑<sup>⑤</sup>,屏南县前院窑<sup>⑥</sup>,政和县碗厂窑<sup>⑦</sup>等。泉州地区是窑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德化县15乡的41个村,发现窑址130多处。较为代表性的是陈七垅窑、后格垅尾窑、黄仔坂窑、和玉窑、仙亭厂窑、石坊窑、山边洋窑、岭兜窑、后所窑、石排格窑、坂头窑、宏祠窑、宝寮格窑、碑坝窑、桐岭窑、洞上月记窑等<sup>⑧</sup>;

①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②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

③ D. W. Davies,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 1961, The Hague, P. 62.

④⑤ 《福建省最新发现的古代窑址》,《文物》1959年6期。

⑥⑦ 福建省文管会编印:《福建古窑址资料汇编》,1959年。

⑧ 晋江地区文管会编印:《晋江地区文物考古普查资料·德化部分》,1977年。

永春县有陈兰窑、黑坝窑、外窑、长垵窑、风流岭窑、过路溪窑、白格窑、南社岭窑、洋坪窑、嵩安窑、石蔗山窑等<sup>①</sup>；安溪县发现窑址数十处，有草北窑、翰苑窑、尾岙窑、月眉窑、珠塔内窑、官仔尾窑、琵琶岙窑、福昌内窑<sup>②</sup>；南安县有西琦窑、碗蒋坑窑、东洋窑等<sup>③</sup>。漳州地区有漳浦县坪水窑<sup>④</sup>、平和县五寨窑、南胜窑等<sup>⑤</sup>。这些窑口烧制的青花瓷产品，胎质细腻轻薄，釉色白中泛灰或泛青，饰以牵牛花、菊花、牡丹、芭蕉、瓜果等植物纹和龙、凤、麒麟、乳雁、蝴蝶、虫、鱼等动物及文字、图案、人物与自然景物结合等花纹，器型为碗、盘、碟、杯、盏、香炉、鼻烟壶、盂、灯座等，充满浓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产品不仅大宗出口，而且运销世界各地，日本的秋田县、青森县、熊本县、冲绳县和北海道等地发现有装饰以狮子戏球纹、羯摩纹、莲花纹和文字、牡丹、唐草、人物、动物纹样的碗、碟等德化窑、安溪窑的产品<sup>⑥</sup>。在平户海域中出土了一批平和五寨窑和南胜窑的碗、碟类器物。近年来发掘的平户荷兰商馆遗址和郑成功居宅遗址，以及大阪城下町遗址，也出土了一批福建窑口的产品<sup>⑦</sup>。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都发现有德化窑的青花瓷器。菲律宾群岛发现的卧足青花

① 《晋江地区文物考古普查资料·永春部分》。

② 《晋江地区文物考古普查资料·安溪部分》。

③ 《晋江地区文物考古普查资料·南安部分》。

④ 《福建省漳浦县古窑址调查》，《考古》1987年2期。

⑤ 据福建省博物馆粟建安先生调查资料。

⑥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集，《海交史研究动态》第8期。

⑦ 据日本国森村健一、松尾信裕两位先生提供的资料和参见平户市文化财协会编印的两个遗址发掘报告（1992年）、大阪市文化财协会编印《大阪出土的桃山陶磁》（1993年）。

碟<sup>①</sup>，印尼发现的半寿纹盘、圆圈点纹小碗、牵牛花碗、花篮纹盘、寿纹碗等，均是德化、永春、安溪窑址中极常见出土物<sup>②</sup>。非洲发现的福建瓷器也很丰富，如埃及福斯塔特城址出土的中间画吉祥纹围边饰半寿纹的盘，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出土的圈点纹青花小碗、云龙纹盘、牵牛花碗、云龙火珠青花碗、花篮纹青花盘、梵纹碗、菊花纹碗等，也在德化、永春、安溪等窑口产品被大量发现<sup>③</sup>。

福建窑口的陶瓷制品，随着海商的足迹输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乃至非洲等地。国外大量中国陶瓷传世品的发现和实物的出土，不仅充分反映了明末清初福建制瓷业的兴盛，而且有力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

①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集。

② 《中国古陶瓷在西亚》，《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2期。

③ 《作为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1期；《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 后 记

七十年代中叶,被誉为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的泉州宋代海船的出土,轰动海内外,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古代海外交通的热潮。那时还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我,得益于庄为玘教授的启迪和教诲,对泉州海外交通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而留校任教,在庄老师的真诚提携和悉心指导下,致力于教学工作,与此同时,围绕着泉州港与海外交通史这一既有地方特色又具国际性意义的学术课题,展开了考古研究。

20年来,调查历史遗迹,搜集志乘谱牒,积累了一批资料;专心致志治学,夜阑挑灯钻研,撰写了多篇文章。这里,斟选了有关海外交通史迹研究方面的论文18篇,作为一个阶段性的、专题性的成果,结集出版。野人献曝,不揣谫陋。倘若敝帚能有丝许裨益于同仁,实乃自珍而望外之幸。

值此付梓之际,我深切地怀念我的学术引路人和恩师庄为玘教授。他奖掖后学,厚爱有嘉,得其教益匪浅。我衷心地感谢诸位良师益友,承蒙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受惠良多。还要于此提及的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高华教授欣然拨冗为本书作序,厦门大学历史系吴孙权君赐笔题写书名,厦门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方面给予的诸多关照,谨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庄景辉

1995年8月16日